

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五十一卷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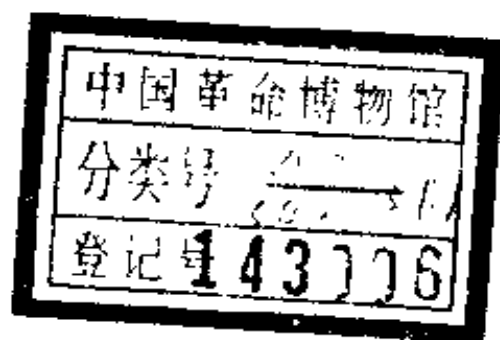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

名誉会长 邓力群

会 长 李力安

《中共党史人物传》编委会

主编 王 淇 陈志凌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新登字001号

中共党史人物传

第五十一卷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

名誉会长 邓力群

会长 李力安

《中共党史人物传》编委会

主编 王 淇 陈志凌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新华书店经销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625印张 9插页 258千字

1994年5月第1版 199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224-03299-9/K·442

定价：11.00元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

顾 问：杨尚昆 习仲勋 王首道 刘澜涛
陆定一 陈丕显 萧 克 马文瑞
乔明甫 莫文骅 李 新

《中共党史人物传》编委会

副主编：郭洛夫 黄 瑶

参加本卷审稿人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淇 三 敏 朱佳木 汪 新
陈志凌 吴殿尧 郑建英 姜廷玉
贾象实 郭洛夫 黄 瑶 阎景堂

责任编辑：郭洛夫

前 言

在《中共党史人物传》丛书 50 卷的编审工作即将结束的时候，关心这套丛书出版的人们，纷纷向我们了解今后编撰打算。在中共党史研究会内部，对这件事也经过多次议论。1990 年 10 月 26 日至 28 日，研究会在北京召开常务理事扩大会议，正式讨论这一问题。多数人认为党史人物的研究和党史人物传的编写是长期工作，要继续进行下去，不应中断，我们这一代党史工作者至少也该完成我党第一、二代杰出革命家传记的编写任务，建议继续编写出版《中共党史人物传》。会后，草拟了 700 多人的编纂规划初稿，呈报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有关部门。

1991 年 6 月，《中共党史人物传》50 卷出齐，研究会和陕西人民出版社在人民大会堂联合召开座谈会，中央领导同志、革命老前辈、中央有关部门领导同志、党史专家，以及首都新闻、出版界的同志们出席了会议。陕西人民出版社文炎社长代表我们两家汇报了《中共党史人物传》的编审与出版工作，提出了继续编辑出版《中共党史人物传》的设想，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关心和支持。时任中共中央常委的宋平同志给本研究会和陕西人民出版社写信，表示“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完成百卷书的编写任务”；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胡乔木同志挥毫题词：“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同年 9 月，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在西安召开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正式确定了“再用10年时间，再编50卷书，使我党第一、二代著名领导人的传记都能收入《中共党史人物传》”的研究、编纂任务。大会产生了新的理事会和编委会，负责领导和组织新的编纂任务的实施。

为了更好地完成《中共党史人物传》后50卷的编纂任务，我们建议各地党史人物研究机构及其领导者重视下列几项工作：

第一，紧紧依靠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中共党史人物研究工作，是中共党史工作的重要方面，又是一项党性原则很强的工作。任何轻视、削弱党对党史人物研究工作的领导，都可能导致我们迷失政治方向，脱离马克思主义立场，犯原则性错误。因此，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及下属机构必须把尊重党的领导作为研究会的纪律规定下来。我们应主动地把党史人物编写计划，送交有关党史研究部门征求意见；编写出来的重要人物传稿呈送党委领导同志和党史研究部门审阅；把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呈报他们解决。邓力群同志在本研究会召开的两次会上，都强调加强党对《中共党史人物传》的组稿、编写、出版发行工作的领导问题。他建议，长期在部队任职的党史人物的传记，由军队承担写作、审稿和出版后的发行任务；除此以外的党史人物传记，则由地方各省市分工承担写作、审稿和发行。他还要求把编书同地方党史资料征编工作和革命传统教育结合起来，使我们出的书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些意见都是从实际出发的，对中共党史人物研究工作的开展很有帮助。

第二，充分发挥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的积极作用。我们这个学术团体是由中共党史（包括中国革命史）学界党史人物研

究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的。研究会理事、编委来自全国高等院校党史、中国革命史教师，党史、军史研究部门，以及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的研究人员。他们是联系全国中共党史人物传记作者的纽带。《中共党史人物传》前50卷作者近千人（参加收集传记资料的人员还未计在内），这是一支很大的党史人物研究力量。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能通过各自不同的渠道，解决他们撰写传记必需的人员、档案、经费等困难问题，写出文情并茂的传记来。我们这个研究会是个长期没有设专职办事人员、没有专门经费的学会，如果不是在中央和地方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充分调动了党史、军史、中国革命史、中国现代史学界各方面专家、学者的积极性，很难设想仅仅10年多一点的时间，就完成了这样一部1200余万字的皇皇巨著。这是开展党传人物研究工作的一条重要经验，我们应充分运用这一经验，把党史人物传记的编撰工作推向前进。

第三，积极争取革命前辈的支持和指导。现在健在的70岁以上的革命老人，大都退居二线。他们阅历丰富，不少人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有的人还参加了北伐战争。他们熟悉历史上重大的历史事件、重要的党史人物，是党史的见证人。访问他们，请他们座谈，既可“抢救”他们头脑里的活材料，又可帮助我们考证、鉴别历史材料的真伪。一切访问材料充分的传记，必然是生动感人的。这项工作应当抓紧，不可错过时机，一旦老人去世，将他熟悉的历史资料带走，留下某段历史空白，将是很难弥补的损失。

在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上，刘澜涛、邓力群和被选为二届理事会会长的李力安等领导同志作了重要讲话，一些省市代表介绍了编写党史人物传记的经验和编撰《中

《中共党史人物传》后 50 卷书的设想。这一次发动群众，组织力量撰写中共党史人物传记的会议。1992 年 1 至 2 月，《中共党史人物传》编委会又在北京召开了部分编委参加的审稿会，审定了《中共党史人物传》第 51、52、53 卷传稿。这标志着本研究会的编撰活动，迈出了新的一步。但也应看到，我们提出的编写《中共党史人物传》第 51 - 100 卷书的计划，是一项十分浩大的工程，10 年左右要完成，每年开两次审稿会，出五本书，这个任务是十分艰巨的。我们应进一步落实西安会议的精神，抓紧时间，修订计划，落实任务，采取有力措施，兢兢业业，团结一致，一步步地去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

王 洪

陈志凌

1992 年 3 月 8 日

目 录

前 言	王 淇 陈志凌 (1)
陈独秀	任建树 (1)
萧云鹄	方修胜 (130)
王平章	《王平章》编写组 (154)
李赐凡	李安牛 (177)
常乾坤	于 禔 吴秋奎 (200)
王集成	陈赛文 (229)
何 穆	田 蓓 (258)
屈 武	张守宪 梁星亮 (289)

附录

关于《中共党史人物传》的研究、编写和审改工 作的几点意见—— 1991 年 9 月 24 日在中共党 史人物研究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陈志凌 (334)
总结过去 继往开来——1991 年 9 月 25 日在中 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发 言	贾象实 (343)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章程	(355)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聘请顾问名单	(359)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关于聘 请名誉会长的决定.....	(360)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名单.....	(361)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第二届常务理事会成员名单	(362)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中共党史人物传》编委会 组成人员名单.....	(363)

陈 独 秀

任 建 树

陈独秀，字仲甫，号实庵，谱名庆同，青年时代官名乾生^①，光绪五年己卯八月二十四日（1879年10月9日）生于安徽安庆“一个小户人家”。父衍中，屡试不第，以教书为业，是个穷秀才，1881年10月在苏州教书时死于疫疾，时独秀两周岁。母查氏，疏财仗义，是个好打抱不平的女丈夫。叔父衍庶，是光绪元年（1875年）的恩科举人，初任知县，后步步高升，由知州、知府而道员，置田产，筑宅第，开商铺，于是“一个小户人家”一跃而为安庆的名门望族。

独秀兄弟姐妹4人，有一位兄长和两位姐姐。兄长谱名庆元，官名健生，是府学廪贡生。因叔父无子，独秀5岁时便过继给叔父做嗣子。

刚强的个性 科举的逆子

陈独秀童年时随祖父章旭习《四书》、《五经》。祖父绰号

^①陈独秀一生用过的别号、笔名、化名已知有40多个。“独秀”一名，首次见于1914年11月10日发表于《甲寅杂志》上《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的署名。

“白胡爹爹”（安庆方言称祖父为爹爹）。当邻里的孩子哭闹时，“一说‘白胡爹爹来了’，便停声不敢再哭。这位白胡爹爹的严厉可怕便可想见了”。陈独秀在1937年写的《实庵自传》里，对于随祖父读书的情况有一段精采且耐人寻味的文字：

我从六岁到八九岁，都是这位祖父教我读书。我从小有点小聪明，可是这点小聪明却害苦了我。我大哥的读书，他从来不大注意，独独看中了我，恨不得我一年之中把《四书》、《五经》都读完，他才称意。《四书》、《五经》还罢了，我最怕的是《左传》，幸亏这位祖父或者还不知道“三礼”的重要，否则会送掉我的小性命。我背书背不出，使他生气动手打，还是小事；使他最生气，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令人可怕的，是我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一声不哭。他不只一次愤怒而伤感的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我的母亲为此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可是母亲对我并不像祖父那样悲观，总是用好言劝勉我，说道：“小儿，你务必好好用心读书，将来书读好了，中个举人替你父亲争口气。你的父亲读书一生，未曾考中举人，是他生前一桩恨事！”我见了母亲流泪，倒哭出来了。母亲一面替我揩泪，一面责备我道：“你这孩子真淘气，爹爹那样打你，你不哭，现在倒无端的哭了！”母亲的眼泪，比祖父的板子着实有权威，一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尤其妇人哭，母亲的眼泪是叫我用功读书之强有力的命令。

一次白胡爹爹又毒打小孙子，孙子仍旧不哭。于是形成了

一种奇特的阵势，一边是越打越狠，一边是咬紧牙关，以沉默相对抗，就是不哭。最后，许是祖父没力气再打下去了，才算结束了这场“战斗”。祖父气得没法，又似乎从小孙子的沉默抗拒中悟出了什么道理。他对乡人说：这孩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

只有硬汉子在受到毒打时才会不哭、不讨饶、不求情、不屈服。但陈独秀并非铁石心肠，他有丰富的感情，丰富的爱，当他“见了母亲流泪倒哭出来了”^①。陈独秀的刚烈而又温情的个性在幼年就形成了。

陈独秀的祖父去世以后，家里曾给他请过几个塾师，他都不满意。到十二三岁时，由大哥教他读书。大哥的脾气恰与祖父相反，是个阿弥陀佛的好好先生，他知道弟弟不喜欢《四书》、《五经》和八股文，便教他读《昭明文选》。陈独秀很快读出了味道，发生了兴趣，“从此更加看不起八股文”^②。那个时代读书人的唯一“正道”是走科举道路，考秀才、中举人、会进士、点状元，然后做官当老爷，发家致富，光宗耀祖。走这条路就必须把《四书》、《五经》读得滚瓜烂熟和会作八股文，可这两样正是独秀所讨厌的，大哥把他没办法，只好听其自然。

1896年，陈独秀通过了县考、府考。他为了“敷衍母亲”，还得去参加院试。院试时，他一看试题是什么“鱼鳖不可食也材木”的截搭题，立即决定“对于这样不通的题目，也就用不通的文章来对付”^③。他“把《文选》上所有鸟兽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头不对马嘴，上文不接下文的填满了一篇皇皇大文”^④。陈独秀放荡不羁，实

①②③④陈独秀：《实庵自传》，《宇宙风》散文十日刊第51、52、53期。

在是在给科举开玩笑。没料到他“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通的大师。”院试结果，陈独秀中第一名秀才。

陈独秀的叔父是举人，哥哥是秀才，现在陈家又出了个秀才，这使地方上的绅士更要另眼看待。于是有许多富户人家托人来与独秀说媒，争相与陈家联姻。在这场联姻竞争中，获胜的是安庆统领高登科，他把长女高晓岚许配给陈独秀。1897年冬，独秀与晓岚成婚。按照封建婚姻的观点，这对夫妻可算是门当户对，文武相亲；至于男女双方对他们的终身大事有什么想法，似乎无关紧要，也不须征求他们的意见。晓岚是位旧式妇女，虽没文化，但有教养，善良温和，孝敬公婆。而独秀却是个不安分守己的人，特别当他后来走南闯北，思想变化日新月异，这注定这对夫妻是不会白头偕老的。

陈独秀和高晓岚生了三男二女。他和孩子们很少生活在一起，对孩子们的教育也有其独特的方式。大约在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时，他把长子延年、次子乔年带到了上海，“寄宿在《新青年》发行所亚东图书馆店堂的地板上，白天在外工作，谋生活自给，食则夸饼，饮则自来水，冬仍衣衾，夏不张盖，与工人同工作，故颜色憔悴，人多惜之，而怪独秀之忍也。”这时陈独秀已与他的小姨子即晓岚的同父异母的妹妹君曼结为伉俪。君曼认为自己是孩子们的姨妈，也是他们的继母，看到他们这般受苦，曾“流涕不已”，托人向陈独秀说情，让两个孩子在家里食宿。陈独秀说：“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叫他自创前途可也”^①。是呵！陈独秀不惜

^①潘赞化：《我所知道的安庆两个小英雄故事略述》，《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第1辑，1980年7月。

抛却唯有他（他的大哥于1909年去世）可以继承的万贯家产，而长期漂泊在外，就是为了自创前途和实现自己的理想。他是按照自己成长的方式去教育他的下一代的。后来延年、乔年都很快成为著名的中国共产党人。

乡试落榜 尊崇维新派

1894年中日战争，一个泱泱大国被一个维新不久的日本小国所战败，这对中国人民的刺激，超过了鸦片战争以来任何一次丧权辱国的战争。战争的失败，屈辱的条约促使中国先进分子急谋救亡图存的良策。1895年，康有为联络在北京应试的1300名举人，联保上书光绪皇帝，请求变法。次年8月，康氏大弟子梁启超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发表《变法通义》，揭露封建专制的腐败；抨击顽固派因循守旧；历数变法之利与守旧之害；阐明变法是大势所趋。陈独秀就是在高昂的维新变法的呼声中走进乡试考场的。

1897年夏，陈独秀离家到南京参加江南乡试，应考举人。他对这次考试是“着实准备了”的，对讨厌的八股文也“勉强研究了一番”。他认为乡试“这场灾难是免不了的，不如积极的用点功，考个举人以了母亲的心愿”，往后好“专心做点正经学问”。他“打定主意，只想考个举人了事，决不愿意再上进”^①，继续走科举道路。

八月初七日（公历9月3日），当陈独秀背着考篮、书籍、文具、食粮、烧饭的锅炉和油布，“竭尽了生平的气力”，踏进

^①陈独秀：《实庵自传》。

那污垢、腐朽、扼杀个性的考棚，便“三魂吓掉了二魂半”。对他印象最深的是“考头场时，看见一位徐州的大胖子，一条大辫子盘在头顶上，全身一丝不挂，脚踏一双破鞋，手里捧着试卷，在如火的长巷中走来走去，走着走着，上下大小脑袋左右摇晃着，拖长着怪声念他那得意的文章，念到最得意处，用力把大腿一拍，翘起大拇指叫道：‘好！今科必中’。”^①这个丑态百出的大胖子，使陈独秀“看呆了一两个钟头”，并“联想到所有考生的怪现状；由那些怪现状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所谓抡才大典，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因此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在《时务报》上说的话是有些道理呀！”这一连串的联想便是陈独秀“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之最大动机”^②。

陈独秀后来回忆起他的思想变化时，说少年时在家里读书，“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奋发有为，也不过念念文章，想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罢了。……到了甲午年，才听见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到了庚子年，又有什么英国、俄国、法国、德国、意国、美国、奥国、日本八国的联合军，把中国打败了。……我越思越想，悲从中来。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此中必有缘故”^③。又说：那时“读八股讲旧学”，认为“习欧文谈新学”的士大夫是“洋奴”，后来

①②陈独秀：《实庵自传》。

③三爱（独秀的笔名）：《说国家》，《安徽俗话报》第5期，1904年6月14日出版。

“读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粲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①。

乡试结果，陈独秀落榜，没有考中举人。他不仅不懊丧，反觉“意外有益”。从此，他与科举彻底决裂。他回到安庆以后，对反对康梁言论的顽固派，“愤不能平，恒于广座为康先生辩护，乡里瞽儒”，以此指斥他“为康党，为孔教罪人”^②。陈独秀开始涉足于政治活动了。

就在陈独秀参加乡试的这一年，德国占领了山东胶州湾，接着俄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列强在华掀起了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扬言要瓜分中国，中华民族面临着严重的危机。陈独秀“痛感时势日非，不堪设想”，在这年的岁末撰写了《扬子江形势论略》一文。这是目前见到他最早的一篇论文，全文7000余字，广征博引，纵论长江上自荆襄，下至吴淞口的形势。文章对江水流向、缓急、深浅和江面的宽狭，江中沙渚的分布和南北两岸各处城镇的战略地位都作了详细的论述，并参照历代战争的得失，向清政府提出了对加强长江防务的具体方案。他认为“若防内乱必据上游，若遇外侮，必备下游，必江口之备已周，再有海军为辅，则欧西之铁甲〔甲〕虽强，亦不容其越雷池一步矣”^③。全文的主旨显然是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但他这时误认为清政府可以代表民族的利益，因此也提出所谓“防内乱”（指前不久的太平军起义）的意见。

①陈独秀：《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新青年》第2卷2期，1916年10月1日出版。

②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第2卷4期，1916年12月1日出版。

③以上引文均见陈独秀：《扬子江形势论略》，藏安庆市图书馆。

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戊戌六君子惨遭杀害，充分证实清王朝反对任何的革新。陈独秀的思想也很快从改良派进步为革命派。

转向革命派 发动安徽拒俄运动

1901年11月，陈独秀到达日本东京自费留学，进东京学校^①（即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的前身）。在未正式入学之前，他先在高等师范学堂速成科学学习日语和普通课程^②。那时到日本留学的青年一年比一年多，1900年，约一百人；1902年增至二三千人；到1905年多达五六千人。他们大多认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而经过明治维新一跃而为强国的日本，便成了中国人学习的样板。于是东京一时成为中国先进知识青年荟萃之地。

在陈独秀到达东京的前一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围剿义和团，清政府与11个国家订立了《辛丑条约》，从此完全屈服于帝国主义，成为它们统治中国的工具。陈独秀恰在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国内社会矛盾更加激化的时期，来到东京留学的。

东京的留学生自办的第一个杂志是《译书汇编》，专门译载欧美的政法名著，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穆勒的《自由原理》等等。这些著作都是资产阶级推翻封建统治、建立民主政治的思想武器，广泛地流传于进步的知识

①《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一次报告书》。

②《中国留日学生史》。

青年中。留日学生秦力山等还在东京创办《国民报》，宣传天赋人权、自由平等。陈独秀到达东京后，首先接触到的正是西方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一整套思想体系，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和汲取这些新学说。

1902年春，陈独秀从日本回到安庆。他联络当地的青年志士潘赞化、葛温仲等在安庆北门藏书楼发起演说会，并在藏书楼内设阅览室，陈列他从东京、上海带来的各种革命书刊，传播新思想。同年9月，他再到东京，与潘赞化一同进成城学校（日本士官学校预备学校）学习陆军^①。这时，留学生中革命与保皇的政治思想分野日益分明。同年冬张继等发起组织青年会，“明白揭示以民族主义为宗旨，破坏主义为目的”，是东京留学生中最早标榜民族主义的团体^②。陈独秀决然加入青年会，这标志着他从康梁派转向革命派。

清政府为了约束留日学生，派遣学监到日本。学生监督姚煜常钳制学生；品德卑劣，引起公愤。1903年3月某日晚，陈独秀、邹容、张继等5人闯入姚室，声言要割掉他的脑袋。姚哀求宽大。邹容说：“纵饶汝头，不饶汝发”，于是“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稍稍抒发割发代首之恨”^③。事后，姚与清政府驻日公使勾结日方，由日警捕人，陈独秀、张继、邹容3人于4月间被迫回国。也就在这时，全国大城市爆发了拒俄运动。

当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时候，俄国派遣了17万大军占领了中国东北。义和团被镇压以后，按约俄国应在1903年4月撤军，

①《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二次报告书》。

②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第61页。

③章士钊：《疏〈黄帝魂〉》，《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229页。

届时俄国不但拒不撤军，反而提出七项新要求，妄图永远霸占东北三省。于是，上海首先兴起拒俄运动，反对清政府与俄国签订新约。

5月17日，陈独秀在安庆藏书楼举行爱国演说会。是日大雨滂沱，到会的有安徽大学堂等校学生300余人。大会“众情踊跃，气象万千”，由陈独秀首先发表演说^①。

陈独秀指出，若依俄国提出的七项要求，“举凡政权、商权、矿路权、兵权、税权，均归俄人之手，则东三省已非我有”。“我政府若允此约，各国必执利益均沾之说瓜分我中国；若不许，则必与俄战。我国与俄战之仇固结不解，我国之人有一人不与俄死战皆非丈夫！”可是“中国人如在梦中，尚不知有灭国为奴之惨，即知解而亦淡然视之，不思起而救之。”因此，他提出当前应广泛地宣传中国将被瓜分的消息；向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若“谓中国人天然无爱国性，吾终不服，特以无人提倡刺激，以私见蔽其性灵耳。若能运广长舌，将众人脑筋中爱国机关拨动，则虽压制其不许爱国，恐不可得。”^②陈独秀在演说时还痛斥“那种平日口谈忠孝，斥人为叛逆，一遇国难”，则执顺国旗降敌的，“是为国贼，是为逆党。是等国贼逆党不杀尽，国终必亡。”^③陈独秀的演说“词情慷慨”，爱国心切，反帝意志坚决，赢得“满座歆歔”。当各学堂学生领袖演说完毕以后，陈独秀当场倡议成立爱国学社，“立经全体赞成”，有126人人社。学社决定每周讲演一次，“如办有基础，拟与上海爱国学社通成一气，并联络东南各省志士，创立一国民同盟会，庶南方可望独

①《苏报》，1903年5月25日。

②③ 陈由己（即独秀）：《安徽爱国会演说》，《苏报》1903年5月26日。

立，不受异族之侵袭。”^①这显然是要推翻清王朝的。

陈独秀的演说深深打动了各校学生的心灵。他们“勃发忠义，奔走相告，……数日之中纷纷告假，多有不上课者”^②，在当地知识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这次演说会是安徽省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群众大会，陈独秀崭露头角，开始成为安徽地区反帝爱国运动的领袖；藏书楼成了一个秘密结社的革命机关。但不久即遭到地方官厅的镇压，开除了大学堂学生柏文蔚等十余人，封闭了藏书楼。安徽巡抚聂缉渠指名通缉陈独秀。陈独秀被迫逃往上海。

编辑《国民日日报》 主办《安徽俗话报》

1903年夏天，陈独秀到达上海时，轰动一时的《苏报》案^③已近尾声。为了接替被查封的《苏报》，继续宣传民族民主革命，原《苏报》主笔章士钊于这年的8月7日创刊了《国民日日报》，在篇幅及取材方面均“较《苏报》新颖”^④，创刊不久，即“风行一时，时人咸称为《苏报》第二”^⑤。协助章士钊总理编辑事务和负责全部文字及校对工作的是陈独秀。两人常彻夜工作，

①《苏报》，1903年5月25日。

②《苏报》，1903年5月30日。

③《苏报》，1896年创刊。1902年后成为中国教育会和上海爱国学社机关报。章士钊为主笔，章炳麟、蔡元培等为撰稿人。1903年5月，邹容在上海出版了他的名著《革命军》。《苏报》迅速向读者推荐此书，赞誉《革命军》为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章炳麟也在该报发表文章，驳斥改良主义。清政府勾结租界当局逮捕章炳麟，邹容自动投案。7月7日，《苏报》被查封。

④章行严（士钊）：《苏报案始末记叙》，《辛亥革命》（一）第387页。

⑤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135页。

“对掌辞笔，足不出户，兴居无节，头面不洗，衣敝无以易，并也不浣”，以致“黑色袒衣，白物星星”，爬满了虱子^①。可见当时两人生活条件之艰苦和忘我的工作态度。

《国民日日报》所刊载的一些政论文，大都不署名，以免作者遭受迫害。因此今天很难识别哪些文章是陈独秀写的，只有两首诗可以确定是陈独秀的作品，即8月9日的《哭汪希颜》^②和17日的《题西乡南洲游猎图》。前一首诗里有这样的诗句：“英雄第一伤心事，不赴沙场为国亡。历史三千年黑暗，同胞四百兆颠连。……说起联邦新制度，又将遗恨到君身。”后一首诗是：“直尺不遗身后恨，枉寻徒屈自由身。驰骋甘入荆棘地，顾盼莫非羊豕群。男子立身惟一剑，不知事败与功成。”要结束“三千年黑暗”的历史，只有实行“联邦新制度”。为了实现这个政治目标，他决心勇往直前，甘愿在艰难险阻中承受任何牺牲。而那种左顾右盼，看风使舵，贪图私利的人简直如同羊豕一般。寥寥数行诗句，表达了大无畏的革命气概。

在《国民日日报》的同事里，与陈独秀结下终生友谊的是章士钊和苏曼殊。苏曼殊与陈独秀共同译著了露俄（即雨果）的名著《惨社会》（即《悲惨世界》），连载于《国民日日报》。当时苏曼殊的汉文根基尚浅，陈独秀“隐然是他的老师。曼殊汉文的才力可讲为仲甫所启发，……而启示了自己的天才，成为一个超绝的文人了。”^③

①孤桐（章士钊）：《吴敬恒—梁启超—陈独秀》，《甲寅周刊》第1卷30号。

②汪希颜（1873—1902），安徽绩溪人，维新志士，早殇，是汪孟邹的胞兄，汪原放的生父。陈、汪两家过从甚密。

③柳亚子编：《曼殊全集》（5）（北新本）第77页。

《国民日报》由于革命党人的内部纠纷和清政府下令严禁售阅，于当年12月1日便停刊了。

1904年初，陈独秀由上海回到了安庆。他一到故乡便与友人房秩五等筹办《安徽俗话报》，募集经费，于同年3月31日发刊问世。《安徽俗话报》先在安庆编辑，由汪孟邹开设的芜湖科学图书社发行，上海东大陆书局印刷。不久，房秩五等人离开安庆，陈独秀也来到了芜湖，寄宿在科学图书社的楼上，编辑《安徽俗话报》。每当报纸从上海印好寄来时，他最忙了，“亲自动手分发、卷封、付邮”^①。而生活却“清苦得很，”每天吃两顿稀粥^②。后来陈独秀回想起这段日子时说：“我那时也是二十几岁的少年，为革新感情所驱使，……日夜梦想革新大业。何物臭虫，虽布满我衣被，亦不自觉。”^③

陈独秀主办《安徽俗话报》的目的是使安徽人通达时势，普及科学知识，启发人民的爱国觉悟。《安徽俗话报》兼有报纸和杂志的特点，每逢初一、十五出版，每期约1.5万字，篇幅不多，文章短小精悍，生动活泼，内容丰富，门类齐全，有省内新闻、历史、地理、教育、实业、小说、行情等。除了政论文章是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其余大多是科普方面的文章。这正如蔡元培所说：“那时候，我们所做的都是表面普及知识，暗中鼓吹革命的工作。”^④

《安徽俗话报》从创刊到翌年9月14日共出了22期，陈独秀用“三爱”笔名在前19期上发表了约50篇作品。他以流利

①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12页。

②高语罕：《入蜀前后》，《民主与统一》第8期。

③《科学图书社二十周年纪念册》。

④《独秀文存》再版《前言》，1933年4月。

酣畅的白话文议古论今，以古喻今，谈天说地，如天马行空，纵横驰骋。在这许多作品里最突出的主题思想是反帝爱国，其次是反对封建专制及其恶俗。

陈独秀在第1期发表的《瓜分中国》一文中，详细列举各列强在华的势力范围及瓜分中国的阴谋，一五一十地告诉读者，说列强“打算把我们几千年祖宗相倚的好中国，当作切瓜一般，你一块，我一块，大家分分”。而官府害怕外国，“活像老鼠见了猫一般”。怎么办？大家仔细想想，是“振作起来，做强国的百姓好，还是各保身家不问国事，终究是身家不保，做亡国的百姓好呢？”^①他还在《说国家》、《亡国篇》等文章中，反复说明，全树将枯，岂可一枝独活；全巢将覆，焉能一卵独完。……国亡家破四字相连”^②的道理。

为了启发人民的政治觉悟，陈独秀号召人民振作自强，挣脱天命观的思想枷锁。他说：“天地间无论什么事，能尽人力振作自强的，就要兴旺”，否则“就要衰败。大为一国，小而一家，都逃不过这个道理。”“天是一股气，并没有什么私心作主，专要洋人兴旺中国衰败的道理。”那些宣传天命观的人，不过是叫人民“服从他做他的顺民”罢了^③。

陈独秀认为捍卫国家主权，就必须提倡民权，反对君权。现在的国家大事，正是“靠着皇帝一人胡为，……所以才弄到灭亡的地步。”那些官吏是“家鬼害家神，安排着洋兵到，干爹奉承，奴才本性。”“一国非民智大开，国权牢固，国基总不能相安。”国，“是一国人所公有的国，并不是皇帝一人所私有的国，

^{①②③}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27、29、55、83、84页。

皇帝也是这国里的一个人。”国家的主权“是全国国民所共有，……上自君主，下至走卒，有一个侵犯这主权的都算是大逆不道。”①

陈独秀还十分重视影响广大人民의思想和风俗教化的戏曲，积极主张改革戏曲，“要多多的新排有益风化的戏”，以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和不畏强暴的志士仁人的事迹作题材，“排新戏”，“唱得激越慷慨”。“不唱神仙鬼怪的戏”和“淫戏”，“除去富贵功名的俗套”，“多唱些暗对时事开通风气的新戏”。②

此外，陈独秀还提倡婚姻自由，反对封建包办婚姻；提倡改革小学教育制度，设置国语教育一科，教学“官话”（即推广普通话）。

《安徽俗话报》办得非常出色，无论是政治观点的鲜明，内容的丰富，或装帧的美观，都堪与当时驰名全国的杭州白话报相媲美。它是安徽最早负有革命使命的刊物，不到半年即行销3000份，名列全国白话报的首位，在全国9个省市里都设有代派处。新中国诞生后，安徽的一些革命老人如朱蕴山等在回忆往事时，都对《安徽俗话报》津津乐道，赞不绝口，说它“最开风气”。

创立岳王会 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

当1904年上半年陈独秀主办《安徽俗话报》的时候，在上

①②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56、30、60、57、88、89页。

海的革命志士章士钊、蔡元培等组织了暗杀团，随后又成立了爱国协会，由杨笃生、章士钊分别任正副会长。协会的所有革命计划都“以暴力为主，而暗杀也在讨论之列。”^①大约在这年的11月间，陈独秀应章士钊的邀请来到上海，并由“杨笃生监督”加入了爱国协会，天天跟从杨等“试验炸药。”蔡元培“也常常在试验室练习，聚谈”。但不久，革命机关被破获，暗杀活动只得暂时停止。陈独秀在上海逗留了一个多月于1905年1月又回到了芜湖。

但暗杀活动在北方仍在继续进行。其中最使清廷要员闻之丧胆的，是由陈独秀参与密谋的吴樾狙击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事件。

吴樾，字孟侠，安徽桐城人。1903年在河北保定两江公学时，常与各方先进人士通讯，“尤得力于陈仲甫”等人的指导，“革命的知识愈丰，革命的志趣益坚”。^②20世纪初，安徽的革命知识青年几乎都与陈独秀有联系。

1905年7月，清政府为缓和舆论，令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搞伪立宪。吴樾为揭穿伪立宪的骗局，决赴京行刺五大臣。行前曾“与赵声（伯先）、陈乾生（独秀）密计于芜湖科学图书社小楼上”^③。后不幸吴樾壮烈牺牲。陈独秀作《存殁六绝句》，内有诗句：“孟侠龙眠有老亲，……碎身直蹈虎狼秦”^④。就是深切悼念吴烈士的。

①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辛亥革命回忆录》（二）第140页。

②张啸岑：《吴樾烈士事迹》，《史学工作通讯》1957年第2期。

③赵启录：《赵声革命事迹》，《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298页。

④《曼殊全集》（5）。

1905年，陈独秀还做了件大事，即成立岳王会。这年春天，由安徽名士李光炯等开办的安徽旅湘公学从长沙迁到了芜湖，改名为安徽公学。“迁校运动的中心人物”是陈独秀^①。这个学校“系清末民初安徽中等学校之最著者”。^②以培养革命干部为宗旨，先后在校任教的除陈独秀外，还有刘申叔、光复会的领导人陶成章、华兴会的重要成员周震鳞，以及柏文蔚、苏曼殊、冷遁等。各地方的革命志士荟萃于芜湖，“安徽公学成了当时中江流域革命运动的中心”^③。

为了促进安徽革命运动的发展，用暴力推翻清政府的统治，陈独秀与柏文蔚和安徽公学师范班学生常恒芳于这年夏天发起建立岳王会。当时参加岳王会的除公学中的优秀生，“还有武备学堂的部分军人，整个组织大概共有三十多人”。同年冬，常恒芳到安庆尚志学堂任教，在当地成立岳王会分会。10月间，柏文蔚到南京任南洋第九镇三十三标二营前队队官，次年成立岳王会南京分会。总会设在芜湖，由陈独秀任会长。常、柏两人任分会会长，并在当地新军中发展会员，或建立岳王会的外围组织^④。岳王会的成员“大多数是中下级军官和士兵”，他们“在新军士兵和各军事学堂中散发《猛回头》、《警世钟》等革命读物，并利用各种机会，不断鼓吹兴汉排满，新军中多数下级军佐和士兵都受了他们的影响，倾向革命。”岳王会堪称军界革命运动的先锋。1908年11月，熊成基率部千余人起义，就是以岳王会成员为核心举

①高语罕：《百花亭畔》第35页。

②朱光潜：《李光炯先生传》，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78辑第143页。

③《辛亥革命前安徽文教界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379页。

④常恒芳：《记安庆岳王会》，《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438页。

行的。

1906年暑期，陈独秀和苏曼殊一起赴日本。同年8月回国，到芜湖皖江中学任教。因从事革命活动，被人告发，陈独秀被迫于1907年春又到东京，入正则英语学校习英语。1909年约9月，回国居杭州。翌年初，在陆军小学任地理历史教员，直到辛亥革命爆发。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打响了推翻两千多年封建君主专制的第一枪，各省纷纷响应，杭州革命党人也奋起举事。陈独秀写了篇革命檄文，由陆军小学堂队长“周亚卫等分贴衙署，省垣官吏闻之悚然”^①。11月6日，浙江军政府宣告成立。

12月12日，安徽临时议会选举孙毓筠为都督，成立安徽军政府。孙即电召陈独秀返皖任都督府秘书长。据当时在都督府任科长的张啸岑回忆：孙毓筠不大理政事，以为推翻清王朝就万事大吉了。问事最多的是陈独秀，他认为推翻清王朝不过是革命的第一步——破坏；今后建设的事更重要。但他过于急躁，常为改革的事与人发生口角。每逢开会只听他一人发言，还总是坚持己见。他主张改善人民生活，反对任用旧官僚，要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②。当时各省革命和立宪派之间的矛盾以及地方实力派的争权夺利之争，错综复杂，安徽省也不例外。1912年6月间，陈独秀到达浦口，“以安徽形势复杂，孙毓筠无法维持，”劝柏文蔚“速回安徽”。同月下旬，柏文蔚接任安徽都督兼民政长职，“任命陈仲甫为都督府秘书长”^③。这个职务在当时

①褚辅成：《浙江辛亥革命纪实》，《辛亥革命》（七）；周亚卫：《光复会见闻杂记》，《辛亥革命回忆录》（一）。

②沈寂：《访张啸岑谈话记录》，1961年8月13、14日。

③柏文蔚：《五十年经历》，《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3期。

拥有较大的实权。但由于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政局动荡不安，陈独秀也不可能有大的作为。据现在见到的有关资料，他这几年主要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是赈灾。辛亥年安徽恰遭水灾，许多州县死亡枕藉，惨不忍睹。1912年初，陈独秀和李光炯等来到上海，“邀集〔安徽〕旅沪军、学、绅、商各界与华洋义赈会接洽，切商募捐、借款两项办法”，以救济灾民。并在沪成立了全皖工赈办事处，选举陈独秀等14人担任议董，聚集资金，抢修沿江大堤^①。第二件事，是他1912年春天在安徽大学堂旧址重办安徽高等学堂，并任校长^②。但时间不长，到1913年上半年他就离校了。

辛亥革命后，虽然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但不久政权即落入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之手。袁氏出任大总统后，不久即免去江西李烈钧、广东胡汉民两都督。1913年6月30日，又免去柏文蔚安徽都督，委任孙多森接任皖督。陈独秀坚决不与孙共事，立即辞去秘书长职务。

7月12日，李烈钧宣布独立，二次革命爆发。17日，柏文蔚宣布独立，兴兵讨袁。这时，柏的部下龚镇鹏驻军芜湖，平时“残杀无度”，且将讨袁计划密告与袁的部下。陈独秀等到达芜湖时，因当面“痛斥其非”，“均被绳绑，拟即枪决。”^③陈独秀临危不惧，怡然自处，“很从容地催促道：‘要枪决，就快点罢！’”^④后幸有张永正旅长以兵力相救，才免遭杀害。

①《民立报》，1912年2月5日。

②北京大学职员履历表。

③柏文蔚：《五十年经历》。

④高语罕：《参加陈独秀先生葬仪感言》，1942年6月4日重庆《大公报》。

9月间，二次革命失败。袁氏爪牙倪嗣冲任皖督兼民政长。10月21日，倪嗣冲发出通告，捉拿革命党，第一批名单有20人，陈独秀被列为第一名“要犯”。陈获悉后，旋即逃往上海，延年、乔年也逃至乡间躲避。军警抓走了他的侄子，抄了他的家，抢走了他叔父衍庶多年收藏的字画。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第二次抄了他的家；到1938年日军占领安庆后，他的家就彻底衰败了。

主撰《新青年》 发动新文化运动

1914年7月，陈独秀又东渡日本。这是他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去日本。他进东京雅典娜法语学校学习，同时帮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这个杂志创刊于东京，以宣传欧洲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为主，主要的撰稿人有当时在早稻田大学读书的李大钊和高一涵、易白沙、张东荪等。

11月10日《甲寅杂志》发表了首次署名独秀的一篇文章，即《爱国心与自觉心》。陈独秀在阐释爱国心时着重指出，所谓爱国，是“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也”，而现在的中国，政纪败坏，官吏贪污，“外无以御侮，内无以保民，不独无以保民，且适以残民。”然而中国之患“非独在政府”，更为严重的是“民无以建国之力，”民众没有觉醒，没有能力建立一个保障自己权利与幸福的民主国家。作者在这篇文章里开始把人民群众的民主觉悟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1915年6月中旬，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上海。6月20日，亚

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为他设宴洗尘^①，席间陈独秀提出了办个杂志的设想。他认为现在中国进行政治革命没有意义，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民国不过是块空招牌，而袁世凯连这块招牌也不要了。因此，中国要进行政治革命须“从思想革命开始”，首先“要革中国人思想的命”^②。革思想的命就要办杂志。他满怀信心地对汪孟邹说：“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这个杂志“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③。

1915年9月，陈独秀主持创办的《青年》（自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杂志与读者见而了。它擂响了思想解放的战鼓，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创刊号上的第一篇文章是陈独秀撰写的《敬告青年》。他以进化论的观点，论证“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但怎样判断“孰为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孰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留置于脑里”呢？陈独秀提出了六项标准。

（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人，“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自人权平等之说兴，“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所谓“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即人的“一切操行，一

①汪孟邹日记。

②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一大”前后

③汪原放：《陈独秀与亚东图书馆》（手稿）。

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非然者，忠孝节义，奴隶之道德也。”

（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宇宙大法，“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我国“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也。”

（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夫生存竞争，势所不免，一息尚存，即无守退安隐之余地。排万难而前行，乃人生之大职。”“人之生也，应战胜恶社会，而不可为恶社会所征服；应超出恶社会，进冒险苦斗之兵，而不可逃循恶社会，作退避安闲之想。”

（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居今日而言锁国闭关之策，匪独力所不能，亦且势所不利。万邦并立，动辄相关，……国民而无世界知识，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

（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欧洲社会制度，凡政治、教育、文学技术，“无不齐集于厚生利用之一途。一切虚文空想之无裨于现实生活者，吐弃殆尽”。而我国“名教之所昭垂，人心之所祈向，无一不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倘不改弦而更张之，则国力将莫由昭苏，社会永无宁日。”

（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想象者何？既超脱客观之现象，复抛弃主观之理性，凭空构想，有假定而无实证”。

陈独秀在阐明六项标准之后，着重指出：“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即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所谓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

科学和哲学，重在提倡科学精神，尊重科学规律，它的对立面是主观臆断、盲从迷信、愚昧无知，简言之曰蒙昧。所谓人权，即民主，它的对立面是封建专制。

贯穿于六项标准中的一条红线是科学与民主。科学与民主是检验一切政治、法律、伦理、学术以及社会风俗、人们日常生活一言一行的唯一准绳。凡违反科学与民主者，即使是“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

陈独秀的科学和民主思想显然是渊源于近代欧洲资产阶级所代表的文明，尤其是把握住最具有革命精神的法兰西资产阶级所倡导的文明。他在创刊号上的另一篇题为《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一文中，介绍近代三大文明，“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他说这“三大文明，皆法兰西人之赐。”自然，当时的陈独秀还不懂得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他所介绍的“社会主义”，仅是指欧洲18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而言。

陈独秀宣传科学与民主，一方面是继承前辈先进人物未完成的事业，是对辛亥革命进行必不可少的政治思想补课；另一方面是把向西方学习、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推进到一个空前深入广泛的新阶段。因此，他自觉地把科学民主与纲常教义尖锐地对立起来，认为两者水火不容，存其一必废其一。陈独秀对于那些常常为人津津乐道的儒家民视民听、民贵君轻、民为邦本等观点，也进行了深刻的批评。“所谓民为邦本，皆以君主之社稷（即君主祖遗之家产）为本位”，“……而与由民主主义之民主政治，绝非一物。……是所谓蒙马以虎皮耳。”^①他以科

^①《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新青年》第6卷2号。

学、民主作武器，“利刃断铁，快刀理麻”，猛击纲常名教，“决不作牵就依违之想”^①。

批判三纲教义 培育国民独立人格

“革中国人思想的命”，应当从何着手，首先革什么呢？陈独秀和他的战友们首先集中力量，对于束缚中国人思想最普遍最严重的儒家三纲教义展开了猛烈的攻击。

陈独秀率先在1916年1月15日《新青年》第1卷第5号上发表了《一九一六年》一文，揭露“儒者三纲之说，……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忠、孝、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因此，为争取独立的人格，就必须废除奴隶道德。

1916年2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1卷第6号上发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文中指出：国民政治觉悟的第一步，是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第二步觉悟，是抛弃数千年相传的“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代替“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第三步，国民政治能否实现，“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国民如要“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建立真正的共和制，

^①《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1号。

就必须破除三纲教义。“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所谓名教、礼教都是拥护“别尊卑、明贵贱”的制度。而“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度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陈独秀说，如果对这一点没有觉悟的话，那么前面所说的三步觉悟，都“非彻底之觉悟”。陈独秀“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总之，对封建的伦理道德，如“不攻破，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①

陈独秀之所以把伦理觉悟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同建立民主制度与反对封建复辟直接地联系起来的。他认为袁世凯废除共和、复辟帝制，“乃恶果非恶因；乃枝叶之罪恶，非根本之罪恶。”而那种“别尊卑，重阶级，主张人治，反对民权之思想”的儒家学说，才是“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恶因，吾国思想界不将此根本恶因铲除净尽，则有因必有果，无数废共和复帝制之袁世凯，当然接踵应运而生。”②陈独秀对三纲这个封建思想的要害，作了坚决的不调和的斗争。他准确地指出，三纲思想与共和“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③；“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④

批判儒家思想，自然会遭到封建遗老遗少的攻击；特别当陈独秀把批儒同反对封建复古逆流的斗争相结合时，受到的攻击更为激烈。1916年9月20日，康有为在《时报》上发表致总统总理书，极力主张“以孔子为大教，编入宪法，复祀孔子三

①《答吴又陵》，《新青年》第2卷5号。

②《袁世凯复活》，《新青年》第2卷4号。

③《答佩剑青年》，（1917年3月1日），《新青年》第3卷1号。

④《旧思想与国体问题》（1917年5月1日），《新青年》第3卷3号。

跪拜明令，保守府学官及祭田，皆置奉祀官。”陈独秀立即写了《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揭露康有为主编的“《不忍》杂志，不啻为筹安会导其先河。”指出“孔教绝无宗教之实质与仪式，是教化之教，非宗教之教”。硬说孔教是宗教，这是“凿孔裁须”。“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姻缘”^①，尊孔正是为了复辟。当康有为参与张勋拥宣统复辟活动而惨遭失败后，陈独秀再次指出：“提倡孔教必培共和，……盖以孔子之道治国家，非立君不足以言治。”他还指出，张勋复辟虽然失败了，但遍布中国的“孔教会”、“尊孔会”都是“复辟党”^②。

有人针对“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姻缘”的论点责难陈独秀道：你所说的孔教是“指汉宋儒者以及今之号为孔教孔道诸会所依傍之孔教”，还是“指真正孔子之教？”并说孔教本来是好的，只是被后儒所败坏了，“至子唐宋之交，孔子之真训遂无几微存于世矣！”^③陈独秀反问道：汉唐以来诸儒为什么“不依傍道法杨、墨”？又为什么“独与孔子为缘而复败坏”他的学说呢？“今之尊孔者，多丑诋宋儒”，其实把“孔门伦理道德”传之后世的正是宋儒^④。孔孟儒学与后世儒学陈陈相因，万不可借丑诋宋儒而颂扬孔孟。

又有人出来反对陈独秀说，数千年来的孔教是“吾国精神上无形统一人心之具”，“可改良而不可废弃”。还说孔子是个“积极建设派，与老、杨之消极破坏者不同。”陈独秀以进化论

①陈独秀：《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1916年10月1日），《新青年》第2卷2号。

②《复辟与尊孔》，《新青年》第3卷6号。

③《通信》，《新青年》第2卷4号。

④《答常乃惠》，《新青年》第2卷4号。

为思想武器，明确地回答说，现在的问题是孔教实行于今天是否“有益”，而不是说孔学从来就“毫无价值”可言。“尊孔者多不明此理”，往往称道“孔教过去之成绩”^①，似乎过去有成绩的东西也适用于今天，其实不然。“宇宙间精神物质，无时不在变迁即进化之途。道德彝伦，又焉能外？”道德，“应随社会为变迁，随时为新旧，乃进化的而非一成不变的，此古代道德所以不适于今之世也。”^②因此，陈独秀指出，对于封建时代的道德，今天如有人仍“恋恋不舍”，是“奴隶性未除，不敢以国民自居”的懦弱表现。

和陈独秀相呼应，李大钊、易白沙和吴虞等人都撰文对封建主义和三纲教义进行开战。而《新青年》杂志也随着对三纲教义的猛烈抨击，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发起文学革命 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

陈独秀洞彻“旧文学与旧道德，有相依为命之势”，^③决不可能作为传播科学与民主的工具。因此他在积极批判三纲教义的同时，便同胡适等人发起文学革命，反对封建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从而把思想解放运动引向了更加广阔的领域。

胡适，安徽绩溪人，汪孟邹的小同乡，1910年赴美留学，很关心中国文学改革问题。陈、胡二人由汪孟邹介绍，一经书信往来便成了好朋友。胡适明确地指出：“今日之文言是一种半死

①《答常乃惠》，《新青年》第3卷2号。

②陈独秀：《答淮山逸民》（1917年3月1日），《新青年》第3卷1号。

③《答张护兰》（1917年5月1日），《新青年》第3卷3号。

的文字”，而“白话是一种活的语言。”“吾以为文学在今日不当为少数人之私产，而当以能普及最大多数之国人为一大能事。”^①

1916年10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2号发表胡适给陈独秀的信，说：“年来思虑观察所得，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陈套语，三曰不讲对仗，四曰不避俗字俗语，五曰须讲究文法结构，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六曰不作无病呻吟，七曰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八曰须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陈独秀在复信中对八事均表赞成，但又觉着这些主张立意不高，态度也不够坚决，因此在10月5日写信给胡适，明确表示“文学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戏言，更非空言”，盼他“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②。胡适接信以后，对“八事”略加修改和阐述，题为《文学改良刍议》寄给陈独秀，发表于1917年1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5号。

胡适的《刍议》与他给陈独秀的信相比，在用词和行文上都较温和谦虚。他“考虑到那无可怀疑的老一辈保守分子的反对”，因此用了《文学改良刍议》这个题目，“说明是改良而非革命；同时那只是个‘刍议’，而非教条式的结论”^③。《刍议》中最值得称道的是胡适明确地指出了“吾国言文之背驰”的弊端，主张“言文合一”，以“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

《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之后，陈独秀紧接着于同年2月1日

①胡适：《留学日记》（四），第939、956页。

②《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3页。

③《胡适自传》，《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下），华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0页。

《新青年》第2卷第6号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四点：

一、“近代欧洲文明史，宜可谓之革命史”，政治界、宗教界、伦理界以及文学艺术“莫不有革命”。我国“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大半原因是“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底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文学。陈独秀是从革命着眼，为了进行政治思想革命而提出文学革命的。

二、伦理道德的革命已经兴起，文学革命之“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畅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三、简要地分析了中国文学发展史，颂扬“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但被明朝的前七子后七子和桐城派的归、方、刘、姚等此十八妖魔^①“所厄，未及出胎，竟尔流产”。

四、在文章的结尾处，陈独秀发出了响亮的战斗号召：“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子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①前七子以李梦阳等最著名，后七子以李攀龙为代表。前后七子都是文学的拟古主义者。归有光虽反对拟古，但推崇唐宋八大家的文学传统。方苞、刘大櫟、姚鼐都是清中叶著名的散文家，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

《文学革命论》发出了向封建文学进攻的号令，钱玄同、刘半农等立即投入了战斗。

胡适在美国读了《文学革命论》有点胆怯了。他立即写信给陈独秀，说他那些《刍议》不过是他个人的“私见”，目的在于引起人们的“讨论，征集意见”。“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入所能定。”“亦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匡正也。”陈独秀回信说：“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以白话文学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匡正也。”^①胡适在5年以后，回忆文学革命发难时的情景，说“他的历史癖太深，故不配作革命的事业；文学革命的进行，最重要的急先锋是他的朋友陈独秀”；而他的“态度太和平了，若照着他这个态度做去，文学革命至少还须经过十年的讨论与尝试”；“当日若没有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精神，文学革命的运动，决不能引起那样大的注意。”^②

正当陈独秀大力发动文学革命之时，蔡元培聘请他任全国最高学府国立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相当后来的文学院院长）。这为陈独秀推动新文化运动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社会地位。1917年1月，陈独秀进京任职。他先后联络了一批进步的学者，如李大钊、钱玄同、沈尹默、刘半农、鲁迅等。1918年1月，《新青年》由陈独秀一人主撰改为同仁刊物，成立编委会轮流编辑，新文化运动的阵营扩大了，陈独秀的住处——东池子箭杆胡同9

①《通讯》，《新青年》第3卷3号。

②《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胡适文存二集》（二）第196—198页。

号（今 20 号），无形中成了运动的指挥部。

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使《新青年》的影响迅速扩大，由创刊时发行不过一千份，到了 1917 年猛增到一万五六千份。

新文学的思想内容是科学与民主，它的表现形式是言文一致的白话。内容和形式的问题都解决了。这时文学革命迫切需要创作出高质量的作品，这正如陈独秀所号召的“国之闻人多以国语著书立说”^①，和胡适所指出的死文学“所以还能存在国中，正因为现在还没有一种真有价值、真有生气、真可算作文学的新文学起来代替他们的位置。”有了活文学，死文学“自然会消灭了”^②。为此，《新青年》从第 4 卷第 1 号起大部分的文章都改用白话。但真正创作出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的是鲁迅。1918 年 5 月 15 日，鲁迅在《新青年》第 4 卷第 5 号上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借狂人之口愤怒地控诉绵延数千年的旧礼教是“吃人的礼教”。《狂人日记》是应时代精神的召唤而诞生的，是篇讨伐封建礼教的战斗檄文。

白话文在即将爆发的五四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推波助澜的威力，为宣传反帝爱国大显神威。1919 年全国至少出了 400 种白话报。到 1920 年，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迫于大势所趋，规定中小学校开始使用白话的语文教材。

改革北大文科 开辟自由园地

1916 年 11 月 26 日，陈独秀为了募集资金，使发行《新青

^①《通信》，《新青年》第 3 卷 2 号。

^②《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 4 卷 4 号。

年》的群益书社与亚东图书馆合并（后未实现），大力发展新文化出版事业，与汪孟邹同车赴北京，28日到达，下榻西河沿中西旅馆64号房间^①。

同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于1917年1月4日到校视事。蔡校长上任后抓的第一件大事是聘请有真才实学的人，协助他一同治理北大。蔡元培和陈独秀都曾于1905年在上海加入爱国协社，从事反清革命活动。此后虽“多年不相闻问”，但蔡元培“很佩服他（陈独秀）的毅力与责任心”，对陈“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当蔡元培与汤尔和“商及文科学长人选”时，汤推荐了陈独秀，并将十余本《新青年》交给蔡元培。蔡校长“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陈‘任文科学长’”。并立即去旅馆拜访陈独秀^②。那时，陈独秀白天为募集资金四出活动，晚间看戏，睡得晚，起得迟。“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来看仲甫，有时来得很早，……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个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③陈独秀起初并不想受聘，说要回上海办《新青年》。蔡说，你就“把《新青年》杂志搬到北京来办吧。”^④陈独秀这才答应回沪稍加整理即来京。

1917年1月，陈独秀进京任北大文科学长。这个“消息传出后，全校震动。青年学生无不热烈欢迎，奔走相告，而教师中的遗老遗少则窃窃私议，啧有烦言”，说陈独秀只会写几篇策论式的时文，并无真才实学。蔡元培态度鲜明地说，仲甫先生精通训诂音韵学，学有专长，连太炎先生过去也把他视为畏友。

①②汪孟邹日记。

③蔡元培：《独秀文存·序》；又见《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东方杂志》第31卷1期。

④沈尹默：《我和北大》，《五四运动回忆录》（续）第166页。

有力地反击了那些遗老遗少^①。在这年年底，陈独秀被选为学校评议员（评议会是决定校务大事的组织机构），还担任北大入学试验委员会副会长（会长为蔡元培）、北大附设国史馆编辑处纂辑股主任和《北大日刊》编辑等职。

陈独秀上任后，有职有权。他不开课，专心致力于北大文科的改革。蔡元培对有关文科的“人事、行政，一切由陈独秀先生主持，不稍加干涉。”^② 陈独秀所做的第一件大事，是为文科延聘名教授。当他一旦决定任文科学长，就写信给胡适，劝他“早日回国”，来北大讲授哲学或文学^③。于是一时提倡新文化运动的知名人士，大多荟萃于北大文科。

北京大学原是个旧式学校，学校行政由旧官吏把持，教师多是出身于举人，进士的老学究，但正如蔡元培所说：“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是陈独秀任文科学长以后，“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④。文科的改革和整顿首先表现在教育思想、教育方针的变化。在《新青年》创刊以后不久，陈独秀曾发表过专门论述教育方针的文章，指责中国教育的弊端，阐明他的教育主张是自动的，启发的，实用的，全身的；而不是他动的，灌输的，虚文的，单独的脑部教育^⑤。他认为高等教育的宗旨不同于一般教育，应当以“研究学理”为主。1918年9月20日，他在北大开学式上演说，指出现在大学生的求学目的“可别为三类：（一）研究学理；（二）备毕业后应用；（三）得

①罗章龙：《陈独秀先生在红楼的日子》，《新华文摘》，1983年3月。

②罗章龙：《椿园载记》第24页。

③《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6页。

④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宇宙风》第55、56期，1937年12月、1938年1月。

⑤《答胡子承》（1917年5月1日），《新青年》第3卷3号。

毕业证书。”抱第三种目的人“必不多”；第二种目的，“虽不得谓之大谬，而仅能适合于专门学校；惟第一目的，始与大学适合。”为了研究学理，他提出了三项办法：（一）注重外国语。因为最新的学理，“均非中国古书所有”，而译成中文的名著又很少；（二）废讲义，因讲义“不足以尽学理”，教员抱着讲义上课是一种懒惰的表现。（三）多采购参考书。由教员指定参考书之册数、页数，“使学生自阅，而作报告”^①。这三项具体办法，都贯穿着他的基本教育思想，即自动的，启发的，反对被动的，灌输式的教育。

陈独秀除了抓教育方针以外，他对北大文科教学的改革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扩充文科，增设新系。北大文科原来只有四门（系），即中国文学、中国哲学、中国史学和英语。现增设德语、法语、俄语三门，并在哲学门、中文门和英文门分别设立研究所。根据学生的外语程度，调整班次，并开设新班。期末考试后，根据学生的考试成绩再作调整。

（二）允许学生自由选修各课，废除一切课程全部必修的规定。北大各学门的课程表本来都定得很死，自选修课增多后，课程表活了。学生各有各的功课表，对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有利。教师怎么讲，可以唱对台戏。学生可以上本系的课，也可以上他系的课。学校四门大开，谁愿意来听课都可以，所以当时北大有三种学生，一是经过入学考试的正式生；二是未经入学考试的旁听生；三是不要许可自由来校听讲的“偷听生”。

（三）整顿课堂纪律，制定考试制度。陈独秀在《北京大学日

^①《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9月21日。

刊》先后发布了数十份《文科学长白》，针对学生纪律松弛的现象，明确规定学生因病、因事不到校者，须有证明，否则按旷课论。本科、预科各班学生上课均不得迟到。选修课一经选定之后，不得任意更改及旷课。已选定的第二外国语，亦不得中途改易。旁听他门他年级功课的，事先务须审慎，倘报名之后，听讲中辍者一经查出，除追回听课证外，并剥夺其以后请求旁听之权利。规定学生升级、留级、毕业，都以学习成绩为准，经学长亲自审阅，上报学校，而后发给文凭。陈独秀为执行课堂纪律，曾将经常缺课的黎元洪的侄子误认为许德珩，给予记大过一次，后一经发现错误，即“收回成命”，并对许“进行劝慰”^①。这说明规定的那些纪律并非一纸空文，是严格执行的。

（四）采购图书，广设阅览室，为学生提供学习条件。陈独秀以学长名义通知文科各教员：“文科各门拟各设阅览室”，要教员“将所授课至不可少之参考书（汉文或译文）约需若干部开单赐下，以备采要购置。”^②

陈独秀在改革文科的同时，也注意自身的改造。为约束自己，他加入了由蔡元培组织的进德会，为甲种会员，即不嫖不赌。还被选为进德会的评议员。

北京大学的改革，冲破了封建顽固派所设置的种种思想文化的禁区，提高了教学质量，开阔了学生的眼界，扩大了学生的知识领域，从而为学生接受新事物、新思想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一旦当科学与民主的思潮成了校园里的主流时，青年知识分子便迅速地行动起来，结社团，举行集会，积极干预国

^①许德珩：《我和陈独秀》，《党史研究》1980年第4期。

^②《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10月25日。

家大事。北大学生邓康（中夏）、黄日葵、许德珩、高尚德、张国焘、段锡朋、易克嶷等于1918年10月13日成立《国民》杂志社，并聘请李大钊为顾问。与此同时，文科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还发起组织新潮社。陈独秀积极支持学生结社，并对他们说：“只要你们有创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经济方面可以由学校负担。”《新潮》和《国民》杂志随即创刊，更使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1919年3月，邓康又在北大发起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讲演团的宗旨是“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①，一时加入的有39人。

创办《每周评论》 指导五四运动

当《新青年》创刊时，有人曾写信要陈独秀对筹安会变更国体，进行封建复辟问题著文警告国人。陈独秀回答说：本志的天职在“改造青年之思想，……批评时政非其旨也。”事隔两年多，陈独秀在1918年7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1号上发表了《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一文，积极主张国民对于“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要有“急谋改革”的觉悟，否则“必至永运纷扰，国亡种灭而后已！”此时的陈独秀从提倡科学与民主，进展到直接干预时政的高度。

然而，《新青年》杂志是个月刊，出版周期长，且有时不能按期出版，内容多是学术性的大块文章，不普及，很难对现实的政治斗争发挥及时的指导作用。陈独秀、李大钊等于1918年

^①《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第136页。

12月22日，创刊了《每周评论》。这完全是个针砭时政的战斗性刊物，它与《新青年》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协同作战。

陈独秀在1919年1月15日《新青年》第6卷第1号上发表了《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对该刊创办3年以来所进行的宣传作了总结，并从根本上反击顽固派的进攻。陈独秀说：“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对于“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社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陈独秀大义凛然，表现了他反对封建主义的大无畏气概和坚贞不渝的决心。

《本志罪案之答辩书》的发表和《每周评论》的创刊，更加引起思想界的震动和顽固派的反对，于是爆发了一场新旧思潮大激战！

古文学家林纾先后在上海《新申报》发表小说《荆生》、《妖梦》，影射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骂蔡元培是乌龟，期求

恶势力杀死他们；诋毁白话文为“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①同时，报界盛传陈独秀、胡适等被驱逐出北大，封建官吏扬言要取缔《新青年》、《新潮》等刊物，弹劾蔡元培。面对封建顽固派之进攻，陈独秀毫不畏惧。他在4月18日、4月27日出版的两期《每周评论》上，编辑和刊登《特别附录：对于新旧思潮之舆论》，汇集了京、沪、浙、川4个省市14家大报发表的27篇文章，共约2.6万字。其主要内容为（1）“学问独立，思想自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2）旧伦理和文言文不适应时势的需要。（3）林纾学风恶劣，“为感情所驱，自陷而为学术界之大敌，思想界之蠹贼”。（4）赞扬和砥砺以陈独秀为首的新派人物，再接再厉，继续奋斗。这些言论的汇集，不仅是对林纾进行了有力的斥责，更重要的是对《新青年》提倡的科学民主、文学革命所取得的成绩，作了一次大检阅。

陈独秀为了减轻北洋政府对蔡元培的压力，特在《新青年》第6卷第2号上发表《编辑部启事》，说：“这个杂志完全是私人的组织。我们的议论完全归我们自己负责，和北京大学毫不相干。”而北大在内外旧势力的压迫下仍于4月8日实施文理学科合并，乘机把陈独秀赶下了台。但这并不能遏止科学与民主思想的传播。

1919年，“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由北京大学等校学生发难，接着在全国各大城市首先由青年学生举行罢课、游行示威，呼吁外争国权，内除国贼，惩处卖国官吏。到6月5日，全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开展了罢工、罢市、罢课的“三罢”斗争。参加罢工斗争的工人约六七万人，显示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

^①林纾致蔡元培公开信。

的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成为反帝爱国运动的主力军。

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前，陈独秀作为一位民主主义者是很崇拜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代表民主主义的美、法等国战败了代表君主主义的德国，是“公理战胜强权”。因此，他主张在巴黎和会上提出“人类平等一概不得歧视”案，使不平等条约“从根消灭”。然而事实与他所期望的完全相反。美、法等五强把持和会，中国虽属战胜国的一方，却依然处于被宰割的地位。陈独秀先是迷惑不解，“难道公理战胜强权的解说，就是按照国力强弱分配权力吗？”继而不满，质问五强垄断会议，“又试问公理何在？”^①5月4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第20号上发表《两个和会都无用》一文，指出国内的南北和会，“两方都重在党派的权利”；“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我看这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这篇短文表明陈独秀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迷信完全破灭了。他所指出的人类真正幸福，“非全世界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对正在爆发的“五四”运动无疑起着鼓动的作用。

从5月4日到6月上旬，《每周评论》用全部版面报道运动发展的情况，并连续出了3期“山东问题”特号，全文刊登《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系统地介绍了青岛问题的来龙去脉，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北

^①《随感录》，《每周评论》1919年2月9日。

洋政府的卖国罪行。

从5月4日至6月8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7篇文章37篇《随感录》。这些文章指出，造成对日外交的罪恶，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祥固然有罪，但根本罪恶并不在这三人，而是掌握了中央大权的北洋军阀政府。^①“现在还是强盗世界！现在还是公理不敌强权时代！”因此我们要实行民族自卫，为此而不惜引起战争。日本侵害了东三省，又侵害山东，“这是我国国民全体的存亡问题，……都出来反对日本及亲日派才是。”^②在《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对内对外两种彻底的觉悟》一文中更明确地指出：“公理是不能够自己发挥，是要靠强力拥护的”；中国政治问题“根本救济的方法，只有‘平民征服政府’。”全国人民“应该抱定两大宗旨，就是：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③陈独秀的这些言论对“五四”运动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和指导作用。他和李大钊主办的《每周评论》是青年人“欢喜无量”的明灯^④，仅在北京一地就发行5万多份。

陈独秀认识到“五四”运动与过去任何一次爱国运动不同，它所特有的精神是人民直接行动，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加以制裁^⑤。6月11日，被毛泽东誉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直接行动起来，去散发由他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宣言》要求维护中国在山东省经济上的权利，免除皖系军阀徐树铮等6人的官职，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等。否则全国人民

①《对日外交的根本罪恶——造成这根本罪恶的是谁？》《每周评论》，1919年5月11日。

②《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每周评论》，1919年5月18日。

③《每周评论》，1919年5月26日。

④郑遂平致记者信，《每周评论》，1919年3月30日。

⑤《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时事新报》，1920年4月21日。

“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陈独秀在散发《宣言》的时候，当场被捕了。

北洋军阀政府逮捕陈独秀，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各界人民团体纷纷指责政府，要求立即释放陈独秀。上海《民国日报》指出陈独秀是“国内最负盛名之新派学者”^①。李达说“陈先生是一个极端反对顽固守旧思想的急先锋，……很能够把一般青年由朦胧里提醒觉悟起来”，我们“一敬他是一个拼命‘鼓吹新思想的人’，二敬他是一个很肯‘为了主义吃苦’的人。”^②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陈独秀之被捕与营救》一文，全文转载《北京市民宣言》，评论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北洋军阀政府逮捕关押陈独秀不仅不能遏止新文化运动的前进，反而通过营救活动宣传了他对新文化运动的功绩。9月16日，陈独秀获释出狱。

为欢迎陈独秀出狱，《新青年》第6卷第6号发表了刘半农、胡适、李大钊和沈尹默写作的白话诗。李大钊的《欢迎独秀出狱》三首诗中写道：“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有许多的好青年，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98天的铁窗生活，使陈独秀磨练得更加刚健了。

^①1919年6月15日《民国日报》。

^②鹤（即李达）：《陈独秀与新思想》，1919年6月24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 宣传工人建立工会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使中国先进分子看到了社会主义的曙光；1919年巴黎和会撕下了西方民主的假面，向全世界显露了其资产阶级的本质；1919年“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这三种因素有机地结合，推动着中国一批民主主义者迅速地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

中国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是李大钊。他在1918年下半年便热情讴歌社会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揭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源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到“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他在《新青年》第6卷第5、第6号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论文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标志着李大钊成长为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陈独秀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时是在“五四”的前夕，较李大钊晚了大半年。他和李大钊主办的《每周评论》宣传了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摘译发表了《共产党宣言》，介绍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报道了国内劳农生活的状况。这时，陈独秀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中，明确地指出这次革命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步的大关键”^①。陈独秀本来是崇奉法兰西文明的，现在如此地推崇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不能不说他的思想观点开始发生了变化。“五四”运动爆发以后，他在6月8日发表的《立宪政治与政党》、《吃饭问题》等文章中，指出“现在人人都要觉悟起来，立宪政治与政党，马上都要成为历史上过

^①《每周评论》，1919年4月20日。

去的名词了，我们从此不要迷信他罢。什么是政治？大家吃饭要紧”。所谓“立宪政治与政党”，就是他前不久还迷信过的资产阶级代议制及其政党。现在他不但不再迷信他，而且还号召别人也不要迷信。他过去站在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立场，呼吁个性解放，现在关心劳苦人民的生计问题，把它看作是“二十世纪劈头第一个大问题”^①。这表明陈独秀的立足点开始转移，他要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分手了。

6月11日，陈独秀被捕。由胡适编辑《每周评论》。他乘机宣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尤其反对谈社会主义，主张点点滴滴的社会改良，反对社会革命。由此引发出“问题与主义”的争论。李大钊及时撰文批评胡适，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经过群众运动，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的改造。这场争论反映了新文化运动的阵营发生了分化。9月16日，陈独秀获释。他出狱以后召开了《新青年》今后编辑方针的会议，会议决定自第7卷开始由陈独秀一人编辑。

《新青年》第7卷第1号发表了《本志宣言》，劈头就说：“本志具体的主张，从来未曾完全发表。社员各人持论，也往往不能尽同。读者诸君或不免怀疑，社会上颇因此发生误会。现当第七卷开始，敢将全体社员的公同意见，明白宣布。”

《本志宣言》明显含有社会主义的思想因素。它攻击《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即资本主义——引者），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主张“新时代新社会”不仅是“自由的平等的”，而且应当是“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他进而指明，新社会的“真的民主政治，必会把政权分配

^①《每周评论》，1919年6月8日。

到人民全体，就是有限制，也是拿有无职业做标准，不拿有无财产做标准。”这显然是批判资产阶级民主的狭隘性和局限性，企求更广泛的民主政治。它还明确提出：“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但对于一切拥护少数人私利或一阶级利益，眼中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永远不忍加入”，并要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毫无疑问，一个崭新的政党、即为全体人民谋利益的党已开始孕育在陈独秀的思想深处了。但综观《宣言》的全文，它是一位激进民主主义者在向共产主义者过渡时期的作品，也是《新青年》从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开始转向宣传马克思主义时的作品。《新青年》这个在思想界最有声望的刊物，它的发展以及它的性质的变化，一直是和陈独秀的思想演变同步前进的。因此，马克思主义若完全占领《新青年》这块重要的阵地，就首先须陈独秀在思想上有进一步的转变，确立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进一步批判资产阶级的民主观。

1919年12月1日，《晨报》发表了陈独秀《告北京劳动界》一文。文中指出：“劳动界诸君呀！十八世纪以来的‘德谟克拉西’是那被征服的新兴财产工商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帝王贵族要求权利的旗帜”，他们的目的达到了。“他们也居了帝王贵族的特权地位了。如今二十世纪的‘德谟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兴无产劳动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陈独秀明确地认识到两种不同性质的民主，代表了两个互相对立的阶级利益，向马克思主义转变跨出了有重要意义的一步。

1920年1月29日，陈独秀为筹办西南大学（后未办成）由北京来到上海，不数日即赴武汉讲学。最使武汉当局恼火的是

陈独秀演讲《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他公开主张消灭私有财产制。一要打破阶级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二要打破继承制度，实行共同劳动；三要打破遗产制度^①。但主张废除私有制，并不都是马克思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也都主张废除私有制。这时陈独秀恰恰还受到后两种思想的影响。2月8日，陈独秀被迫离开武汉回到了北京。警方欲再次逮捕他。这时由李大钊挺身而出，不避危险，护送陈独秀离京。2月12日，陈独秀抵达上海。同年4月间，住到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这里是陈独秀的寓所，也是《新青年》编辑部的所在地，也是即将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诞生地。

陈独秀到达上海以后，他的主要活动是宣传工人，筹办工人刊物和组织工会。1920年3月，陈独秀决计把《新青年》第7卷第5号编辑成《劳动节纪念号》，并于5月1日出版。《纪念号》内容丰富新颖，共约400页，相当原来一期的两倍多。上有孙中山、蔡元培等16人题字，其中有9人是名不见经传的劳苦工人。如怡和纱厂绒毯间工人武毓源题的“不劳动者人类之公敌也”；植树工人刘朗山题的“黜逐强权，劳动自治”；先施大菜间王澄波题的“不劳动者口中之道德神圣皆伪也”；张玉堂题的“惟亲身劳动者有平等互助精神”；怡和纱厂工人周传勋题的“不自食其力者社会之绝物也”；刘光典题的“不劳动者之衣食住等均属盗窃赃物”等。还刊登了33幅工人劳动照片。工人的题字和照片刊登在举国闻名的大型刊物《新青年》上，必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①1920年2月7日《国民新报》。

《劳动节纪念号》的第一篇文章是李大钊写的《五一运动史》。他希望中国工人“认定今年‘五一’纪念日作一个觉醒的日期”。占本号全部篇幅的2/3的，是对于中国各地劳动状况的调查。此外还登载了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明白宣布废除沙俄与日本、中国所缔结的一切秘密条约和在华的一切特权。《劳动节纪念号》的编辑和出版，在国内产生了极大影响。它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开始相结合的产物，也是陈独秀思想转变的一个里程碑。蔡和森曾说，《新青年》以前“是美国思想宣传机关，但是到了仲甫同志倾向社会主义以后，就由美国思想变为俄国思想了，宣传社会主义了。不过在过渡期间的文章，社会革命的思想是有了，杜威派的实验主义也是有的。一直到1921年（系1920年之误——引者）‘五一’劳动节特刊问题，才完全把美国思想赶跑了。”^①

陈独秀在编辑《劳动节纪念号》的同时，还积极参加工人庆祝五一节的筹备工作，并被推举为筹备世界劳动节大会的顾问。上海工人第一次大规模地纪念五一节的活动，是在陈独秀的指导之下进行的。

陈独秀在参加庆祝五一节的筹备活动时，发现当时上海的工会团体大多是由“小政客发起的”，办工会的人“总是穿长衣的先生们多，穿短衣的工人很少很少”^②。因此在下半年，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的前后，他立即着手筹办工人刊物，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真正的工会。他和李汉俊、俞秀松等先后主办了《劳动界》周刊（8月15日创刊）和《伙友》周

①《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版第7页。

②《此时劳动运动的宗旨》，《劳动界》第15册，1920年11月21日。

刊(10月1日创刊)。这一年,陈独秀在这两个刊物及其他报刊上发表了约20篇关于工人运动的文章,着重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宣传:

(一)宣传工人的重要社会地位。工人是社会的“台柱子”^①,是他们的力量支撑着社会,但他们的社会地位却十分卑贱。

(二)宣传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揭示资本主义剥削工人的秘密。

(三)宣传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指出劳动者的觉悟可分作两步:第一步觉悟“是劳动者对于国家、资本家要求待遇改良”;第二步觉悟“是要求做工的自己起来管理政治、军事、产业,……居于治人的地位”^②。同年9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8卷第1号上发表了《谈政治》一文,着重批判了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到算是资产阶级的朋友了”;揭露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妄想利用资产阶级议会施行社会主义的政策是“与虎谋皮,为虎所噬,还要来替虎噬人的方法”。并郑重宣称“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也是工人阶级的伟大的历史使命。《谈政治》一文在当时是一篇高质量的马克思主义论文,它标志着陈独秀由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四)号召工人组织自己的工会。陈独秀认为“工人要想改进自己的境遇,不结团体固然不行。但是像上海的工人团体,就再结一万个也都是不行的。”他说,这些所谓的新工会,“一大

①②《劳动者的觉悟》,《新青年》第7卷6号,1920年5月1日。

半是下流政客在那里出风头，旧的公会公所一大半是店东工头在那里包办。觉悟的工人呵！赶快另外自己联合起来，组织真的工人团体呵！”^①

陈独秀所写的关于工人问题的文章，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很受工人们的欢迎。杨树浦电灯厂一钳工曾写信给陈独秀说：从前受压迫，“有话不能讲，有冤无处伸！现在有了你们所刊行的《劳动界》，我们苦恼的工人，有话可以讲了，有冤可以伸了，做我们工人的喉舌，救我们工人的明星呵！”我们祝“《劳动界》万岁！祝先生的身体健康！”^②

在工人有了初步的觉悟以后，1920年11月21日，上海机器工会召开成立大会。陈独秀在会上又一次指出，工人团体须完全由工人组织，“万勿容资本家厕身其间，不然仅一资本家式的假工会而已。”^③上海机器工会是中共发起组成立后领导建立的第一个工会。

当陈独秀等在上海积极从事工人运动的时候，北京、武汉、长沙、广州等地的共产党小组成员也都在努力开辟这方面的工作。其中尤以北京李大钊、邓中夏等人创办的《劳动者》周刊和长辛店工人补习学校最有影响。1920年是中国工人阶级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的一年。

创立中共发起组 展开思想论战

1920年2月中旬，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京南下时，两人曾

①《真的工人团体》，《劳动界》第2册，1920年8月22日。

②《劳动界》第5册，1920年9月12日。

③1920年11月22日《申报》。

在途中“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①。当时虽没有详细讨论，但决心要建立中国共产党则是一致的想法。

同年3月，俄共远东局维经斯基率代表团来华，代表团的成员有库兹涅佐娃、马马耶夫和翻译杨明斋。维经斯基一行于4月间抵达北京，通过在北京大学任教的两个俄籍教授，首先结识了李大钊，经过多次恳谈，表示要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同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介绍维经斯基等人“到上海去见陈独秀，要陈独秀建党”^②。

维经斯基到达上海以后，首先会见陈独秀，又经陈独秀的介绍，会见了当时宣传社会主义的《星期评论》编辑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以及研究系的报纸《时事新报》的负责人张东荪。他们举行了多次的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除了上述的一些成员，还有李达、陈望道、俞秀松等。经过座谈了解中国革命情况和十月革命后的俄国现状，商讨发起建立共产党的问题。于是在5月间便先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研究会的负责人是陈独秀，会员有沈雁冰、李达、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等^③。上海和北京两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无形中成为共产党发起组的前身。

6月间，“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5人开会，筹备成立共产党，选举陈独秀为书记”，并起草党纲十余

①高涵：《李守常先生传略》，1927年5月24、25日汉口《民国日报》。

②张申府：《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1979年9月17日），《“一大”前后》（2）第220页。

③陈望道：《回忆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1956年6月17日），《“一大”前后》（2）第20页。

条，明确提出“用劳农专政和生产合作为革命手段”^①。7月19日，再举行筹备会，“这次会议为未来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基础。会上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坚决赞成建立中国共产党”^②。8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这时的发起人，一共是8人，即：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时在日本）、杨明斋和李达。每次开会时，吴廷康（维经斯基化名）都来参加”。开会地点在陈独秀的住处——渔阳里2号。上海发起组会议“首次决议推陈独秀担任书记，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③。

陈独秀将上海的建党意见转告李大钊，即“上海小组将负责苏、皖、浙等省的组织和发 展”，希望李大钊“从速在北方发动，先组织北京小组，再向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和天津、唐山等城市发展”。李大钊对于这些意见“略经考虑，即无保留的表示赞成”，“认为上海所拟议的要点都是切实可行的，在北京可以依照着发动起来。”^④从此，南陈北李携手创建中国共产党。

陈独秀为加快建党的步伐，函约王乐平在济南组织（王本人未加入组织，而向陈推荐了王尽美、邓恩铭等几位青年组党）；陈公博在广州组织；张申府在法国组织^⑤；施存统在日本组织；毛泽东在长沙组织；派刘伯重（刘由陈介绍入党）回武

①施复亮（即施存统，于1920年6月20日赴东京）：《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一大”前后》（2）第35、36页。

②舍维廖夫：《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大”前后》（3）第156页。

③《李达自传》，《党史研究资料》第2集第2页。

④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98、104页。

⑤1920年下半年，张申府由沪赴法国时，陈独秀写介绍信给张，要他到法国与赵世炎联系，在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中建党（《张申府谈话记录》，1961年1月27日）。

汉组织。“这样，上海的组织事实上成为一个总部，而各地的组织是支部了。”^①11月，上海发起组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规定了共产主义的思想是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灭阶级；为实现这一伟大目标，工农必须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镇压资产阶级，建设共产主义；并“以此为收纳党员之标准”^②。到1921年初，除上海外，有北京、长沙、广州和济南等4个支部相继成立。此后不久，北方数省和内蒙古地区的党组织在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之下，也纷纷建立起来。

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上海发起组为了迅速发展党员，扩大党组织，在1920年下半年进行了下列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把《新青年》改组为中共发起组机关刊物。中共发起组成立以后，为了广泛地宣传社会主义，多方面地介绍苏俄社会的各种新制度、新政策，陈独秀不顾胡适等人的反对，决然将《新青年》改组，从1920年9月1日出版的第8卷第1号起，成为中共发起组的机关刊物，主要由发起组的成员担任编辑和撰稿人，并特设“俄罗斯研究”专栏，介绍苏俄社会实况，以事实消除人们对十月革命的误解，驳斥一些诬蔑的谰言。

（二）1920年8月22日，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引导一批进步青年及时走上革命道路。陈独秀指派发起组中最年轻的俞秀松任团的书记。到1921年底，北京、长沙、武昌、天津、广州等地也先后建立起团组织，有计划地培养和发展党员。与此同时，为培养革命干部，发起组开办了外国语学社，选拔学生赴苏俄学习。

①《李达自传》，《党史研究资料》第2集第2页。

②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1页。

(三) 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陈独秀于1920年初，委托恽代英翻译考茨基的早期著作《阶级斗争》。同年8月，陈望道将《共产党宣言》全文译出，由陈独秀、李汉俊校对后出版。9月，李汉俊翻译介绍了《马克思资本论入门》一书。11月，出版“新青年丛书”第一种，即李季译的克卡朴《社会主义史》等。

(四) 创办《共产党》月刊，在中国树立第一面共产党大旗。该刊于1920年11月7日问世，李达主编。陈独秀在创刊号的《短言》里，向全社会庄严宣称：“一切生产工具归生产劳动者所有，一切政权归劳动者执掌，这是我们的信条”。这篇《短言》，正如毛泽东所说是一篇“颇不愧旗帜鲜明”^①的宣言。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工人运动的兴起和中共发起组的建立，都受到来自“左”右两方面的阻挠和攻击。右面有资产阶级的代表人张东荪等；“左”面有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等。张东荪认为中国太穷了，“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即增加富力，开发实业。“而开发实业方法最能速成者莫若资本主义”。世界上没有不经过资本主义“而能达到社会主义的”。现在中国“缺少真正的劳动者”，因此成立共产党是不可能的不必要的。区声白虽然主张消灭私有制，但极力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主张绝对的自由。这两种言论，可谓异曲同工，都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成立中国共产党，反对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中共发起组的成员对于这些错误言论，奋起迎击，于是展开了两场激烈的争论。陈独秀汇集了这两次争论中的双方言论，分别冠以《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和《讨论无政府主义》的总标题，全文刊载于1920年12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8卷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5页。

第4号和1921年8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9卷第4号，反映了共产党人无私无畏、追求真理的执著精神。陈独秀在这两次争论中所发表的言论的主要论点是：

对于张东荪的争论，陈独秀认为中国需要开发实业，问题是用什么方法去开发。“按资本生产制一面固然增加财富，一面却增加贫乏，这是稍有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的”。中国穷，大批的手工业工人之所以失业，“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下必然的状况”。因此要使中国富起来，就“非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制采用社会主义生产制不可。”至于说中国“缺乏真正劳动者”，这倒要请教张先生，你所吃的用的住的“是何人做出来的？先生所办的报，是何人排印出来的？”中国受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除了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①你认为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不配讲社会主义，而你却读什么基尔特社会主义。你这种社会主义“把压制生产劳动者的国家政权法庭海陆军警察完全交给资产阶级了”，这其实是一种“调和思想”^②，是假社会主义。陈独秀和他的战友们在这场争论中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方向，这无疑是正确的。但由于还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因此在争论中就忽视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性及其与封建主义生产方法相比所具有的进步作用。

陈独秀与区声白的争论主要发生在广东。1920年12月17日，陈独秀应广东省长陈炯明之聘请，离沪赴广州，任该省教

①《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新青年》第8卷4号，1920年12月1日。

②《社会主义批评》，《新青年》第9卷3号，1921年7月1日。

育委员会委员长（相当今省教育厅厅长）。他到达广州以后，以合法的身分积极地宣传旧教育制度的改革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初到广州一个月就发表大型讲演7次，半年内在《广东群报》等报刊上发表了40多篇文章。其中一次讲演是1921年1月19日，题目是《社会主义批评》，对象是广州公立法政学校的师生。陈独秀在讲演时纵论各派社会主义学说，对诸如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工团主义和行会社会主义等，无不有所评论。他认为“只有俄国底共产党在名义上，在实际上，都真是马克思主义”。在谈到无政府主义时，他认为无政府主义者宣扬的个人绝对自由对于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是行不通的，“完全不适用”的；在政治上主张立即废除国家、法律，也是行不通的，坚持这种作法，“非致撞得头破额裂不可”^①。这篇演说词，全文发表在《广东群报》以后，引起了区声白的不满和反对。他和陈独秀一来一往共有6封书信。争论的问题是区声白宣扬个人绝对自由；陈独秀主张民主集中制，少数服从多数，指出所谓绝对自由，是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②。归根结底是区声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陈独秀对此则坚持不渝。

广州是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的地方。虽然当地也建立了共产党小组，但其中大部分成员是无政府主义者。陈独秀来到广州后发现了这一情况，他希望争取这批年轻人，明确地跟他们说：“如果你们合作就加入共产党，不再讲无政府主义了。”^③无

^{①②}1921年1月19日《广东群报》；又见《新青年》第9卷3号，1921年7月1日。

^③沙东迅：《一访刘石心先生的记录》，《劳动者》，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2、146页。

政府主义者不同意，双方“势同仇敌，……互相攻击。”^① 区声白给北京无政府主义者写信，说“陈独秀野心专横，谓吾辈联合须听其指挥，悉依青年团之集权主义进行，如吾党被其降服立约之加入者”^②，商议怎样联合攻击陈独秀。陈独秀再次明白地告诉他们“要放弃原来的无政府主义观点，才能加入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者不同意^③。到1921年春，由陈独秀直接领导成立了中共广东支部，排除了无政府主义者，甚至连“共产党组织内部的情况也不给他们知道”^④。

在上述两场争论中，中共发起组成员都奋笔疾书，投入战斗。《共产党月刊》先后发表《短言》、《社会主义商榷》、《无政府主义的解剖》等都是旗帜鲜明的战斗论文。这两场争论使许多进步青年在政治思想上明辨大是大非，认清了共产党的性质和任务，从而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创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主持中央工作 工运第一次高潮

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达上海。不久，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接替维经斯基工作的尼科尔斯基（俄国人）也到达了上海。他们同李达商议，“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

①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1980年版第668页。

②北洋政府步军统领衙门档案，（一〇）二二（二）21。

③沙东迅：《一访刘石心先生的记录》，《劳动者》，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2、146页。

④谭天度：《关于广东党组织成立的回忆》，《“一大”前后的广东党组织》第119—120页。

大会，宣告党的成立”^①。于是，李达“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开会”^②。陈独秀因兼任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无法脱身，便指派陈公博、包惠僧去出席会议^③。

陈独秀虽然不能参加会议，但很关心建党的事。早在这年的2月间，他曾经起草了一个党章，寄到上海，“主张党的组织采中央集权制”。现在他又向大会“提出关于组织与政策的四点意见”，交陈公博带到上海。这四点意见是：“一曰培植党员，二曰民权主义指导，三曰纪纲，四曰慎重进行征服群众政权问题。”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发展和教育党员，执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注重组织纪律和争取群众、夺取政权的意思。

1921年7月23日至8月2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李达、李汉俊、王尽美、邓恩铭、张国焘、刘仁静、包惠僧、周佛海和陈公博13人，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此外还有国际代表马林等也出席了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并推举“陈独秀任书记，李达任宣传主任，张国焘任组织主任”（指工人运动的组织而言），三人组成中央局^④。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规定经过暴力革命，“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

①②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一大”前后》（2）第10页。

③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136页。

④李达：《关于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的一封信》（1954年2月23日），存上海市文管处。

束”，“消灭资本家所有制，没收机器……归社会公有”。《纲领》的第十二条规定，“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①。中国共产党这时虽然人数很少，但它是遵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建立起来的，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像一棵新生的幼苗，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的大地，必将成长为一株枝叶茂密的参天大树，盛开革命之花，满结胜利之果。

中共“一大”闭幕以后，马林多次提出陈独秀应辞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回沪任书记。包惠僧去广州，向陈独秀汇报“一大”情况，请他回上海主持中央工作。8月17日，陈独秀致函陈炯明，辞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一职，未获准，只得借词医治胃病请假离粤。9月9日，广东省教育委员会职员举行祖饯大会，为陈独秀饯行^②。

1921年9月中旬，陈独秀回到上海，仍住进老渔阳里2号。从这时起，他就没有职业了，也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经济生活常常发生困难。他的经济主要来源于1922年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独秀文存》的版税。他没钱用了，就去亚东图书馆，但又“从不开口”向汪孟邹要钱。老朋友相知有素，汪孟邹每当“见他坐的时候多了总要问他一句：‘拿一点钱吧？’他点点头，拿了一元、二元，再坐一回，再去了。”每逢这时，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相识的安徽籍的职员便要议论一番：“他家里有钱哩！他不管怎么样，再也不要家里一个钱。他真是一个硬汉子。”^③

①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增订本）第6、7页。

②1921年9月10日《广东群报》。

③汪原放：《亚东六十年》（手稿）。

陈独秀到达上海的第二天便同马林见面会谈。会谈中，他们对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发生了争论。马林认为各国共产党都是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和计划，应在国际的统一领导之下制定。陈独秀认为中国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目前也不必要国际的经济援助。谈了几次都谈不拢。一次马林的翻译张太雷跟陈独秀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中国不能例外。”不料，陈独秀把桌子一拍，说：“各国革命有各国国情，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作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说完就拿起皮包出门要走。张太雷仍然笑嘻嘻地请他坐下来谈，陈独秀不理，很气愤地走了^①。

陈独秀一上任，他的作风生硬粗暴的老毛病便暴露出来了。这对于一个党的中央书记来说，确是一大缺点。

陈独秀初到上海时，在中共中央工作的只有他和李达、张国焘三人，别无工作人员。三人聚会常在陈的卧室楼下的客堂间或统厢房里。“当时决定宣传工作，仍以《新青年》为公开宣传刊物，由陈自己主持”。李达“编辑《共产党》月刊，作为秘密宣传刊物（从第3期至第7期止）”^②。张国焘主持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中央局还决定成立人民出版社，出版15种共产主义读物。

正当中共中央积极开展工作的时候，10月4日下午2时许，法租界巡捕把陈独秀和他的妻子高君曼以及正在陈宅聚会的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一共5人捕去，《新青年》等印刷品

①包惠僧：《回忆马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4月版第100、101页。

②《“一大”前后》（2）第14页。

也被搜去。

第二天会审公堂审问，说包等4人是陈的党徒。陈独秀说：“他们是我的客人，高是家庭妇女，客人陪我太太打牌（被捕时，4人确是在打牌——笔者），有事我负责，和客人无关。”法庭将高释放，其他4人仍回监。在牢里陈独秀对包说：家里有马林给我的信，如果被搜出来，可能要判七八年刑。我打算坐牢，你们出去继续干，不愿干也不必勉强。

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各大报纷纷登载，闹得满城风雨。“第二天褚辅成和张继等将陈保释出去”，但得随传随到。5天后，包等也被保释。为了营救陈独秀，李达“通报各地的组织派人到上海来”，并电请孙中山先生设法。“孙中山打了电报给上海法租界的领事”。马林请了法国律师巴和承办这个案子。26日，法庭结案：查《新青年》已被封闭禁止出售，被告明知故犯，罚洋100元，销毁查抄书籍，释放陈独秀^①。

陈独秀等出狱以后，才知道马林为了营救他们5人，“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这才顺利结案的。“马林和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算是共了一次患难。”陈独秀本是个很重感情的人，现在无形中增进了对马林的感情。他们“和谐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得到适当的解决”^②。从此，中共接受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济的支援。

11月间，陈独秀签发《中央通告》，提出从现在至明年7月以前的工作计划，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五区“都能得同志三十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全国社会主义青年

①《“一大”前后》（2）第389、390页。

②李达：《关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几个问题》，《“一大”前后》（2）第2页（李达将被捕时间误为1922年1月）。

团须超过 2000 名；“各区必须有直接管理的工会一个以上，其余的工会必须有切实的联络”；中央局宣传部必须出版共产主义书籍 20 种以上。“关于劳动运动，决议以全力组织全国铁道工会”，青年及妇女运动，各区也应“切实注意”^①。中共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各项工作。

在上述各项工作中最主要的是发动和领导工人运动。8 月中旬，在上海设立了中国工人运动的领导机关——劳动组合书记总部。不久又设立了北京、武汉、湖南、广州和山东 5 个分部。各分部的负责人和一些党员创办了工人刊物，启发工人觉悟；或深入工人区，开办工人补习学校，联络和教育工人；或按产业组织工会，发动罢工斗争，并在斗争中各地工会互相支援，增进工人阶级的团结。

陈独秀这时十分重视工人工作。从 1921 年 11 月至 1922 年 5 月，他在上海出版的报刊上发表了大约 10 多篇专门论述工人运动的文章，其中尤以 1922 年 5 月 1 日发表在《先驱》第 7 号的《告做劳动运动的人》一文最为重要。这篇文章一开头便说：“现在世界的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都已经使我们……觉得非从事劳动运动不可了”。他指出，做劳动运动的人应该知道七件事：（一）把近代产业工人与一般个体劳动者区分开来，并要充分估计到产业工人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二）明确指出革命知识分子从事工人运动的重要意义。（三）劳动组织系统有三种，即党派的组织，不分劳动者所属的职业或产业，但依党派的政见而结合；职业的组织；地方的组织。后两种组织尤其

^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0 页。

需要注意团体的联合，即工会与工会之间的联合。（四）“劳动运动的最终目的，自然是要造成劳动者的国家，劳动者的世界”。为达到这一目的，须“采取各种和劳动界战斗力相应的战略”。（五）劳动者“对于一切非革命的政党，都不可和他们接近”。“劳动者所最应该亲近的，是革命的社会党——即共产党”。（六）“八小时工作制及星期日休息，是劳动运动中重要事件之一”。（七）“罢工自然是劳动者对付资本家的唯一武器，但实行罢工时，必审度资本家企业状况及劳动市场底供求状况”。在这里，陈独秀指明了工人运动的主要对象及其最终目的，阐明了工人阶级对各党派所应该采取的不同的态度，以及当前争取实现8小时工作制对工人切身利益关系等问题，是当时对工人运动具有指导意义的一篇纲领性的文件。此外陈独秀还写了许多战斗性的短文，如《宁波水手》等。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推动下，中国工人运动逐步趋向高涨。为了促进工人运动发展，中共决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为此，陈独秀于1922年4月下旬第二次来到广州。5月1日召开全国劳动大会（5日结束），各地代表和广州工人举行了五一节庆祝活动，陈独秀即席演说《劳动节的由来及意义》，会后举行有10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大会最成功的是通过了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之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通讯机关。这等于公认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工人运动的唯一领导机关。

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在会上演讲《马克思的两大精神》：“第一，实际研究的精神”，“第二，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号召青年研究马

克思学说，“还须将其学说实际去活动，干社会的革命。”^①

两个大会促进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涨。1922年，全国罢工约100次，人数达21万。这年有“中华劳动运动纪元年”^②之美称。

大会结束后，陈独秀由陈公博陪同到惠州访问陈炯明，想去调解陈炯明与孙中山之间的矛盾，因陈炯明反对孙中山北伐，被免去了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等职。但到陈炯明那里，见“室内挂满了军用地图，桌上架满了军用电话”，觉得事不可为，“广东恐怕不久必有变故”^③，于是陈独秀很快就返回上海了。

加入国民党 维护中共的独立性

1921年底，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去中国南方考察，并会见了孙中山先生，次年3月回到了上海。他认为中国工业最集中的城市上海也没有他所“熟悉的那种工人运动”；农民对革命“漠不关心”；国民党是个多阶级联盟的政党，和工人联系紧密；而中共却不和南方罢工工人联系，“对中国政治生活来说没有价值”^④。因此，他建议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

马林的建议受到了中共的抵制。4月6日陈独秀致信维经斯基，并要他转告共产国际。信中指出国共两党“革命之宗旨

①1922年5月23日《广东群报》。

②德敏：《中国职工运动三十年大事纪要（1）》，《中国工运史料》，1958年第1辑第74页。

③陈公博：《我与共产党》，广东省档案馆：《“一大”前后的广东党组织》，1981年5月版第103页。

④《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2年7月1日），《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

所据之基础不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各地同志“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加入国民党^①。

马林碰壁之后，于4月间离沪回莫斯科，7月11日正式向共产国际提出了他的建议。国际采纳了他的意见，于1923年1月作出关于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决议，认为“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它既依靠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而中国工人阶级却“尚未完全形成独立的社会力量”；因此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是适宜的”，但中共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②。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共在上海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除肯定“一大”制定的革命纲领，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还制定了最低纲领，即民主革命纲领。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成果。大会推举陈独秀起草“二大”宣言。《宣言》首先追述了国际帝国主义侵华史；初步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现状，指明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提出了对内打倒军阀，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任务。

为了实现民主革命的任务，“二大”通过了民主联合战线决议案，并指明首先要联合国民党的民主派，但“亦只是联合与援助，决不能投降附属与合并”，因为民主派不是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可见这时所谓联合国民党是指国共两党平行的外部联合，而不是采用由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党内联合形式。

“二大”通过了中共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国际是个权力高

①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15、93页。

度集中的组织，从此，国际与中共的关系正式成为上级与下级，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将对中国的革命及陈独秀本人产生深刻的影响。最后，大会选举陈独秀任中共中央委员长。

“二大”闭幕后不久，马林又来到了上海。他建议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国共两党关系问题。8月底，中央在杭州召开了西湖会议，会上为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发生了争论。陈独秀说：“不能因为国民党内包容了一些非资产阶级分子，便否认它的资产阶级的基本性质”。如果加入国民党“是共产国际的不可改变的決定，我们应当服从，至多也只能申述我们不赞同的意见。”马林回答说是国际的决定。陈独秀说那也“只能有条件的服从，……只有孙中山先生取消打手膜及宣誓服从他个人等原有办法才能加入进去。”^①最后，中央终于接受了国际关于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指示。

正当这个时候，陈炯明在广州发动武装叛乱，孙中山逃到上海。当李大钊、陈独秀在西湖会议之后会见孙中山，提出两党党内合作办法时，即由孙中山亲自主盟，李、陈等人加入了国民党。孙中山即着手改组国民党，并指定陈独秀等参加国民党党章和总章的起草工作。但没多久，陈独秀便于11月8日启程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1923年2月20日才回到了上海。

1923年初，陈炯明战败，孙中山重回广州，设立大本营。6月12日至20日，中共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经过激烈的争论，才决定全体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大会《宣言》指出“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

^①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第242—243页。

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站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大会选举陈独秀任中共中央委员长，毛泽东任秘书，负责中央日常工作。

从“二大”到“三大”，陈独秀对国共两党合作方式的意见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这一转变就他的思想而言，有以下两点原因：

一、中国社会正处在由宗法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时期，中国需要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革命便失去了阶级基础。因此，“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只有在民主革命胜利了，无产阶级“才有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的机会”^①。

二、中国工人阶级现在还“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资产阶级虽然亦幼稚，但“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②。因此，全国的民主力量“应该集合在民主革命的中国国民党，使他成功一个强有力的革命党，才有打倒军阀的希望。”^③不言而喻，陈独秀的这些观点显然是来自于马林的建议和共产国际的决议。

1923年10月6日，苏俄政府和苏共中央派驻广州的代表鲍罗廷来到了广州。孙中山聘他为国民党特别顾问。鲍氏的到来，加快了国民党改组的步伐。11月，陈独秀主持了中共三届一次全会，作出关于《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其中指出，中共要扩大国民党组织，“矫正其政治观念”；“我们的同志在国

①《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1923年4月25日），《向导》第22期。

②《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1923年12月1日，《前锋》第2号。

③《怎么打倒军阀》（1923年4月18日），《向导》第21期。

民党中为一秘密组织，一切政治的言论行动，须受本党之指挥”；并“预〔须〕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但事实上不可能时，断不宜强行之”。1924年1月1日，陈独秀在中共与社会主义青年团召开的联席会议上，着重指出中共党员同国民党的关系是作为一个秘密支部，要尽力争取国民党内的领导权，但做法要自然^①。同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著名的国民党“一大”宣言。这次大会确认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的原则。大会经选举产生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共产党员占25%。从此，国共两党正式实现合作，携手推动中国革命逐步走向高涨。

国民党内的右派却自始反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尤其是国民党中央三个监察委员，竟然在五六月间连续两次弹劾共产党，妄图取消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党团活动；上海的一些右派也极力诋毁中共，叫嚷什么国民党“亡党”了。

9月17日，陈独秀在《向导》周报第83期发表《我们的回答》一文，驳斥右派的反动言论。文中指出：中共党员“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它“变成一个有组织能行动的党”，这难道是破坏了国民党吗？！介绍工农学生加入国民党，这有什么过错？难道像你们那样“必须介绍军阀、官僚、政客、商人到国民党”里来才算是正确的吗！？你们要我们退出国民党，我们明白地答复你们：国民党“是中国各阶级革命分子集合起来进行国民革命的团体，这团体应该是各分子所公有的，谁也不配叫谁退出”。应该退出的是那些“反革命非革命分子”。党

^①会议纪录，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团活动，是中共在国民党内保持其独立性的组织基础，为了加强这一活动，陈独秀和青年团领导人恽代英联合签发了关于在国民党内的合作办法，确定凡加入国民党的党、团员都必须受中共中央的领导^①，以维护中共的独立性。

指挥五卅运动 批判戴季陶主义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之前，瞿秋白、邓中夏等都曾撰文论述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陈独秀也认为“社会各阶级中，只有人类最后一阶级——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不但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革命他是主力军，即在被资本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之国民革命，也须他做一个督战者，督促一切带有妥协性的友军……不妥协的向外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进攻，才能达到“民族解放”的目的^②。正由于以上这些论述，使“四大”对中国民主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即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对于革命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四大”选举陈独秀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兼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宣传部主任，瞿秋白、蔡和森任宣传委员，张国焘任工农部主任，五人组成中共中央局。“四大”闭幕后不久，发源于上海的“五卅”运动正是在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

1925年5月14日，上海日商内外棉十二厂（纺纱厂）厂主

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297页。

②《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1924年12月20日），《新青年》（季刊）第4期。

无故开除工人代表，致使全厂工人罢工。15日，内外棉七厂（纺织厂）厂主借口十二厂工人罢工，无原料，将本厂关闭。当工人拥进厂门要求上班时，日本人将工人顾正红惨杀致死。当日晚，中共上海地委决定发动群众反抗日本人的暴行，点燃了“五卅”运动的导火线。16日，陈独秀以总书记名义签发了中共《中央通告第三十二号》，要求各地党组织“应即号召工会、农会、学生会以及各种社会团体一致援助”，发表“宣言或通电反对日本人枪杀中国同胞”，募集捐款援助罢工工人。19日，又签发《中央通告第三十三号》，指出“形势至为严重，我们在拥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上，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工作上，在反抗日本所主持的安福政局上，都应该号召一个反对日本的大运动”，各地同志应即邀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开一联席会议，下全体动员令，组织游行演讲队，……向日本帝国主义者加以总攻击”，并应设法令国民党各区分部“和我们合作”^①。

《通告》下达以后，各地党组织迅速行动起来。中共上海地委立即召开会议，决定公祭顾正红，发动群众。当学生在公共租界为工人募捐或为参加公祭大会途经租界时被捕了。租界当局还决定于30日审讯学生。

28日，中共中央与中共上海地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发动广大学生于30日到租界进行反帝大宣传，声援工人；营救被捕学生；同时宣传反对租界当局提出的损害广大市民权益的增加码头捐、增订印刷附律等议案。这天约有3000余学生上街演讲，上海滩顿时热火朝天。下午，英国巡捕发射排枪，血腥屠杀学生和市民，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当天晚上，中

①《中央通告第三十三号》，《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334页。

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上海总工会公开成立（委员长李立三，总务主任刘少奇），与上海学联、全国学联和上海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联合组织工商学联合会，建立反帝斗争联合阵线。31日，上海开始实行罢市、罢课、罢工“三罢”斗争。从此，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革命运动如狂涛怒澜汹涌澎湃，席卷全国600座城镇，有1700万人投入了这场民族解放运动的洪流。

陈独秀密切注视着“五卅”期间上海的阶级关系的变动。从1925年6月至9月间运动基本结束，他在《向导》周报先后发表了11篇文章，以指导运动的发展。当上海人民掀起“三罢”斗争的高潮时，他指出这次斗争的性质和任务，是“立脚在中国民族自由的意义上，反抗剥削践踏我们的外国帝国主义者”。斗争的最终目的是“推翻全世界一切帝国主义，目前在此次运动中最低限度的要求应该是”：惩办凶手赔偿损失；取消各国领事裁判权；收回全国租界；撤退驻在中国境内的外国陆海军等。斗争是长期的，“我们须有普遍的持续力，不可得了一部分胜利便停止前进，即此次完全失败，亦不可因此沮丧！”^①

当反帝斗争中出现一些妥协的言论时，陈独秀及时地进行了批评。他列举当时较流行的五种言论，即以惩凶赔偿了事；缩小战线专门对英；法律解决；“五卅”惨案是地方事件和依靠政府交涉解决，指出这些主张都是错误的。因为“杀人之罪不仅在英捕，而在帝国的国家之高压政策，……是国家行为而非私人行为”；英国固然是罪魁祸首，而“日、美、法、意也和英国

^①《上海大屠杀与中国民族自由运动》（1925年6月6日），《向导》117期。

一样”地欺压中国；“法律只能制裁私人的犯罪行为而不能制裁国家的横暴与民族间的冲突”；这次屠杀不仅发生在上海，“青岛、汉口都同时流血”，这“不但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并且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是要唤起国际的同情才能够解决的”。至于依靠政府交涉解决，陈独秀说，卖国政府“向来是代表外国向本国人民交涉，不曾代表人民向外国交涉”。他进而指明这次斗争“乃是全中国人民为民族的生存与自由反抗一切帝国主义之争斗”，争斗的方法“只有依赖国民自己的团结力”^①。

当上海总商会于6月26日宣布开市，退出“三罢”斗争之后，陈独秀指出开市并不是总商会的罪恶，因为“民族自由是要经过长期的争斗，决非罢市可以达到目的”。总商会的罪恶“在始而离开民众团结”，拒不加入工商学联合会，“继而背叛民族利益（删改工商学联合会所提条件），完全表现出在民族争斗中妥协的大资产阶级之阶级性。”^②

7月6日，租界当局使用了卑劣恶毒的手段，停止工业用电，断绝了上海民族工业的能源，一面向民族资产阶级施加压力，一面造成了大量工人失业。于此同时，奉系军阀在上海加紧镇压反帝斗争，于是反帝联合阵线发生分化，上海工人面临着孤军奋战的困境。有些工人“想以武装暴动来救此危机”。陈独秀认为这种“浪漫的‘拼命’办法”是不对的。他主张为了避免孤立，保存工人阶级组织，应该“改变”罢工的策略，“以

①《此次争斗的性质和我们应取的方法》（1925年6月20日），《向导》第118期。

②《我们如何应付此次运动的新局面》（1925年7月2日），《向导》第120期。

经济的要求及地方性质的政治要求为最低条件”，收缩罢工^①。8月10日，中共中央号召工人有条件的复工。12日，日商纱厂工人首先复工，其他各业也相继复工。

在“五卅”运动中，共产党的队伍壮大了，威信提高了，成为真正的群众革命党。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和无产阶级的坚决不妥协的革命精神惊醒了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戴季陶，他忧心忡忡，觉着再也不能“沉默敷衍含混”了。1925年7月出版了他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从思想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组织上排斥共产党。他认为国民党的“最高原则”只能是三民主义，“绝不须用唯物史观做最高原则”。主义是一个政党的“共信”，“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团结不固，不能生存。”诬蔑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采用的“寄生政策”，极力主张将共产党员从国民党里排除出去；或者是脱离共产党，做一个“单纯的国民党员”，只有这样才能领导国民革命^②。

戴季陶的书一经出版之后，立即受到了陈独秀、瞿秋白等人的批判。9月11日、18日，《向导》周报第129、130期刊载了陈独秀《给戴季陶的一封信》。信中首先指出戴对于共产派的态度与国民党右派“无甚出人”，然后就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国共两党关系等问题，对戴进行批判。

陈独秀说：共产党为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平等的“异常迫切”的心情，胜过你所说的那些“单纯的国民党员”。你的根本

①《我们如何继续反对帝国主义的争斗？》（1925年8月23日），《向导》第126期。

②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1925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戴季陶主义资料汇编》，1983年1月版第58、83、87、84页。

错误是借口“完成国家和民族的需要，便抹杀阶级争斗的需要”，这“不但抹杀阶级利益，并且使民族争斗之进行要受到极大损失”。因为“国民革命之成功，当以工农群众的力量之发展与集中为正比例；而工农群众的力量，又只有由其切身利益而从事阶级的组织与争斗，才能够发展与集中。因此，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主张停止阶级争斗，便是破坏民族争斗之主要力量。”“国民党不是一阶级的党”，于共信之外，“便应该有别信存在”。“你说我们：‘只借国民的躯壳，发展自己的组织’……‘尽量在中国国民党当中扩张 C. P. 或 C. Y. 的组织’”，这纯属颠倒是非。事实是“年来由国民党员加入 C. P. 的很少很少，比较 C. P. 加入国民党的大约不及百分之二，比较由 C. P. 介绍加入国民党的大约不及千分之五”。试问：“究竟是国民党帮助 C. P. 发展，还是 C. P. 帮助国民党发展呢？”为什么“你闭着眼睛硬否认事实”！陈独秀在信的末尾指出，你这部书必有许多人利用它“做反动宣传，……对于这一点你须深加省惕。”

陈独秀对戴季陶的批判是及时的，某些立论也是正确的，但没有击中要害。戴季陶主张的做一个“单纯的国民党员”，其反动实质是为了资产阶级争夺革命的领导权，要把共产党员从国民党里驱逐出去。对于这一点，陈独秀认为“这分明是想把全党各阶级的分子成为某一阶级化，可是这个野心的企图，在现时的中国国民党中，颇难实现”。又说“你如果真有这个企图，在理论上我当然不必反对，因为政党随着阶级分化而演进，本

应该是这样。”^① 这一言论表明陈独秀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从而实现两党党内合作的政策，开始发生动摇了。

同年10月，陈独秀在中共中央第二次扩大会议上，便提出共产党员“应该及时准备退出国民党而独立，始能保持自己的政治面目，领导群众而不为国民党政策所牵制。”这个意见受到了“当时的国际代表和中央负责同志一致严厉的反对”^②。会议认为脱离国民党“是一种很大的错误”。但会议同时又规定“非必要时，我们的新同志不再加入国民党，不担任国民党的工作，尤其是高级党部”^③。这个规定也不利于争夺对国民党的领导权。

主张退出国民党 对新右派让步

1925年下半年，国民党内部左右派的分化愈演愈烈。11月，一批老右派林森等十余人公开地从国民党内分裂出去。他们在北京西山非法召开国民党中央全会，通电广州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即日停止职权；开除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开除汪精卫党籍6个月等。与此同时，国民党内部又出现了以戴季陶主义为思想基础的新右派。怎样区分和对待新老右派呢？

陈独秀认为西山会议派已成为“社会上的一种反动派，不

①以上引文均见《给戴季陶的一封信》（1925年8月30日），《向导》第129、130期。

②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油印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③《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议决案》（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417页。

能当他们是国民党右派了”。而右派“只要他不右倾而至于反动，还算是右派而非反动派。我们对于这种右派，并不必特别反对”。现在新右派“一开始即带有反动倾向”，如果“继续发展下去”，便和西山会议派一样成为反动派了。也就是说现在还没有“继续发展下去”，因此对新右派“亦应与之在每个行动上联合作战。”^① 这就是陈独秀之所以主张联合新右派的一个原因。

联合新右派的另一个原因，是同当时国内政局的变化有关的。同年11月22日，奉军第十军军长郭松龄倒戈，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率部响应，并进军天津，国内形势一时出现喜人的景象。28日，中共北京组织发动市民5万余人集会游行，高呼拥护广州革命政府，段祺瑞下野。但没有多久，郭松龄被杀害，国民军四面受敌，冯玉祥通电下野，北京市民反段运动失败。奉直两系军阀相勾结，反动气焰复张。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认为“革命低潮到来了”，要实行让步的策略，对即将于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张尽可能地把各方面的‘人物’都包括进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去”^②，以免进一步造成国民党的分裂。

中共广东区委原计划在国民党“二大”选举中央委员时，使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少选中派，多选左派，使左派占绝对的优势”。但由于中央路线的推行，在选出的60个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共产党员只有14人，“结果成了右派势力大，中派壮胆，左派孤立的形势。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对国民党右派、中派的

①《国民新右派之反动倾向》（1925年12月20日），《向导》第139期。

②《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11月版第132页。

第一次大让步。”^①此后在中山舰事件和国民党党务整理案中，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又作了第二次、第三次让步。

1925年下半年，蒋介石统率的军事力量可谓异军突起，在广东地区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国共两党合作开始之时，蒋氏任黄埔军官学校校长，在第二次东征讨伐陈炯明部时，任东征军总司令、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第一军中有许多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政治素质高，战斗力强，为统一广东根据地立下了汗马功劳，蒋的威望和权势也随之猛长。

蒋介石这个人老谋深算，诡计多端。他在经过一番精心策划之后，于1926年3月20日制造了中山舰事件，谎称中山舰要炮轰黄埔，将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共产党员）逮捕，并武装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的住所，扣押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当时正在广州考察的，以苏共中央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为首的高级使团的住宅也被包围。当布勃诺夫得知蒋氏此举是“对人不对俄”，即信以为真，满足了蒋的要求，将苏联顾问季山嘉等十余人遣返回国，采取了对蒋让步以求继续合作的政策。他写信给鲍罗廷，说：“中国共产党必须十分审慎行事，……决不能突出自己作为助手和领导者的地位”；苏联顾问应当帮助中共“做好两年事：一是不要过早地使统一战线破裂；二是要重新确定党今后在广东的政策的基本方向”^②。事件发生后不久，有250名共产党员被迫退出了黄埔军校和第一军；身兼国民党中央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国民政府主席三要职的汪精卫，被迫离粤去法国。蒋介石一箭双

^①《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119页。

^②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第128页。

雕，扫除了他在夺取权力斗争中的重大障碍。

3月底，布勃诺夫化名依文诺夫斯基回国，途经上海时会见陈独秀。他对陈说，蒋“本人并不反共反俄，……蒋氏似已了解共产派确未有谋危政府及蒋氏个人之计划，风波已归平静；惟孙文主义学会一派挑拨离间之举动仍未停止，随时会有事故发生。”^①陈独秀根据这一情况在4月3日出版的《向导》周报上发表《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一文，揭露国民党右派所散布的共产党倒蒋和改建工农政府的阴谋。文中称“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一个柱石”，而把攻击的矛头直指“以孙文主义学会为中心的国民党右派”。

4月中旬，当中共中央收到广东区委的详细报告以后，才知道事件的真情实况。于是陈独秀又提出退出国民党的建议，但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都不同意。5月11日，中共中央致电答复国际4月30日关于共产党应留在国民党的指示，说：“我们不打算退出国民党，左派和蒋介石也无意开除我们，他们只是想限制我们在国民党里开展工作”^②。

4月29日，鲍罗廷从北京回到广州。他所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怎样处理中山舰事件，此“风波已归平静”，而是怎样处理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务案。此案的主要内容是限制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和省市党部担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总数的1/3，也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职务。鲍罗廷对于蒋介石所提出的要求都同意了。蒋介石后来记述道：当鲍罗廷与我会商

①致中（即陈独秀）：《广州事变之研究》，《向导》第148期，1926年4月3日。

②转引自杨云若等：《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33页。1988年6月版。

时，“对我的态度极为缓和，凡我所提主张，都作合理解决”，“所以我们的会商能够达成这八点协定”^①。5月17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顺利地通过了整理党务案。25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林祖涵、组织部部长谭平山、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都辞去了他们的部长职务。与此同时，蒋介石的地位扶摇直上，身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主席，独揽党政军大权。

6月9日，《向导》周报发表陈独秀6月4日《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信》的基调是为中共辩解，而不是揭露蒋介石的阴谋，其中既有批评蒋的言论，也有美化他的辞句。在同一天出版的《向导》周报上，还发表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为时局及国民党联合战线问题》。这个文件如果不是出自陈独秀的手笔，至少也是经他同意才发表的。《书》中指出两党建立联合战线的重要性。至于“两党合作之方式：或为党内合作或为党外合作，……原不拘拘于形式”。当初“孙先生以为党内合作，则两党之关系更为密切，……故毅然决定，令本党党员得加入贵党”。现在贵党的党务整理案，“或者认为与本党合作之方式”须有改变，“果若此，则与本党合作政策并无所谓根本冲突”。“贵党‘党务整理案’原本关及贵党内部问题，无论如何决定，他党均无权赞否”。至于今后两党合作之方式，“可各自根据其党之议决以相协商，文函会议皆可”^②。整理党务案明明是限制共产党的，却完全成了国民党“内部”的事，共产党不需要也无权表示“赞否”。陈独秀

①蒋中正：《苏俄在中国》，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5年版第42页。

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5月版第98—99页。

的退出国民党的建议虽然被否决了，可并没有解决他的思想问题。这个文件依然流露出退出国民党的情绪。

7月12日至18日，中共中央召开第三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作出《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议决案指出，现在退出国民党，“消灭这一各阶级联盟的政党，以为共产党已经就能独立领着无产阶级，使其他被压迫民众跟着它，来完成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种观点是完全不对的”；“如果有些同志，仍旧认为共产派应当包办国民党机关，自己占领发展国民党组织及党部工作；……这种观点亦是错误的”。决议认为目前紧迫的任务是反对右派（指老右派），“竭力赞助”中派（也称新右派，指蒋介石、戴季陶等），同时应当拥护劳动民众利益的政策^①。总之，既不能退出，又不能包办，还要赞助蒋介石，这就是这次会议制定的政策。

决策上海工人武装起义 起草汪陈宣言

中国共产党为响应北伐军攻打上海，推翻反动军阀的统治，建立市民政权，于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领导上海工人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这期间，陈独秀除到汉口出席中共十二月特别会议外，一直坐镇上海。武装起义中所执行的重大政策，都是经他认可，或是由他直接制定的。

1926年10月24日，上海工人举行第一次武装起义。由于事先缺乏准备，过分地依赖上海国民党和资产阶级势力，以及起义时机选择不当等原因，当天就失败了。

^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120—122页。

11月初，北伐军攻克九江、南昌以后，国民党内部的分化日益加剧，蒋介石愈来愈反动。他在江西非法召开国民党中央会议，公然反对国民政府迁都武昌；公开叫嚷要“制裁”共产党，驱逐鲍罗廷；并唆使他的党徒杀害工会干部；强行解散执行三大政策的南昌市党部和学联。这一连串的事件，不能不引起共产党人的警惕。

1927年1月25日，中共上海区委即明确指出反赤联合战线的危险性。区委书记罗亦农说：“上海为财源之地，北伐军如果一来，必将勾结资产阶级，也许蒋介石到上海后，就正式攻击C. P. 而爆发直接冲突。”^①区委决定发动以“工人为主的武装暴动，……表示民众的力量”。否则，蒋介石来到上海，“必与帝〔国〕主〔义〕妥协”^②。这是中共上海区委第一次把工人武装起义与防止蒋介石和帝国主义妥协联系起来。

2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告^③，制定了武装起义的总方针。上海区委依据中央通告于17日发出《秘书处通讯（第十一号）——应付目前国民党内右派的进攻及我们对蒋的态度》。《通讯》指出：革命势力之伸长，将迫使中外反动势力变换手法，“不由外面进攻而从内部破坏”。因此，国民党内部的斗争“已成为目前革命中最严重问题”。中央决定的斗争方针是：“1. 不可使这个争斗简单成为C. P. 与K. M. T. 的争斗，无论在任何斗争中都要拉出左派，与左派联合进行；2. 不过所谓与左派合作，是要我们能勇敢的立在主体地位，使左派来帮助我们，

①中共上海区委会议记录（1927年1月25日），未刊。

②上海市档案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版，第115、117页。

③《“六大”以前》第721页。

不是要左派为主体，我们去助他。……总之，我们以后在一切斗争中一定要自己肩起责任去冲锋”，改变过去左派在前“顶头去干”，共产党“在后面出主意”，以致“左派一退”，共产党“也跟着退”的状况。“现时蒋介石已成为反动势力之中心”，但我们“只能在口头上宣传，文字上不能明提蒋介石的名字”，而是依据事实“用很巧妙的词句暗射”他^①。

这个方针若不是陈独秀首先提出的，也必定是经过他同意的。而且在第三次起义时，他提出的许多主张都是和这一方针的精神相吻合的。这表明了陈独秀对革命领导权（至少表现在这时上海工人斗争中）问题认识的进步，也无形中批判了他在1926年12月特别会议上所陈述的观点：共产党员包办国民党，使“国民党没有群众，左派的群众和左派领袖隔离了，于是左派未能有力的形成。”^②也纠正了他在第一次起义时以商人为主体的思想。

在区委下达第十一号通讯的同一天（2月17日），北伐军攻打杭州，守敌望风披靡，弃城而逃。18日，上海总工会发布总同盟罢工命令，但迟至21日区委才下达起义命令。由于工人发动不够充分和军警的残酷镇压，中共中央和区委于23日晚召开联席会议，当机立断，由总工会下令复工；同时决定“扩大武装组织”，积极准备第三次起义。联席会议建立了武装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会）。特委会以陈独秀为首，由中共中央和区委的主要负责人罗亦农、周恩来、赵世炎、汪寿华等共8人组成^③。此外还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特别军

①③④《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119—122、136、137页。

②陈独秀：《政治报告》（1926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384页。

事委员会^④，具体策划武装起义。

特委会从1927年2月24日至3月30日，共召开了31次会议，陈独秀出席了30次。他到会必发言，若把他的发言记录，与区委会议、各部产总联席会议、活动分子会议等会议记录，以及区委的《每日通讯》，对照阅读，便不难发现陈独秀的意见是得到及时贯彻的。3月5日，特委会在讨论拟定起义日期时，决定“整个行动，由特委会议指挥，……紧急时亦（农）、恩（来）、松（松林，即汪寿华）、独（秀）”4人负责^①。陈独秀在特委会上的发言内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总同盟罢工、武装起义和召开市民代表会议，三者紧密结合进行。陈独秀在24日的特委会上提出“要造成工人群众夺取武装的野心。在26日的会议上提出“我们要集中11号工作，群众夺取武装，群众的开代表会议，这二层是武器与政治间有意义的。……无论是警察的兵士的一支二支（枪）都夺取。”“市民代表会议，要各地方各区域都成立，成功一种权力。上海市政府即建筑在许多小政府上面，非常有力量的。”总同盟罢工“要决定为夺取武装，为开代表大会而罢工。（罢工后工人）不应回到家去，不要为罢工而罢工。”罢工时，“事先要组织广大的交通队”，侦察队，宣传队，“以便很快的行动”。^②3月4日的晚上，陈独秀还问罗亦农：“罢工后工人是否能够跑到街市上”？罗回答说：“已宣传为暴动而罢工，不能像上次那样，罢了工都回家去。”^③根据陈独秀的这些意见，经过集体讨论，会议做出决议：罢工后工人立即冲上街头，夺取武装，转入起义；同时召开市民代表大会，为建立市政权做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正是

^{①②③}《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283，191、192，276页。

根据这个纲领性的决策进行的。

二、争夺市民代表大会的领导权。2月28日的特委会在讨论未来的市政府问题时，陈独秀说：“北伐军来后，最重要的问题，即为市政府问题。我们要群众的，而他们必是领袖的。我们要选举的，而他们需要委任的。此为重要争点，我们应赶快做代表选举的工作”，在北伐军未来之前，“预先选好”^①。在3月5日的特委会上，他进一步指出：市民代表会代表人数，至少一千人，工人占一半”；“如果商人太多，工人要增加”^②。

三、掌握火候，确定起义日期。3月5日晚，周恩来在特委会上报告，关于起义“各方面动作已预备好，集中力量在闸北”。于是会议集中讨论起义的日期问题。陈独秀说：起义“仍要带点机会色彩，不要太早。有二标准。（一）上海已无驻兵；（二）北伐军到松江后仍前进，或待至到龙华。”因为“我们武力单薄，鲁军作兴索性蠢动一下”呢。周恩来说北伐军攻下松江或苏州“必可”发动。会议经过讨论，陈独秀作出决定：“（一）松江下；（二）苏州下；（三）麦根路与北站兵向苏州退。三条件有一个就决定发动”起义^③。

当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愈是接近上海，资产阶级原有的一点起义的热情也愈来愈低落，而共产党人则愈是加紧起义的准备工作，因为他们越来越认识到革命形势的严重性。3月15日，罗亦农在向活动分子作报告时，明确指出蒋介石“根本丢弃了中山三大重要政策，……且将与一切反革命的势力妥协，将使整个的革命运动右倾而倒败。”如果共产党“坚决起来做民众政权的运动，……与武汉的民众遥为应援，共同合作，未始不可

^{①②③}《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227、283、281、282页。

以抵制右倾力量的发展”^①，防止蒋介石来到上海出现反动局面。这就是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的一个重要目的。

3月20日晚，北伐军占领了上海近郊龙华镇。午夜12时，上海总工会主席团会议议决于21日正午12时开始总同盟罢工。各工会在接到命令的3小时内便实现了全市总同盟罢工，参加罢工人数不下80万人^②。

22日上午9时，市民代表大会召开，到会有千余团体，4000名代表。大会产生了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执行委员19名，其中共产党员9名。当日下午6时，上海工人在中共的领导下，经过28小时的巷战，占领了上海全部华界地区，赢得了武装起义的胜利。

武装起义胜利之后，在中共领导之下公开成立了一支2000名武装的工人纠察队，这使资产阶级感到胆战心惊。起义胜利后的第二天，上海总商会、南市商会、闸北商会和银钱两业公会举行联席会议，会上“一致赞成”务须收回工人手中枪械，“以维治安”^③。此时，市上流言蜂起，什么市政府是共产党的，蒋介石反对，上海总工会被北伐军缴械了等等。资产阶级生怕党军误会，首先对刚刚诞生的临时市政府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到3月底先后有6位资产阶级人士辞去市政府委员职务，他们把未来的希望寄托于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

25日晚，陈独秀在特委会上慷慨陈词：

①《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19、322页。

②1927年3月22日《申报》。

③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荣家企业史料》（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92、193页。

中国革命如果不把代表资产阶级的武装打倒，中国就不想要革命，同时只要把此武装打倒，资产阶级就可以服从革命的力量。上海现在资产阶级与右派勾结党军也很右倾。我们如果情愿抛弃上海，就很容易，如果争斗，就要马上动作。

因为将来的纠纷问题，为纠察队的武装解除问题，如果我们不马上动作，将来就将纯全为国共争斗，完全失掉联合阵线。所以我意我们现在要准备一个抵抗，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此决斗或许胜利，即失败则蒋介石的政治生命完全断绝，因此此决斗，实比对直鲁军斗争还有更重要的意义^①。

26日下午，蒋介石来到了上海。他立即表示“本人对沪租界绝无用武力收回之意。”^②对沪上工商业，“各种条例，不日当可公布，决不使上海有武汉态度。”^③“所有上海地方秩序与中外人民财产，自由鄙人完全负责”，工人纠察队“应该受军事当轴的节制。”^④29日，当市政府举行就职典礼时，蒋介石派人送来一封恐吓信：“在此军事期内，一切行政处处与军事政治统系攸关，若不审慎于先，难免纠纷于后，……务望暂缓办公”^⑤。但从当时的形势看，只要有市政府的支柱武装工人纠察队的存在，

①《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89页。

②1927年3月28日《申报》。

③上海市档案馆：《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第48页。

④1927年3月30日、27日《申报》。

⑤1927年3月30日《申报》。

“纠纷”总是不可避免的。

陈独秀为了防止蒋介石的反动，曾经设想过多种方法。在武装起义之前，他曾说：“我们如果有很大多数的群众对他示威，他也或许能够让步。”所以我们要特别发展国民党员，“将来对付右倾军阀，可用党员大会来解决最后难解决的问题。”^①在起义胜利之后，他曾经通过工人和北伐军第一师薛岳部的联欢，为薛部招兵等办法，试图使这支比较左倾的部队能常驻上海。在蒋介石来到上海后，陈独秀说“我们表面上要缓和反蒋反张〔静江〕，实际准备武装组织。……对蒋要求我们的问题，差不多都可答应，但要他积极反英”，并试图发动反英大罢工，抗议英、美帝国主义炮轰南京^②。现在又“决定以市政府与老蒋冲突，免工人纠察队直接与他们冲突。”^③但所有这些办法，没有一条是行得通的。而形势则日益险恶，市面上流传的工人纠察队要冲租界的谣言越传越广。就在这个时候，汪精卫由法国途经苏联，于4月1日回到了上海。

汪精卫一到上海便立即被蒋介石等人包围，连日举行会谈。他们诬指共产党提出打倒国民党口号，使工人冲入租界，要汪立即“分共”。4月3日，蒋介石发表通电，扬言“中正当专心军旅，……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诸端，皆须在汪主席指挥下，完全统一于中央。”^④陈独秀本来是主张迎汪复职，将政权归汪，军权归蒋的。现在蒋介石的通电在字面上完全符合

①中央特别委员会会议记录（1927年3月17日），原件存上海市档案馆。

②《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428页。

③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1927年4月1日），原件存上海市档案馆。

④1927年4月4日《申报》。

他的主张。因此，当汪向陈质问中共要打倒国民党、冲入租界时，陈表示绝无此事，随即亲笔起草国共两党联合宣言，与汪合署，于4月5日公诸报端。

《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郑重声明，“中国共产党坚决的承认，中国国民党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毫无疑义的重要”；严正指出所谓“共产党组织工人政府，将冲入租界，贻害北伐军”等等，纯属谣言，是反革命分子破坏两党合作的阴谋。《宣言》把“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也一律看作是谣言；要两党“相互尊敬，事事商协，开诚进行。”^①只讲合作，不讲斗争，显然有右倾麻痹思想。

陈独秀是真心实意地期求缓和，而蒋介石则一面搞假缓和，一面策划于密室，暗布杀机。1927年4月12日，他的党徒用最卑劣的手段，剿杀工人纠察队。当上海工人和市民举行示威游行，要夺回他们武装起义的胜利果实时，反动派不惜血洗宝山路，疯狂屠杀上海民众。

对土地问题的意见 答国际指示

1927年4月中旬，陈独秀从上海前往武汉，他是中共中央5个常委中最后一个到达武汉的。这时，中共中央所面临的革命形势更为险恶与复杂了。蒋介石成立了南京国民政府，下令“清党”，决然与武汉国民党中央相对抗。武汉方面宣布开除蒋介石的党籍，继续执行联共政策，但却陷入了四面受敌的危险境地。东有蒋介石；南有受南京政府节制的两广；北有奉系军

^①1927年4月5日上海《民国日报》。

阀；西有与蒋介石相勾结的四川军阀杨森。而与此同时，在武汉国民政府所管辖的两湖地区，中共领导的工农群众运动猛烈展开，农民的土地问题亦随之日益紧迫。

陈独秀到达武汉以后，即主持4月18日至20日的中央会议。会上对于革命策略的制定，有四种不同的意见：（一）东征讨蒋；（二）南下重建广州政府（“四一二”之后的第三天，李济深在广东进行“清党”）；（三）与国民党一起举行第二次北伐，消灭奉系军阀；（四）在两湖地区开展土地革命。会议经过讨论，中共中央（自然包括陈独秀在内）决定采纳北伐的意见。但在北伐的同时，对于要不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怎样解决土地问题又发生了争论。

国民党的土地委员会在4月初就成立了。这个委员会为了制定解决土地问题草案，曾经举行过多次会议。陈独秀出席了4月26日的扩大会议。他在会上提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原则：“（一）国民革命过程中必须解决土地问题，即是没收小地主及革命军人以外之出租的土地分给农民；（二）公布佃农保护法；（三）无土地之革命士兵退伍时必须给以土地；（四）解决土地问题之先决问题必须给农民以武装及政权。”^①对于解决土地问题的具体方法，陈独秀也提出了三条措施，但条条都是依靠两党合作自上而下实施的。

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陈独秀在4月29日向大会作政治报告，当谈到土地问题时，他把小地主划入了小资产阶级范围，说不没收他们的土地，“向

^①1926年4月26日国民党土地委员会会议记录，存湖北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

他们让步”是为了与小资产阶级建立联盟。这个意见为“五大”所接受，并写进了大会的《宣言》里。但陈独秀没有把解决土地问题作为当时革命的紧迫问题。他认为现在还有新、旧军阀，只有“等待北伐继续向前推进，等待农民运动扩大以后，再来加深农民运动”才“更可靠得多”^①。也就是说先扩大后深入，等到打倒新旧军阀以后，再进行土地革命。这个意见同斯大林的观点不谋而合。斯大林在5月13日和中山大学学生谈话时，也是主张先北伐的，至于土地革命等和冯玉祥军“会师，在军事方面充分地巩固起来”以后，再“以全力开展”^②。

“五大”作出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对土地问题的态度比陈独秀积极，《议决案》认为：现在革命既“需要很快的扩张”，同时也“应当竭力执行深入革命的职任，以巩固革命的根据地”。如果认为要先完成北伐而后再解决土地问题，“这正可以使资产阶级在他所占领的沿海诸省，戴着民族主义者的假面具而在极短时期内巩固他们的势力。”《议决案》的基本意见是革命的扩大与深入同时进行，“反对以扩大革命地域为借口，而实际上抛弃或削弱现时革命根据地的倾向”。这显然是批评陈独秀的。“五大”还专门作出了《土地问题议决案》，但没有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具体办法。“五大”认为“四一二”政变之后，国共两党的关系“比以前应当更加密切。资产阶级之退出，使国民党日益成为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两党应“共同担负政权”^③。由此可知，关于解决土地问题，无论是陈独

①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辑。

②《斯大林全集》第9卷。

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6月版第42—45页。。

秀的意见，或是中共“五大”的意见，或是早在1926年底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会议提出的意见，除了对解决土地问题的主张有缓急之差异外，它们都有一个根本的共同点，都是依靠两党合作，由国民政府自上而下地进行的。因此，解决土地问题的关键要看国民党的态度了。

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于5月9日、12日两次讨论土地委员会提交的《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这是个初步的土地改革方案，也完全符合一个多月前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所通过的《对农民宣言》的精神，但它竟然被否决了。从此，武汉国民党抛弃了扶助工农的政策，使一切试图通过现政权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都变成了空话连篇的幻想，这对于国共两党的继续合作不啻是釜底抽薪。

5月13日，掌握两湖地区军事大权的唐生智所节制的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发出反共通电，并率叛军直逼武昌。接着，国民党发布了一系列的压制工农运动的训令。21日夜，驻扎长沙的唐生智部下许克祥团发动武装叛乱，封闭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解除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的武装，疯狂屠杀工农和革命志士。

急剧恶化的革命形势，迫切要求共产党制定出新的政策。但是，五届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及共产国际首席代表罗易和苏联顾问鲍罗廷，谁也拿不出切实可行的挽救革命的方略。正当这时，罗易6月1日收到了共产国际于5月底发来的紧急指示，其要点是：（一）“没有土地革命，就不能胜利”，“必须反对过火行动，但不能用军队，而要通过农民协会”；并强调指出“从下面实际夺取土地”。（二）国民党的某些老领袖“正在动摇和妥协，必须从下

面吸收更多的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革新”它的上层。（三）“动员两万左右共产党，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否则就不能保证不失败。”（四）“组织以有声望的，不是共产党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①。指示强调从下面自动地没收土地，并首次提出了中共建立自己的军队的任务。这较以往的指示确有很大的变化和进步，可惜的是这个指示来得太晚了。许克祥在湖南，夏斗寅在湖北大肆屠杀工农，朱培德在江西“礼送”共产党员出境，“已到火烧眉毛的时候，来不及了”^②。

6月6日，陈独秀在政治局会议上宣读这个指示，并一一作了说明，表示他的意见：农民运动如果不过火，反动派的统一战线就不能形成，因此现在不能着手解决土地问题；国民党通常是在代表大会上确立它的领导人员，现在国民党没有召开代表大会，怎么能增加它的领导成员呢？如果我们要建立一支独立的军队，又如何维持呢？怎样获得武器？在我们建立军队以前，我们得进行谈判，同反动军阀打交道，我们不得不支持现在当政的这些将军，否则就不可能有建立我们自己军队的机会；至于组织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这是行不通的，如果我们能够成立这种东西，领导人就只能是共产党员。陈独秀认为共产国际的这个指示不是言过其实，就是一种幻想^③。陈独秀发言以后，会议经过了讨论，由政治局作出对国际指示的答复：“依照训令方针进行，唯声明不能即时都能实现，因为中央全体同志

①《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31—32页。

②李维汉：《回忆与研究》第135页。

③转引自史略：《陈独秀是怎样拒绝共产国际“五月紧急指示”的？》，《中央档案丛刊》1987年第2期。

都认为国际这些训令都是一时没有办法的办法”。

在许克祥叛乱之后，陈独秀在政治局会议上曾两次“提议退出国民党”。他认为“我们和国民党所争的，……实际上他们所要的是整个的领导权，现在只有两条路摆在我们的面前：放弃领导权，或是和他们决裂。”鲍罗廷说：“你这个意见我很赞成，但是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容许。”^①中共既不能同国民党决裂，又不能改造它的中央领导机关，还要和它继续合作，因此唯一的希望是建议国民党平定叛乱，“明令宣布”许克祥等所组织之委员会系反革命，并令军队联合革命的民众共同推翻之”^②。同时中共中央还连续下达文件，纠正农民运动中的“过火”行动，以维系已经无法继续的国共合作。但在国民党领导人汪精卫等看来，农民运动不是过火不过火，或要不要纠正的问题，而是“一个空前的错误，……难怪许克祥他们要起来反抗”^③。

共产国际收到中共中央对“五月指示”的答复以后，6月8日又来电，“责斥中央对于土地革命的态度不坚决，……警告中央改变态度，否则将在国际机关报上公开批评，同时指令迅速反攻并解决许克祥，农民自动没收土地”^④。15日，陈独秀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致电答复国际：“大多数的军官来自中小地主阶级”，他们以农民过火行动为借口，“反对土地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必须采取让步政策，必须纠正过火行为，节制没收土地的行动”。“否则，将立即引起与大部分反动军队的

①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

②《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关于政局的公开信》（1927年6月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141页。

③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速记录（1927年6月1日）。

④《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版第80页。

冲突，与国民党发生分裂，而我们将变成一个反对党”。“你们的指示是正确的而重要的，……但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实现。用改组的办法驱逐汪精卫尤其困难。当我们还不能实现这些任务的时候，必须与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将领保持良好关系。……如果我们同他们分裂，要建立我们自己的军事力量将是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即使如此，“在最近的将来，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客观上大概是不可能的。”^①中共中央这时既害怕国共两党分裂，又意识到两党的合作关系，即将要公开破裂，陷入了无法解脱的思想矛盾。鲍罗廷说：“斯大林主张土地革命的政策是对的”，可是“以季诺维也夫及其在中国的代表（当然包括鲍本人在内——引者）只教我们帮助资产阶级，武装中国资产阶级，未教我们武装工农，准备与资产阶级决裂。所以现在斯大林的政策难于执行”。陈独秀接着说：“以前季诺维也夫一向教我们帮助资产阶级，现在斯大林教我们二十四点钟内实行土地革命！”^②鲍、陈二人闭口不谈自己应负的责任，把责任统归于前共产国际主席、现成为联共反对派的首领之一——季诺维也夫。

大革命紧急时期的政局，可谓瞬息万变。当唐生智部北进攻入豫南时，冯玉祥部东出潼关占领了郑州，蒋介石的部队也北上占领了徐州。冯玉祥到徐州与蒋介石会谈，并倒向了蒋的一边，他发表通电，一方面而指责武汉地区的工农运动，一方面而呼吁宁汉两方虽“异地而同心，应通力合作”等等。不久，他也发了点路费把曾经为他整军经武的共产党员“送”走了。徐

^①《罗易赴华使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4月版第324、325页。

^②《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97页。

州会议使“四一二”政变以来扑朔迷离的政治风云明朗化了，陈独秀的先扩大后深入革命的意图化为泡影；武汉国民政府也根本无力消除蒋介石所造成的分裂局面，或继续与蒋对抗下去，结果是，武汉国民党汪精卫集团步蒋的后尘而实行“分共”。

6月30日，中共中央为了“推迟”^①武汉国民党可能的叛变，通过了由瞿秋白起草^②的国共两党关系十一条议决案：承认国民党处于国民革命的“当然”领导地位；“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等等^③；把一向掌握在共产党手中的工农团体的领导权也拱手让给了国民党。但这并不能“推迟”汪精卫的“分共”。

两个月后，蔡和森在回忆当时政治局的情况时，说：十一条“是五次大会后机会主义的总结。但这不是秋白同志和独秀同志个人的责任；……不过是两月以来（五次大会后）动摇、犹疑、回避土地革命，向所谓左派让步政策之总结罢了”。他又说，那时“中央政治局的精神愈益混乱不振，大家都沉闷得很，又像迷失路途似的。对于每一个问题都是动摇的，犹疑的。”^④蔡和森所说的这种情况，正是一个年幼的党在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中，面临着紧张又激烈的斗争时，一种不成熟的表现。

潜行返沪 提出“四不”口号

1927年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

①王若飞：《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中共党史革命史论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5月版第121页。

②④《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96、98、91页。

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255、256页。

中央改组，组成新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陈独秀被停职。他隐蔽在武昌一个偏僻的工人区，同他住在一起的只有他的秘书黄文容（黄玠然）。

7月15日，武汉国民党实行“分共”，公开背叛孙中山制定的三大政策，大革命遭到惨重的失败。

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中共开始独立地领导武装革命斗争。

8月7日，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的指导下，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会议指出中央领导机关的右倾错误给革命事业带来严重危害，制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在湘赣边发动秋收起义，10月率起义军千余人到达井冈山地区，开始创立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此外，在广东、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河南等省的许多地区也爆发了武装起义。“八七”会议在中国革命史上是一次伟大的转折，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共产党人在十分艰难和漫长的战斗历程中逐步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但是这次会议也有缺点，“在党内斗争上造成了不良倾向，没有让陈独秀参加会议”，并“把反对机会主义看成是对机会主义错误的负责者的人身攻击”^①。毛泽东也曾指出：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是完全应该的。但其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

^①《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172页。

工作。”^①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要陈独秀去苏联学习，他拒绝了。当黄文容问他为什么不到苏联去学习时，他说：“你懂什么？莫斯科让我去学什么啊？学习中国革命问题？中国历史是中国人懂得还是外国人懂得？你以为中国问题还要请教外国人，难道外国问题也教请中国人，中国人能懂吗？”^② 陈独秀认为“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他拒绝去苏联学习，一方面是基于这样的观点，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对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所制定的方针有分歧意见和不满情绪。

大约在9月上旬，陈独秀、黄文容和汪原放等4人同乘一艘英国公和号轮回上海。船上贴着英文布告，大意是国民政府如果在船上捕人，本船主概不负责。4人包了一个官舱，陈独秀扮作病人，戴上风帽，睡在上铺，连吃饭也在舱里。船到了上海，他暂时住在彭礼和家^③。

陈独秀回到上海不久，中共中央也陆续由汉口迁来上海，并于10月间创办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独秀经常为此刊写稿，在每期的“寸铁”栏里以“撒翁”作笔名发表一组杂感性的短文，揭露新旧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以“寸铁”为名的栏目，早在《每周评论》和后来的《向导》周报都有了，那时陈独秀也常在这一栏里发表短文，用的笔名是“只眼”。陈独秀一生用过的笔名、别号有30多个，且个个都有特定的含意。“只眼”，是目光迥异非凡的意思。“撒翁”，据郑超麟说是老头子撒手不管事了。这个解释与字面是相符合的，也许是反映了陈独秀在受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938页。

②黄文容的回忆（1978年3月17日），存武汉市文物管理处。

③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128、129页。

到批评后一时产生的郁闷和消极情绪。不过他这个人是不会把意见憋在肚子里不发出来的。他说过：“我见到于革命于党有危险的我不得不说，我不能顾忌你们说我是机会主义者。”于是在1927年11月、12月，接连给中央常委写了三封信，提出了他对中国革命的意见，其中主要内容有以下四点：

一、“国民党虽然不能长久统治巩固，而眼前尚不至崩溃，因此，我们以群众力量扫荡他们夺取政权的时机尚未到。”^①

二、“因此，我以为此时的工农运动，应偏重经济的斗争，……固然因经济争斗而不避免暴动，尤其在农运非暴动恐难发展。问题是在只能以暴动为不得已而用的方法，而不可以为目的，此时尤不可存‘以暴动取得政权’的幻想”^②。

三、“提议用‘四不’口号（不缴租，不完粮，不纳捐，不还债），更简单明了容易唤起广大的农民群众，……而只是幻想政治的暴动，暴动失败了（当然的失败），我们什么都得不着”^③。

四、“‘工农政府’‘独裁政府’‘苏维埃政府’这些口号我殊不以为然。……我以为用‘工农兵平民（贫民亦不妥）代表会议政府’似较妥当”。

中央常委在收到独秀的来信以后，于12月间回了他两封信。这时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刚刚开过扩大会议。会议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的“左”倾思想指导之下，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把处于低潮的革命形势误认为在继续高涨。因此反对退却，要求继续进攻。中央在回复陈独秀的信时，不可能不受到这次会议的影响。复信对陈独秀信中提到的问题，回答如下：

①②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448—449页。

国民党从上到下派系林立，矛盾重重，“足见任何一派不能巩固其统治”。

“发动工农的经济斗争，以引导到政治暴动是非常之必要，而且是唯一的方针。”

“农民群众在现在的阶段，已经分不开经济与政治的。所以以‘四不’口号……发动农民群众是非常之对，非常之必要；然而由此便必须走到暴动”。

“现在的问题，在农民暴动中正是最迫切农民群众取得政权（苏维埃）的问题”^①。

以上两种意见显然有重大的分歧。陈独秀不同意“八七”会议制定的武装暴动的总方针，中央则坚持不渝。不过这时双方都是心平气和地提出意见，讨论问题。中央对收到陈独秀的信还表示“非常之欣慰”，也“同意”他的某些意见。但由于两种意见的分歧涉及到对革命形势的估量和革命的基本方针等全局性的问题，因此陈独秀与中共中央之间的矛盾一开始便潜伏着对抗性的因素。

当陈独秀向中央写信的时候，也正是联共内部派别斗争日趋激化的时候。1927年11月14日，联共开除了托洛茨基的党籍。1928年初，将托氏流放。一年以后又把他驱逐出境。联共内部的派别矛盾上升为所谓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并株连到一大批老布尔什维克，波及到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时一批留苏的中国学生也接受了托洛茨基的观点，他们在1928年初被遣送回国时，秘密地带回来有关托氏言论的文件，并在上海成立了托派小组织。陈独秀看到这些文件后，受到了莫大的鼓舞。

^①以上引文均见《中央政治通讯》第14期，1927年12月。

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过去多次提出退出国民党的主张竟与远在千里之外的托洛茨基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主张不谋而合；托洛茨基把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归咎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正中陈独秀的下怀，从此他“才彻底的系统的了解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机会主义之真实根源之所在”^①；大革命失败后，托洛茨基所提出的国民会议总口号，亦为陈独秀所欣然接受。总之，陈独秀从托氏的言论里找到了理论根据，获得了支持，使他郁闷的情绪豁然开朗。而中共是坚决反对托派主张的，于是陈独秀与中共中央的意见分歧，由于联共内部派别斗争的激化也随之而加深和扩大，并在中东路事件的宣传问题上发展成公开的冲突。

中东路事件的争论 误国政策与保卫苏联

中东路原是沙俄对华不平等条约的产物，十月革命后，苏俄曾宣言废除沙俄在华一切不平等条约。1924年，两国签订新约共管中东路。大革命失败后，中苏关系恶化。1929年7月10日，国民党指使东北地方当局，以武力接管中东路，并在北平、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策动反俄大会，宣传收回中东路是为了保全国主权和防止“赤祸”。

事件发生后，共产国际认为当时的形势是帝国主义利用中东路事件要进攻苏联，立即号召各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兴起保卫苏联运动。17日，中共中央发出第41号通告，指出“苏联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是世界反帝国主义的大本营”。“中东路事件，就是进攻苏联战争的开始”。所以要进行广大的宣传和发动

^①陈独秀：《答国际的信》（1930年2月17日）。

群众示威，“务使反帝国主义战争保护苏联的口号成为农民群众中通常了解的口号”^①。

7月28日，陈独秀发出致中共中央常委信——《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他不同意这种宣传口号，认为国民党政府“是戴着拥护民族利益的假面具来欺骗民众，并且收了效果”。而中央的宣传方式却“太说教式了，太超群众了，也太单调了，……只是拿世界革命做出发点，拿‘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做动员群众的中心口号”，这“只有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而不能动员广大的群众，反而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陈独秀还要求“取消”第四十二号中央通告里的一段话：“帝国主义对苏联战争开始的时候，毫无疑问的要引起本国工人阶级的革命，造成世界革命的高潮，这样便是中国革命更有利的条件，而更可促成全国革命高潮更快的到来”。因为这段话“使同志们会很自然的做出奇怪的结论：‘原来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还有这些好处，我们让他赶快向苏联进攻罢！’”陈独秀认为中东路事件的发展前途，一是帝国主义利用中国进攻苏联；二是帝国主义各国为争夺中东路而爆发大战。无论是那种可能，战场都在中国，“最直接受蹂躏的自然是中国人民”。因此在向群众宣传时应当指明这一点，“才能够把国民党拥护民族利益的假面具打得粉碎，然后提出反对国民党政府对于中东路的卖国政策或‘误国政策’”。

对中东路事件应当怎样进行宣传，使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既照顾到民族利益，又兼顾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揭

①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328—329、341—343页。

露国民党政府的假面具，这对中共来说的确是个相当棘手的问题。陈独秀的反对国民党政府“误国政策”的口号，也未必能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但他注意到了中东路事件中夹杂着民族问题，批评中央的宣传方式“太说教式了，太超群众了，也太单调了”，提出要打碎国民党政府拥护民族利益的假面具，这些意见是值得听取和研究的。

中共中央却相信共产国际对形势的分析，认为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是必然的，而且“必然要引起世界革命的爆发”。强调“拥护中国革命必须拥护苏联，拥护苏联也就是拥护中国革命”；放弃拥护苏联的宣传，“就成了资产阶级的俘虏”。因此，中央在8月3日《复陈独秀的信》里，指斥他对中东路事件发展前途的两种可能的分析，是“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理论的基础，……帮助了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宣传”。“误国政策”是“资产阶级的左派在野党”^①的口号等等。这种论断已经不再是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而是上纲上线的大批判了。

这时的争论，如果仅从表面上看陈独秀7月28日给中央的信，他所说的不过是关于中东路事件如何进行宣传的具体问题，并未申述他对中国革命的基本意见。不过他这时已经转向了托派，对中国革命形成了系统性的意见，他之所以不发表出来，实是引而不发，以待时机。他在信的末尾上写道：我的意见“或不至”引起“大家的误解与揣测，所以我今后对于重要问题，都想有点意见贡献于党”，并要求把我的意见全文“在党报上发表出来”^②。这显然是要与中央进行公开的争论。中央在复信的结尾处回答说：“始终是希望同志公开的发表对于政治对于党的意

①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5）第338—339、343页。

见”，而且“从没有什么误会与揣测”^①。

8月11日，陈独秀在《复中央的信》里，对自己的意见作了解释，并批评中央“原则和策略不分”，“死板的用命令主义蛮干”，是“纯凭主观不看事实的盲动主义精神之表现”^②。陈独秀的批评也开始升级了。

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特辟《两个口号——误国政策与拥护苏联》专栏，公布了陈独秀与中央来往的信件，同时刊登了许多篇批判陈独秀的文章，其中尤以王明在《布尔塞维克》第2卷10期上《论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一文，火药味最浓。王明一连串给陈独秀扣了七顶大帽子：把民族利益与世界革命利益相对立，怀疑和公然反抗国际指示，放弃领导权，做资产阶级的尾巴，不认识革命高潮等等，是一篇典型的以势压人的作品。然而却偏偏遇到了一位历来不怕压的人。这场争论使陈独秀与中共中央的分歧加深了，距离拉大了。

因此，当中东路事件的争论还未结束之时，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争论便全面地爆发了。

坚持反对派理论 被开除出党

陈独秀在1929年8月5日、10月10日和26日，连续给中共中央写了三封信，全面系统地提出了他对于中国革命的意见，其中涉及到许多问题，有大革命时期的国共两党合作，革命形势高潮或低潮，以及革命的性质和革命的总口号等问题。现将

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5）第340页。

②《中国革命与机会主义》，上海民智书局1929年10月出版。

陈独秀对这些问题的观点简要地介绍如下：

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的合作采取了以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方式。陈独秀起初是反对这种合作方式的，后来他同意了，接受了。历史也已证明这种合作方式确使国共两党都得到了发展，并曾将中国革命引向了高涨。但从1925年下半年到大革命失败前，陈独秀曾多次提出退出国民党的建议，均被共产国际所否决。现在他认为这种党内合作方式是“国际对于中国革命根本政策之错误”，是以“阶级联盟”政策代替了“无产阶级独立的领导革命”的政策，是中国革命的“致命伤”。他说，这个错误政策，不但在“三二〇”事件后、“四一二”政变后不改变，一直到马日事变后“还不肯改变，强迫无产阶级的党始终屈服于在资产阶级的政党之下，做他们的苦力。”^①陈独秀的这番言论全盘否定国共两党的合作，显然是片面的。他还抓住斯大林所作出的论断——共产党要“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接近完全胜利的时候，……显露出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时候”，才可退出国民党^②挑起争论，其攻击的矛头与其说指向中共的某些领导人，毋宁说直指共产国际和斯大林。

中共中央认为，陈独秀关于国共合作问题的观点，“已经共产国际批评得体无完肤”，现在他“只图避免责任，不惜把自己躲到托洛茨基主义的旗帜之下而诬蔑共产国际的根本路线为机会主义！”^③

①《致中央常委的信》（1929年10月10日）（油印件）。

②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册第317页。

③《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5）第395页。

关于革命形势问题，陈独秀明确地认识到革命进入了低潮期，自广州暴动失败以后，党“应该马上取得好的退守政策，以保存阶级的战斗力，……以图革命之再起。当时党的政策却不是这样，反而是在主观上肯定革命高潮还正在一直高涨，因此取了直接进攻政策，直到六大大会前”^①。

“六大”，正确地指出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形势处于两个高潮之间，革命的总任务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大会还批判了盲动主义的错误。但是大会对于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的认识并不彻底，对盲动主义的批判也不够坚决。在肯定革命处于低潮期的同时，认为“新的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并已出现了到来的象征^②。特别是当1929年2月8日共产国际来信指出中国党内右倾比“左”倾是“更加严重”的危险，盲动主义“已经丧失了自己的基础”之后，党对形势的估量又滋长起过分乐观的情绪，认为“新的革命高潮的象征，的确可以看见”了；“反动统治阶级，已经走向他们崩溃的道路”^③。10月26日，共产国际又来信，根据所谓资本主义世界总危机的理论，断定“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底时期”。来信列举了国民党的整个国内政策的失败，工人运动的高涨等所谓十大危机的表现，因此，“现在已经可以开始而且应当开始准备群众去用革命方法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去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专政，同时，要积极地发展和扩大革命形式的阶级斗争

①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信》（1929年8月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5）第403页。

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4），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386、388页。

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5）第209、334页。

(群众的政治罢工、革命的示威运动、游击运动等等)。”^① 这等于说“六大”规定的争取群众，准备暴动的总任务过时了。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飞行集会成了发动城市工人的重要方法，群众示威成了重要的革命途径，而且规定“一切示威的准备发动与组织，都必须建立在力争公开的路线上”，“愈公开才能愈加深入群众”，一旦当军警来镇压时，便会“形成肉搏，演成巷战”^②。这显然是“左”倾盲动主义的蛮干。

陈独秀认为“六大”以后，“革命高潮还未到来”，那种盲目乐观的论调，并“不是中国的国货”，而是斯大林和“国际领导机关之所赐”^③。把敌人的情形估量得非常之坏，把自己的情形估量得非常之好，自然要发生盲动主义；盲动主义在碰着不动的阻碍，自然要发生命令主义”，去“制造群众大斗争的空气”，“玩弄”示威，结果不但不能增强党的力量，反而是削弱了党的力量，因此党“首先要铲除盲动主义的精神”^④。

陈独秀在估量形势时，过分地重视城市工人的斗争，把产业工人不断的经济斗争是否“有转向总的政治斗争的趋势”，作为革命高潮到来的标志之一^⑤，而忽视了广大农村的农民斗争。

对于形势作出错误的估量，自然要制定出错误的政策。而对于形势作出正确的估量，也并不能保证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如何估量革命形势，只是制定政策的一个条件，而不是唯一的条件，除此之外还需要认清国情，正确地分析社会各阶级及其相

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5)第422、423页。

②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5)第458、457、477页。

④⑤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信》(1929年8月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5)第405、413页。

互之间的关系，确定革命的性质、对象和动力。陈独秀恰恰在这些问题上犯了错误。他认为大革命失败后，“主要是资产阶级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而封建势力“变成了残余势力之残余”^①。按照这个观点作逻辑推理：资产阶级既然经过了一场革命“得了胜利”，那就意味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完成了，此后“有的只是工人对资本家的革命了”^②。而事实中国民主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陈独秀又说，以资产阶级为领导的政权，“已经是不会排斥帝国主义，不会肃清封建残余，不会解放农民而完成民主革命的了”^③。只有无产阶级领导工人、中小农民以及城乡劳苦民众，“以不断的革命斗争，扫荡阻碍中国进步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富农等一切剥削下层民众的反革命势力，建设无产阶级贫农专政的工农代表会议（苏维埃），统一全国的政权，才能够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一面走到社会主义的道路”^④。这就是陈独秀设计的革命方案。

陈独秀夸大了资产阶级的力量，过分地强调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低估了封建势力，忽视了封建地主与广大农民的矛盾，进而也忽视了农民群众在中国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因此，他认为一旦革命高潮到来，就不该“死守资产阶级的民主阶段”，应当“立即发出‘工厂归工人’”等口号^⑤，中国革命“不是俄国的十月革命，也不是二月革命，而是二月革命与十月

①③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信》（1929年8月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5）第406、412页。

②《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5）第398页。

④⑤陈独秀：《致中央常委的信》（1929年10月10日）。

革命之总和”^①。也就是说，民主革命要与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进行，这显然是违反“六大”决议的。

在革命高潮来临之时，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那末在低潮期，又将怎样进行革命斗争呢？陈独秀认为应当以“国民会议”作“总的政治口号”，“亦即是由一个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不记名投票选举产生出来的国民会议，以民主的组织运动来对抗国民党政府的军事独裁”。“在国民会议运动中试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反对帝国主义的政纲。这个运动必将遇到“阻碍”、“假冒”、“流产”等等的斗争，但它可以打破群众“对统治阶级当中任何派系的幻想”，斗争每前进一步“都证明非群众革命的暴动，根本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才可以解决国家的一切问题^②。然而，陈独秀对于经过农民暴动创立起的工农红军和开辟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却抱鄙视和反对的态度。他认为在革命高潮来临之前，根本不应该建立红军和苏维埃政权。

中共中央收到陈独秀8月5日的信，于28日由国际代表和中央代表约他谈话，责备他“不应该向中央发表不同的意见”。中央的“政治路线没有原则上错误”，不允许在党报上发表他的信。陈独秀指责这是“用专横态度来掩饰错误”^③。一些托派成员把他的信复写后，在党内散发，进行小组织活动。9月，陈独秀和彭述之等成立托派小组织名叫“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这当然是党的纪律所不容许的。10月5日，中央作出《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警告陈独秀

①陈独秀：《答列尔士同志》（1931年1月20日）。

②陈独秀：彭述之：《致中共中央信》（1929年10月26日）。

③陈独秀：《致中央常委的信》（1929年10月10日）。

“必须立即服从中央的决议，……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与活动”^①。10月10日，陈独秀在致中共中央信里，不仅不接受中央的意见，反说中央“固执掩护错误”，向中央“作一次最后的警告”^②。21日，中共江苏省委决定开除彭述之等四人的党籍，主要理由是“他们的共同观点”都来自于陈独秀给中央的信，因此省委请求中央开除陈独秀^③。26日，陈独秀与刚被江苏省委开除的彭述之联名向中央写信，公然声称“你们说我们是反对派，不错，我们是反对派”。

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决议里列举了许多开除他的理由。其实只要有一条，即承认自己是反对派（中国托派）就足以够清除出党的了。

由于陈独秀曾连任中共中央五届书记，在党内有着特殊的地位，因此，开除他的党籍还需报共产国际审批。1930年2月，国际在给中共转陈独秀的电报中说：“决定予你以机会来参加本政治书记局审查”中共开除你党籍的决定的会议。“如果你对此提议置之不理”，这一问题将提国际主席团的会议讨论。27日，陈独秀致共产国际信，说“关于这些根本问题，我和你们实有不可调和的不同意见……不是调我个人到莫斯科便可以解决的，而且这是官僚的办法。”^④

陈独秀被开除出党，这是他的政治生活一大转折。他将何去何从呢？

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5）第402页。

②陈独秀：《致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10月10日）。

③《红旗》第52期，1929年11月10日。

④陈独秀：《答国际的信》及附件。

任托派书记 倡议联合反蒋抗日

陈独秀被开除出党以后，一批从事反对派活动的党员也相继被开除，有的加入“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1929年12月，陈独秀任“左派反对派”书记。1930年3月创办《无产者》，所以“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亦名“无产者社”。此后，上海又出现了两个托派小组织，一是刘仁静等人的“十月社”，一是赵济等人的“战斗社”，连同1929年初由梁干乔等人成立的“我们的话派”，一共是4个托派小团体。他们之间互不团结、争领袖地位，争中国托派的正统，指责陈独秀是“右派反对派”，嘲笑他是“光棍”和“孤家寡人”。他们对某些所谓“理论”问题开始咬文嚼字，叽叽喳喳，争论不休。托派国际和托洛茨基多次来信指示他们要统一起来，陈独秀也呼吁迅速团结起来，认为“阻碍统一，这是罪恶之罪恶”，要“从大处着眼，从政治出发来快刀斩乱麻的解决过去及现在的纠纷”，迅速实现统一^①。

1931年5月1日至3日，4个托派团体在上海召开统一大会，陈独秀当选为大会主席。大会通过了陈独秀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纲领》。《纲领》攻击中共“差不多一走上斗争舞台就在机会主义领导之下”。这种话出自一位中共主要创始人之口，真不知将他自己置何种地位。《纲领》规定“它绝不与共产党的活动隔绝，它在每一个问题中采取它的态度，……无情的批评正式党领导之政策的错误，并以它自己的信仰，不对

^①陈独秀：《对于统一运动的意见》，《无产者》第11期。

正式党领导作任何的让步”^①。大会把统一后的团体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简称中国托派）。之所以沿用这个名称，无非是表示它是中共内部的一个派别，妄图在共产党内“改造”党。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领导机关，由陈独秀任书记。

4个托派小团体统一之后，最盛时期全国也不过500人左右；而且他们并未真正实现统一，始终存在着组织涣散、理论混乱的问题。尤其可耻的是某些成员私心膨胀，朝秦暮楚，简直是政治娼妇。在统一大会召开的当月，便有人向国民党告密，致使托派中央机关遭破获，13名重要成员被捕，组织顿时陷于瘫痪状态。陈独秀虽然是书记，但他在中国托派中的地位远不能与他过去任职中共中央总书记时相比。不过他毕竟是有政治斗争经验的，因此当政治形势发生剧烈变化时，他迅速地提出与中共合作的倡议。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因此在一周之内日本侵略军便占领了辽宁、吉林两省各大城市。人民大众痛心疾首，奔走呼吁抗日救国，各种中间势力的政治派别和社会名流以及国民党内的爱国人士，都纷纷提出挽救时局的主张，中华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骤然上升。

在国难当头，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陈独秀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积极地提出反蒋抗日的主张。1931年10月初，他在《抗日救国与赤化》、《此次抗日救国运动的康庄大路》文章里，斥责蒋介石专门依赖国联主持公理，不仅是“妄想”，而且

^①唐宝林：《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401页。

是“奴性”的表现，“直是引虎自卫”^①；针对那种因害怕“赤化”而不敢动员民众抗日的言论，公开宣称“赤化”是全国工农劳苦大众“所乐为的”，反对“赤化”不过是“少数的军阀资本家地主而已”。现在大敌当前，我们“只有两条路走，一是不怕赤化”，由工人、农民、士兵结合起来，“建立自己的革命政府”，领导“对日本帝国主义作持久殊死战，以期获得最后的胜利”；另一条路“是服从反赤化的国民党政府之统一指挥，退让，求救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其结果是“中国不亡于日本，即瓜分于列强，此外并没有第三条路”。陈独秀还进一步提出赤化的纲领，即驱逐帝国主义在华驻军，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反对国民党政府剿杀争取土地的农民武装（红军）”；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和罢工、抗租的自由^②。总之要实现民族革命战争，必须首先推翻国民党政府，建立民众政权。这个政权“将经过全国抗日救国会而实现”，或经过平等直接不记名投票选举的“国民会议，或苏维埃而实现”，这便是“此次抗日救国的康庄大道”^③。

陈独秀的这些言论充分地表明他满怀爱国热忱和坚决抗日的态度。他所指出的“康庄大道”是不是真正的光明大道，这且不论。他这时对中国革命问题的主张同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机会主义者的中共中央还有哪些分歧，也估且不论。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无论是中共中央或陈独秀，都是主张反蒋抗日的，他们的政治大方向是一致的。然而陈独秀的主张首先遭到某些

①③《此次抗日救国运动的康庄大路》，《火花》第1卷第3期，1931年10月。

②《抗日救国与赤化》，《火花》第1卷第4期，1931年10月1日。

托派成员的反对，他们“鄙弃”民族主义，认为“工人无祖国”，“不应该爱资产阶级的国”，“民族主义，不是我们的立场。”对于这种极“左”言论，陈独秀及时反驳，说：“这样高贵的嘲笑之结果，只有把自己的任务和民族领袖的地位拱手让诸别的阶级”。民族主义就其本质而言，诚然“是资产阶级的”，可是“中国资产阶级已经不能担负民族的解放任务”。在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里，“只能采用民主民族”的口号，“而不宜于社会主义的”口号^①。至于对当时中共中央指责托陈取消派“投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言论，陈独秀不仅未予理会，反而在“一二八”事变前夕，进一步提出了与中共联合行动的建议。

1932年1月初，陈独秀以“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名义发表《告全党同志书》，呼吁一切共产主义者在所有工运、学运、反日运动、国民会议斗争、反国民党斗争以及苏维埃运动中“联合行动，不加任何形式的阻止与破坏，以便统一我们的力量向阶级敌人进攻”。此后，陈独秀又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并转全体同志，说“任何同志，谁还固执教派精神，拒绝合作，他将会在革命之前铸成莫大之罪恶。因此，我们向党建议，马上召开一个联席会议，以决定在群众行动中一致步骤问题，希望你们不要使革命的群众失望。”^②

陈独秀在前不久还扬言不对共产党“作任何的让步”，现在却主动要求与开除他的党携手合作，共同反蒋抗日，这个变化一方面是由于外敌当前，民族矛盾突出；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

①陈独秀：《被压迫国家的无产阶级应不应领导爱国运动》，《校内生活》第1期，1931年11月28日。

②转引自《上海事变中的取消派》，《红旗周报》第34期，1932年4月1日。

本人的某些错误观点的改变。他曾经反对党离开大城市到农村去开创革命根据地，诬蔑红军，诋毁党对红军的领导，说什么共产党员在红军中担任领导职务，就像是“几粒盐放在水缸中不能使水变成咸味，并且因生活方式及环境关系，也跟着游民无产阶级化流寇化了”^①。现在，他看到红军三次军事反“围剿”的胜利，及农村苏维埃运动的成绩，红军“大规模的发展起来”，不再是他过去所说的“仅是大革命之余波”，“已经是威胁到国民党政府而为其所不能消灭的势力”；苏区的土地革命也“已经不是仅仅写在政纲上的白纸黑字”，而在中共领导之下已“见诸实行”；苏维埃政治也不再是乌托邦，而“是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保障，同时也是空前的最高度的民主主义政制”^②。这些新的认识不能不说是陈独秀的一个进步的表现。

中共中央对陈独秀的来信，本应持求同存异的欢迎态度。但这时以王明为首的“左”倾冒险主义者掌握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他们排斥一切中间势力，对从党内分裂出去的托派，尤其恨之入骨，认为他们是“绞尽脑汁来欺骗民众，千方百计来阻碍革命的发展”^③。“取消派为要维持其在工人中的欺骗，……向党提出来要与联合，共同的开联席会议，……党愿意与他们在上海工人阶级一致的联合战线上共同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但是党不能与陈独秀□开联席会议，革命的共产党与反革命的

①陈独秀：《关于所谓“红军”问题》，《无产者》第2期，1930年7月1日。

②陈独秀：《谁能救中国？怎样救中国？》，《先锋》第5期，1932年10月。

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77页。

陈独秀是不能联合在一起的”^①。陈独秀建议遭到拒绝后，仍然继续宣传反蒋抗日，到1932年10月间被国民党逮捕了。

法庭辩诉 三军不可夺志

1932年10月15日，托派中央机关的驻址——上海市虹口区有恒路春阳里210号被公共租界和虹口区捕房中西探员破获，当场捕去托派中央常委彭述之和常委秘书谢少珊等5人，其中只有谢知道陈独秀的住址，他在威逼利诱之下供出了陈的住址。当天下午7时，捕员“带领该犯至岳州路永兴里11号”将陈独秀捕获。到16日夜共有托派成员11人被捕^②。托派本来是个组织松散的团体，经此打击更加一蹶不振。

陈独秀曾经是思想界、政治界的领袖，具有烜赫的社会声望。现在他虽然由中共中央总书记蜕变为托派书记，可人们仍然关注事态的发展和他今后的命运。19日夜，陈独秀和彭述之被押往南京军政部军法司监狱。他在京沪列车上竟然“酣睡达旦，若平居之无事者然”^③。25日，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将他提至军部，“半谈话，半审问”，结束之后，军部的“许多青年军人纷纷持笔墨和数寸长的小纸条”，“四面包围（长官不能禁止）”了陈独秀，向他“索书纪念”^④；“陈欣然书数纸”。一曰：“三军

①《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7-1933）第208、209页。

②吴铁城给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的报告，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③高语罕：《参与陈独秀先生葬仪感言》，1942年6月4日重庆《大公报》。

④陈独秀致王灵均信（1933年1月7日）；汪原放：《亚东六十年》（手稿）。

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二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三曰：“莫等闲白了少年头”^①！陈独秀借题字直抒胸怀，表示他是决不会向国民党屈服的。

陈独秀曾经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一次，后来又被上海法租界当局逮捕两次。他每次被捕，都在社会上引起广泛而又强烈的反响，革命团体的抗议，舆论界的谴责，他的亲朋好友以及社会知名之士八方奔走，极力营救他。而这次被捕虽然也有反响，但较过去冷清得多了。没有谁对国民党当局进行抗议或谴责，只有为他说情和请求从轻发落的。他们一面为陈独秀的过去评功摆好，一面以诬蔑中国共产党的方式，极力为他开脱。23日，蔡元培、杨杏佛、柳亚子等8人联名致电国民党政府，说陈独秀“早岁提倡革命”，后“佐柏烈武治皖有功，而‘五四’运动时期，鼓吹新文化，对于国民革命尤有间接之助，此非个人恩怨之私所可抹杀者也。……顾其反对暴动政策，斥红军为土匪，遂遭共党除名”，伏望“爱惜人才，特宽两观之诛，开其自新之路”。24日，蒋介石表示“陈独秀等系危害民国罪，应交法院审判以重司法之尊严”^②。26日，陈被押至江宁地方法院，关进了监狱。蒋介石对于共产党人，一经捕获，大多是秘密关押，或处决或交军事法庭审判。现将陈独秀交法院审判，以显示其所谓“重司法尊严”，这意味着陈独秀可保全老命，免遭一死。其中之奥秘由10月26日的《晨报》一语道破：“盖陈原非真共党可比”也。

1933年4月14、15、20日，江苏高等法院开庭审讯陈独秀。

①《陈独秀军部挥毫》，1932年11月9日《晶报》。

②1932年10月25日《申报》。

陈也早有准备，自撰《辩诉状》，申明“共产党之终极目的，自然是实现无剥削、无阶级、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社会”。但目前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抗帝国主义以完成中国独立”；“反抗军阀官僚以实现国家统一”；予过去、“现在及将来之所思所行”，“即此物此志”。现在控告予以危害民国及叛国罪，“予不但绝对不能承认”，而且恰恰相反。接着，他猛烈抨击国民党政府对内“搜刮人民，杀戮异己，对日本侵占国土，始终节节退让”，“且制止人民抵抗”。“而予则主张由人民自己扩大其组织与武装，对帝国主义进行民族解放战争”，以完成国家之独立，“试问谁为‘叛国’”？国民党政府“以刺刀削去人民的自由权……试问谁为‘危害民国’？”^①

法庭对陈独秀进行3次公开审讯时，旁听席上之拥挤一次甚于一次。陈独秀在法庭上“态度安闲，顾盼自若，有时且隽语哄堂”^②。

法官问他“何以要打倒国民政府？”陈回答说：“这是事实，不否认。”这个政府对内剥削和镇压人民，对外退让、投降，人民就有打倒它的义务。他还多次论证推翻国民党政府并不等于危害民国，说：孙中山等“曾推翻满清，推倒北洋政府，如谓推倒政府，就是危害国家”，那末孙中山“岂非已叛国两次！”他进而说明：“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组织苏维埃政府”也不危害民国。现在法庭控予以“叛国”，根本不能成立，“应毫不犹豫的宣告予之无罪，并判令政府赔偿予在押期间之经济上的健康上的损失！”他那无所畏惧的风采和《辩诉状》酣畅泼辣的文字，

①《陈独秀自撰辩诉状》，亚东图书馆1934年版。

②《陈独秀案公开审判记》，1933年4月15日《申报》。

使人们感到“五四”时代的陈独秀形象，再现于众人的面前。

可是当法官问他“对于红军主张如何”时，他说：“照现在状况尚用不着红军。共党理论，先有农工为基础，待有政权，才需要有军队”^①。话虽不多，却已充分表露了他的托派观点。他的老朋友、鼎鼎大名的律师章士钊在为他作义务辩护时，也正是针对陈独秀的托派身分，力图证明陈不仅无罪，反而对国民党有功。章士钊说：现在陈是托派，“以共产党论，托洛茨基派多一人，即斯大林派（指中共——引者）少一人，即江西红军少一人，”可见托派“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以清共”，乃有功于国民党，哪有什么罪过？陈独秀听到章宣读这段辩护词时，他发火了，当场声明：章律师之辩护“全系个人意见，并未征求本人同意”，“本人的政治主张，不能以章律师之辩护为根据，应以本人之文件为根据”^②。所谓“本人之文件”，即指他自撰的《辩诉状》。他在这里面写道：当“日本帝国主义方夺取山海关、急攻热河”的时候，“而国民党军队却向江西集中，其对待共产党人也，杀之、囚之，犹以为未足”。可见在大敌当前，陈独秀并不愿“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以清共”。

章士钊的辩护是为了减轻陈独秀的“罪行”，陈的辩解是为了说明他对于国民党的态度。而法官的判决却主要是为了攻击中共，巩固国民党的政权。他利用陈独秀过去的名望和在中共的地位，在判决书里恣意攻击中共和工农红军，说鉴于陈独秀等反对中共“利用土匪溃兵领导乡村农民为武装暴动，时时加以抨击，……审按情节，当可矜原，自应量减科”^③，判决陈独

①②《陈独秀开审记》，《国闻周报》第10卷17期，1933年5月1日。

③《江苏高等法院判决书》，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秀徒刑 13 年。陈不服，上诉。6 月 30 日，最高法院终审判决处徒刑 8 年。

陈独秀被判决以后，关进了南京老虎桥监狱。他在狱中一开始就享受优待，独自住一间牢房。后来他进行绝食斗争，反对严格的管制，狱方才允许他接见亲友，读书读报。这时，经常来监狱探望陈独秀的是他第三个妻子潘兰珍。

潘兰珍原是上海美美烟厂的女工。1931 年与陈独秀同住在一幢楼房里。两人邂逅相遇，日久产生感情，结为夫妻（时高君曼已病逝）。潘年轻漂亮，心地善良，富有舍己助人的优良品德。陈教她读书识字，进行启蒙，但潘并不知道陈的真实身分，直到被捕以后，才知道她的丈夫就是鼎鼎大名的陈独秀。为了照顾丈夫在狱中的生活，潘当即寄居南京。晚年的陈独秀多灾多难，贫病交迫，如果说他在生活上有什么事值得庆幸的话，那就是有位年轻的妻子陪伴着他，直到他告别人世。

陈独秀在监狱里请朋友们弄来许多书籍报刊，塞满了两大书架，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托派著作、游记、甲骨文著作以及日本出版的蒙古语、西藏语、缅甸语、暹罗语、土耳其语等等，可谓五花八门，无所不包。他在狱中把大部分时间用于研究音韵学和文字学。正如他在“五四”时写的一篇短文《研究室与监狱》中所说的，“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①。那时他是跟青年人说这些话的，现在他身体力行，并在研究文字学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①《每周评论》第 25 号。

驳斥托派极左言论 主张全民抗战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9月22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对《宣言》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从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在全国人民要求民主自由，团结抗日的呼声中，国民党党禁也有所开放。8月21日，国民政府司法院训令，陈独秀“入监以来，已逾三载，爱国情殷，深自悔悟”，现将该犯原处刑期，“减为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宽大”^①。23日，陈独秀获释出狱。25日，他致信《申报》编辑部：政府说我“爱国情殷，深自悔悟”。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我本无罪，悔悟失去对象；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这种“以诬蔑手段，摧毁他人人格，与自身不顾人格，在客观上均足以培养汉奸”^②。陈独秀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国民党政府虚情假意的宽大。可惜的是这封信当时未能见诸报端。

陈独秀一走出老虎桥监狱的大门，便成为各派政治集团所瞩目的人物。他们纷纷伸手，拉拢引诱他。出狱的当天，有国民党中统局要员丁默村前往接待，要陈住进国民党中央党部招待所，被他拒绝丁。不久，胡适等劝陈参加国防参议会，后来又劝他去美国，都被他谢绝了。托派分子要陈独秀回上海重整托派组织，而他认为托派的“宗派的做法没有出路”。上海托派临委那些人“只会背老托的文章，于实际的政治斗争一无所知”，是“坐在

①国民政府司法院训令，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徒刑期从1934年6月30日终审判决算起。

②陈独秀致《申报》编辑部信，原件存上海市档案馆。

亭子间里喊抗战，没有在实际行动上跨前一步”^①。还有人要他去香港，他也“不愿考虑”，他认为既然“拥护与参加抗战，就无论如何得留在抗战区”^②。于是，他于9月9日由南京到了武汉。

8月底，一位曾经是托派成员，而多年和托派没有组织联系的罗汉，拜访了八路军驻京办事处负责人叶剑英，以“个人名义”提出托派与中共合作抗日的建议，并在叶的安排下到了西安，后因山洪毁路，无法前往延安，才改为“经过电台来解决”^③。9月10日，中共中央电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负责人林伯渠，为联合抗日向“陈独秀等托派分子”提出三项条件：（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在上述三条件实现后，方能考虑其他关系问题”^④。

罗汉本是以“个人名义”建议中共与托派联合抗日的，在他去西安之前还不曾与多年不相见的陈独秀晤而，陈独秀也不可能委托他向中共中央表示自己的意见，而中共中央的电文却指名道姓说“陈独秀等托派分子”，这里唯一的原因是陈独秀是托派书记。至于陈独秀是否会主动提出与中共合作抗日的建议，迄今未见到有关这个问题的材料，故不必妄加猜测，但有一点

①转引自王凡西：《双山回忆录》，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11月版第232-235页。

②双山译：《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1929-1939）第74页，藏北京图书馆。

③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1938年4月24、25日汉口《正报》。

④叶剑英、董必武、博古：《致〈新华日报〉公开信》，1938年3月21日《新华日报》。

是肯定无疑的，即他不会代表托派发表什么意见，更不会以托派首领的身分向中共提出什么建议。因为他在南京和叶剑英谈话时，就已经“声明：我的意见，除陈独秀外，不代表任何人，我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为任何党派所拘束”^①。10月初，陈独秀得知中共中央提出的三项条件之后，他在11月21日写信给托派分子陈其昌等人，说“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我绝对不怕孤立”^②。1939年，他在给托洛茨基的信里严正指出，托派“集团自始即有极左派倾向。……有些人认为任何时期任何事件任何条件下，和其他阶级的党派协议对外国帝国主义或对国内独裁者的共同行动，都是机会主义”。对于这种错误观点“没有人能够纠正，谁出来纠正，谁就是机会主义者”。他们“认为只有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战争才是革命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不能算是革命的。……他们认为谁要企图同共产党国民党谈判共同抗日的工作，谁便是堕落投降”。“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小集团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的障碍。”^③

以上这些引文可以证实陈独秀出狱以后，就自动地脱离了托派，而且这种脱离是在民族危难之际，是他对托派的某些观点和活动进行批判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若将以上的引文与中共

①陈独秀：《致〈新华日报〉公开信》，1938年3月20日《扫荡报》。

②《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第24页。铅印本，无编者姓名和出版单位名称，出版年代为1948年。

③《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77、78页。

中央的三项条件相对照，陈独秀是部分地履行了那些条件的，但他一直拒绝用登报“公开声明”的方式来表明他的态度。对于一位个性倔强，已被开除出党的人，要求他在一个早上把他多年形成的错误观点全部清理完毕，也的确是不容易的。

关于陈独秀与中共谈判合作抗日的事，迄今见到的资料也很少。据罗汉说，在南京剑英、博古“已和陈独秀见过面，关于合作抗日问题谈得很融洽”；博古认为“独秀的意见，很少有和托洛茨基相同之点”^①。所有这些都说明中共与陈独秀合作抗日是可能实现的，对陈独秀这样具有特殊地位的人是应当争取与团结的。至于他是否要求或能否回到共产党的队伍里来，这与联合抗日的大局相比毕竟是次要的事。

但就在这个时候，王明于12月4日在《解放》杂志上发表《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斗争的新时期》一文，说日寇必然要安插各种奸细到共产党中来，首先是吸收托洛茨基——陈独秀“匪徒分子”充当这种卑劣的工具。接着康生于1938年1月13日在该刊第29、30期上连续发表长文《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诬指陈独秀为汉奸，说自“九一八”以来陈独秀、罗汉等的“托匪中央”每月领取日本的津贴300元。

康生的诬陷引起舆论界的愤懑，王星拱、高一涵等9人为陈独秀打抱不平，于3月16日在《大公报》发表公开信，说“独秀先生生平事业，早为国人所共见，在此次抗战中之言论行动，亦为国人所周知。汉奸匪徒之头衔可加于独秀先生，则人人亦可任意加诸异己。此风断不可长。”17日《新华日报》针对9人的公开信发表《短评》，说“陈独秀是否为汉奸问题，首先

^①罗汉：《致周恩来等一封公开信》。

应该看陈独秀是否公开宣言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对托派汉奸行动以为断”。这篇《短评》迫使陈独秀不得不公开表态。18日，他写给《新华日报》一封公开信，要求康生拿出真凭实据来。他说“是否汉奸应该以有无证据为断。”“声明不声明并不能消灭或成立事实呵！”“你们企图捏造汉奸的罪名，来压迫我”公开声明脱离托派，就如同当年“有人要我公开声明脱离‘赤匪’”一样，都是“画蛇添足的事”^①。蛇本无足，画者“添足”实是多此一举。言外之意他虽没“公开声明”，实际上已经脱离托派了。这场诬陷与反诬陷的斗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作出公开正确的判决。

陈独秀在从南京到武汉的船上，曾拟定5个题目，准备写一本抗日意见的小册子。到武昌以后，应邀给青年演讲。1937年10月6日，他在华中大学演讲《抗战意义》。他操着浓重的安庆口音说：“这次战争，是一个革命的战争”。“败了作奴才，胜了做主人，这就是这次抗战的伟大意义。”“万不可”把这次战争“看作两个阶层，或两个政府的战争！除了汉奸，一切人都应努力”支援抗战。陈的演说博得了“雷声似的掌声”^②。陈独秀这时忙得很：撰写抗日文章，接见记者发表抗日意见，给青年演说抗日。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之前，他发表了30多篇关于抗战问题的文章，其中主要的内容是：这次抗战的历史意义是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与束缚，以完成中国独立与统一；党政当局要下决心完成自上而下的改革，才能做到全国总动员；因此要解除民众自身的痛苦，例如农民耕地不足，衣食艰难，不

^①1938年3月20日《扫荡报》。

^②1937年10月6日上海《大公报》。

解决，还怎能发动广大的民众呢？民众要有政治自由，自己组织起来。陈独秀说也许“有人认为这样未免太发动了，我则以为没有这样的‘太发动’，是不能抵抗站在我们眼前凶恶而有力的敌人，挽救国家民族之危亡的！”^①

综观陈独秀的这些意见可得出以下几点结论：（一）背离了托派中的极“左派”立场。托派认为在抗战过程中应准备力量推翻国民党政权，并诬蔑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彻底投降”，攻击陈独秀“叛变了组织”。（二）陈独秀主张动员全民抗战，不同于国民党的片面抗战。（三）陈独秀的抗战主张与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有不少相同点，但也有原则上的差异，这主要表现在国共两党的关系上。对于这个问题，陈独秀认为国民党应当“承认共产党及其他在野党派，都公开合法存在，……并且不妨碍在野党对政府党政治的批评”；“共产党及其他党派，都以在野党的资格绝对拥护抗日战争；一致承认国民党一党政权及其对于抗日战争之军事最高统率权这一事实”，因此全国军队都应该“直隶中央政府”^②。总之，在陈独秀看来，领导抗战完全是国民党政府的事，其他党派一概不得染指。

陈独秀对抗战领导权的错误观点，同他对国民党政权的性质以及对当时中国社会性质的错误认识是密切相连的。他认为“国民政府对于工商业，对于币制，对于交通，对于军队，都沿着资本主义发展的路线，着手建设，……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封建残余的旧国家”，而是一“初期资本主义的国家”^③。“资本主义是中国经济发展必经的过程，”抗战胜利后应当建立资产阶级

①②③张永通等：《后期的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76—77，122、90，160、146页。

的共和国。因此他诬指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有保存实力趁火打劫的企图”，攻击抗日游击队是“游而不击”^①等等。这些言论证明陈独秀这时虽然在组织上与托派脱离了关系，但在思想上理论上仍然保留有托派观点。

贫病交迫的晚年 潜心研究文字学

1938年6月28日，陈独秀由汉口乘船溯江而上，于7月3日到达重庆。他虽然曾有显赫的社会声望和众多的社交关系，但在战时的首都也难找一个长久栖身之地。他的同乡邓仲纯（医生）邀他到江津县城去居住。但8月3日陈到了江津以后，邓妻却拒绝接纳，使他无处安身，只好临时住在小客栈里。后幸得江津县城东关郭家公馆房东孙某的同情，腾出房屋，使陈得以安身。数月后，经邓仲纯再次热情相邀，住进他开设在县城的延年医院（黄荆街83号），然邓妻与潘兰珍仍不能和睦相处。当地富绅邓縻仙留日时与陈相识，他的侄儿邓燮康喜结天下名士，于1940年7月帮助陈迁居鹤山坪施怀清（江津第一中学校长）家。这里距县城约15公里，交通很不方便，清朝时出过一个进士，名叫杨鲁承，他的后代早就想请人整理先人的遗著。陈独秀来到鹤山坪后不久，便被请进杨家的石墙院居住，整理杨的遗作。

陈独秀自到江津以后很少写作、发表文章，因而稿费收入很少，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穷，对他来说并不可怕，他过惯了穷日子。最折磨人的是疾病。他早年患肠胃病，现在又有高血压症。那时，在生活上并不是没人接济他，可他不是那种见

^①张永通等：《后期的陈独秀及其文章选编》第176、149页。

钱眼开的人。金钱虽无臭味，可给钱的人有不同的政治背景，谁的援助可以接受，谁的钱要坚决地拒收，他毫不含糊。在生活费用中接济最多的，是北京大学同学会和他的一些朋友如章士钊、杨鹏升和邓燮康等。有一次，刘伯坚从互济会经费中拿出100元给他，他感动得老泪横流，说：“互济会的钱应该用来营救狱中同志，照顾烈士遗孤”^①，婉言谢绝了。罗家伦、傅斯年都是他在北大时的学生，后来都在国民党里做官。他俩送钱去时，陈独秀说：“你们做你们的大官，发你们的大财，我不要你们的救济。”任卓宣原是中共党员，后叛变投靠国民党，曾汇去200元，当即被他退回。朱家骅托叛逃的张国焘送一张5000元支票，这个数字在当时是相当可观的。张深知陈的为人和脾气，不敢去，又转托郑学稼。陈独秀致函郑学稼说：“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嘱其面还^②。

中国的士大夫在政治上失意的时候，有隐居山林的，有皈依佛门的，也有借吟诗作画抒发胸怀的，即使“五四”时期提倡新文化红极一时的人物，也有人不久就到故纸堆里去讨生活了。陈独秀却永远不会对政治采取消极态度，依然特立独行，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继续直言不讳地发表他的意见。他在给陈其昌等人信里说：“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

①黄永盛、王亚非：《飘零枯叶度残秋——陈独秀在江津》，《党史文汇》1986年第4期。

②郑学稼：《陈独秀先生晚年的一些事》，台湾《传记文学》第30卷第5期。

不对的话。”^①这段话一连说了四个“绝对”，可见他的态度“绝对”到何等严重的地步。同时他也有意无意地提醒人们注意，他所说的话既有“极正确的”，也有“极错误的”。他这些正确与错误掺和在一起的言论，除了小部分已撰写成文外，大多散见于他和别人的通信里，其中谈论最多的是关于民主与专政问题，而且是直接针对苏联政制而发的，他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可以说是“极错误的”的方面。这些书信，在他死后由后人编纂成书，题名《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于1948年11月首次出版（未署编者姓名及出版社名称）；1949年6月，又由香港东南印书社出版，书名为《陈独秀的最后见解（论文和书信）》，正文前有胡适写的《序言》。

陈独秀流落江津以后，把大部分时间用于研究文字学。他旧学功底厚实，在辛亥革命失败后避居上海时，曾著述有《字义类例》一部，由亚东图书馆于1925年12月出版。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回到上海，为了研究音韵学校核方音，曾请茅盾、陈绶文校核上海话，杨殷校核广州话，项英校核汉口话，邓颖超校核北京话。后在南京监狱，又以“中国文字音韵学等类干燥无味的东西”作“消遣”^②，进行深入地研究。现在他把在狱中写作的《识字初阶》一稿，经过精心修改成书，题名为《小学识字教本》，分上下两篇。他在本书的《自叙》中写道：过去的塾师和现在的学校，教中小学生识字，“如习符咒”，“漫无统纪”，“戕贼学童之脑力”，“累及学习国文”及其他科目。“此中小学习国文识国字之法急待改良，不可一日缓矣。本书取习用

^①《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第23页。

^②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163页。

之字三千余，综以字根及半字根凡五百余，是为一切字之基本形义，熟习此五百数十字，其余三千字乃至数万字，皆可迎刃而解，以一切字皆字根所结合而孳乳者也。上篇释字根及半字根，下篇释字根所孳之字，每字必释其形与义，使受学者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此不独使受学者感兴趣助记忆，且于科学思想之训练植其始基焉。……或以为文字训诂之学，老师宿儒皓首治之犹难尽通，将何以教学童耶？余曰不然，……盖以古之制字者，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此皆视而可见察而可识者也，本非艰深难喻，今之教者依此口讲而手绘之，习者如睹画图，虽下愚可晓，如拨云雾而见青天也。作始者或不易，传习者必不难。中国在拼音文字未行以前，识文字善教育之道，舍此无他途。”从《自叙》中的这段文字，可知陈独秀多年呕心沥血，研究文字学，是为了使这门古老而深奥的学问直接为普及国民教育服务。

《小学识字教本》上篇完成之后，陈独秀寄给陈钟凡征求意见，并在信中说：“此书出，非难者必多，书中解说亦难免无错误，而方法余以为无以易也。形、声、义合一，此中国文字之特征也。各大学文字学科，往往形、声、义三人分教，是为大谬。欲通中国文字，必去六书之说。所谓指事、会意、形声，皆合体象形，声皆有义，义托于形，形、声、义不可分也。六书中说，形声最为荒谬，人旁、鸟旁、草木旁、水火旁、牛旁、口旁、金石旁等等，其字均甚多；但右旁之声，谓之谐声而无义，则将何以别之？例如牡字《说文》从牛土声，牝字《说文》从牝声，是皆牛也，而牡牝无别矣。岂非笑话？吾书三千字，字字形义并释，不取某声以了之，明知此事至难，然非此无由通识中国之文字也。”“明知此事至难”，他还坚持要做，这正如章

士钊对他的评论：“一匹不羁之马，奋力驰去，不峻之坂弗上”^①。越是艰险越向前，这就是陈独秀的个性特征。遗憾的是《小学识字教本》未能写完，当下篇写至“抛”字时，还未作解释即绝笔。后由国立编译馆油印 50 部分别赠于学术界的有关专家（1971 年，梁实秋将所得的一本在台湾影印出版，但隐去作者名字，删去作者的《自叙》，并将书名改为《文字新铨》。梁认为“此稿对中国文字有独到之研究，有很多新的铨释，发前人之未发”）。

1942 年 5 月 12 日，陈独秀服用偏方——蚕豆花泡茶治疗高血压，不料蚕豆花因雨淋发霉变质，服后中毒，腹胀，继而昏厥，冷汗如注。5 月 27 日晚 9 时 40 分逝世，享年 63 岁。临终前，他嘱夫人潘兰珍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求自立。6 月 1 日，由邓燮康无偿提供衣食、棺木、墓地，安葬于江津大西门外康庄。参加葬仪的除了他的夫人潘兰珍，三子松年和孙子、孙女外，还有他的生前好友、同乡和当地小学学生百余人。1947 年 6 月，三子松年将先父的灵柩迁回老家，葬于安庆北门外十里铺叶家冲。

1979 年，安徽省安庆市人民政府经中共中央批准，拨款重修陈独秀墓，重新立碑，以追忆这位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碑上镌刻：

一九七九年重立

陈公仲甫讳独秀

合葬之墓

母高太夫人

①孤桐（章士钊）：《吴敬恒 梁启超 陈独秀》，《甲寅周刊》，1926 年 1 月 30 日。

延年 松年
子 乔年 鹤年 泣立

1982年，安庆市人民政府又重修和扩建陈独秀墓。墓基东西长8米，南北宽7米，墓高约1.8米。四周有白石条砌成的石栏，底圈也用白石条铺盖。墓碑上刻“陈独秀之墓”。墓基的后墙上写有：“安庆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庆市人民政府一九八二年公布。安庆市文管处立”。每年的清明节，墓前都摆满了由许多不留姓名者所献的鲜花。

萧 云 鹄

方 修 胜

萧云鹄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著名农民革命运动领袖之一。1928年11月在河南开封被捕，遭敌长时间监禁，1932年2月于洛阳遇害。

(-)

萧云鹄，又名乃斌，字鸿翥。1899年1月5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程德岗萧家湾。父亲萧润生以塾师、家庭教师为业；二叔、三叔分别以行医、司药谋生。萧云鹄在兄弟姐妹中居长。他的父母无力将他的弟妹们抚养成人，除留他、双目失明的二弟和五弟在家外，将三弟、四弟和小妹送给人家做儿、当童养媳。直到萧云鹄成年，家中除四间旧瓦房、几亩开荒地、几棵树外，别无他有。全家人的生活主要靠父亲教书、母亲和妻子纺线等微薄收入维持。

萧云鹄从小随父在家读书识礼。稍长，随父亲离家去杨鹰岭学校就读。1916年春节过后，他父亲离开家乡，到武昌当家庭教师。萧云鹄随父去省城，考入武昌中华大学附属中学。1918

年，他在林育南的影响下，加入了恽代英发起建立的互助社。

1920年初，萧云鹄中学毕业，在家乡陈谭秋三哥陈春林主办的聚星学校任教。他除完成教学任务外，还常同林育南、林育英（张浩）创办的浚新学校教师胡亮寅等交往，交流教学体会，讨论社会问题^①。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陈谭秋回湖北组建中共武汉区委，并回黄冈在聚星、浚新两所学校的教师中宣传中共的主张。经陈谭秋介绍，萧云鹄和胡亮寅于1922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创建了黄冈第一个中共组织——陈策楼党小组^②。由于他们进行了大量的秘密宣传和组织工作，上述两所学校在建党时期和大革命时期，成了黄冈革命运动的策源地和指挥所。

1922年夏天，萧云鹄将中共陈策楼小组的工作，交给受聘来聚星学校任教的陈学渭（亦黄冈人），就到武汉同陈谭秋、林育南等开展秘密的建党工作和工人运动去了。

（二）

1924年8月，萧云鹄赴广州考入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为该校第二期学员^③。11月间，孙中山为“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应冯玉祥的邀请离广东北上。萧云鹄以其精明干练被选为孙中山随行侍卫人员^④。年底，他由北京返广州后，即同李劳工、周逸群、王柏苍等共产党员一

①1979年11月2日访问陈厚木、陈瑞卿、陈启三等老人记录。

②《中国共产党湖北省黄冈县组织史资料》，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

③聂绀弩1982年12月24日谈话记录。

④王襄1974年9月26日谈话记录。

道，效仿列宁创办《火星报》，在黄埔军校学生中组织了进步团体——火星社^①，积极从事宣传和发动工作。1925年春，他参加了讨伐广东东江一带的陈炯明军阀部队的一系列战斗^②。

萧云鹄在黄埔军校和东征活动中，表现出较强的组织和指挥能力。因此，他未及毕业，就被中共中央派往河南，任中共豫陕区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负责农民运动工作。

1925年8月6日，已在河南工作了一段时间的萧云鹄，黑夜摸回家中。妻子陈西羽^③正和家人在昏暗的梓油灯下吃饭，见他突然回来，先是大吃一惊，接着就是一顿牢骚：“你整年在外跑，家中上有老（母亲）下有小，你全然不顾，良心何忍？”萧云鹄赶快制止妻子声张，对她说：“我在河南教书，这次回家，就是接你们母子去的。”8月8日，他带着妻子和3个儿女踏上了去河南开封的路程。

到了开封，他一家先住在鼓楼街两湖书局，1926年1月搬到三圣庙后街中州艺术学校门楼上，后又迁双龙巷^④。刚开始，陈西羽发现住地根本不是什么学校，既没有教室，又没有学生，而出出进进的都是些成年人，年龄最小的张志刚也有14岁。她弄不清丈夫为什么要把她母子从千里之外“骗”来，于是就问萧云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萧云鹄这时才严肃地告诉她：“我名义上是在这里教书，化名汪东来。实际是党派到这里做地下工作的。把你母子接来，是为了好租房子，好掩护。这里是

①湖北省志·人物志编辑室：《湖北人物传记》（试写本第三辑）第44—45页。

②聂绀弩1982年12月24日谈话记录。

③系一农家女子，黄冈陈策楼人，1917年同萧云鹄结婚。

④林壮志：《豫陕区委在开封及其他》，存中共开封市委党史办公室。

我们党的机关。有人问你，就说是汪东来老师的家属。遇事要特别小心！”

陈西羽年长萧云鹄一岁。她早在家乡听过革命道理的宣传，而且与萧云鹄感情甚笃，对萧云鹄当然竭尽全力支持。看上去，她土里土气，但说起话来却朴实、得体，待人接物，落落大方。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组织上认为她无论是思想觉悟，还是处事能力，都能适应秘密工作，就安排她放哨、送文件之类的事情做，并给她备好几件化装的衣服。她有时扮成阔太太，同萧云鹄一道外出；有时装成沿街乞讨的“叫花子”，单独行动，给了萧云鹄工作上以不少帮助。这时，在书记王若飞的领导下，中共豫陕区委的中心工作，是深入基层发动工人群众，组织工会，在实际斗争中发展党员、团员，加强党团的组织建设^①。萧云鹄白天黑夜都很忙。他有时身着长衫，腋下夹着几本书，俨然是一位刚离开学堂的教书先生；有时又夹起算盘簿册，打扮成一位匆匆外出结算的商行“管帐”；有时又衣着褴褛，挑着一担筐子到处拾破烂；有时身穿油渍渍的工作服，像是一个急忙赶去上班的工人。

这年秋天，萧云鹄安顿好妻子儿女，离开开封，同中共郑州特委委员戴培元等，到郑州市西郊的荥阳县去开展农民运动^②。不久，豫陕区党委军运委员胡伦也前去同他们一道工作。他们在水磨村、双楼廓、崔庙村、张河村等地，组织农民学文化，把穷人为什么穷、怎样起来闹翻身等革命道理印成传单，发给农民传阅；还编一些歌曲，让思想分散的农民用歌声互吐苦

①马文彦 1981 年 5 月谈话记录。

②《胡伦自传》（1964 年 2 月）。

衷，联络感情。其中有一首歌这样唱道：太阳西坠天晚了，路上昏暗行人少，这时候才往家跑。唉哟哟，这时候才往家跑。茅庐小屋冷多少？寒风大雪怒号号，破衣破被全当了。唉哟哟，破衣破被全当了^①。

经过近一个月的组织发动，他们以戴培元出面，吸收四五十位农民加入组织，首先在张家庙成立了“水磨村农民协会”。不久，水磨区农民协会成立^②。在各区、村农民协会相继成立的热潮中，萧云鹄到县南山区贾峪镇，经过说服头领，动员贫苦青年农民的工作，将这个地区的红枪会改编成农民自卫军第一大队^③。在农民武装组织成立大会上，平汉铁路工会、陇海铁路工会及郑州市各行业工会，都派出代表送锦旗祝贺。与此同时，萧云鹄、胡伦、戴培元还在郑县、汜水、密县等地发动农民起来与军阀政府和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作斗争^④。这些县份的农民运动，很快引起中共北方区负责人李大钊的重视。十月，李大钊在给豫陕区党委的指示中，进一步强调“必须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协会”。豫陕区党委立即召开会议，讨论了开展农民运动的问题，决定委员分头带干部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发动、组织农民群众^⑤。

11月，萧云鹄公开以广州国民政府河南省特派员的身分，到杞县了解情况。不久，即同中共杞县特别支部书记张海峰（公开身分是一所补习学校的教师）到该县南部地区，开展组建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团的工作。

①②中共荥阳县委党史办公室资料。

③《胡伦自传》（1964年2月）。

④《唐朴农自传》。

⑤《王若飞》，《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0卷。

20年代中期的河南，正如1926年《河南省农民协会成立宣言》^①中指出的那样：“连年战乱，直匪横行”，官府对农民是“苛捐杂税，百般勒索”。土豪劣绅又“凭借官厅势力，狐假虎威，以欺压农民，敲诈剥削，无所不至”；他们“包办之保卫团或民团，其经费亦强取之于农民”。“至若战事发生，则拉夫、拉车，要草、要面，彼军既饱载而去，此军又照例苛求，层出不穷，循环不已；甚至焚烧劫掠，屠杀奸淫。致使一般农民，或因遭罹炮弹而妻离子散，或因失去重要农具而破产失业，沦为乞丐，流为兵匪”。并且，“这可怕的痛苦还是一天天有加无已！”广大农民早就盼望有人帮助他们摆脱受压榨受剥削的困境，跳出苦难的深渊。因此，萧云鹄和张海峰组建农民协会的工作进展十分顺利。他俩首先到傅集，找到开智小学校长孔寅初及安子敏、韩云亭，动员他们，让学校晚上变成成人夜校。他俩都担任教员，通过教农民读书识字，宣传革命道理，启发农民的政治觉悟，把他们组织起来。接着，他俩又到何寨村，对“红枪会”首领何心桐、何心榕兄弟二人进行说服动员，得到大力支持。

年底，傅集、何寨两个区农民协会建立后，县西边的十里岗也建立起一个区农协。萧云鹄、张海峰参照广东省农协章程中“有三个区农协，就可以成立县农协”的规定，即决定成立杞县农民协会，以便扩大影响，由上而下发出号召，推动农民组织的进一步发展。经豫陕区党委批准，萧云鹄、张海峰等于1926年1月23日召开了县农协筹备会议，对县农协成立大会的各项具体事宜，作了详细的交代和布置。

^①《农民运动》第3期，1926年8月17日。

2月1日，杞县全县农民代表大会在县城甲种农业学校礼堂召开。到会的代表济济一堂，来宾有陇海铁路工会、国民党开封市党部、河南青年协进社、学生联合会及睢县西陵寺区农协等单位前来祝贺的代表。大会由张海峰主持，他首先介绍了县农民协会成立的意义和当前的任务，接着对农民协会的宗旨、纲领、组织及筹备经过作了说明。经代表热烈讨论，大会通过了由萧云鹄起草的农民协会章程和成立农民自卫团、支援睢县成立农民协会等决议案；选出了执行机构，推举张海峰为委员长，孔寅初为秘书长，何心榕为军事部部长。杞县农民协会宣告成立。大会号召全县农民在各级农协的组织下，团结起来，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抵御溃兵土匪，反对苛捐杂税、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而斗争。尽管参加这次大会的代表中农以上的成分占大多数，农协执行委员也大多是他们中的头面人物担任，然而，在当时，该县农民协会的成立的确是“振两河旗鼓，开华北先声”。正如广东省农协领导人彭湃、罗绮园、阮啸仙和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农民部长林伯渠在祝贺信中称赞的那样，它“为华北农民树起一面自谋解放的革命旗帜”^①。会后，农民群众闻讯，一片欢腾，纷纷要求加入农民协会。农协组织从此不断发展。

在建立农协组织的同时，萧云鹄十分重视农民武装的组建工作。在此之前，豫东的农民已经自发地组织起红枪会，以刀、矛、木棍乃至锹、杈、锄、镰等为武器，武装自己，抵御溃兵土匪，反对贪官污吏。而杞县、睢县、通许三县恰是这种斗争

^①张海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回忆》（1961年于沈阳），存中共河南省委党校。

的中心地区，各村都建立了红枪会团部，并以首领姓氏命名（如团长姓何，即称何团）。萧云鹄调查分析了红枪会的组织形式，认为它有迷信的一面，把“太上老君”、关羽、孙悟空等作为信奉的神灵，以为符咒、乩语也可以击退敌人。但是，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是深受压迫和剥削的农民群众，反对军阀政府反动统治，有进步的一面。而后者又恰恰与共产党开展农民运动的目标完全一致。于是，他同张海峰对一些主要红枪会首领的成分和倾向，进行了逐一地分析，制定了对他们的工作方针：把坚持防匪自卫，政治上倾向进步的红枪会，作为组建农民自卫团的基本力量；把那些“联匪互保”，即既与土匪订有互不侵犯的协议，又与其他会团有联系的红枪会，作为中间力量看待，注意其首领讲朋友、重义气的传统习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感情联系，把他们争取到农民武装队伍中来；对少数首领通匪，或被反动势力控制的红枪会，则暂行敷衍，进行教育，按教育后的情况区别对待。他俩通过对各红枪会团长说明利害，晓以革命大义的深入细致工作，使其认识到只有依靠群众，走革命道路，才有个人和组织的前途。一些团的首领相继地向会众说明情况，宣布红枪会改编为农民自卫团。根据萧云鹄的意见，中共杞县地方委员会（1926年初成立）在何寨召开了全县农民自卫团代表大会，宣布杞县农民自卫团总团部成立，推选何心榕为总团长。会后，县以下分别设立了区、村团部，属各级农民协会领导。接着，他们布置各地采取选举自卫团领导机构、团员填表登记等形式，对各级自卫团进行了组织整顿。

1926年3月，直、奉军阀已从南、北、东三面进攻河南，国民二军节节败退。该军某旅退到杞县县城后，被一股红枪会（不是农协领导的）阻拦，再不能出城继续向西撤退。县农民自

卫团主动出面替他们疏通，他们才得以退走。但该旅反而怀疑农民自卫团捣了他们的鬼，退到开封后，又派一部分武装返回，寻衅闹事，将县府警备队的枪枝缴去。本来，农民协会与国民二军和以其为靠山的县政府，基本上是“井水不犯河水”。国民二军一部缴枪一事，是故意“杀鸡”给“猴”（农民自卫军）看的，对此，广大农民异常气愤；再者，萧云鹄、张海峰、何心榕等认为，应该借此机会，组织一批农民自卫团进城，显示一下农民武装的战斗力量，提高农民运动在全县人民中的影响。于是，在萧云鹄的指挥下，张海峰、何心榕、孔寅初等召集了傅集、何寨、十里岗等区的农民自卫团，组织 1000 多人的武装队伍浩浩荡荡地直抵县城之下。国民二军前来缴枪的部队闻风弃枪逃走。县府命令警备队紧闭城门，派有名望的绅士孟子仪出城“慰问”自卫团，企图阻止他们入城。自卫团对此置之不理，一再声张将要攻城，城门被迫敞开了。农民自卫团以其严整的队伍，秋毫无犯的纪律，受到市民们的夹道欢迎。县府怕被国民二军收缴的枪枝落到自卫团手里，在自卫团入城时，乘机将枪枝沉入井中。自卫团为照顾统一战线关系，未予追究。但是，他们向县府提出了承认农民协会和自卫团、取消苛捐杂税、停止向农民预征钱粮、革除县府陈规陋习、惩治贪官污吏、保证民众集会自由等要求。县长立即答应速向上峰转述后再作是论。当天晚上，农民自卫团又秩序井然地退出了县城。农民自卫团首次进城，震动了官府，鼓舞了全县农民的斗争意志和团结起来夺取胜利的信心。从此，杞县农民协会实实在在地成了农民自谋解放的旗帜，杞县成为豫东农民革命运动的中心了。

萧云鹄在以杞县傅集、何寨为重点开展工作的同时，还常到睢县的李康河、郭河、姬芳李、张奶奶庙、苗楼、长岗等村，

以及太康县的一些村庄，去建立党的组织，发展农民协会和自卫团。同年4月，经研究决定，萧云鹄负责建立河南省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并兼任筹委会主任^①。

5月，河南督办寇英杰（吴佩孚部属）派一个营驻防睢县县城。该营在那里招兵买马，卖官鬻爵，诈取民财，加重了老百姓的经济负担。萧云鹄带领杞县李店村农民自卫团到睢县，任命睢县农民自卫团负责人马集勋为总指挥，让他出面召集农民自卫团和红枪会围攻县城。15日晚，1万多人攻下县城，活捉了反动县长罗殿卿，给刚上台统治河南的直系军阀以沉重打击。6月，河南省农民协会宣布成立，萧云鹄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同年8月，因国民二军在直、奉军阀的进攻下，全线溃败，退出河南，原在河南可以公开或半公开活动的共产党员干部，都被迫转移或隐蔽，中共豫陕区党委分解成河南省委和陕甘区党委。萧云鹄留河南省委工作，任农运委员兼军运委员。在国民革命军已从广东出师北伐的形势下，中共河南省委根据河南地处南北中枢的地理位置和农民运动的基础，提出了发动武装起义，组织一些小型精干的农民武装，并利用红枪会，骚扰吴佩孚的后方，支援北伐战争的工作方针，得到了中共北方区负责人李大钊的赞同^②。在此方针指导下，河南全省农民运动得到迅速发展。至年底，杞县有共产党员100多人，共青团员200多人，县农协领导下的区农协7个，乡农协38个，会员达43500人，自卫团员近6000人；睢县有党员40余人，区农协1个，乡

^①林壮志：《豫陕区委在开封及其他》，存中共开封市委党史办公室。

^②《胡伦自传》（1964年2月）。

农协 9 个，会员 16000 人，自卫武装 3000 人。另外信阳、许昌、修武、安阳、汲县、郾城、长葛、密县等地都兴起了农民革命运动。全省农协会员达 24.5 万余人^①。

1927 年 2 月，在毛泽东提议下，中共中央召集河南省东、西、南、北、中 5 个地区的农协代表到武昌开会。豫东农运特派员张海峰带领杞县县委（1927 年初由原地方委员会改建）书记吴芝圃和孔寅初、王亦言出席了这次会议。毛泽东对各地的代表强调：“为支援北伐战争，要发展农民武装，积极准备武装暴动。”会后，萧云鹄听取了代表们关于会议精神的传达，立即同张海峰召集杞、睢两县县委及通许、太原、陈留等县的农民自卫团负责人，在何寨村开会，商量执行中共中央指示的具体行动方案。这次会议确定：（1）以各县农民自卫团为基础，按国民革命军的军事编制，组建河南革命军别动队第二纵队（后又称豫东纵队），任命张孟晋为纵队司令；各县农民自卫团改编为支队，由纵队指挥部任命支队司令。（2）积极发展农民武装，争取联络豫东其他可以联络的红枪会参加暴动。（3）积极准备武装起义，夺取县城，打击和扰乱军阀武装和政权。（4）攻克县城后，立即建立临时人民民主政权——治安委员会。

河南革命军别动队第二路纵队很快组成。萧云鹄以中共河南省委军运委员的身分，参加了组建部队的各项工作。在他的具体指导下，豫东各县都在紧张地进行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他考虑到杞县支队队伍庞大，成分比较复杂，能否带好它，将关系到整个豫东农民武装的行动能否统一的问题，就同该县县委商定，由县委书记、经过广州农讲所培训过的吴芝圃担任司令，

^①《中国农民》，1927 年 2 月。

任命共产党员何心榕、张玉镜和李福瑞、王国安、吴体彦等为各联队（原区自卫团）的指挥员。接着，他到睢县亲自指挥，任命马集勋为支队司令，李西峰、苗铁锋、王明伦等为各联队的指挥员。随后，他又让张海峰去做工作，争取一些红枪会对他们的支援。张海峰偕同李西峰曾在商丘北部地区，与姜伯循、孙鸿猷等红枪会首领歃血结盟，并商定统一行动计划。

这年3月底，广东、湖北、湖南、江西及河南等省农民协会负责人在武昌举行联席会议，组建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萧云鹄和邓演达、毛泽东、彭湃、方志敏等13人当选为执行委员。

同年4月，进军河南的北伐军沿平汉路北进，长驱直入，势如破竹。临颍一战，击溃了奉系军阀的主力。在此形势的鼓舞下，萧云鹄、吴芝圃同韩绍棠、孔寅初、李鼎生等发动了攻占杞县县城的武装起义。

起义之前，根据萧云鹄的安排，豫东别动队杞县支队对县城守军及其装备进行了侦察，了解到敌无正规军，仅200多人的武装警察队，有“巩县造”五响长枪60余支，“单打一”长短枪近百支，另县长卫士班有长短枪十几支。同时，吴芝圃召集各联队指挥员，对各部的行军路线、集结时间和方法、行动纪律作了明确的规定^①。

5月24日黎明，萧云鹄、吴芝圃在何寨村宣布举行武装起义。随之，别动队和支援攻城的红枪会6000多人，在萧云鹄的指挥下，按照各自的行动路线，化整为零，分别向县城附近集

^①张圣亭口述：《华北第一个红色政权——河南杞县人民政权建立的经过》，存中共开封地委党史办公室。

结。起义队伍于晚饭后抵达城下，在城的东面和北面作攻城战斗准备。城高池深，易守难攻，幸好有王国安和张圣亭借来的四门土炮。次日凌晨，东面的土炮首先打响，打得城墙上砖瓦横飞，把还在睡梦中的守军和县府官吏惊醒。萧云鹄借助于炮声，率部踏梯登上城墙，扫清东门之敌，敞开城门，迎进大队人马。北面部队亦很快攻了进来。因他们是采用的击溃战术，即事先放弃了南门和西门，所以军阀政府的县长杨保源和大劣绅侯宜斋、段跃斋等在战斗打响后，乘慌乱之机出西门逃跑，余下守军和政府职员全部缴械投降。这时，起义队伍一面以纪律严明的王国安团负责维持治安，一面搜索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其中一部将县府历年的地亩粮册、司法案卷、一切公文都搜出放火焚毁，并将逃跑劣绅的家产分发给群众。萧云鹄带领一支队伍，前去打开县府监狱，释放出被关押的无辜农民。起义队伍从攻城开始，到控制全城，仅用了4个小时。检点人员，无一伤亡。城内居民解除了多年心头之恨，无不对起义队伍表示极大的兴趣，纷纷以饭菜食品慰劳战士。根据原来的研究决定，吴芝圃出任县长，由他出面邀请范翔九、杨子固、黄锦中、王英甫等知名人士组成治安委员会。这是杞县的第一个人民民主政权。它负责镇压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打击反动分子的破坏活动，为革命军别动队筹集粮秣，解决部队和政权内工作人员的经费问题。经商定，原县府工作人员照旧供职，地方绅士和旧职人员无不表示满意。待稍安定，别动队分别驻扎到县府、武营、老当铺、祠堂及城关附近的公共房屋，都未住进民宅。人民群众对此交口称赞，说从未见到过这样的队伍。为了扩大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5月30日，中共杞县县委在城隍庙召开群众大会，县委成员第一次与群众公开见面。吴芝圃登台演讲，

宣传北伐战争和国民革命的重大意义；鼓励农民群众进一步团结起来，谋求自身的解放；号召商民、市民组织起来，支援农民协会，为打倒贪官污吏，铲除封建迷信贡献力量。各界人民对共产党的领导和新的政权无不表示衷心拥护。会场上传单飞舞，口号声此起彼伏，热气腾腾。

杞县县城解放后，萧云鹄指示郭廷和（后名于秀民）组织睢县别动队举行武装起义。不久，睢县县城也被别动队占领。应陈留县人民和别动队的要求，萧云鹄、吴芝圃很快又率杞县别动队一部前往陈留，协同该县别动队，攻克了离省城开封仅20余公里的县城，把斗争的矛头直指河南军阀统治的心脏。

萧云鹄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工作，终于同张海峰、吴芝圃等在豫东平原上点燃了熊熊的农民革命的烈火。虽说农民武装起义连克三座县城，只不过是人民革命的初步尝试，但它却以空前的事实显示出：农民群众在共产党的周围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是推翻反动统治，谋求自由的巨大力量。

就在萧云鹄等农民进行武装起义的时候，国民二军高桂芝部“围剿”了商丘的一支进步的红枪会。6月，冯玉祥又经过郑州会议、徐州会议，与汪精卫、蒋介石达成协议，支持他们“宁汉合作”，共同反共。并在河南到处散布“豫东别动队是土匪”，“农民协会包庇土匪”，“农民协会是土匪”的舆论，制造镇压农民革命运动的借口，并明令通缉“杞县暴动匪首吴殿祥（吴芝圃）、睢县匪首马集勋”。

在封建军阀组织的反扑面前，占领县城的各县别动队，先后撤出。但刚被激起的农民武装组织的斗争热情，并未受到挫伤。然而，在6月底，中共河南省委在以陈独秀为代表的错误路线影响下，一反常态，对豫东农民暴动和建立革命政权横加

指责，说是错误的过火的行为，破坏了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合作，破坏了共产党同冯玉祥部队的关系；竟然下令解散杞县、睢县县委、共青团组织和农民协会、别动队支队；给萧云鹄以留党察看、吴芝圃停止党内组织生活的处分^①。刚刚兴起的豫东农民革命热潮，就这样被党内的错误决定压下去了。

因起义前后精神高度紧张，更由于对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取消农民运动的错误路线的义愤，萧云鹄回到开封就病倒了。他神情恍惚，言语不清。陈西羽经请示省委书记张景曾同意，搀扶着萧云鹄，带着儿女乘火车回到了湖北。在火车上，萧云鹄不时地发出狂噪，叫喊着“我的手枪！我的手枪”。陈西羽怕引起乘客的怀疑，便使劲地将他的头抱在怀里，强迫他睡觉。并对左右乘客解释说：“他做水果生意，钱被人偷光了，气成这个样子，我这是送他到武汉诊病的。”

（三）

萧云鹄一家回到武汉，住在汉口硃口观音阁，与黄冈同乡同学罗四维、胡亮寅等相会。他们都对共产党领导革命的前途表示担忧。几天后，萧云鹄被武汉政府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二十四师独立团参谋长。他将家属委托给观音阁附近小学的李老师（李作民，黄冈回龙山人）后，即回黄冈乡村去动员青年农民参军。他自己制作了一面招军旗（现存湖北省博物馆），上面用墨笔写着：“招募新兵”。黄冈是湖北全省农民运动最火热的县份之一，“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等口号早已家喻

^①《吴芝圃》，《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9卷。

户晓，人人皆知。经萧云鹄号召，地方党组织配合做工作，一批青年农民踊跃报名参军。他的四个弟弟，除二弟双目失明外，都应征入伍。五弟鸣翥当时年仅15岁。母亲和邻居劝他把五弟留在家里，他说：“都带去，我全家革命，革命到底！”

萧云鹄带领家乡应征的300多名新兵，从浠水巴河镇乘船顺长江东下，到九江与部队会合。这时，汪精卫已叛变革命，在九江莲花巷中学二十四师司令部里，萧云鹄书写了“打倒汪精卫”“打倒蒋介石”等标语，并带领战士到处张贴。不久，部队开往南昌，萧云鹄率二十四师司令部人员留守九江，负责收容部队行军掉队人员。“八一”南昌起义后，他立即率领留守部队乘船追赶大部队。途经江西樟树镇时，萧云鹄及所部人员全被国民党第五方面军朱培德部杨嗣生师阻拦。他指挥战士们摘下帽徽、领章，连同手枪一起从船后沉入水中，并谎称是第十一军的士兵，被总指挥张发奎遣散回家，前去萍乡乘火车回武汉的。敌军无证可查，除留下他的五弟当勤务兵外，将他们全部释放。

1927年8月，中共湖北省委根据中央“八七”会议确定的总方针和各项具体规定，制定了湖北的秋收暴动计划，将全省划分为武汉、平汉铁路和鄂东、西、南、北、中7个暴动区域，分别建立共产党的特别委员会。萧云鹄奉命回到武汉，同月下旬与王平章2人被省委分配去组建鄂中特委，任特委书记。鄂中区辖沔阳、潜江、汉川、天门、京山等县。9月初，省委常委任旭巡视鄂东，认为该地区太大不便指挥，将鄂中区划分为南北二部分，鄂中北辖汉川、天门、京山等县，王平章任分特委书记。鄂中南辖沔阳、潜江、监利三县及新堤市（即洪湖县），

萧云鹄任分特委书记^①。

萧云鹄化名钟德辉。他经过几天调查后，即以鄂中南分特委名义在沔阳蚌湖召开了扩大会议，贯彻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关于“组织群众由骚动转入暴动，建立工农武装，建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五军”的指示，同与会成员重点研究了筹集枪枝、建立武装的问题。会后，特委委员邓赤中、熊传藻及沔阳县委书记刘绍南等，即回各县开展工作。萧云鹄则分别在白庙、九合湾等地召开秘密会议，动员党员和原农协骨干再次组织起来，举行赤色暴动。

沔阳南部戴家场有个大恶霸涂恒甫（别名涂老五），素来横行乡里，无恶不作。群众对他恨之入骨，称他为“毒老虎”。在萧云鹄的指挥下，中共沔阳县委组织暴动队伍，仅靠三支手枪，再助以爆竹和梭标，月夜大闹戴家场。暴动队员董锦堂开枪击毙了涂恒甫，打响了鄂中秋收起义的第一枪^②。涂恒甫和另一土豪张泽厚两家的财产，随即被分发给贫苦农民。当地农民说：“钟德辉一来就杀了一只老虎”^③。

群众发动起来后，人多枪少，无法扩大武装部队。因此萧云鹄很想尽快搞到一批枪枝。开始，他到新堤去活动，想利用新堤警卫团一个连与国军第八军一个连的矛盾，让警卫团去缴八军那个连的枪枝，但因警卫团调走，计划落空。接着，他把蚌湖武装骨干集中起来，袭击了沔南重镇峰口，从出差峰口的省团防军的一部分尾军手中，缴获了十几支长枪。自此，暴动队员士气大振，有了武器资本，小股游击队得以建立。

①《党在湖北革命史资料》，存湖北省档案馆。

②王治 1980 年 1 月 3 日谈话记录。

③杨光华 1980 年 1 月 23 日谈话记录。

正在萧云鹄对游击队进行紧张训练的时候，邓赤中带领排湖和张家场等地的 300 多名暴动队员，于 12 月 3 日傍晚到沔阳县城外埋伏下来，并以部分队员化装潜入城内。第二天天刚破晓，暴动队员外攻内应，一举攻克县城，将反动县长胡宝琛当场烧死，捣毁了国民党镇压农民革命的改组委员会，打开监狱，救出了娄敏修等 90 多名革命同志，缴获长短枪 20 多支，子弹 2000 余发。这次战斗胜利后，沔阳县游击队就有近 40 人枪。萧云鹄想乘胜追击，夺取更多的枪枝，于是立即率领这支队伍夜袭新堤。不料新堤之敌已有充分准备，游击队不仅未能取胜，反而有两名队员在战斗中牺牲。为此，特委其他同志和沔阳县委责备他事前不听劝告，采取主观冒险行动。萧云鹄虚心接受同志们的批评，吸取教训，将队伍带到沔西进行休整和训练^①。

1928 年 1 月，经过全面侦察，周密准备，萧云鹄率领部队全歼监利团防驻新沟嘴之敌，缴获长短枪 60 余支。这次空前的胜利，使游击队扩大两倍，发展到 100 多人。于是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五军在沔阳拖船埠正式成立。萧云鹄任军长。下辖十三师（师长王少卿，党代表刘鑫珊）三十七团（团长赵文允）。萧云鹄还在群众大会上宣布沔阳县拖船埠区苏维埃政府建立。一时间，新的部队、新的政权，吸引着附近广大群众前来参军参政，军事、政治活动相当活跃^②。

2 月初，萧云鹄同娄敏修、罗天予将第五军带到沔东杨林尾，一方面进行紧张的军事训练，一方面发动群众参军。同月 6 日，他们召开党员大会，决定攻打监利县城，号召党员分头做好战士和群众工作，加紧准备攻城工具。恰在这时，湘鄂西

①②杨光华 1965 年 2 月 4 日谈话记录。

前委领导人周逸群、贺龙通知萧云鹄率部队前去监利朱河镇，与他们带领的石首游击队会合。萧云鹄立即停止执行攻城计划，率部队从戴家场渡口过河，2月9日赶到了监利朱河镇^①。

两支部队会师后，由贺龙、周逸群统一指挥，不久发展到五六百人，改编为三个大队，萧云鹄、滕树云、史庶元分别担任大队长。在进攻监利县城失利后，部队大部分由贺龙、周逸群率领退出监利入石首县境，萧云鹄只带30多人枪退到沔阳苏湖。不料苏湖已三面被敌包围，他们与敌奋战三昼夜，最后弹尽粮绝，大部分战士壮烈牺牲。萧云鹄带部分军事干部突出重围，将武器交给沔南区委埋藏，再去沔西与特委其他成员和县委会合。在这里，地方观念比较严重的特委委员邓赤中^②，竟以特委的名义，同沔阳县委召开联席会议，要萧云鹄检讨苏湖失败的经过，指责他犯有逃跑主义错误，最后决议撤销萧云鹄的党内、军内职务。

后来，因连遭几次严重失败，加上周逸群等转移鄂西，鄂中南分特委与省委和中央完全失掉了联系。这时，萧云鹄主动建议特委派他前去中央联系工作。获准后，他于同年6月离开了战斗近一年的鄂中南地区，前往上海。

（四）

萧云鹄向中共中央汇报了工作后，被任命为中共河南省委军委书记^③。心胸坦荡的萧云鹄并不计较历史对他的误会，欣然

① 吴登榜、杨世潮 1965 年 1 月 21 日谈话记录。

② 《湖北英烈传》第 143 页。

③ 吴德峰等的回忆。

接受中央分配的工作。他顺便取道湖北，回家接走妻子儿女，于1928年11月20日携眷抵达开封。萧云鹄一家在旅馆住了三四天后，经五家店铺出面证明他确实是“生意人”，并担保不会干出反政府的事（否则五家全受连累），才被同意搬到北道街138号安家。

这时，开封以至河南全省白色恐怖极为严重。冯玉祥的肃清杂色军队计划在河南取得暂时胜利后，他认为他的唯一敌人就是共产党了；反动政府内部也传出“共产党在南方已取得胜利，现在正集中力量以开封、郑州、西安等地为中心”，开展活动，逐步消灭国民党。因此，军阀同地方政府联合起来，以开封为重点，并在豫中、豫西、豫北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再利用其中叛变自首分子，对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进行更深程度的破坏。中共河南省委曾派交通员、巡视员到各地去恢复组织活动，但终因敌人势力强大、收效甚微。11月3日，省委常委吴某被捕叛变，敌人即开始根据他提供的名单捕人；几天后，省委秘书处被敌人查出，住在机关的事务秘书长姚曼、文书科主任李明、技术书记焦日新等都被抓走^①，而焦日新又在狱中自首^②。于此情况下，萧云鹄一到开封，就等于钻进了敌人的包围圈。

萧云鹄租赁的房子，前后左右邻居不是做小生意的，就是小手工业者。这里就是中共河南省委军委机关。萧云鹄及家属与工作人员装扮成一家人和亲戚：萧云鹄化名萧焕然，算是一家之长；秘书吴善珍（后名吴奚如）化名萧焕章，萧云鹄与陈

①光霁：《最近河南白色恐怖厉害与党的破坏的情形》（1928年12月30日），存河南省档案馆。

②《贺克寒给中央的报告》（1929年1月24日），存河南省档案馆。

西羽称他“幺弟”，孩子们称他“幺叔”；黄征（江西人）化名黄金甫，称萧云鹄夫妇“表兄”、“表嫂”，孩子们称他为“表叔”。他们“一家人”遵守铁一般的纪律，在这里“做着袜子生意”，并计划买一两台织袜机，把“生意”搞得更像样一些。

对于萧云鹄来说，不幸的时刻终于来了。11月25日晚8点钟以后，林育南、吴德峰和省委其他成员悄悄地来到军委机关，在一团漆黑的房间里召开秘密会议。他们讨论时，把声音压得很低。待夜深人静，他们又一个个地离开会场。因联络员张铁生前几天外出送文件被敌探抓去，陈西羽就更加注意军委机关和领导成员的安全。领导开会时，他就在院子里检东捡西，转来转去。散会后，他听见院墙边的厕所里有人发出呼吸的声音，就马上进屋告诉萧云鹄。萧云鹄警觉地出来转了一圈，但未发现异常情况。

第二天一大早，北风呼啸，天气阴沉并下着大雪。陈西羽见几个警察在院墙外踱来踱去，一种不祥的预感蓦然而生。她连忙催促萧云鹄起床去买盐，想让他回避一下。萧云鹄穿好棉衣，抱着儿子幼鹄朝外走去。刚到院子门口，几个警察突然冲上来，用绳子将他捆绑住。萧云鹄神情镇定地质问：“我是一个做生意的，犯了什么法？你们凭什么抓人？”警察不由分说，将他推出院子门外。这时，萧云鹄只好对陈西羽说：“天气寒冷，你要把孩子照顾好！”另外几个警察冲进屋里，把吴善珍和黄金甫也捆了起来，一同带走。下午，邻居几个店铺老板也被押走了。

陈西羽眼巴巴地看着丈夫和同志们被抓走了。她没有哭天喊地，而是立即进屋烧毁了机关所藏的文件。火还未完全熄灭，几个警察冲了进来，问她烧的是什么，她回答是孩子撕破的废

报纸。警察见她不卑不亢，抽出绳子将她吊在屋梁上，用手枪顶住她的胸膛，审问：“那两个人（指吴善珍和黄金甫）住在你家干啥？来你家开会的有哪些人？”并威胁说：“不说，我就开枪打死你！”陈西羽被吊得遍身麻木，头晕眼花，但她总是那句原话回答敌警：“我们一家是到这里做生意的，犯了什么法？”在左邻右舍男女老少苦苦哀求下，警察才将她放下解开。接着，陈西羽母子被赶出户外，其家什、衣物全被抄去。陈西羽带着儿女住在一间破茅草棚子里。她变卖了仅有的一件大衣和一双皮鞋，给萧云鹄他们送去三床旧棉絮、三条毛巾和三把牙刷；她取出萧云鹄的30元存款，买些油炸麻花沿街叫卖，一来维持牢饭和母子生活开支，二来想以此作掩护，暗地里打听组织上的消息。几乎每天晚上都有特务前来纠缠，要她讲省委领导住在什么地方，哪里还有联络点。而她一口咬定是做袜子生意的，“不知道什么党、什么联络点”。

萧云鹄等被捕后被关押在河南省第一监狱。陈西羽虽然每天送牢饭，但无法得到萧云鹄等在狱中的消息。一个月过去了，被抓去的邻居方老板被释放出来了。陈西羽立即前去询问丈夫的情况。方老板见她满脸愁云，就对她说：“你莫伤心，萧掌柜很乐观，坐牢还经常唱京戏，什么‘满天风雨满天愁，革命何须怕断头？留得子胥豪气在，三年归报楚王仇’。”陈西羽又问萧云鹄受刑没有，方老板脸色突变，长叹一声：“惨无人道呀！敌人审问萧掌柜，什么情况也没得到，就给他上夹杠，坐老虎凳。”并说：“萧掌柜就是今后释放出来，也是一个残废人。”陈西羽听后，心如刀割。后来，组织上安排另外一名妇女送牢饭，让陈西羽带着儿女回湖北，她辗转回到老家，住在娘家陈策楼附近的祠堂里，靠纺线、讨饭把儿女拉扯成人。1949年5月武

汉获得解放，同月31日，她母子三人被市长吴德峰派去的人接到武汉。后在武汉市定居，今年90高寿。

萧云鹄、吴善珍等一进监狱，即被分开住进小号子。他同另外4人生活在50多平方尺的天地里，每天吃的是黑窝窝头、小米稀饭加咸萝卜。1929年，狱中秘密建立了共产党的支部，领导难友学习和斗争，萧云鹄是该支部第二任书记。后来，萧云鹄等秘密接到中共中央关于“被捕的同志在监狱里不要成立组织，不搞斗争，不搞暴动”的指示，即停止了组织活动。但是他们在狱中的核心作用，对其他难友的影响依然存在^①。

萧云鹄等3人被判处两年半徒刑。可是，刑满后又未能获释。“九一八”事变后，敌人又把他们作为反省对象，转到就在监狱里成立的反省院。在这里，他们虽然被解下了沉重的脚镣手铐，生活也比以前好多了，还有与家人通讯的自由。此时此刻，他们思念亲人，盼望与同志们共同战斗的心情，显得更加急切。萧云鹄与家中取得联系后，得知分别四年多的五弟鸣翥仍在江西赣州国民党部队服役，便立即给他去信一封：

鸣翥五弟：

相别几年，你还在江西军队里面服务，我由叔父处得知你的消息，真是欢喜之至。你在军队里面务必服从长官，勤慎服务，小心办公，努力学习。现值国家多事强邻剑劈之秋，你果能够持干戈为社稷，这也是我家祖宗德行不小哩。兄因政治嫌疑，不幸于民国十七年十一月廿六日在开封被捕入狱，对于家中老幼不能照顾，听说母亲在家受苦，

^①吴奚如1980年1月18日谈话记录。

你务念生育大恩，不时寄些钱物，奉养她老人家，以终余年。你若经济有余剩，可寄点给我，以供零用。

长兄焕然手书①

不久，萧云鹄即收到五弟鸣翥寄来的信和 20 元钱。幸存的兄弟俩总算通了一回信息。

可是，情况刚有转机又急转直下，与萧云鹄同时被捕的中共扶沟县委书记吕润阳，为了换取自己的苟安，将萧云鹄的真实身分密告河南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刘峙军法处分别提审萧云鹄等人，分别给他们加刑半年，重新挂上脚镣手铐，解到洛阳监狱关押②。1932 年 2 月 10 日清晨，萧云鹄被传出牢房，一阵枪声响过，他同另外 17 名革命同志英勇就义，时年 33 岁。

附 本文除已注明来源外，其他主要参考资料有：

1. 多次访问陈西羽记录。
2. 1979 年 12 月烈士家乡萧家湾座谈会记录。
3. 张海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回忆》，1961 年于沈阳。
4. 中共河南省荥阳县委党史办公室：《关于地下党活动情况的汇报》，睢县县委党史办公室：《大革命时期睢县两次农民大暴动概况》，杞县县委党史办公室：《睢、杞、太地区党史——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5. 刘仁静、张马栓、张桂林、靳锡庚、杜靖涛、孔繁济、郑国政、郑一侨、苗九锐、苗泽生、段佩明、黄定甫、阎凤书、刘耕初、于秀民、秦克信、郭永增、谢文宜、向思赓等人的回忆资料。

①萧民举（鸣翥）1964 年回忆。

②吴奚如 1980 年 1 月 18 日谈话记录。

王 平 章

《王平章》编写组

王平章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领导人之一，192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湖北省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中共鄂豫边特委、鄂豫皖特委、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务委员、鄂豫皖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委员长，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政治委员等职。1933 年 3 月 28 日在河南商城银山畈（今属安徽省金寨县）战斗中不幸牺牲，时年 32 岁。

（一）

王平章，学名远清，化名王贯三、万秉章，1901 年 7 月 3 日（清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十八日）生于湖北省汉川县担山（今庙头）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有 3 个哥哥 1 个姐姐，他排行老幺。5 岁那年，父亲病逝。全家只有 2 亩薄田，还租种地主的一部分土地以维持生计。他 7 岁入私塾，先后断断续续读了 6 年。16 岁时，在谭家湾设蒙馆，从此开始教书生涯。20 岁那年，与邻村姑娘田银珍结婚。

1922 年春，王平章考入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董必武时在一师任教，经常指导王平章等阅读《中国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和马克思著作。1923 年春，王平章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

团。

1924年1月，国共两党实现合作，董必武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负责人。王平章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为国民党一师区分部负责人。他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大力发展国民党组织^①。

3月，制造“二七”惨案的罪魁之一、湖北省督军兼省长萧耀南借祝寿大宴宾客，以炫耀自己的“政绩”。王平章等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揭露其罪行。届时，他带领5位同学将揭露萧耀南罪行的传单散发在萧家大院内，使萧耀南狼狈不堪^②。

通过革命斗争的锻炼，王平章在1924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党小组长。

在董必武的影响和指导下，王平章在家乡担山创办了全人小学，于1924年9月正式开学。所谓“全人”，就是要求学生成为品质完备、道德高尚的人，成为改造国家、改造社会的栋梁之材。该学校一反尊孔读经的传统，让学生学习新鲜的国文、算术、历史、地理、自然等课程。学生们唱起了《照耀人间闪赤光》的校歌。新思想、新文化的春风吹进了担山^③。随后，王平章又在杂姓台（又称瑞鹤洲）推动胡家珍办起了济人小学。这两所学校后来成了汉川中共组织的发祥地，开展革命活动的阵地，培养革命人材的摇篮。

（二）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各地掀起反帝浪潮。武

①刘仲衡、李益谦的谈话记录。

②刘仲衡的谈话记录。

③刘子谷、刘耀清、张声明的谈话记录。

汉各界群众举行游行示威，王平章和同学们一道在街头巷尾进行讲演，声泪俱下。英帝国主义对示威群众进行镇压，制造了“六一一”惨案。湖北督军萧耀南向帝国主义献媚，勒令各校提前放假。王平章等被迫离校。是时，中共武汉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陈潭秋指示王平章、刘子谷等，把反帝斗争的烈火引向农村。

6月中旬，王平章、刘子谷等汉川旅省学生返回县城，汉川旅京、旅沪学生也相继回县。王平章等根据中共武汉地委指示，在汉川县中学召开会议，商讨反帝斗争问题。会议决定成立汉川反帝后援会指挥部，王平章等8人为指挥部成员。会议决定深入开展宣传工作，广泛发动群众，抵制英日仇货，募捐救济上海等地罢工工人。会后，王平章、刘子谷坐镇县城，其余负责人分赴全县各地进行组织和发动群众工作。

一天，汉川县中学生宣传队在英美烟草公司汉川代销处（又称晏亨记代销处）门口，宣传抵制仇货的道理，并要进入晏家对其烟草进行登记。老板晏衡甫公然鸣枪威吓学生。王平章闻讯十分气愤，认为这是帝国主义爪牙对抗反帝斗争的严重事件。晏衡甫外号“晏老虎”，是汉川一霸。王平章等决定召集全县反帝动员大会，打击“晏老虎”的嚣张气焰。

6月底的一天，四乡农民、教师、学生数千人，响应指挥部的号召，浩浩荡荡从四面八方进入汉川县城，齐集“贡院”前面。王平章站在贡院前的台阶上发表简短讲话，声讨帝国主义的罪行，揭露晏衡甫对抗反帝斗争的行径。会后，群众举行游行示威。王平章和指挥部的负责人走在队伍的前列，和人们一道，手举三角小旗，不断振臂高呼口号。游行队伍来到晏衡甫家门口，只见大门紧闭，王平章遂指挥学生敢死队挥起板斧，

劈烂晏的招牌，砸开晏家大门，人群像潮水一样涌进代销处，将烟草搬到大街上烧毁。“晏老虎”趁人群混乱之时，逃之夭夭。

砸烂晏亨记代销处的革命壮举，使全县人民认识到组织起来的巨大力量，增强了人们改造社会现状的信心^①。

汉川教育腐败不堪。教育局局长程鸿藻顽固守旧，贪污腐化。王平章等早在1924年暑假就召开过全县进步教师会议，探讨改革汉川教育的问题。砸烂晏亨记代销处以后，王平章等决心乘胜把程鸿藻拉下马，另选具有新思想、新文化的人担任教育局局长。但教育局局长的撤换必须通过省教育厅，而教育厅厅长程鸿书正是程鸿藻的弟弟。经请示董必武同意，王平章等首先组织了汉川旅省学生会，以其为骨干力量，通过《汉川青年》报大造革新汉川教育的舆论。接着组织清算小组，从清查教育局帐目中发现程鸿藻贪污巨款、中饱私囊的罪证。根据这些罪证，写出控诉状，向县知事公署和湖北省政府控告程鸿藻，并将程的丑行劣迹通电全省。第三步，通过董必武联络湖北教育界知名人士耿仲钊、李汉俊，向省教育厅施加压力。与此同时，王平章等组织进步教师和学生分别到县知事公署和湖北省府请愿。由于上下团结一心，各界大力支持，终于迫使湖北省教育厅撤销了程鸿藻的职务。王平章等趁热打铁，召开全县师生代表大会，民主选举张素吾为汉川教育局局长。张素吾在任内大力提倡平民教育，安排进步教师充实学校，继全人、济人之后，汉川又出现了树人、惠人等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学校^②。

9月，湖北一师复课，王平章返回学校。

①刘子谷、刘祖清、张声明的谈话记录。

②刘子谷、刘祖清、张声明、刘耀清的谈话记录。

11月间，直系军阀吴佩孚穷兵黩武，大肆搜刮军费，向汉口总商会勒索军费100万元，指令湖北省财政厅发行军用券，实行盐斤加价。此举激起了武汉各界人民的反对。中共武汉地委立即发动各界群众罢工、罢市、罢课。王平章、陈定一、刘仲衡等到汉口几处游乐场所散发传单。一天晚上，王平章等在新市场（今民众乐园）活动时，被稽查队队士发现，对他们拳脚相加，平章头部、胸部多处负伤。稽查队士将他们关押在汉口民生路华阳旅社锅炉房的储煤室里，准备天亮以后解送武昌。由于刘仲衡与锅炉工是老熟人，便托他送信给有关方面，打通稽查处头目的关节，王平章等获得释放^①。

王平章出狱后无钱治伤，幸得一位老校长的儿子关照，在其开办的医院免费治疗一段时间，才恢复健康，继续战斗^②。

（三）

1926年初，王平章调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农民部干事，从此离开一师，专门从事农运工作。湖北农运的迅速发展，引起反动当局的恐慌。3月11日，农民部等机构被反动军警封闭，一人被捕。王平章等从武昌迁至汉口办公，继续领导全省农运工作。

一周后，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北京师大学生李循鉴被杀害。李系汉川人，一师毕业生、共产党员、人社成员。噩耗传到一师，师生们义愤填膺。王平章、张素吾等召集进步师生、人社成员在一师大礼堂举行追悼会。王平章含着泪水宣读

①②刘仲衡的谈话记录。

祭文，追述李循鉴短暂而光辉一生的事迹，号召大家学习烈士英勇献身的革命精神，为推翻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而斗争^①。

4月上旬，汉川反动当局以“宣传赤化”、“过激”等罪名查抄全人、济人小学，逮捕3人，并在武汉《中西报》、《正义报》上通缉王平章等7人^②。

时中共武汉地委决定成立湖北省农民运动委员会，由陈荫林、王平章、刘子谷3人负责。根据分工，王平章驻黄冈，指导鄂东农民运动。

5月，王平章来到黄冈县回龙山，住在中共支部书记杜远骏家中。黄冈是陈潭秋、陈荫林的家乡，是湖北最早建立秘密农协的县份之一，农运工作基础较好。在王平章的指导下，黄冈县农运筹备委员会于6月成立。

8月中旬，北伐军攻占长沙，22日进入湖北通城，武汉守敌惶恐不安。董必武决定争取刘佐龙率部起义。王平章奉命返回武汉，参加策反工作。刘佐龙所部官兵大多系湖北人，驻汉阳、汉口。董必武、耿仲钊主要做上层人物的工作，王平章和其他同志则配合做中下层人物的工作。他们发现一师音乐教师王浩如与三团团长王桂荣是至交，决定请王老师协助工作。王浩如给王桂荣写了一封信，恳切而委婉地劝其归顺革命。王平章、刘仲衡等携带信件，前往汉口拜访了王桂荣。王犹豫不决，敷衍应酬。后经王平章反复劝说，又适时向他透露了刘佐龙率部起义的意念，他才下定决心随刘起义^③。

9月6日，北伐军进攻汉阳，刘佐龙阵前起义，掉转枪口攻

①③刘仲衡的谈话记录。

②刘子谷的谈话记录。

打危山炮台，北伐军顺利攻占汉阳、汉口。

策反工作结束后，王平章以省农运特派员的身分前往黄冈，再次来到回龙山。

在北伐军攻占汉口、汉阳的胜利进军声中，黄冈地区的反动统治势力发生动摇，但还要作垂死挣扎。阳逻（今属新洲县）大地主王福生带着家丁四处逼租，毒打佃户，十分猖狂。王平章决心拿王福生开刀，杀杀反动统治阶级的威风，打开黄冈农运工作的新局面。他动员回龙山农协负责人华耀清带领三四十名会员将王福生抓到回龙山街上示众，这在农村是破天荒第一次。上千的群众赶来看热闹。王福生在群众的威逼下，表示悔过认罪。农民群众看到了农民协会的力量，纷纷要求参加农民协会。乡、区农协组织蓬勃发展。据12月份的统计，全县除2个区外，有14个区建立了农民协会。

实现一切权力归农会以后，地主豪绅死不甘心，少数顽固分子进行疯狂反扑。上巴河乡大劣绅李品山带领保卫团杀伤农协会员。为了回击地主豪绅的反扑，王平章等在上巴河召开了有4000人参加的乡民大会，宣布李品山23条罪状，并将李品山及其帮凶交政府惩办。大会还将李品山操纵的保卫团改为农商保卫团，将李品山把握的旧商会改为商民协会^①。王平章最后在大会上讲话，强调农商合作，不要受土豪劣绅拨弄，打击地主豪绅的破坏活动，保卫胜利成果^②。

1927年1月下旬，王平章出任武昌县农民协会委员长。3

①华耀清：《在扬眉吐气的日子里》；方修胜：《黄冈农民运动概述》，均载《黄冈革命史资料》第1辑。

②平章：《黄冈上巴河的乡民大会》，载《湖北农民旬刊》第10期，1926年12月17日。

月，他出席了湖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会上当选为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

此后，王平章组织广大农民，为保卫革命中心——武汉，推动革命深入发展，作了巨大努力。一天，他获悉一个土豪藏有4支短枪，便亲自在县农协驻地对这个家伙进行审讯，终于搞清了情况，作了及时处理，消除了隐患^①。“四一二”政变后，夏斗寅率部叛变，威胁武昌。叶挺率部进剿叛军，王平章率县农民自卫军配合正规部队作战。夏部全线崩溃，王平章率部一直追到贺胜桥^②。

王平章无比痛恨蒋介石一伙的叛变罪行，组织农民坚决反击。6月中旬，广东农民自卫军500多人为避免广东军阀的屠杀，被迫来到武昌徐家棚。王平章闻讯，立即带领农民数十人，携带大米4石，青菜4担，前往徐家棚进行慰问，表达了武昌10多万农友对广东农友的深情厚意^③。与此同时，武汉地区的反革命活动也日趋猖狂。6月18日，王平章主持召开武昌县农协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会议要求武汉国民政府下令保护工会、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惩办一切屠杀工农的反动分子，讨伐蒋介石。武昌县农协还在7月上旬发出了讨蒋通电^④。

7月中旬，国民党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反动面目日益暴露，革命处于危急关头。王平章根据中共湖北省委的安排，前往九江追赶叶挺、贺龙的部队，投入新的战斗。

①张声明的谈话记录。

②黄征祥的谈话记录。

③④谭克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武汉市郊农民运动概况》，《武汉党史资料》1983年第2期。

(四)

王平章赶赴江西，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在革命委员会属下的农工运动委员会工作。起义大军转移至抚州时，王平章因浑身浮肿，行走困难，组织上安排他与董觉生（董必武之弟）等人返回湖北。

他们于8月下旬辗转回到武汉。时值中共湖北省委全力发动秋收暴动，迫切需要干部，省委安排王平章、萧云鹤前往鄂中，接替唐方九主持特委工作。9月初，省委又将鄂中划分为南北二部，王平章负责北部（天门、汉川、京山、应城4县）的领导工作。王平章抱病赶到天门芦家口，隐蔽在同学彭正浩（中共天门县委委员）家中，很快与唐方九取得联系。根据唐方九的介绍，王平章起初把希望寄托在京山国民党曹勳部的哗变和天门西乡的土匪、皂市的红枪会的改编上，结果都落了空。因此受到省委的批评，认为他不应把主要精力集中于兵运工作和会匪工作，应该把力量放在发动群众上。王平章及时改变作法，深入到中共组织基础较好的地方，如汉川的榔头、南河渡、庙头，天门的芦家口等地，以中共党员为骨干，以刀矛为武器，组织暴动。9月中旬，汉川榔头率先暴动，杀掉土豪王大定。接着，天门芦家口斗争了大地主胡顺太，清算出金条、元宝，以此来解决部队给养，并用来造船、打刀、买枪。在暴动的怒潮中，天门、汉川分别建立了游击队、义勇队^①。

11月上旬，中共湖北省委发出指示，要求各地有组织地进

^①《湖北秋收暴动专号》（1927年10月）。

行暴动，创造割据局面。王平章集中天门、汉川的武装，攻占了天门东乡的反动堡垒净潭。此地处两县交界地带，华严湖、中柱湖连成一片，芦苇丛生，便于联合天门、汉川两县武装开展游击活动，奠定割据局面的基础。

11月中旬，中共湖北省委巡视员来到鄂中，于21日深夜在净潭附近湖中木船上召开特委临时会议。省委巡视员突如其来在会上宣布“汉川义勇队副大队长万吉甫勾结土匪，私自释放土豪，严重丧失立场，且对党有野心，根据省委命令，应将万吉甫予以处决。”王平章和其他同志均感意外，面面相觑。原来，王平章因公赴省时，特委的工作曾委托给万负责。万为解决给养，曾抓过一些土豪，罚款后予以释放。万还与当地一支土匪队伍订立协议，互通情报，互不侵犯。一些与万有矛盾的同志，便向省委作了歪曲事实的控告。王平章在了解了事实真相后，认为在对敌斗争中根据不同情况采取区别对待的办法应予肯定，希望巡视员如实向省委报告，再作处理。巡视员坚持成命，王平章据理争辩，会议僵持达3小时之久无结论。最后只作出了举行天汉暴动的决定。

22日晚10时，王平章带领天门、汉川游击队（义勇队改称）在汉川曾家坡集结，进行暴动前的准备工作。不料，就在此时，省委巡视员派人处决了万吉甫。王平章对这种不正常的作法极为气愤。他对同志们说：这不仅冤枉了一个好同志，而且还会在同志中间造成猜忌和隔阂，招致不良后果。战士们对此事普遍感到不满，天门有一部分武装拉走了。

11月23日凌晨2时，天汉暴动开始。王平章率天汉游击队进攻分水嘴，6时占领杨林沟，8时占领芦排；24日凌晨1时进占南河渡。12月1日晚，游击队进攻汉川南部重镇系马口，不

料中途与一支国民党军队遭遇，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游击队撤出战斗。天汉暴动横扫汉川半边天，土豪劣绅一片惊慌；劳苦群众大受鼓舞，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斗争行列。

王平章由于过度操劳，营养极差，旧病复发，日趋严重，组织上安排他在武汉住院治疗。12月20日，中共湖北省委作出决定，撤销中共鄂中特委，解散汉川游击队，但对此未作任何说明。王平章知道此事与万吉甫事件不无联系，但有口难言，深感痛苦^①。

（五）

1928年春，桂系军阀胡宗铎残酷摧残湖北革命力量。中共湖北省委及其联络机关遭到破坏，王平章与省委失掉联系，只得离开医院前往沙市、荆门避难。适逢刘子谷遭汉川反动当局追捕也转移到此，他们遂结伴来到钟祥潞灌塘的一师同学寇瑜家中。王、刘、寇三人自发地组成一个中共小组，准备夺取当地清乡团的枪枝打游击。但王、刘二人被坏人告发。他们闻讯后，立即搭乘木船顺汉江而下。船过担山，王平章虽然非常想念妻子和下肢瘫痪的儿子，以及患脑膜炎留下后遗症的女儿，并为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感到内疚，但为了寻找中共组织，他无法回家探望。他们到汉口后，省、市中共组织均遭破坏，无法立足。王平章、刘子谷只得前往开封、北平投师靠友。尔后，王平章化名王贯三前往中共中央所在的上海，但未接上关系。他

^①《天门汉川工作报告》（1927年12月3日），刘子谷的谈话记录，郭述申的回忆材料。

此时身无半文，幸得朋友资助，前往庐山寻找已在海会寺从师大愚法师潜心钻研佛学的张素吾。通过张的关系，他在海会寺里当了不穿袈裟、不念佛经的“和尚”。庐山脚下有个帅家大湾，他经常到那里帮助农民干活、聊天，交朋结友，启发他们的革命觉悟，动员他们跟地主老财斗。陈家洞有一所私塾，王平章与塾师周先生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并教学生唱《劳工神圣》等革命歌曲。王平章的活动被一位反动官吏觉察而密告到星子县府，反动军警将他投进了监狱。幸得大愚法师等人出面营救，王平章才得以出狱。他在狱中从一位难友那里打听到南昌城内有一家裁缝铺是中共的联络站，便满怀希望前去接头。可惜那家裁缝铺已被敌人破坏，他的希望又一次落空^①。

1929年春，大愚法师赴上海讲学，王平章、张素吾等陪同前往。王平章乘机寻找中共组织，不期与刘子谷、董觉生邂逅相遇。通过董与陈潭秋接上了组织关系。他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在中共中央举办的训练班经过短期学习后，被安排在上海做交通工作。他摆个算命摊子作掩护，接待全国各地来上海联系工作的同志^②。

9月，中共中央派王平章、曾道润前往河南处理三十二师和中共商城县委误杀干部的问题。原来，7月间，三十二师和中共商城县委因工作意见分歧，采取恐怖手段处置中共鄂东北特委派来协助工作的（原三十一师大队党代表）徐子清、徐其虚，将徐子清杀害，徐其虚拘押。这样一来，他们与鄂东北特委、三十一师的关系十分紧张，部队之间互相戒备，严重影响革命队

①刘子谷的回忆材料；王克家的回忆材料。

②刘子谷的回忆材料；丁选武的谈话记录。

伍内部团结和根据地的巩固。中共中央得悉后，派曾、王二人前去处理^①。王平章知道此行有一定风险。但他坚决奉命前行，在中共豫南特委的协助下，到达三十二师驻地。但徐其虚已在8月被处决。王平章等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克服宗派主义，加强革命团结的指示，批评了他们动辄枪毙刑讯惩办同志的作法。王平章等坚持正面教育，没有追究个人的责任。他们还从下到上找战士干部谈心，广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使大家提高认识，终使三十二师师长周维炯等人承认了错误，并作了检讨，从而初步消除了三十二师与三十一师的误会和隔阂。在麻城北部的一次战斗中，三十一师与三十二师密切配合，取得了胜利^②。

9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鄂豫边特委，王平章被派往鄂豫边区工作。11月10日，王平章到达中共鄂东北特委所在地方家湾，会见了徐朋人、徐宝珊、戴季英等人。他坦诚地对大家说：“你们从黄麻起义开始坚持斗争，建起了这么大一块根据地，而我走了一段弯路，在庐山当过和尚，来迟了，我要向你们学习。”他那赤诚相见、严于解剖自己的精神，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③。11月20日，中共鄂豫边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豫南光山县胡子石召开，王平章为大会起草了《政治决议案》。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鄂豫边特委，徐朋人、王平章、徐宝珊三人组成常务委员会，王平章主管组织工作^④。

1930年初，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对鄂豫皖三省交界各根据地

①中共中央关于鄂东北特委改组为鄂豫边特委致豫南特委的信（1929年9月24日）。

②郑位三：《先烈王平章同志生平事略》；郭述申、成仿吾的回忆材料；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7月版。

③④戴季英的谈话记录。

的统一领导，决定成立中共鄂豫皖特委，王平章为特委常务委员。他向中央巡视员表示自己不再担任特委的主要职务，要求到基层去搞巡视工作，得到了中央巡视员的同意。接着，王平章到黄安、麻城、光山等地实地考察。据时任中共黄麻县委书记的戴季英回忆，王平章注重实际，非常接近群众，常常对同志们讲：“共产党领导革命，就是要领导人民大众来干，没有人民大众，革命就是空的。要领导群众，就必须首先熟悉群众。”郑位三在《先烈王平章同志生平事略》中也曾写道：王平章“最能接近群众，他身体较胖，农民群众都亲切地称他‘王胖子’，根据地无论男女老幼，一见王平章就围拢他，倾诉各人的心事和问题，王平章总是孜孜不倦地给以解决或解答。”这年夏天，由于形势的需要，王平章一度接任特委宣传部部长。但他仍然挤出时间到基层去^①。皖西根据地距特委所在地较远，王平章经常以巡视员的身分前去指导工作。一些地方对执行“保护中小商人利益”的政策掌握不一，曾出现过偏差。王平章在巡视期间，与中共六安县委书记舒传贤一起讨论，认为“保护中小商人利益”的提法太笼统，应当改为“中小商人营业自由”。这样一来，政策界限明确，执行起来也易于掌握^②。

皖西根据地于1930年春进行了土地分配，对待富农的政策是只分配其剩余的土地，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在5月间，一位中央巡视员到皖西后，根据中共中央新制定的《土地暂行法》，错误地将皖西对待富农的土地政策改为“没收富农的一切土

①鄂豫边特委给中央的报告（1930年1月10日）。

②舒传贤：《关于皖西北情况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年12月10日）；王志怀：《皖西苏区土地革命述评》，《安徽史学》1986年第2期。

地”。从而在一些地方出现“打倒富农，没收富农的财产，把富农赶上山头开垦”的事件。7月份，王平章巡视到此，立即将这种错误的政策纠正过来^①。

王平章在工作中处处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1930年夏，六安有一名干部被杀害，疑为改组派所为，中共六安中心县委为此逮捕了两个人，舒传贤和王平章等研究决定，将这2人交由特别法庭审理，审判结果宣判无罪。但退庭后，特别法庭的同志又认定这2人是改组派，建议将其暗杀。舒、王坚决反对，提出交由中共霍山县委继续审理，根据群众的检举和侦察的证据再行判决。此案拖了一段时间，2人终被判处死刑。舒传贤为此背上“妥协改组派”的黑锅，并在1931年初被中共皖西北特委开除党籍。舒不服上诉，特委于4月召开扩大会议，对舒的问题进行复议。王平章在会上带头为舒作证，加上其他一些同志的积极支持，会议重新作出结论^②。

王平章在巡视皖西过程中，还在党的建设、武装建设等方面作了许多工作，对皖西根据地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六）

1931年5月4日，中共皖西北特委常委（军事）姜镜堂他调，由王平章接任他的职务，担任皖西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王平章到任后，立即着手将各县赤卫队、游击队统一按三三制编

①舒传贤：《关于皖西北情况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年12月10日），王志怀：《皖西苏区土地革命述评》，载《安徽史学》1986年第2期。

②舒传贤为被处分给中央的报告（第一号）（1931年4月27日）。

为赤卫军，成立各县赤卫军司令部进行军事指挥。皖西北在整顿地方武装，加强群众武装组织建设方面，走在了鄂豫边区的前列^①。

6月28日，王平章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务委员。在7月召开的鄂豫皖特区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当选为鄂豫皖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委员长，主持政府的工作。

10月25日，红二十五军在皖西麻埠组成，卞继勋任军长，王平章任政治委员。

1932年初，王平章任中共皖西北特委（不久改称道委）书记。

张国焘为排除异己，在其统治地区大搞“肃反”扩大化。他认定皖西反革命特别多，特派陈昌浩等前去督阵，11月下旬在皖西掀起“肃反”高潮。王平章担任中共皖西北特委书记后，出于对党、对革命的忠诚，对组织原则的服从，在一定程度上执行了张国焘的错误“肃反”路线^②。后来，他对“肃反”发生怀疑，曾私下与人议论：“经过革命考验的同志怎么都是改组派呢？不能这样杀害自己的同志。”^③以后，“肃反”有所降温，在中共皖西北代表会议的决议中就明确提出，“将杀尽土劣改为打倒土豪劣绅”，“对于贫雇农、工农成分的人受改组派影响的只要坦白自首，劳动改造好的可以恢复党籍”^④。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肃反”扩大化的危害。

王平章十分重视经济工作。皖西苏区地处大别山腹地，盛

①《鄂西北特委报告之六——军事委员会工作》（1931年6月20日）。

②③陈明义的来信；郭述申、李继坤的谈话记录。

④《皖西事件的经过》，安徽省六安地区《公安志》（1983年5月）。

产茶叶、竹木。但由于国民党实行经济封锁，这些物资不能远销外地，人民群众迫切需要的粮、棉、油、盐又无法输入。为了打破封锁，王平章组织武装，打击盘踞在商业通道上的土匪、民团。如派 100 多名便衣队，敲掉了四顾店子民团。还派出武装，护送根据地人民将茶叶、竹木运载出境，带回了苏区所需的物资。由于采取了这一措施，活跃了苏区的经济，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保障了红军的给养，对支援革命战争起了重要作用^①。

从 1931 年 11 月起，鄂豫皖苏区军民展开了第三次反“围剿”斗争。中共皖西道委为配合红军进行苏家埠战役做了大量工作。当苏家埠战役开始时，道委下达了《为红军东下告群众书》，号召工农群众配合红军行动，打倒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和国民党军阀。王平章召集道委会议，研究拥红、支前工作，动员各级机关组织担架队、运输队、慰问队，给红军作好后勤工作；同时献出了大批粮食、猪肉、鸡蛋等物资。特委还组织 2000 多名赤卫队员配合红军作战。苏家埠战役结束后，王平章调任红二十五军政委。

由于部队迅速扩编，抓紧建立和健全各级政工机构，配备政工干部乃当务之急。军、师设政治部，内设政务、民运、宣传三科；团设政治处，配有宣传员。另外，军部还设有教导团和培养红小鬼的学兵连，连队设有战士委员会。王平章反复强调各级干部要注意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民众动员工作，瓦解敌军工作；要求中共党员每天向党小组长汇报本人及连队的思

^① 丁选武的谈话记录。

想动态^①。

1932年7月，蒋介石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由于张国焘在军事上的错误指挥，使红军由主动进攻逐步转入被动挨打。7月上旬，红二十五军军长邝继勋率教导团等部1000多人守卫霍丘城。7月，国民党军徐庭瑶等部3万余人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霍丘城进攻。10日，王平章率部解围在俞林店受阻。12日，霍丘城失陷，邝继勋被撤职，由蔡熙申接任军长。蔡、王率红七十四、红七十五师与敌激战于霍丘与叶家集之间。8月上旬，王平章率1个团从孙家冈撤至叶家集。在这两地之间的7.5公里长的大路上，到处都是红军、游击队、赤卫军和被迫离开家园的群众。连天大降暴雨，人们淋得像落汤鸡一样，又饿又累，人困马乏，到处是一派混乱。王平章刚到叶家集，侦察员就来报告，说敌人将以数倍于我之兵力抢占叶家集。形势紧迫，王平章决定连夜转移。但一些游击队员、赤卫军战士和老百姓由于疲惫不堪，不愿再挪脚了。王平章立即召开部队团长、政委和固始、六安等县的独立团或游击大队负责人联席会议，指出“叶家集西边是史河，西南边柳树店是一条小河，叶家集夹在两条河之间，现在敌人已从东南面、东面、北面三路包抄过来，天亮以前如不撤出，我们就会全部做俘虏，就会重演霍丘城的悲剧。”他宣布：“所有部队和转移的群众须于今晚10点以前撤到柳树店小河以西的开顺街。部队12点钟以后不行动的以军法论处。”会后，部队和逃难的群众遵照政委指示，向柳树店进发。人们来到小河边，砍倒大柳树，横在约四五米宽的小河上，迅速抢过小河。王平章在叶家集逐户进行检查。10点整，

^①黄群的谈话记录。

部队和群众已撤退完毕。王平章满意地离开叶家集。第二天拂晓，国民党军分三路向叶家集发动猛攻，等待他们的却是一座空无一人的集镇^①。

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张国焘由盲目轻敌一变为惊慌失措，产生了放弃鄂豫皖苏区的念头。9月中旬，张国焘在燕子河召开会议，提出“南下袭取英山，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意见，后又提出“出潜（山）太（湖）打游击”的主张。沈泽民、王平章等察觉到张国焘抛弃鄂豫皖苏区的意图，对此表示反对，积极主张应以“巩固苏区根据地为原则”，迅速“回到黄麻”地区。讨论的结果，决定放弃出潜太的计划，主力红军先取英山，再向黄麻地区转移^②。

1932年10月10日，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在黄柴畈召开会议，决定红军赴京汉路以西活动，并讨论了留根据地坚持斗争的兵力问题。陈昌浩提出只留红七十五师；王平章则主张留下红七十四、七十五两个师。会议最后根据王平章的意见作出了决定，留下的部队由沈泽民、王平章、吴焕先等率领坚持斗争^③。

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后，国民党军以15个师的兵力对鄂豫皖苏区反复进行“清剿”，到处烧毁房屋，蹂躏妇女，屠杀群众，抢掠财物，人民群众遭受巨大摧残，苏区大部丧失。留在根据地的红军被零碎分割，数量大大减少，形势极为严峻。

为了统一领导，集中力量扭转根据地的混乱局面，中共鄂豫皖省委于11月底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重建红二十五军，吴焕先任军长，王平章任政治委员。部队活动于鄂东北地区。12月

①李继坤的谈话记录。

②《鄂豫皖苏区省委的报告》（1933年1月5日）。

③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7月版。

30日，省委召集紧急会议，决定成立红二十八军，以恢复皖西苏区。会后，沈泽民、王平章、吴焕先、徐宝珊等8人联名向中共中央报告鄂豫皖苏区红军战况、党政工作、肃反情形及对红四方面军军事行动的不同意见。报告中系统地揭露了张国焘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的错误指导方针和错误言行，并指出“他从南昌暴动到现在是一贯倾向”。

报告还批评了张国焘的家长式的专断作风：“在党内领导方式方面，他不采取集体领导的方式，不发动自我批评，不在适当范围之内发展党内民主。”在张国焘统治下，普遍存在“处罚主义，使多数干部都不安于工作，新提拔分子不愿负责，群众中积极分子不愿入党”，“此实国焘同志家长制度领导方式的残余”，“由此而打击群众的积极性不能充分发挥”。由于历史的局限，这个报告没有认识到张国焘大搞“肃反”的严重错误^①。

1933年1月上旬，红二十八军在麻城大畈组成，廖荣坤任军长，王平章任政治委员，全军约3000人。时皖西敌情极为严重，国民党军以10个团的兵力为“进剿”部队，以22个团为“驻剿”部队，另有2个师1个旅在六安等地策应，蒋介石限令在1月底以前“剿灭”红军。而红军战士处于饥寒交迫的境地，隆冬季节还没穿上棉衣，睡觉没有棉被，只能滚稻草，伤病员多，粮食医药奇缺。王平章在此危难之时，表现出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他在动员大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说：“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军队，艰苦奋斗是我们的光荣传统，宋朝士大夫范仲淹说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封建士大夫尚且如此，我们革命者更应该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只有今

^①《鄂豫皖苏区省委的报告》（1933年1月5日）。

天的艰苦奋斗，流血牺牲，才会有明天的胜利。”他在实践中体会到，越是在艰难困苦の場合，越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他反复教育干部：红军行军打仗，瓦解敌军，宣传组织群众都离不开政治工作。他要求政工干部平时和战士打成一片，战斗前向指战员们做动员工作，战斗中和战士们一起冲锋。

王平章正是这种政工干部的榜样。

行军中，他一边走一边和战士谈心，总是给人以思想上的启迪，使人受到教育和鼓舞。他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讲南昌起义的故事，以此使大家认识到南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几年后全国建立了10多块根据地。眼下，四次反“围剿”虽然失败了，但只要百折不挠，坚持斗争，一定能创造出新局面。行军路上，他的马经常给伤员骑，自己步行，有时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还帮战士背背包、米袋。每次宿营，他都要先去看望伤病员，对送往后方的伤病员，总是再三叮嘱给他们多带粮食、食盐、药品等。他要求各级党组织在火线上考察党员，在战斗空隙发展党员。

1933年1月中旬，廖荣坤、王平章率部从鄂东北向皖西北挺进。一路上遭到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战斗十分频繁。在四道河、胭脂坳、白沙河、叶家集、开顺街、小南京等地给敌人以沉重打击。2月5日，红军与敌二二四旅在双山河遭遇。红军当即从北坡发起攻击，占领敌军控制的山头。但敌人不甘心失败，增加兵力又从南山坡反扑上来。红军向山后撤退，但后山地势较高，红军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情况十分危急。王平章沉着冷静指挥战士转身冲入敌阵地，与敌展开激战，终于重新夺回了阵地，消灭敌人数百名^①。一系列的胜利，极大地

^①余正旺：《战斗在大别山的日子》，《丰碑》第1期。

鼓舞了皖西北军民的斗争士气，部队得到了锻炼，枪枝、弹药、粮食、人员均得到较大的补充。

红二十八军的军事行动，震惊了国民党皖西“剿共”总部。敌二十五军两个旅和安徽省3个保安团共1万多人向皖西苏区进攻。3月26日，红二十八军转移到赤城南溪门坎山一带构筑阵地，严阵以待。3月28日，廖荣坤、王平章率军部特务营、交通队进入银山畈阵地。上午，敌人以两个团的兵力发起两次进攻，均被红军击退。午后，敌人又发起进攻，投入1个旅、2个保安团的兵力，向红军阵地扑来，满山遍野黑压压的一大片，飞机还在上空轰炸扫射。当敌人爬到红军阵地前沿时，王平章带领交通队、特务营冲入敌群。敌人乱作一团，慌忙夺路而逃。红军取得了反击战的胜利。但不幸的是，王平章被敌人子弹击中喉部，倒在血泊中。他吃力地叮嘱同志们：“不要动摇，坚决反击敌人！”战士们把他抬下火线进行抢救，终因失血过多，王平章的心脏停止了跳动^①。

噩耗传来，中共鄂豫皖省委领导人不胜悲痛。他们沉痛地向中共中央报告：“二十八军政委王平章在火线上牺牲了……皖西北工作失一柱石。”^②。

作者附记：

一、本文参考资料除已注明出处者外，还有：

1. 湖北省档案馆，湖北省博物馆，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战史编委会，武汉军区《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条目组编辑室，中共六安、信阳地委，

^①李长如：《卓越的红军政治工作者》，1984年7月29日《人民日报》。

^②《鄂豫皖省委报告》（1933年4月）

孝感、应山、武汉、黄冈、麻城、红安、新县、光山、潢川、商城、金寨、霍山、六安、霍丘县（市）委党史办公室；新洲县地方志办公室；六安地区，麻城、红安、金寨县（市）博物馆；新县文馆会；六安行署公安处《公安志》办公室等单位提供的有关材料。

2. 袁溥之、王文焕、魏玉泉、童世光、曹冰清、王远芳的谈话记录或回忆材料；彭正浩自传。
3. 周进、王志怀、鲍劲夫、宋承海、罗高松、汪沧、顾旭、陈忠民、周永年、张义洲、张伯实等提供的有关材料。

二、《王平章》传稿的编写工作，是在中共孝感地委党史办公室、汉川县委党史办公室的领导下，根据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布置的任务进行的。从1984年开始征集编写，按照丛书编委会几次审稿意见，经过反复调查考证，已4易其稿。编写组由萧正楚、陶鸿斌主持，**傅烈贵**执笔。参加资料搜集和文稿修订工作的还有胡金汉、**何唐丹**、胡必高、涂同时、吴金香、郭金荣、孙晓波、匡正民、夏正民等。

李 赐 凡

李 安 牛

李赐凡，曾任红四军十师政委、师长，江西省军区司令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他奉命留在江西坚持游击战，1935年1月壮烈牺牲。

（一）

李赐凡，原名李嗣蕃，号汉亲，曾用名李锡凡、李树凡，1908年2月2日生于湖南省宜章县鸬鸕坪村。家中世代务农，父亲李富祥常给人打短工，长期患肺病；母亲则双目失明。李赐凡在堂亲的资助下，8岁上了本村小学，1923年秋进入宜章县立阁邑高小就读，两年后，高小改为县立初中。在这里，他受到了学校教员、共产党员李文香、颜秉仁和高静山等人的影响，读了不少进步书刊，思想和学识与时俱进，成了进步组织宜章青年励进会的骨干，后来又担任县城学生联合会的主席^①。

1926年5月，李赐凡经高静山介绍加入国民党，接着，他

^①欧阳毅将军回忆文章和谈话记录（1986年6月）。

也介绍欧阳毅等十几个进步学生加入国民党^①。他领导宜章县学联，组织学生开展了捣毁福音堂、查禁焚烧日货、慰问北伐军队等一系列活动。他还回到家乡组织农会，推进国民革命。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李赐凡回到家乡鹧鸪坪村当了小学教员。这时，中共湘南特委派胡世俭担任中共宜章县委书记；县委秘密转设在离鹧鸪坪村 5 公里路的碣承启学校。碣石村原在衡阳读书的彭晒、彭睽、彭儒等十几名青年，也因白色恐怖而转回家乡活动。县委在这里成立了中共碣石特别支部。1927 年 10 月，李赐凡即由碣石特支简载文、彭晒发展为中共党员^②。从此，他以教书为掩护，积极开展农运工作，秘密恢复和发展农会，并在学校教员和周围农村中发展了十几名党员。后来，在鹧鸪坪一带建立了党支部，李赐凡担任支部书记^③。

1927 年 11 月，朱德、陈毅领导的原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到达湖南南部，与中共湘南特委一起发动农民，开展革命活动。1928 年 1 月 12 日，朱德率部智取宜章。李赐凡和碣石特支的彭晒赶到宜章县城，听取朱德和县委的指示。1 月 19 日，彭晒等人胜利地举行了碣石暴动。李赐凡和农民党员李玉岗带领鹧鸪坪 130 多位农民参加了暴动。1 月 20 日，他们返回本村，镇压了大豪绅李天保，喊出了“暴动，暴动”的响亮口号，竖起了武装起义的大旗。只几天功夫，武装起义的烽火便燃遍了宜章县各地。李赐凡曾在仁里村一栋屋壁上写下两条醒目的标语：“杀尽土豪劣绅，枪决反动派”、“杀尽地主，实行土地革命”。这

①《中国国民党宜章县第二区党部党员表》，原件存宜章县公安局。

②《中共宜章县委落实地下党办公室调查表》（1981 年）及县民政局档案资料。

③访问老红军战士彭振雁记录（1985 年 9 月）。

两条标语经历 60 年风雨，至今仍可辨认出来。

与碣石村相邻的山上李家，是座大村。村中的豪绅利用农民的封建宗法思想，煽动本村农民结队前往围攻革命堡垒碣石彭家。他们还派人到鹧鸪坪等村游说，企图把李姓农民都拉去为其壮威。眼看着革命力量面临被传统的封建宗法势力绞杀的危险，李赐凡挺身而出，义正辞严地斥责游说者的卑劣行径，并教育受蒙蔽来围困碣石的山上李家群众说：“天下农民是一家，农民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团结起来，把矛头对准共同的阶级敌人，才能取得自己的解放。”豪绅们的阴谋终于破产。李赐凡率领鹧鸪坪农民勇敢冲破封建宗族界限、坚持革命的举动，曾一度在宜章县传为佳话。

为了保卫胜利果实，打击反动派的疯狂反扑，中共宜章县委于 2 月间决定把黄沙、白沙两区的农民赤卫队武装统一起来，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三师独立营。李赐凡参加了独立营的领导工作。独立营在李赐凡和彭晒、萧克、龚楷等人带领下，转战各地，随三师参加了攻占黄沙堡城、攻打桂阳县城等战斗，成为湘南起义中一支颇能打仗的农军队伍。

1928 年 4 月初，湘粤之敌南北夹击宜章，正在西南偏远山区活动的独立营与上级失去了联系。不久，县委派曾日三送来指示：革命军主力已转移，独立营立即东进。李赐凡即与萧克等人带领队伍，经梅田、麻田翻上了骑田岭主峰黄岑岭；再经折岭、五盖山，于 4 月中旬在资兴县与毛泽东带的队伍会合。

（二）

1928 年 5 月井冈山会师后，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6

月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原宜章农军被编为四军第二十九团。李赐凡担任二十九团教导队(又称学生队)党代表^①,教导队队长先后是萧克、刘敬。教导队的学员都是些连、排干部,边带兵,边学习。部队几乎天天行军、打仗,李赐凡从战斗实践中指导学员带兵打仗,在战斗间隙组织训练,努力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

不久,李赐凡担任二十九团少共团委书记^②,并负责少共的宣传工作。他组织了一支宣传员队伍,要求他们学会“三打”(枪打、笔打、口打),开展战场鼓动,瓦解敌军,慰问伤员和活跃部队等活动,紧密配合作战。6月下旬,国民党军向七溪岭进攻前曾叫嚣:“共产党已进鬼门关,消灭红军过端阳。”李赐凡则带领宣传队员用纸糊的喇叭筒向国民党士兵展开政治攻势,高喊:“我们都是穷兄弟,不要自己打自己”。最后,红军在龙源口取得大捷,并乘胜追击,攻占永新,打垮了江西杨池生、杨如轩部的进攻,保卫了井冈山根据地。李赐凡将战果编成宣传材料,带领宣传队员唱道:“哎哟哎哟,杨池生临阵脱逃,杨如轩带花先跑。”

井冈山上,战斗天天不断,生活十分艰苦。战士们常常吃不上盐;大都每人一套衣服,有时洗了,也是顶在头上边行军边晒。李赐凡常在行军中与大家唱着“红米饭,南瓜汤”、“天作房,地当床”等红军歌谣激励红军战士。他还对住在大小五井的战士们说:“我们现在是住了大小五省呢!”部队走到哪里,

^①欧阳毅:《我对井冈山斗争的回忆》;陈光:《我的自传》(1944年写)。

^②访问欧阳毅记录(1986年6月20日);访问李佐国记录(1984年11月28日)。

他们便把标语刷到那里，宣传工作做得十分出色，为红军早期的政治工作积累了经验。

1928年7月中旬，中共湖南省委代表执行“左”倾盲动主义方针，趁毛泽东不在部队之机，强拉二十八、二十九两个团离开根据地，冒进湘南。李赐凡与张际春、高静山、胡世俭等二十九团政治工作干部都表示反对^①。7月24日，部队虽然攻克了郴州城，但立即遭到敌范石生和许克祥部的疯狂反扑。红军在撤退郴州时，二十九团被冲散，许多人私自往家乡宜章方向跑。李赐凡苦口婆心地劝住了一些人，跟团长胡少海一起返回了井冈山。他编入二十八团党部工作，不久，提任了一营一连党代表^②。

1929年1月，红四军离开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沿途都有国民党军追堵，加之天气奇寒，红军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于2月8日攻克瑞金。此时，敌刘士毅部尾追上来。为了打掉这个尾巴，军部决定在距城30公里的大柏地设伏。按照朱德军长的部署，胡少海率领二十八团一营执行诱敌深入伏击圈的任务。李赐凡与连长李云奉命领着一部分人，挑些担子摆在大道上诱敌。敌人来了，他们顶一阵就退；敌人停下来时，他们又回过头来打。就这样打打退退，折腾了大半夜，终于把敌人一步步引进了红军的伏击圈^③。接着，李赐凡带领一连迅速甩开敌人，绕到山背后往回疾走，很快插到国民党军背后，将其截成几段。红军乘势向敌猛烈开火，击溃了刘士毅部两个团，俘敌团长以下800多人。此后，红军转战宁都、东固、广昌等地。

①欧阳毅：《我对井冈山斗争的回忆》，《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

②访问萧克记录（1986年6月15日）。

③访问王长太记录（1980年5月）。

又转向闽西，扭转了被动局面。

3月14日，红军攻下闽西的长汀城，一营战士击毙了土著军阀郭凤鸣。这时，部队改团为纵队，营为支队，连为大队，李赐凡升任第一纵队第一支队党代表^①。随后，部队以一支队为尖兵，连克瑞金、于都、兴国、会昌，于4月29日攻打宁都。宁都城大墙高，顽敌赖世忠凭坚固守，红军攻了两昼夜未克。朱德重新调整部署，下令每个纵队准备20把木梯子，从南、北、西三个方向强攻。第三天入夜后，李赐凡带领一支队义勇连，在后卫部队火力掩护下，顶着铺上棉被的桌子，接近西城墙角下，竖起梯子。他率先登上城头，抡起大刀，向正处混乱状态的敌群奋勇砍杀^②，给后续部队砍开一条血路，为夺取宁都城建下奇功。

5月，红四军再次入闽，在攻打龙岩、全歼陈国辉部和进占上杭、消灭卢新铭一个团的胜利战斗中，一支队都打得很出色。当时，毛泽东常常随一纵队行动，每到宿营地，就留下支队、大队党代表，问队伍里发生了什么情况，有什么问题。李赐凡从毛泽东精辟分析敌情、形成明确的作战方案到灵活组织实施等等作战指挥艺术方面，得到很大教益，学会了如何指挥打仗。

1929年夏、秋之际，红四军第八次党代会后，毛泽东离开了部队，部队纪律一度松散。一次出操时，有个士兵向后转慢了一点，便挨了二大队大队长龙浦林两皮带。李赐凡见后批评了大队长，大队长却不以为然地说：马鞭下面出好兵嘛。他对这种管理军队的旧方法十分厌恶。10月，李赐凡领一支队到广东东江作战，先在松源打败国民党军一个营，与主力一起占领

^①访问萧克记录(1986年6月15日)。

^②访问吴树隆记录(1986年6月14日)，1959年调查材料。

了梅县。但由于部队此时思想面貌不佳，在随后的第二次攻打梅县等战斗中，骄傲轻敌，损失了不少精锐。李赐凡从战争胜、败对比中，进一步体会到学习毛泽东关于加强红军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意义。红四军从东江回到闽西时，毛泽东还住在永定牛牯扑深山里，一面养病，一面指导地方工作。李赐凡和王良常到这里汇报军情，转送书信报刊，沟通毛泽东与部队的联系^①。后来，陈毅从上海带回了中央军委指示信，请毛泽东回到部队，为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作准备，李赐凡即率部到新泉参加整训^②。毛泽东在望云草室多次召集各级党代表座谈会，听取大家的意见。李赐凡在会上详细地汇报了一支队的政治工作情况，畅谈了他自上井冈山以来做部队政治工作的体会，分析了部分指战员中存在有军阀主义、单纯军事观点和涣散作风等问题。他特地以龙浦林鞭打士兵为例发表意见说：“随便处罚人，说什么‘三句好话不如一个巴掌’，甚至枪毙逃兵，老兵也欺侮新兵，都造成官兵对立，损害内部团结，削弱部队战斗力，这怎能行呢！红军要生存，就要靠政治工作，要以政治工作来保证部队的行动符合党的要求”^③。他的发言受到毛泽东的赞许。以后，他又自始至终参加了古田会议^④，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建设做出了贡献。

古田会议之后，李赐凡和王良率部北上宁化、东韶，在行军、作战的间隙，组织各大队传达学习会议决议，检查部队中

①中共龙岩地委党史办公室：《闽西革命根据地史话》。

②《福建革命史画集·新泉整训部队》，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

③访问吴树隆记录（1986年6月14日）。

④访问萧克、吴树隆记录（1986年6月）。

存在的各种不良习气，整顿纪律，加强政治工作，收到明显效果。部队以全新的战斗姿态，绕到国民党军背后的江西乐安、宜黄等地开展游击战争，击溃了金汉鼎部的进攻，并组织干部战士大力开展群众工作，帮助地方建党建政。1930年3月初，在歼敌唐云山旅的水南战斗中，李赐凡与一大队大队长陈光率部占住右翼的一个山包，咬住敌人连续激战一整天，为部队赢得了战机^①。第二天，红军四面围追，唐云山精锐旅被消灭2/3，余部落荒逃入吉水以北。战后，陈光升任副支队长。一支队在李赐凡和王良率领下，随主力参加围困赣州，数日不克。部队转而开向南部，连克寻邬、南康、大庾、南雄、信丰等县。在创建赣、闽、粤一大块巩固的红色区域的斗争中，李赐凡和一支队立下了汗马功劳。

（三）

1930年6月，红一军团成立，李赐凡升任红四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②。8月，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会合组成红一方而军。红军撤围长沙后，毛泽东、朱德发布了《进攻吉安的命令》。10月3日晚，红军开始攻城。李赐凡与一纵队随四军从左翼的螺子山出击，首先攻下真君山的敌人阵地，接着，一纵队的一部从西面攻进城里，因后卫部队未接上，又被敌人反击出来。战斗持续到第二天傍晚。军团在真君山前沿阵地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当夜解决敌人，打进城去。午夜，总部一声枪响后，埋伏在

^①访问王长太记录（1985年9月6日）。

^②访问萧克记录（1986年6月15日）。

四周山上的红军和赤卫队员跃起冲锋。王良和李赐凡率一纵队担任攻城的第一梯队，在兄弟部队配合下，像猛虎般地扑向城边，用竹竿和梯子隔断敌人的电网，用稻草填满密布着竹钉的壕沟，奋勇向城内杀去。守城的邓英部惊乱异常，四处逃窜，除少数人乘船从赣江北逃外，大部分被歼。

夺取吉安后，红军又一次进行整编，四军第一纵队改为第十师，由王良任师长，22岁的李赐凡任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①。

部队在永丰、宜黄一带整训中，各军开展了肃反、清查“AB团”的斗争，有的单位刮起了一阵无端怀疑、刑讯逼供和乱捕乱杀之风。起先是军保卫局通知十师，说师宣传队有几个人是“AB团”分子。师部即逮捕他们审问，都不承认，用刑后都承认了，还供出十几个人；再抓再审，牵连出30多人，其中有几个还是湘南起义中随李赐凡一起出来的。如原井冈山前委委员毛科文的侄子、看护排长毛茂春被抓后即杀了^②；有个14岁的王东保，刚从十师调到军部作勤务员，也被人供出抓了。李赐凡同师长商量说：这些同志大多是在敌人枪眼下幸存下来的党员，他们怎么能是反革命呢！王良也同意不再杀人。于是，李赐凡立即骑马与王长太到军部向罗荣桓政委和负责肃反工作的军政治部主任彭祐汇报，他们同意把抓起来的人放出来^③。这样，一批忠诚的干部战士得以保护下来，其中如王东保等人后来成为人民军队的高级将领。

1930年冬，蒋介石调集10万兵力，分八个纵队，采取“并进长追”、“分进合击”的战法，从江西吉安至福建建宁一线分

① 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萧克回忆。

② 吴树隆对中共井冈山、宜章县委党史办公室同志的几次谈话记录。

③ 访问王长太记录（1985年9月6日）；吴树隆几次谈话回忆记录。

数路由北向南，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反革命“围剿”。红军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采取“诱敌深入”方针，以少数兵力与敌保持交战接触，引诱迷惑敌人，使敌人连连扑空；而主力红军则向赣江以东作战略转移，最后秘密在黄陂、小布地区集结待命。十师中有的干部和战士初时对这样的作战方针不理解，纷纷来师部请战，要求痛快地与敌人战个你死我活。李赐凡笑呵呵地对着大家解释说：“同志哥，你莫急嘛，你们在家里看过牛吗？你把牛鼻子牵住了，再野的劣牯牛也跑不掉的。敌人的鼻子现在也被我们牵住了，让他们到山沟里规规矩矩转去，到了它昏头转向、懒得再转时，嘿！看我们的朱总司令、毛总政委是怎样来收拾这些龟儿们的吧。”^①经李赐凡一说，指战员中的情绪也就安定下来了。

12月29日，国民党军第九路军前敌指挥官张辉瓒率十八师进入永丰县龙岗，占领黄竹岭，并准备进犯距龙岗15公里的君埠。张辉瓒扬言“要剃朱、毛的头”，彻底消灭红军，骄狂不可一世。红军决定乘机在龙岗至君埠的隘途里埋伏下大军，以歼灭张辉瓒师于运动战之中。当夜，朱云卿总参谋长向李赐凡和王良传送了总部命令^②。

第二天拂晓，龙岗被濛濛的雨雾笼罩着，群山寒气袭人。朱德、毛泽东等总部首长亲临小别山指挥。担负正面攻击的红三军首先打响了战斗，李赐凡与王良率领十师作为第二梯队从东北方向赶来，在上固未发现敌人，便迅速向南越过十二军阵地，从龙岗北面的高山上直冲而下，攻击张家车的敌人。开始，一连三

^①访问王长太记录。

^②中共永丰县委党史办公室：《龙岗战斗》，未刊。

次冲锋都未能奏效，有的队伍渐渐不支，战况吃紧。这时，李赐凡与王良跑到队伍前面，用驳壳枪一挥，高喊“冲啊，冲上去就是胜利！”^① 部队顿生虎气，战士们高叫着“打到龙岗去，活捉张辉瓒过年！”一举攻下了张家车。十师紧接着又抢占了龙岗西北面的高地，与友邻部队一起以优势兵力将敌人的师部和两个旅切割包围，形成了对外阻敌增援、对内防敌突围的有利态势。敌军顿时大乱。当张辉瓒派出一个团要去为戴岳旅解围时，还没来得及辨明方向，就被十师及邻近部队一举歼灭。下午3时，朱德发出全面攻击信号，几百支冲锋号一齐吹响，红军从四面八方涌向龙岗镇，国民党军9000人马都成了瓮中之鳖，大部被俘。

战斗结束后，十师负责打扫战场。清查俘虏时，唯独不见敌师长。李赐凡与王良立即组织搜山，在万功山一棵大枫树旁，师部管理科科长陈茂发现了张辉瓒的狐皮大衣，后来终于在一个山洞里把两手抱着脑袋缩成一团的张辉瓒拖了出来^②。顿时，战地群山一片呼唤：“张辉瓒被捉住了，张辉瓒被捉住了！”李赐凡轻蔑地斥问张辉瓒说：“到底是你剃朱、毛的头，还是朱、毛剃你的头？”张辉瓒全身哆嗦，叩头求饶说：“是朱、毛剃我的头。”^③ 路旁的俘虏兵和群众围上来，争着要殴打张辉瓒。李赐凡劝住大家，叫战士把张辉瓒押往红军总部。

龙岗大捷后第三天，十师又与红十二军一起，乘胜追至东韶，再歼敌谭道源半个师。紧接着，王良、李赐凡率十师和萧克、张赤男的十二师又一鼓作气，连克广昌、南丰^④。蒋介石发

①访问吴树隆记录(1986年6月14日)。

②陈茂：《活捉张辉瓒》；刘忠：《从闽西到京西》。

③访问王长太记录(1985年9月)；陈茂：《活捉张辉瓒》。

④《关山阵阵苍》(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

动的第一次“围剿”被彻底粉碎。战后，李赐凡与有关同志一道编了一首歌谣^①：

一九三〇年，红军摆战场，
国民党军队，被围在龙岗。
三军正面打，四军抄后面，
听到三军枪响了，四军冲上去缴枪。
先缴迫击炮，后缴机关枪，
长枪短枪都缴了，又活捉了个张师长。

蒋介石接二连三纠集重兵向革命根据地“围剿”，李赐凡和王良率十师多次受命与敌人正面决战，打了不少硬仗。尤其是在第三次反“围剿”的兴国高兴圩、老营盘血战中，李赐凡亲自带领十师敢死队冲锋，与敌人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互相争夺，战况空前惨烈。当敌五十二师在红军打击下向吉安撤退时，在方石岭地方又遭红军阻击，终被全歼。该师长韩德勤本已被我俘获，由于大家不认识他，被他佯称伙夫获释逃脱了。后来，李赐凡与军部的梁必业等人为此编了一个小剧演出，生动地刻画出韩德勤的丑态。李赐凡还在剧中饰演一名诙谐有趣的老表^②。

（四）

1931年11月，王良调任十一师师长，由陈光继任十师师

①歌词是1985年9月6日访问王长太时，由其回忆、吟唱所整理的。

②访问梁必业记录（1986年6月24日）。

长，李赐凡仍任十师政委。他们遵照毛泽东的部署，在地方赤卫队的配合下，在石城县屏山、珠坑、横江一带围困被地主土匪盘踞的山寨土楼，先后攻下多处土围子^①。

这时，驻守宁都城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正准备起义。中革军委决定派红四军迅速前往宁都城外的会同地方“相机予以协助”^②。12月13日午前，李赐凡和陈光率全师攻占会同^③。第二天，李赐凡和陈光又亲率一个连接近宁都城附近侦察情况，了解城内动静，及时向军部和中革军委提供军情^④。12月14日宁都起义成功，季振同、越博生、董振堂率二十六路军27000人参加红军，组成了红五军团。

1932年1月，红军围攻赣州，攻打了一个月未克。李赐凡率十师先作监视部队，后与十一师攻打赣州南边的新城^⑤，消灭广东军阀余汉谋一个独立旅，占领了新城。红军撤围赣州后，以四军作主力组成东路军再进闽西。随军行动的毛泽东根据漳州守敌虚弱的情况，决定攻克龙岩后向闽南进军，直下漳州。4月16日下午，红军进抵离漳州城15公里的天宝大山下，李赐凡和陈光领十师迅速占领天宝大山下东部的各攻击位置，与山上守敌严阵对峙。

天宝大山是闽南有名的大山岭之一，也是漳州城外的天然屏障。漳州守敌是蒋介石嫡系第四十九师张贞部。张贞得知红军进逼漳州的消息，一面飞电福州告急，一面将主力分左右两

①见《关山阵阵苍》（中册）。

②《中央革命根据地史要》，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268页。

③④《陈光、赐凡的一封信》（1931年12月13日），《中共党史资料》1985年第11辑。

⑤杨成武谈红军攻打漳州，《党史资料通讯》1982年合订本第34页。

翼布防在天宝大山，企图凭险顽抗。红军决定集中优势兵力，采取正面主攻和侧面狙击配合，依次消灭敌人。19日拂晓，一声攻击令后，十师首先配合十一师攻下了杨梅岭、风霜岭的敌阵；随后，十师直攻大尖山守敌^①。李赐凡领着一支队伍冲向九龙江支流的永丰溪。但溪上的宝明桥正处于敌人火力的封锁之下，部队难于从正面过桥。他果断指挥战士们撤到下游窄谷处，涉水过河后，立即组织对山上敌人仰攻^②。经过激战，他们占领了大尖山东侧的敌阵。这时，军参谋长聂鹤亭也来到十师阵地，与李赐凡一起指挥战士们在大尖山到天宝镇一线与踞险顽抗的敌人格杀，拿下了天宝阵地，敌主力王祖清旅被消灭得干干净净，防守在笔架山、榕子岭的敌杨逢年旅被迫撤退。接着，李赐凡不顾胳膊已受枪伤，与陈光会合后，共同指挥部队，一鼓作气地从高耸的天宝山冲将下来，横扫残敌^③。敌师长张贞闻风丧胆，慌忙带领余部弃城逃窜。20日清晨，李赐凡率部浩浩荡荡地开进漳州城。

十师与红四军军部都驻在与厦门隔海相望的石码。李赐凡起初在漳州城里的医院中治伤，结识了护士邱姗姗，以后与这位闽南姑娘结成伉俪。^④在漳州期间，他时常到驻在石码、海澄等地的部队布置工作，检查部队执行政策情况，并派人协助当地成立秘密工会和地下党组织。一次，他指着泊在远处海面上的外国军舰说：总有一天，我们要把外国兵从我国领海、领土上全部赶出去^⑤。

①《聂荣臻回忆录》（上册）。

②③访问梁必业记录（1986年6月24日）。

④据邱姗姗自述，1935年3月22日《江西民国日报》。

⑤访问梁必业记录。

不久，国民党政府拼凑 63 万兵力，准备对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东路军奉命回师赣南，经过长汀县大禾地区时，李赐凡随四军军长王良去察看一个地主土围子；突然敌人射来冷枪，王良不幸牺牲。李赐凡与全师官兵极为悲愤，发誓为老师长讨还血债^①。7 月 9 日，红军集结在广东省南雄的水口地区，同 20 个团的粤军展开剧烈的拉锯式争夺战。十师于 10 日拂晓开到战场，会合五军团在主阵地上打得非常英勇。李赐凡在阵地前沿不断变换指挥位置，并从牺牲的战士手里抱过机枪，向敌人狠狠扫射，他的眼皮也被敌人弹片擦伤。许多战士手持大刀与敌人肉搏，战场杀声震天，景象极为惨烈。此后，部队在乐安、宜黄战役，闽北的黎川、建宁、资溪、金溪等一系列重要战斗中，十师都担负着主攻的任务^②。

李赐凡作为政治委员，“不仅政治工作出色，军事指挥上也很出色”^③。萧克说李赐凡是个“思想开朗、有文化的英勇善战的好政委。”^④有的战士作战勇敢，常常同敌人死打硬拼，他每次战前作动员时便向战士们说：“我们不是为死亡而战，是为求生、为人民解放而战”，教育大家要动脑筋，多长几个心眼，多打好仗，打胜仗。正因为他和王良、陈光几位师首长都能在枪林弹雨中身先士卒，思想上以身作则，对部队建设认真负责，带出了一批批优秀干部，因而第十师在历次反“围剿”中敢打大仗、恶仗和胜仗，愈战愈强，威震苏区，是战斗力最强的中央红军主力师之一。

1932 年底，红军在闽西的黎川再次整编，四军缩编为十、十

① 吴树隆对井冈山博物馆同志的谈话记录（1979 年 10 月 13 日）。

②④ 访问梁必业记录（1986 年 6 月 24 日）。

③ 访问梁必业记录（1986 年 6 月 24 日）。

一两个师，直属一军团指挥^①。李赐凡由十师政委改为师长^②，陈光调任十一师师长。1933年1月1日，数万红军从黎川誓师北进，秘密向金溪开进。1月4日，部队进至黄狮渡时，遇上国民党军第五师周士达旅。十师首当其冲，即同其他部队一起，一举攻下黄狮渡，全歼该旅，俘旅长以下1000多人。第二天，李赐凡到后龚村红军总部参加会议时，朱德赞扬李赐凡指挥十师在黄狮渡速战速决，取得了大胜^③。

1月8日，红军以十师、十一师为主力，继续由金溪沿公路西进，迎战从浒湾来犯之国民党军十四师、二十七师、九十师。在枫山铺即与敌吴奇伟、孙连仲师各一个旅共六个团的敌人遭遇，遂在公路两侧展开激战。敌二十七师一部抢先占领了公路北侧新岭前方高地，踞高临下，掩护其大部向红军攻击，把红军压在公路两侧。红军分头迎击，愈战愈勇。总政委周恩来这时也来到硝烟弥漫的十师前沿阵地，高举手臂号召：“同志们，为苏维埃奋斗到底就在今天！”^④。红军战士在周恩来号召激励下，更加英勇杀敌。李赐凡坚定地指挥部队向敌人冲锋，邻近的三军团也发起猛冲，红军攻占了新岭前方高地。接着，李赐凡受命领着十师的一部在山头上正面阻击敌人。此时，敌人调来飞机轰炸，红军伤亡增多，形势对红军很不利。敌人步步向十师阵地压过来。李赐凡果断地把师部的谍报班、警卫班、通讯排等凡能战斗的勤务人员都组织起来，投入战斗^⑤。他马刀一

①据《聂荣臻回忆录》。

②梁必业给中共宜章县委党史办公室的信（1985年10月28日）。

③④⑤乐安县博物馆：《第四次反“围剿”的前前后后》，1983年、1985年整理，未刊。

挥，高声呼喊说：“同志们跟我来”，便带头向压过来的敌人猛扑过去。战场地域不大，枪炮声震耳欲聋，战斗异常激烈。这时，敌人一颗炮弹在李赐凡身边爆炸，他的双脚被炸成重伤^①。师部的看护排排长吴树隆急忙要背他下去，他一把推开吴排长，坐在血泊中咬住牙根向战士们喊道：“同志们顶住！只要有一个人，有一口气，有一滴血，就要保住阵地！”^②正在这危急时刻，军团长林彪、军团政委聂荣臻等及时赶到，在前沿阵地上直接指挥战斗，士气顿时大振，稳住了阵势，最后打垮了敌人^③。

浒湾战斗胜利结束后，李赐凡被转入广昌红军后方医院治疗。由于左腿骨已被炸碎，加之医疗条件有限，不得不锯掉了左腿，装上假肢，靠双拐行走。治疗期间，他还代理过一段医院政委^④。为了早日返回前线，他扔掉拐杖，苦练骑马。只有一只腿，在马上很难掌握平衡，他多次被摔下来，有时衣裤也被血肉粘住。来看望他的战友见了也禁不住流泪，可他却坦然地笑道：“锯掉只腿算什么！我们是革命军人，只能流血，不许流泪”^⑤。他的刚强意志和乐观性格，极大地感染了全体医护人员和红军伤病员。

（五）

1933年春，李赐凡被派往江西省军区任军事部部长和武装

①③《聂荣臻回忆录》（上册）；以及乐安县博物馆材料。

②访问吴树隆记录（1986年6月14日）。

④⑤访问王长太记录（1985年9月）。

力量动员部主任^①；6月间，继罗荣桓任军区政治部主任^②；以后又兼任省少先队党代表^③。

这时，中央苏维埃政府给江西下达了每月扩红8000至1万人的繁重任务。为了胜利完成扩红任务，李赐凡带领武装力量动员部工作人员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创造了兴国县赤卫军模范师4000多人全体加入红军的突出典型^④，继而推动了博生、胜利、赣县、公略、永丰等县。作为红军预备兵员的少先队模范团、工人师、模范师，在各地相继成立。仅在“红五月”突击扩红运动中，江西省就给红军输送了26529人^⑤。8月5日，少共国际师在江西军区驻地宁都成立，陈光首任师长，李赐凡为组建这支刚强的少共军队付出了巨大心血。李赐凡对扩大红军作出的重大贡献，受到中央苏维埃政府表扬。当时出版的《红色中华》、《红星报》以及《红色江西》等苏区报纸，都曾大力宣传兴国及江西省的扩红经验。

1933年8月，中革军委对革命战争有功人员颁发红星奖章。李赐凡获得了这一殊荣^⑥。9月，在江西省第二次党代会上，他被选为中共江西省委执委委员^⑦。12月，他在江西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作了扩大红军与地方武装问题的工作报告，并当选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⑧。1934年1月，他与李

①王健英给宜章县烈士传编纂办公室的信（1987年4月20日）。

②梁必业给中共宜章县委党史办公室的信（1985年10月28日）；宁都博物馆材料。

③《江西省少先队训令》（1934年4月2日），存瑞金文物纪念馆；谢德谋来信回忆。

④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要》第336、337页；《红色中华》等报。

⑥据老红军战士彭建才和李赐凡亲属的回忆。

⑦⑧《中共江西省组织史资料》；《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

富春、曾山等一起赴瑞金参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在大会上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①。由于他在扩红中的优异成绩，又一次受到中央政府表扬，并授予他银质奖章。大会结束后，他又参加了军委召开的中央政治工作会议^②。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以后，李赐凡在《红星报》、《红色江西》等刊物上相继发表文章，对战局发表意见。在《粉碎地方武装中的机会主义动摇》一文中，他以江西军区所属一些部队为例，尖锐批评有些同志在敌人“堡垒政策”面前先是轻敌硬碰，继而害怕逃跑、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动摇，提出“要坚定地方武装中的党的领导，保证我们队伍中思想上布尔什维克的一致”，克服悲观失望和动摇思想，大胆深入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勇敢配合主力红军打破敌人的“围剿”^③。纵观战争全局，他对地方武装和赤少队的作用寄予厚望，力求这两个组织在支援反“围剿”战争中能做出更大的贡献。他还提出要吸收广大劳动妇女加入赤少队的主张，作到每个赤卫队员要有一件武器、一根扁担，五个人共一副担架，随时准备动员参战^④。1934年4月2日，他又以省少先队党代表名义，与队长王昌豆发布训令，号召苏区青少年动员起来，每人都做军鞋，并替军属耕作，县与县、区与区开展竞赛，用实际行动支援前线红军的战斗^⑤。这期间，他除了领导好支前工作外，还不顾自己身上多处

①1934年2月3日《红色中华》。

②《张南生日记选》，《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4期。

③1933年11月12日《红星报》。

④《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第716页。

⑤《江西省少先队训令》（1934年4月2日），存瑞金文物纪念馆。

负伤，仍在前方奔忙。

1934年5月，中央决定成立赣南省和赣南军区，作为反“围剿”的最前线，李赐凡调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①。他拖着一个假肢，转战在赣江两岸，协助西方军总指挥陈毅指挥西线作战。陈毅在兴国县老营盘指挥战斗时腿部负重伤后，李赐凡便继陈毅担负起江西军区司令部的领导工作^②。

长期的戎马生活，使李赐凡磨练成刚强的意志。在转战中央苏区的几年里，他曾数次写信给家乡父老兄弟。有次，他寄上自己戴着红星奖章的照片给父亲，并在信中表示：赐凡现在远驰他乡，舍了小家，然为的是国家，走的是正道，志在为劳动阶级打出天下，改变富人当道贫者受欺之现状；待黑暗的统治溃灭之日，吾当回归故里，或从教、或务农，以报效乡土父老养育之恩；纵然不日僵卧沙场，吾于九泉之下当含笑耳^③！

（六）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前，李赐凡于9月间临危受命，留任江西省军区司令员^④。10月26日，他与曾山带领军区与省苏维埃政府人员撤出宁都七里洞和李园村，转至西甲村。他在这里召开了干部会议，研究部队的行动和策略问题。会议决定，首先要牵制敌人兵力，掩护红军主力转移，然后向东固山区集结，开

①《中共江西省组织史资料》；中共宁都县委党史办公室资料。

②访问吴允中（江西省政协副主席）记录（1987年2月21日）；王健英来信。

③访问李赐凡亲属及鹧鸪坪村老人记录（1985年9月7日）。

④《中共江西省组织史资料》；欧阳毅回忆陈毅谈话记录（1985年6月25日）。

展游击战争；根据斗争需要，撤销省军区和省苏维埃政府，联合成立江西省军政委员会，统一指挥游击战争^①。在李赐凡提议下，将宜黄、洛口、永丰、公略、兴国、万太等县地方武装改编为江西工农红军独立师第一、第二团，其他各县武装也统一改为挺进游击队。不久，中共公（略）兴（国）万（太）特委又组织了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四团。

会后，李赐凡与曾山即率独立师、军区安南团、省苏维埃政府保卫局机关人员以及部分游击队共4000余人转到竹坑、陈圻及麻田等地，牵制国民党军进攻，掩护红军主力转移；以后，又在金竹坑、小布、树陂、上潮等地开辟新游击区^②。他领着军区警卫连驻扎在小布的布头村，与原苏维埃政府干部应秋国、应益珍等人一起，到周围各村发动群众抗租抗粮反霸，并四处张贴标语，宣传白军士兵也是工农出身，号召他们不要打真正为工农谋利益的红军，要与红军共同抗日，挽救民族危亡。警卫连还利用各种办法和巧妙战术灵活打击敌人^③。

由于敌我悬殊太大，尽管李赐凡和曾山等人尽了最大努力，仍未摆脱被“围剿”的困难局面，斗争越来越艰苦。到年底，他们已被围困在宁都县的源头、石公坑和羊州坑一带很小的圈子里，形势险恶。李赐凡同曾山商量，决定分三路冲破敌人封锁，向兴国和东固山地区突围。李赐凡考虑自己行动不便，便把主要的部队独立师和安南团交由曾山率领，干部游击队由胡海和

① 吉安县纪念馆：《曾山在江西活动纪事》。

② 原洛口县游击大队大队长宁春庭谈李赐凡在突围中（1976年4月5日），存宁都烈士纪念馆。

③ 布头村江西军区旧址调查（1976年4月），宁都县烈士纪念馆馆藏材料。

洛口县游击大队大队长宁春庭带领，自己身边只留了原省军区的一个警卫连^①。在突围战斗中，李赐凡这支队伍与另外两路失去联系，未能向预定方向突围出去，不得已改向古龙岗，准备重返井冈山去坚持斗争。在极为严峻的形势下，他向战士们鼓气说：“做胜利时的英雄容易，做失败时的英雄不易。同志们要有勇气做失败时的英雄，革命的胜利总会到来的”^②。在古龙岗附近，部队再次与强敌遭遇，打了一仗，李赐凡的右脚也被打伤。他果断地命令连长和指导员带领队伍继续前进，自己和爱人邱姗姗及两名警卫员辗转回到了小布破下村。群众把他们隐藏在岩背垅山上一个崖洞里。

1935年1月25日，邱姗姗同一名警卫员下山与群众联系时，不慎被前来搜山的国民党军抓获。敌人得知她是红军司令员的妻子，便断定李赐凡也藏在山上，于是调来重兵，并逼着邱姗姗带路搜山^③。李赐凡眼看敌人迫近，又无退路，便同警卫员一齐开枪抵抗。打倒几个敌人后，警卫员牺牲了，他又再受重伤。进退无路，为不落入敌手，李赐凡毅然饮下了自己的最后一粒子弹^④，为人民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解放后，小布人民特为李赐凡等红军烈士建了纪念碑，并在他献身的岩背垅崖洞前树碑纪念^⑤。许多熟悉李赐凡的老同志每每谈及他时，对他的共同评价是：李赐凡英勇善战，文武兼备，既是卓越的军事指挥员，也是模范的政治工作者。李赐

①②宁都县博物馆调查老同志回忆材料；兴国县老红军谢帮全来信。

③1935年3月22日《江西民国日报》。

④访问兴国县老红军干部万香记录（1985年7月10日）；谢德谋等人回忆材料。

⑤“破下烈士纪念碑”、“李赐凡同志被害遗址”两块碑文。

凡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附 主要参考资料：

1. 《中共组织史资料汇编》、《中国工农红军史略》、《福建革命史画集》、《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中央革命根据地史要》、《回忆湘南暴动》、《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回忆中央苏区时期》等党史书籍，《红星报》、《红色中华》、《少先队江西省队部训令》及《江西民国日报》等历史报刊和文物史料。
2. 聂荣臻、陈光、欧阳毅、萧华、陈茂、简载文等人的回忆和有关文章；王健英、杨道明、罗孟文、周爱民、谢德谋、谢帮全等人给宜章县烈士上传编纂办公室的来信。
3. 访问萧克、梁必业、曹里怀、欧阳毅、曾志、彭儒、吴树隆、吴允中、万香、周万卷、刘会、彭振雁、王长太、彭建才、李佐国、李久如、邓元山、李耳成等老同志的谈话记录。
4. 对井冈山、兴国、宁都、瑞金、龙岩、吉安、乐安、永丰等地党史办公室和烈士纪念馆的访问、调查资料等。

常 乾 坤

于 頔 吴秋奎

常乾坤，1925年入黄埔军校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最早的飞行员之一，曾任八路军航空工程学校教务主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校长、军委航空局局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等职。他在航空理论方面有较深的造诣，是著名的航空专家和航空教育家。他精通俄文，懂英文、日文和德文，曾担任过朱德总司令的首席俄语翻译。新中国成立后，他参加人民空军的创建工作，在空军的军事训练、院校建设、科学研究、武器装备及民航事业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1955年被授予空军中将军衔。

(一)

常乾坤1904年7月，出生在山西晋南王屋山下的垣曲县毫城村。家有几十亩山地，有十五六口人生活，虽不等米下炊，也不算富裕。常乾坤七岁入私塾。他聪颖好学，七八年功夫读完了四书、诗经、书经、易经、幼学、小学古文释义等书；还读了不少古文和诗赋之类的书籍。

辛亥革命后，垣曲县成立了高级小学校。常乾坤想进县城

高小念书，并通过考试被学校录取，但由于他父亲和家人的坚决反对，结果没有去成。常乾坤并不甘心。第二年（1919年），他又以第五名的成绩考进县城高小，在外祖父的赞助下，终于入学读书。常乾坤在县城高小坚持读了三年，毕业后因无钱上中学，便到省城太原，想考太原师范，这样既可达到继续求学的目的，而经济负担又不太重。正在这时，他得知晋军的学兵团招生。学兵团学制四年，开始有三个月的新兵训练，然后为正兵，其余同普通中学教育差不多。更重要的是学兵团不仅不交学费，而且每月发6块大洋，除伙食和其它扣除外，尚余2元多可供零用。考虑到这一切，常乾坤于1922年正式进入晋军学兵团。晋军学兵团，也叫讲武堂，实际上是阎锡山的初级军官学校。后又改名为斌业中学，是取“文”、“武”二字合一，以表示这所中学是文武兼备的意思。该校除设中学课程外，还设有军事操练和军事教育。常乾坤在这里读书、受训四年，收获颇丰，既取得了中学知识，又接受了军事教育，丰富了自己的社会常识，了解了一些国家大事。

“五四”运动后，新文化、新思想慢慢传入太原。常乾坤开始接触进步书籍和报刊，先后阅读过《觉悟》杂志、《新青年》杂志，以及鲁迅的《呐喊》、《狂人日记》等等，思想上逐渐起了变化，开始思考走向革命的道路问题。

1925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全国大中城市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热潮，太原城也沸腾起来了，以学生为主体，举行罢课、示威游行，开展募捐、救济死难烈士家属、追悼“五卅”烈士等活动。常乾坤积极参加这些活动，并从斗争中提高了对革命的认识。他向往当时被称为革命摇篮的广州。1925年6月，常乾坤同共产党员范洪亮、曹汝谦等到了广州。

常乾坤到广州后，恰逢黄埔军校第三期招生。他义无反顾地投考黄埔军校，以优异成绩被录取，分配在炮兵队学习。由于常乾坤在晋军学兵团掌握了一定的军事技术，加上他勤奋学习，成绩优秀。他在政治上积极靠拢共产党，受到了军校中共组织的重视和培养。1925年7月，常乾坤由范洪亮、曹汝谦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以后，他参加党的组织生活，阅读《向导》周报、《新青年》等刊物，思想进步很快。

黄埔军校设置的课程，主要有军事、政治两大类。常乾坤由于学了几年军事课，基础较好，军事课学起来不大费力。他最感兴趣的是军校的政治课和历史课。这些课程主要有：三民主义、中国国民运动、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世界革命运动简史等。这些课大都由共产党人周恩来、恽代英、肖楚女、张太雷等讲授。当时既无书本，也无讲义，学生要做课堂笔记。常乾坤学得认真，理解得也好，经常受表扬。他的理想是毕业后到部队去，作一名政治工作者。

1926年1月，常乾坤从黄埔军校毕业。

（二）

1926年春，广东航空学校第二期招生，常乾坤得到中共组织的同意，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入航校。这所学校是1924年7月由苏联政府帮助中国在广州建立的，开始称为军事飞机学校。苏联援助航校飞机，派出教官，供应教材；学生来源主要是从黄埔军校毕业生中遴选。

常乾坤在军事飞机学校几个月，接触了当代最新科学知识。他学习刻苦认真，对航空理论理解较快，飞行技术也好，比较

早地放了单飞。那时他们驾驶的飞机连座舱盖都没有，飞行员几乎是站着操纵飞机，强劲的气流夹着发动机的废气扑面吹来，飞行一次非常艰难；飞机落地，满面油污，大家相视而笑。常乾坤在航校担任区队长，党内担任小组长，表现积极热情，不仅自己学得好，又能主动辅导和帮助别人，是同学中的佼佼者。

1926年6月，常乾坤作为广东军事飞机学校的飞行学员，由国民政府派出，赴苏联继续学习航空。这次派出的学员共12人，其中常乾坤、徐介藩、李乾元、黎鸿峰（越南人）、金震一（朝鲜人）5人系中共党员。他们从上海乘船至海参崴，又改乘火车抵莫斯科。

常乾坤初到苏联进的是航空理论学校，集中学习和研究飞行原理，同时也广泛涉猎数学、物理学及电学知识，尤其对空气动力学钻得较深，取得了优异成绩。一年后，常乾坤又进入苏联空军的飞行与领航学校，系统地学习与研究空中领航学和空中射击学等专业航空知识。

1930年1月，常乾坤进入苏联空军独立航空队，开始担任中尉领航员，后升任准校领航主任。在航空队，他认真对待每一次飞行，细心地体会分析飞行中发生的问题，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有很大提高。他每次飞行都能很好地完成任务，一直保持了优异的训练成绩，曾受到苏联空军的奖金奖励。

为了进一步全面掌握航空理论知识，常乾坤于1932年12月，又考入苏联航空工程最高学府——茹考夫斯基航空工程学院的航空工程系。他潜心学习和研究飞机发动机原理、构造、设计等航空工程理论，还深入到飞机和发动机工厂去实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取得了良好成绩。毕业设计时，他成功地设计了一架侦察飞机和一台航空发动机，受到了好评，获得航空工

程师和空中领航员的技术职务。

常乾坤在苏联学习航空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这就是学成后回国为党的航空事业，为中国人民空军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因此，他对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极为关心，经常到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了解国内的情况，并从苏联报刊上找寻有关中国的消息。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每次反“围剿”的胜利，对于红军转危为安，胜利突围，完成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他都感到欢欣鼓舞。

1937年发生“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公然向中国发动全面进攻，引起了常乾坤的极大愤怒。他认为自己的学业基本完成，应当回国参加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战斗。他到共产国际找中共代表任弼时要求回国参加抗战。答复是：抗日战争可能是长期的，中间也许会有曲折，要他继续学习，安心等待。常乾坤表示：“既然目前不能回国，倘若时机许可，请一定告诉我，我随时准备着。”此后，他又向任弼时要求过两次。1938年3月，任弼时通知他说：“共产国际已同意你回国。”常乾坤没有来得及参加茹考夫斯基航空工程学院的毕业典礼，于1938年9月初踏上归国的征途，回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

此前，在迪化已有红军西路军的一批干部，借用盛世才的装备，进行特种兵训练的“新兵营”；中共组织由“新兵营”选调43名党员，其中25名进入新疆航空队飞行班第3期学习飞行，18名进入机械班第2期学机械。常乾坤等到后，组织上安排他们暂留迪化，力争进入新疆航空队当教官。中共中央的代表邓发要求他们做好准备，一旦交涉成功，就可马上开始工作。

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是个多疑善变的政客，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也改变了对共产党的态度。他不同意常乾坤等进入

航空队任教，原来打算开办的第4期飞行班也不再招共产党的学员了，致使中共从延安派来准备学飞行的同志失掉了进飞行班学习的机会。后来，中共中央决定在迪化办一个航空理论训练班，集训原准备进航空队第4期学飞行的同志。训练班由常乾坤讲飞行原理，王弼讲机械原理，学员有吴元任、林征、任平、郑德以及从苏联回来的刘风、王涟、王天、李风、王春、王占山等人。常乾坤一边给航空理论训练班讲课、辅导，一边翻译资料，编写教材。他先后编译了《飞行原理》、《空中射击学》和《空中领航学》等教材。常乾坤讲课生动风趣，深入浅出，一些比较高深的理论，经过他的解释，学员都能明白和理解。

进入盛世才办的航空队第3期学习飞行的25名中共党员都是红军干部，政治素质高，但文化水平较低，个别的是初中文化程度，一般只有小学程度，有的还未念过书，是在红军部队学习识字的。他们在学习遇到不少困难，对一些飞行原理搞不清。党组织安排这些同志在星期天和节假日回到党代表办事处，由常乾坤、王弼等给他们讲辅导课，解答疑难问题。由于常乾坤、王弼等的精心辅导，加上他们的刻苦钻研和勤学苦练。结果，这25名党员中，飞出了24名，只淘汰1人，比前两期学员的淘汰率都低。

“新兵营”有一个特科大队，实际上就是炮兵大队，学习炮兵技术和战术。教官是苏联人，原来由一位俄罗斯人当翻译，因为他不是军人，更不懂炮兵，翻译起来很费劲，学员也听不懂。后来这个翻译工作就由常乾坤来担任。因为常乾坤在黄埔军校学过炮兵，对于炮兵的技术和战术都有一定的了解，翻译的效果特别好，而且能够按照教官的授课给大家进行辅导。原炮兵

司令员宋承志回忆说：“常乾坤同志给我们当翻译，使我们学炮兵受益不小。他没来之前学习很困难。常乾坤同志既懂炮兵技术，也懂炮兵战术。他平易近人，经常跟我们在一起，有什么问题去找他，不论什么时间去，他都耐心解答，我非常感激他啊”。

常乾坤在迪化这段时间，除了完成讲课、辅导和翻译工作外，还抓紧研究航空理论和编译书籍。开始时，他手头资料很少，俄文材料也不多，学习与研究都受到影响。后来，组织上从苏联搞来一批航空书籍，他如获至宝，拼命地阅读与研究。他在迪化编译的这批航空理论书籍，后来已正式出版，并在东北老航校的教学起到了重大的作用。空军成立初期办的几所航校，也都普遍地使用了这批教材。

在迪化的两年多时间，常乾坤还阅读了不少政治理论书籍，其中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及中国近代革命史、联共（布）党史等，进一步提高了政治思想水平。

1940年12月，常乾坤、王弼等一行，奉命从新疆回到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办航空尚提不到议事日程，然而他们从长远着眼，还是向中共中央呈报一份建议，阐明现在虽然没有立即成立航空学校的可能，但航空干部的训练周期长，所需知识门类多，理论性强，必须早作准备，否则形势发展一旦需要就来不及了；建议先成立一所小型学校，集中百十名干部，学习航空理论、航空知识，准备革命形势发生大的变化之后，作为建设空军的骨干使用。毛泽东看过建议之后，认为此举颇有远见卓识。中央遂于1941年2月间着手筹备成立航空学校的工作。这所学校定名为工程学校，

校址选在延安以北的安塞县。

1941年3月6日，常乾坤被任命为工程学校教务主任。他立即从延安搬到安塞，全身心地投入了建校筹备工作。3月，学员到了六七十名，其中有刘玉堤、吴元任、马杰三、龙定燎、林征等。常乾坤白天和学员们一起参加建校劳动，晚上抓紧时间备课。4月6日正式开始上课。按照计划，首先学习数学、物理学知识，并学习俄文，待学员有一定文化基础后，再开始学习航空理论。常乾坤除负责整个教务工作外，还亲自给学员讲代数和俄文。为适应形势的变化，1941年10月，上级决定将工程学校与抗大三分校合并编为军事学院，院长由朱德总司令兼任，叶剑英为副院长，郭化若为教育长。军事学院下辖三个大队，一大队为俄文工程队，二大队为工程和参谋队，三大队为炮兵队。常乾坤被任命为第一大队大队长，主持俄文教学工作。

1942年夏，军事学院迁往绥德。俄文学大队变成了总参谋部俄文学校。俄文学校分初级班和高级班，常乾坤给高级班讲课。当时教学条件差，一没有教科书，二没有现成的讲义，三学员没有字典可查。常乾坤就自编教材，认真教学，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为了搞好教学，他还利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编译了《俄文文法》、《俄文会话读本》、《俄文常用词汇》等，作为学生的读物。10月，常乾坤被任命为军委编译局（四局）编译处处长，任务是主持军事条令的编译和俄文教学工作。

1944年9月，中共中央军委调常乾坤到第十八集团军总参谋部任高级参谋、航空组副组长（组长是王弼）。常乾坤在总参的工作主要是外事联络，给首长当翻译，诸如迎来送往，接待外籍人士和专家等等。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工作努力，吃苦耐劳，成绩显著，多次受到上级的表扬。这段工作也极大地

锻炼了他的组织计划能力、行政领导能力，熟悉了高层次的参谋业务，学到了许多属于战略决策方面的知识。常乾坤离开总参赴东北时，叶剑英对他的评价是：“积极参与外事工作有成绩，很好地配合友人工作完成了任务，有领导能力。常乾坤同志搞了一二十年航空，在我党将来建设空军中可参加一定领导工作。”^①

（三）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的一天清早，叶剑英把常乾坤等找去，说：枣园有电话来，叫你们去，可能是商谈去东北的问题。听到这话，常乾坤等高兴得连早饭都顾不得吃，急忙赶往枣园。9点来钟，一位同志把常乾坤等带到任弼时的窑洞。见面后，任弼时直截了当地说：“你们的愿望快要实现了，中央要你们马上赶到东北去，设法创办一所航空学校，培养一批技术骨干。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你们看怎么样？”

常乾坤等激动地说：“这是我们早就盼望的，我们要坚决完成党交给的这个光荣任务！”

“我们很了解你们的心情，长翅膀的人是坐不住的，你们需要辽阔的天空，是吗？”任弼时笑了笑，接着又说：“赤手空拳办航校，会有许多料想不到的困难，遇到问题要随时请示东北局和民主联军总部。”^②

吃中午饭的时候，刘少奇来了。他一再叮咛：这次到东北

^①引自常乾坤档案。

^②常乾坤：《第一所航空学校》，《星火燎原》第8集，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134页。

去创办航校是件大事，是党和中国人民创建航空事业的一个开端。要有坚强的信心和决心，要有不屈不挠、百折不回的勇气和克服困难的精神，一定把航校办起来，而且要把它办好^①。10月15日，常乾坤等一行20余人启程那天，周恩来前来送行，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是放出去的鹰，遇事要多动脑筋。”^②他们肩负着党的使命，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告别了革命圣地——延安。

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常乾坤终于在冰天雪地的季节到达东北，首先向中共中央东北局报告了中央的决定。根据当时的局势发展，东北局又对建校的方针、原则和具体做法作了许多重要指示。

1946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确定在通化成立了航空总队，由通化军区后方司令员朱瑞任总队长。2月初常乾坤到达通化后接任总队长工作。航空总队是航校诞生的前奏和雏形。在此基础上，于1946年3月1日，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所航空学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简称“老航校”）。在开学典礼上，通化军区司令员何长工代表中共中央、中央东北局和“东总”讲话，并宣读了航校领导干部任职命令，常乾坤被任命为校长。

航校成立后，困难很多，首先是没有飞机和器材。常乾坤进行了紧急动员，号召大家寻找器材，并亲自带领航校职工冒着大风大雪，不分昼夜地四处寻找。除锦州、沈阳等地几个机场的器材没有来得及抢运外，辽阳、铁岭、东丰、朝阳镇、佳

①常乾坤：《第一所航空学校》，《星火燎原》第8集，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134页。

②《东北老航校回忆文集》，1986年出版。

木斯、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北安等地，凡有航空器材的地方，都留下了常乾坤等人的足迹；甚至到机场附近的山沟、材镇，去寻找轮胎、仪表、铝皮垫子，寻找汽油、滑油。由于火车不通，汽车缺乏，好不容易收集起来的残破飞机和笨重器材运不回来，常乾坤等就动员群众用牛马大车运送，创造了用马车拉飞机的奇迹。经过常乾坤等多方面的努力，终于修理装配起各式日本飞机几十架，但都缺少零件。他们从各方面收集来的破旧零件中翻找，把一切能用的零件都派上了用场。

战争环境，敌人的骚扰不断。在通化装配好的飞机基本上就未能飞行，航校刚刚成立一个多月就开始大搬家。第一次搬家是向牡丹江转场。怎样转场？当时人们心中无数。为此，常乾坤决定，一面派飞机前往牡丹江侦察，一面派先遣队到牡丹江布置迎接飞机。经过全校同志群策群力，终于在短短的几天内，把绝大部分能飞的飞机从空中转到了牡丹江；不能飞的飞机和器材也陆续抢运到当时比较安全的敦化、延吉等地。第二次是从牡丹江搬到东安。当时正值严冬季节，东安附近的机场遭到严重破坏，弹坑累累，营房、仓库等建筑都成残垣断壁，几乎连一栋完整能用的房子都没有。东安的冬天，风雪连天，风卷雪花，刮起“烟炮”，对面看不见人，气温下降到摄氏零下三四十度，手触到铁上就粘掉一层皮。向这样严寒的地方转场，必须事先做好准备工作。航校抽出大部分人员先到东安抢修机场、营房和仓库，经过一个多月的奋战，终于在11月底转到了东安。

老航校成立之后，先后由通化至牡丹江、牡丹江至东安、再从东安转回牡丹江，最后到长春。每次转场几乎都遭到敌机的空袭，常乾坤等都勇敢沉着，巧妙地指挥部队安全转移。

为加快培养航空人才，常乾坤等采取了人民军队行之有效

的互教互学，包教保学，重视教学实效，理论紧密结合实际，迅速把技术学到手的教学方法。教员、学员一起动手，把不能用的破飞机、发动机和仪表都搬进了教室。上课时教员讲一个机件，让大家看看实物，讲一个原理，给大家实际表演一番，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当时，世界各国训练飞行员的常规都是三阶段——先飞初级教练机，再飞中级教练机，后飞高级教练机或战斗机。初级教练机航校有几架，但都是木头做的。由于长期在机场上风吹、雨淋、日晒，框架都朽了，蒙布也扯光了，加上几次长途转移，都已变了形，不能试飞，飞初级教练机的门被堵死了。中级教练机一架也没有：只有一些破旧的九九式高级教练机和几架日式战斗机。能否打破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三级教练法，越过初、中级两个阶段，直接飞高级教练机呢？这是一个前人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一部分人坚决反对这样干，认为这是违反科学的；有的还说：“想一步登天，只怕飞得高，摔得重！”常乾坤等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和民主联军总部的支持和鼓励下，征求了学校广大干部和学员的意见。学员们坚决回答：“我们愿冒任何风险！上高级教练机，怕什么？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常乾坤等校领导经过分析研究和反复思考，最后果断决定，“三步并成一步走”。他们一面发动群众动脑筋想办法，一面采取了加强地面准备，增长带飞时间，改进训练方法等一系列措施。在保证飞行安全方面，他们针对器材破旧，教员技术不熟练，设备简陋，制度不健全，缺乏经验等不利因素，要求全体同志，特别是飞行人员、机务人员、修理人员，要小心谨慎，认真负责，细致扎实，兢兢业业，像姑娘绣花一样地做好一切工作，保证飞行训练少出事故或不出事故。经过全体同志的努力，1946年7月下

旬的一天，飞行学员终于单独驾着九九式高级教练机，飞上了万里无云的高空。

教练机解决了，油料又成了问题。常乾坤等又发动群众来研究。有人建议：用酒精可以代替汽油开汽车，能否用酒精开飞机呢？常乾坤觉得有理，于是决定试验一下。第一次用酒精试飞时，因为天气太冷，酒精度数不够，眼看着飞机飞上天，突然，听不到马达声了，飞机一直往下猛坠，在空中停了车，试验失败了。第一次不成功，再试！先使用汽油和酒精的混合燃料，逐渐减少汽油的分量。经过试验、研究，在提高了酒精度数和加大了燃料喷嘴之后，试用 96 度的纯酒精飞行，终于获得成功。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军区副政委的陈云同志得知这一消息后，高兴地对常乾坤说：“你们为航校训练解决了大问题。”^①后来，他们在哈尔滨办了两个酒精工厂，生产了大量酒精，保证了飞行训练。

参加飞行的人越来越多，训练也更加紧张，随之而来的是器材日益缺少，胶皮轮子和螺旋桨更是奇缺，只能几架飞机轮换着使用。由于没有补充来源，到了 1947 年下半年，情况越来越困难，器材已经用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常乾坤下决心减少飞行次数，压缩部分人员，按“保养技术，短小精干，持久延长”的方针坚持训练。

当时的生活条件也非常艰苦，不仅吃不到肉和油，连细粮和蔬菜也很少见。常乾坤等就把飞行员、机务人员组织起来，开荒种地，上山打柴烧木炭，到兴凯湖去打鱼，冬季到草塘里，敲

^①陈云同志听了常乾坤汇报航校工作后的指示，《东北老航校回忆文集》，1986 年出版。

开厚冰抓泥鳅，春、夏季挖野菜、拣鸭蛋，秋季打猎，来改善生活。常乾坤还和大家一起拉犁耕田，并告诉掌犁的同志，犁头角度多大才最省力，效果最好。他们住的房子很简陋，是紧急赶修起来的，既无取暖设备，窗户又不严密。夜晚，西北风卷着雪片打得窗户哗哗响，大家只得带着棉帽睡觉，冻醒了就裹着被子在屋里兜圈子。没有冬季飞行服、皮大衣和毡鞋，也没有保险伞和保险带，飞行员只好穿着棉袄和单布鞋，用麻绳将鞋捆起来飞行；地勤人员的工作服是补了又补的；大家毫无怨言。

老航校的学员文化水平较低，对航空理论学不懂，实际操作困难更多。根据这些情况，常乾坤重新制订了训练计划，首先用3至6个月时间补习文化，使学员的文化水平达到初中二年级的水平，然后再进入理论学习。为解决教员力量不足和缺乏教材的问题，常乾坤带头并动员全校所有懂航空理论和飞行技术的干部兼任一些课程，并动手编写教材。他编写的《空气动力学》等教材，深入浅出，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抽象的原理具体化，很受学员们的欢迎。

1947年10月，上级对航校领导班子作了较大的调整，刘亚楼兼任校长，吴溉之兼任政委，常乾坤任副校长。常乾坤坚决服从上级的决定。尽管他改任副校长，加上他爱人曲冰千里迢迢来到老航校不久就病逝，留下一个孩子，但他的情绪一点也没有受影响，照常兢兢业业地工作。那时正值筹备招收新学员，常乾坤根据当时学校的器材情况，对应当接收多少学员，飞行训练如何分步骤，先培养哪种航空干部，各培养多少，器材如何解决，学生如何选调等一系列问题，都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论证，并详细地报告了“东总”。

常乾坤认为，越是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领导干部越要以身作则，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感化、影响群众。凡是要求大家做的事情，他都带头去做。航校初建缺少理论教材，常乾坤带头找资料、搞翻译，把原编译的《飞行原理》、《空气动力学》等教材，都重新整理编印。学员文化水平低，他亲自给学员补文化课，又讲航空理论课。他房子的灯总是亮到深夜。他非常关心群众生活，有一段时间，飞行员光吃高粱米，特别是南方人，吃了不消化。对这个在航校范围内不好解决的问题，他和马文政委一起到哈尔滨东北民主联军总部请求解决一些大米。那时东北的大米不多，主要是供应伤员。要大米要经过高岗批准才行。他们几次去找高岗，也未能解决，直至1947年春节，“东总”才发来一些大米和海带等物品，使飞行员的生活得到一些改善。

常乾坤非常注重报刊工作。他认为革命的舆论既能推动工作，又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那时航校办有《星火》杂志，是学术性刊物；《航校》报，是综合性报纸；还有《学习月刊》。常乾坤非常关心这些刊物，他曾为《星火》杂志题词：“只有彻底剔除旧思想意识的人，才能成为真正建立人民空军基础的骨干。”^①他还经常抽空给校办报刊写文章，以指导教学工作。

常乾坤一贯生活俭朴，廉洁奉公。老航校创建时期，他同大家一起过苦日子。一次，航校办公室主任蒋天然在哈尔滨经营酒精工厂，完全出于对首长的关心和爱护，没经过商量，就用酒精厂的钱，给校首长每人买了一件皮大衣、一顶皮帽子。一位干部到大连去，想到航校人员没有衬衣穿，就给校首长每人

^①《东北老航校建校40周年纪念册》第102页。

买了一件衬衣。常乾坤认为这种作法是很不应该的，曾几次在会上作检讨。按规定常乾坤应享受小灶待遇，他在延安时就吃小灶，但老航校的生活很困难，他和大家一样吃高粱米、玉米面、萝卜、白菜和土豆。

航校建立之初，技术人员主要是两部分人：一是从敌对营垒起义的同志；二是放下武器参加人民军队的日本人员。遵照上级的指示精神，常乾坤以认真负责、诚恳待人的态度去感化和教育他们。刘善本是国民党空军第一位驾机起义的人，1947年3月，被任命为老航校副校长，分工主持一个机场的飞行训练。常乾坤鼓励他大胆工作。刘善本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努力工作，把自己的技术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航校的训练。在起义人员中，还有白起、蔡云翔、何健生等，常乾坤也同样按照党的政策，放手使用他们，充分地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在航校，放下武器参加民主联军的日本人，共有300多人，其中飞行人员17人，机械师24人，机械员72人，还有医生、护士、汽车司机等。常乾坤和校领导班子成员对这些人以诚相待，尊重他们，信任他们，鼓励他们用自己的技术为革命工作，将功赎罪，使他们完全打消了顾虑。这些人后来为我们培养航空人才做出了贡献。1946年2月3日是春节，通化发生了“二·三”反革命暴动，这是国民党特务勾结少数日本关东军溃散人员策划的。在老航校的日本人也受到牵连，一些人被审查，许多人甚为惊慌，担心会坐牢杀头。常乾坤参加了审查工作。他实事求是地处理了这个问题，没有冤枉好人，很快稳定了大家的情绪。

就在通化反革命暴动发生不久的4月份，由于战争形势所迫，老航校由通化向牡丹江转移。能飞的飞机都要从空中飞走。

敢不敢让日本人驾机转移？航校领导在研究这一问题时，意见各异。常乾坤认为既留用了他们，就应该信任他们，在关键性的时刻，放手让他们去独立完成任务，最有说服力，也最能感动他们。最后决定，让他们参加了空中转场。这些日本人深受感动，他们认真负责，任务完成得很好。一次，国民党飞机空袭牡丹江机场，为了保住装满飞机的机库，日本司机佐渡不顾个人安危，开着加油车在机场内奔跑，把敌机引开，保住了机库。日本人林弥一郎（林保毅）被任命为东北航空委员会委员、航空总队副总队长、老航校飞行参议等职，为老航校建设做出重要贡献。

在将近4年的时间里，常乾坤和其他校领导一起，带领全校人员认真贯彻执行了党的政策和毛泽东主席的教育方针，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吃苦耐劳，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为人民解放军培养出各类空地勤人员500多人。

1949年3月8日，常乾坤、王弼等到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航校工作时，毛泽东高兴地说：“很好，过去在延安办不到的事，今天办到了。你们为今后正式建立空军做了准备工作，培养出了一些种子。”^①

（四）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航空局。人员主要从

^①常乾坤：《第一所航空学校》，《星火燎原》第8集第142页，1982年出版。

老航校抽调。3月30日，中央军委任命常乾坤为军委航空局局长兼航校副校长，王弼为军委航空局政委兼航校副政委。

航空局是代行空军职能的过渡机构，是成立空军的基础框架，是中央军委管理航空工作的部门。常乾坤出任军委航空局局长后，立即着手组建航空局机关，从东北老航校调来一些人，很快组建了作战教育处、航空工程处、民航处、情报科和供给科，暂编64人。渡江战役后，南京、上海、杭州、武汉、南昌等大城市和长江以南广大地区获得解放，航空业务增多，工作范围扩大。1949年5月，航空局机关增设了航行管理处、秘书处、政治处，人员增至172人。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许多城市陆续解放，国民党留下的众多机场、器材、航空人员需要接管。常乾坤派出干部，在各野战军的支持下，赴各地接收国民党空军人员、飞机和器材。到1949年10月底，共接收飞机113架，航空发动机1278台，各种航空物资器材4万余吨；接管飞机修理厂、航空配件厂、飞机装配厂、氧气厂、通讯器材厂等32个，收容一大批航空技术人员，使解放区的航空技术人员达到2938人，飞机增加到159架。

随着解放区域的一天一天扩大，为了支援前方作战，为了恢复解放区生产，为了新中国成立后发展民航事业，常乾坤带领航空局积极组织各地抓紧修复机场，创造条件开辟空中航线。到1949年10月底，共修复机场40个。经请示周恩来批准，先后开通北京—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苏联赤塔航线；北京—太原—西安—兰州—迪化航线；北京—石家庄—开封—武汉航线；北京—济南—徐州—南京—上海航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驻香港的原国民党“中国”、“中央”两个航空公司的爱国员工酝酿起义，回归大陆。常乾坤亲

自组织安排人员，使10月29日和11月9日两批起义的12架运输机，顺利安全地飞抵北京和天津机场。

常乾坤为了给正式建立人民空军作准备，领导航空局同志，精心设计制定了人民空军的机徽和军徽。人民空军的机徽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红星军徽的基础上，两边配以镶有金黄色边的红带，表现了人民空军在祖国大地上奋飞的雄姿。人民空军的军徽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红星军徽的基础上，配以雄鹰的两翼，象征着人民空军英勇果敢，为捍卫祖国领空安全而翱翔无阻。当时制定的人民空军的机徽和军徽沿用至今，已成为人民空军光荣的象征。

1949年5月4日，国民党空军派出飞机轰炸了北平南苑机场。当时正在积极准备召开全国政协筹备会，北平的防空问题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在一次军委召开的会议上，周恩来副主席对常乾坤说：要召开政协会议，同党外人士协商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卫工作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地面上由罗瑞卿部长负责了，空中的你们能不能出点力啊！常乾坤当即回答：“行”。经过紧张的筹备，1949年8月15日，在北京南苑机场正式组建了人民解放军第一个飞行队，担负起北京的防空任务。

开国大典空中受阅，是航空局负责组织的又一次重要任务。那时进行这样大型的空中受阅，没有组织指挥经验，没有可供借鉴的资料，除了老航校来的和起义过来的几位共产党员外，飞行员大都是从国民党军队和航空公司刚刚起义归来的。飞机全部是缴获国民党空军的旧飞机。这样一支队伍接受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检阅，飞越30万群众聚集的天安门广场上空，任务艰巨，困难多。常乾坤带着检阅飞行中的各种问题，深入群众，召

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听取意见，进行了空中照相试验，解决了受阅机队飞行员的配备和组成问题，圆满地完成了受阅任务。

军委航空局是人民空军的前身，常乾坤带领全局同志所做的工作，为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的作了准备，打下了基础。

（五）

1949年11月11日，人民空军正式成立。常乾坤被中共中央军委任命为空军副司令员兼训练部部长。当他在东北老航校接到任命电报时，心情很激动。他给刘亚楼复电说：“我愿诚心诚意地协助您，兢兢业业地为建设中国人民空军而努力！”

空军成立之初，首要的任务是组建航空学校。当时，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要组建6所航校，人员都是从老航校抽调的。常乾坤等给每所轰炸机航校分去飞行、机务人员各20名左右；每所驱逐机航校分去飞行员10名左右，机务人员20名左右。6所航校从部队共选调了1672名学员。第一批新建航校，经过紧张的筹备，均于1949年底和1950年初开学。后来，常乾坤提出原老航校还有一批力量，还有校舍、教员、飞机器材等，应当继续发挥作用，建议再办一所航校。刘亚楼同意了他的建议。于是，请示中央军委批准，又增加了第七航校。

1950年6月，正式成立了空军混成第4旅。这是人民空军第一支作战部队。该旅的第10团首先在苏联空军人员的帮助下改装喷气式战斗机，同年10月底完成了改装训练，10月17日，常乾坤代表空军陪同陈毅参加了交接仪式，并观看了飞行表演。

按分工，常乾坤负责空军的军事训练工作。那时航校训练和部队训练还未分开，他的主要精力是抓航校训练，加快培养

飞行人员。军事训练中的突出问题是飞行事故多，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情绪和训练质量，常乾坤对此深感不安。为解决这一问题，他带领机关人员深入部队，充分发动群众，研究分析发生飞行事故的原因，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一是飞行员技术不熟练，操纵失误；二是有些领导只重视训练进度，忽视飞行安全工作；三是机务保障有薄弱环节。常乾坤适时地向空军党委提出建议，围绕提高各级领导对飞行安全工作的认识和责任心，提高飞行人员的技术和处置故障的能力，加强机务保障等方面提出了改进意见。空军党委采纳了他的意见，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于1951年5月作出了《关于飞行失事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应将对于飞行失事的认识，提高到原则水平，把飞行失事的有无、多少，作为衡量空军各部门，每个人（尤其是飞行人员和机械人员）的各种工作好坏的主要标志之一。1952年以后，空军召开了一系列安全会议，提出了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切实按章办事，做到“一切为飞行服务，为安全负责”；做好飞行四个阶段的工作，开展飞行安全立功运动。空军还整顿了飞行纪律，制定了“稳步前进，完成计划，提高质量，保证安全”的训练方针，使空军的军事训练逐步走上轨道，训练质量有所提高，严重事故显著降低。

抗美援朝初期，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决定空军参战。空军参战后，同朝鲜人民空军并肩作战，需要统一指挥。1951年1月7日，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致电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提议按照联合司令部的组织原则，成立中朝空军的联合集团军司令部。金日成同意这一提议。1月10日，空军党委遵照中央军委关于成立联合空军集团军司令部的指示，确定由常乾坤提出联合集团军司令部所需各种人员的编制。1月16

日，空军党委又研究了集团军干部配备，并决定常乾坤立即着手筹组指挥所。1月28日，常乾坤率领新组成的前线指挥所60余人，由北京启程赴朝。2月5日到达平壤以北之君子里，后在三神炭矿建立了指挥所。1951年3月15日，中朝联合空军正式成立，隶属于中国人民志愿军。3月30日，中央军委授权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刘震为中朝联合空军司令员，王涟（朝方）、常乾坤兼任副司令员，沈启贤为参谋长。常乾坤分工负责在朝鲜境内修建机场和筹措作战物资。

为尽快做好空军参战的准备工作，上级要求在短期内修好几个喷气机机场和土跑道机场，并筹备足够的作战物资。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严肃地对常乾坤说：“如果按时完成任务，第一个得勋章的是你，如果完不成任务，第一个杀头的也是你。”^①常乾坤深感责任重大。他带领中朝联合空军后勤部部长杨尚儒、政委李雪炎等人亲自选点，组织技术人员精心设计。他还亲自到朝鲜政府联系，请求派民工修机场，朝鲜政府发动了数万群众同中国人民志愿军一起抢修机场。当时的季节天寒地冻，机械很少，大部分靠人挖。铁镐下去，只出一个白点。加上敌机扫射轰炸，时常是机场刚修好，又被炸坏了。据统计，在修建6个机场过程中被敌机轰炸72次，投弹6826颗，炸死炸伤修建机场的军民551人。广大军民不怕牺牲，不怕艰难，坚持抢修。敌机轰炸时就躲，敌机走后继续干，炸坏了再修。常乾坤经常带领人员深入施工现场，指导施工，检查质量，鼓励军民。经过中朝军民的共同努力，终于在1951年9月以前，共修好6个喷

^①《空军抗美援朝后勤工作大事记》，1965年编，未刊，存空军档案馆。

气机机场和 10 余个土跑道机场。后来又翻修了一批机场，与此同时，常乾坤还组织修建了一批仓库，储备了大量军用物资。常乾坤在朝鲜还负责了解美国空军在朝鲜与志愿军空军空战情况，经常组织参谋人员，汇集这方面的资料，加上分析意见，发回国内参考。

常乾坤在朝鲜期间，同大家一样住山洞，吃炒面、饼干和罐头，生活十分艰苦。美机经常来轰炸扫射，有一次把他们住的山洞洞口炸塌，封住了出口。在这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幸好电话线没断，打电话通知别的山洞，才把他们抢救出来。

常乾坤非常尊重朝鲜同志。当时任朝鲜人民空军司令员的王涟，在苏联学习航空，后来到中国，曾在常乾坤领导下工作过。但常乾坤非常尊重他，主动和他商量问题，密切配合工作。常乾坤还教育身边的工作人员要和朝鲜同志搞好团结。他的工作和作风得到朝鲜同志的好评，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授予“自由独立”勋章。

1953 年 8 月，中共中央军委任命常乾坤为空军第二副司令员兼军事学校部部长。那时苏联专家逐步撤走，是开始自办航校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是整顿、消化从苏联专家那里学来的东西。主要措施是，把原来的既训练飞行人员，也训练地勤人员的综合性学校，分建为单一的飞行航校和地勤航校。常乾坤带领军校部的同志，按照空军党委的要求，扎扎实实地做了四项工作：

第一，组织实施分校。将 10 所航校，分成 7 所培养空勤人员、3 所培养地勤人员的航校。后来，经中央军委批准，又先后于 1954 年成立十二航校，1956 年成立十三航校，1957 年成立专门为民航培训飞行人员及其他干部的十四航校，使空军各类

航空技术人员的培训成龙配套，形成了不同层次的网络。

第二，努力提高航校的教学质量。组织人员再次修改了教学制度、飞行训练提纲及教学大纲，统一编写了教材，并制定了5年的训练计划。为帮助学员更快学习技术，推广直观教学法，广泛发动群众制作各种直观教具，1953年还专门在北京举办了教学模型展览会，总结、交流了直观教学的经验。1953年12月，空军党委指出，提高教员的水平和改进教学方法，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为落实这一指示，常乾坤指导机关的同志，认真组织教员在职学习理论，进行短期轮训，并组织部分教员外出参观、实习，取人之长，充实自己。同时，将一批干部送到指挥员训练班轮训，提高他们的指挥能力。

第三，1954年筹备召开了第一次教学代表会议，系统地总结了航校的教学经验，如“在理论教育的三个过程中的六个教学原则”、“在飞行训练六个阶段中的六条教学经验”和“树立正确的教学思想，改进教学作风”等。还宣扬了模范飞行教员邵长源、徐庆春等的先进事迹，推广了他们的教学经验，对提高航校的教学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

第四，建立预科教育制度。改进过去招收的学员直接进航校的办法，规定学员进入航校以前，应先经过预科学校训练。预科学校主要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教育，对学员继续进行审查，然后按期给航校输送。建立预科教育制度，进一步保证了学员的质量，使航校能集中力量进行专科教育，对加速培养飞行员起到了重要作用。

1958年9月，常乾坤兼任空军学院副院长。建学院时，他亲自选点，精心组织施工，较快地完成了该院的基建任务。

1959年1月，空军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编写出适合我军

情况和需要的条令、条例的指示，召开了各军区空军党委书记会议，作出广泛发动群众，认真组织力量，切实地进行编写自己的条令、条例的决定，并成立了空军党委条令编审委员会。同年11月，空军党委决定成立空军条令教材编审小组，常乾坤是3人编审小组成员之一。编审小组突出抓了编写工作的方向、方针、原则、计划安排和方法步骤，同时还具体审查各条令、教材的纲目，对重要的条令、条例还逐章逐条逐句进行审查。

为搞好条令、条例的编写工作，空军分期分批地从机关、部队、院校抽调了1112人，分别集中在杭州、上海、北京等地专门从事编写工作；对一些专业性的教材则指定有关院校负责编写。常乾坤经常深入各编写点检查、指导工作。

编写空军各种条令、条例、教材，需要参考苏联和其他国家的有关资料。常乾坤指示有关部门，为各编写点调来俄文、英文、德文等翻译人员几十名，他自己有时还深入到翻译组指导工作。翻译人员努力工作，译出了大量资料，为空军条令、条例编写工作提供了足够的参考材料。

到1965年8月，空军共编写出各种条令、条例、教材、操典、大纲、教范、教科书、技术原理等306本，常乾坤参加了大部分条令、条例、教范、教材的审查工作。这批条令、教材，对空军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1960年9月，常乾坤兼任空军工程学院院长、政委，主要是组织领导学院的筹建工作。空军工程学院的地址定在陕西省西安市，是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航空系为基础组建的。但该院航空系的师资已转移到西北工业大学去了。常乾坤不仅要考虑学院的基建，还要准备筹组教学人才问题。为了建好这个学院，他亲自到哈尔滨工程学院去研究学院组建的有关问题。在

学院修建过程中多次出现资金、材料短缺，甚至停工待料，常乾坤及时请示、报告党委和有关领导给予解决。学院建成后，院址到西安市区有一条土路，公共汽车无法通行，全院家属子女上班上学发生困难。常乾坤多次去找当时担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在省委领导的大力支持下，这条土路修成了柏油路，解决了群众的困难。

空军是由多兵种组成的，技术复杂，科研工作处于重要地位。常乾坤于1958年3月至1960年5月、1963年8月至1966年5月，曾两次担任空军军事科学研究部部长。1958年3月，常乾坤着手组建了空军军事科学研究部。为了开展科研工作，在各军区空军和空军军、师、团里，都成立了科学研究指导委员会（简称科委），并在各军区空军设置教研室或科研处，作为军区空军科委的办事机构，军设科研科、师（校）级单位配备了科研参谋，具体承办科研业务，从上到下组成了领导科研和技术革新的体系。随后，根据空军的兵种类别组建了雷达、通讯、导航、航空技术装备、航空医学等一批研究所，还成立了空司防化研究室、空后油料研究室，配备了科研骨干，为空军的科研工作摆开了摊子。

1959年1月，常乾坤组织起草了《关于进一步开展科研工作和技术革新运动的决定》，以空军党委的名义下发部队。决定明确了空军科研工作的方向、任务和原则，要求各级党委要参加并主持科研工作，空军各业务部门应对本业务系统的科研工作直接负责，把科研工作当作本身业务工作的组成部分。

为了推动空军的科研工作，1959年1月30日，常乾坤负责筹备召开了空军第一次科研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明确了空军的科研重点应放在对新武器装备的研究提出建议和要求，研究使

用新武器装备的战术，改进维护修理，延长使用寿命等方面。各研究所按照这一重点，结合空军作战、训练，开展研究。航空技术装备研究所首先取得了成果。他们研究改装了米格—17ПФ飞机，1959年5月29日夜，用这种改装的飞机将国民党空军窜入大陆的1架B-17型飞机击落。

后来，空军提出了“发动、组织、鉴定、综合、提高、推广”的科研方针。常乾坤认真贯彻这一方针，充分发动群众，坚持开展群众性发明创造与专门科研相结合，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中主要有将米格—15和米格—15比斯型飞机改装成教练机，自己研制飞机零备件和各种飞行训练模拟器、飞机加装俯冲装置和地面雷达练习器等等。1964年，空军对1959年以来的研究、革新成果进行清理鉴定和验收，筛选出有推广价值的项目7615项。1965年6月至9月，全军举办的装备革新展览，空军选送415项，有326项获奖。

随着我国航空工业的发展，为扭转空军部队使用外国武器装备的局面，在国务院、中共中央军委的领导下，航空工业部门对飞机由修理转为制造，由仿制转为自行研制。空军作为使用单位，科研部门要和航空工业部门共同拟定研制规划，组织鉴定定型，并承担试飞试验等一系列工作。1962年1月，成立了航空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常乾坤任副主任委员。办事机构——“航定委”办公室，设在空军科研部，负责组织产品鉴定工作。到1966年5月，常乾坤先后组织参与了对国产初教—5、歼—5、运—5、直—5、初教—6、歼—6、歼—7等型飞机的生产定型工作。常乾坤还参加了强—5、歼—8飞机的试制和试飞研讨工作。当时由林彪签发的一个文件，要求一定在1970年“七一”前让歼—8飞机飞上天。常乾坤以科学的态度，经过各方面的调查论证后认

为,有的单位的产品未达到规定的技术指标,新工艺、新材料没有经过严格的试验,飞机机体强度静力试验不合格等,目前还不具备试飞的条件。如果强行试飞,后果不堪设想。后来他与航空工业部、航空研究院的领导同志交换意见,统一了认识,终于使歼—8飞机试飞暂不进行。常乾坤为歼—8试飞把了技术关^①。后来,条件成熟了,才组织了试飞,并获得成功。

在刘亚楼、常乾坤等空军首长领导和组织下,空军科研部门和部队还参加了我国发展核武器工作,圆满地完成了产品运输、烟云取样、剂量侦测、空中摄影以及进入沾染区观察爆炸效果等任务。

中国民航局,在很长一段时间归空军管辖。民航领导机关的建立,飞行人员的培养、调配,机场的使用,飞行保障,航线开通,都是在军用、民用两利原则下统筹安排的。空军曾分工常乾坤管过一段民航工作。他和民航局领导同志相处得很好,遇事总是先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然后同他们一起商量。他经常去民航检查工作,认真贯彻周恩来对民航“保证安全第一,改善服务工作,争取飞行正常”^②的指示,反复强调安全工作是衡量民航工作好坏的重要标志,要求大家千方百计搞好安全工作,做到万无一失。他也非常重视搞好民航的服务态度。一次,朝鲜外宾在哈尔滨民航站受到非礼待遇,常乾坤抓住这一事例,多次对民航工作人员进行教育,要求他们进行整顿,举一反三,把坏事变成好事,使民航全体人员受到教育,服务态度有很大的

①邹及心:《关于歼—8“七一”上天问题的回忆材料》(1991年2月21日)。

②周恩来对民航工作的指示(1957年10月5日),《当代中国民航》第108页。

改进。

常乾坤投身革命近半个世纪，为中国革命事业特别是人民空军的建设兢兢业业工作。1971年4月，他感到身体不适，仍坚持工作。后来，他准备出差去研究歼-8飞机定型时，患重病，经医院治疗无效，于1973年5月20日不幸逝世，终年69岁。常乾坤在病危时还念念不忘歼-8飞机，他为人民航空事业和人民空军的建设奋斗终生。

附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宋承志、苏进、裴丽生、马文、卢竟如、吕黎平、白平、李雪炎、吴肃、方子翼、方槐、姚峻、袁彬、李向民、赵群、刘洪德、黄乃一、何健生、邹炎、张凤岐、徐昌裕、李奎、孟华、凌祖佑、马列、鄢仪贞、孟力、王智涛、顾青、李振兴、陆石麟、邹及心、方致远、杨培光、华龙毅、施谛、邢海帆、韩志明及常乾坤亲属的回忆材料和访问记录。
2. 《空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出版。
3. 《东北老航校回忆文集》，1986年出版。
4. 《东北老航校建校40周年纪念册》，1987年出版。
5. 《当代中国空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
6. 《星火燎原》，第8集，战士出版社1982年8月出版。
7. 《通天之路》，1990年出版。
8. 《中国科技史料》，1989年第10卷第2期。
9. 总政治部、空军档案部门保存的常乾坤的档案、讲话及调查研究资料。

王 集 成

陈 赛 文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副政治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王集成，于1983年5月1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76岁。王集成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半个多世纪以来驰骋沙场，战功卓著。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人民军队一位优秀指挥员和优秀政治工作者。

（一）

王集成原名王富堂，1907年2月12日出生于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乌鸡背村。他家有耕地十余亩和竹山几十亩，是个自耕自足生活水平中等的农户。王集成7岁进私塾念书，10岁辍学，开始帮母亲砍柴、种地，家庭生活日渐困顿。12岁的王集成，上纸槽当了学徒。他刻苦钻研造纸技术，很快成了一名熟练的造纸师傅。他做的纸质量优良，受到同行的称赞。凡是盖有王集成印章标记的，一刀纸要比别家的多卖二文钱。王集成喜欢读书，经常在豆油灯下阅读他父亲收藏的各类古书，如《粉妆楼》、《今古奇观》等等，常常通宵达旦，结果患下了红肿沙眼病，受到父亲的严厉训斥。此后，他只好遵父教学珠算、登簿记帐。

王集成的父亲王钦达，为人忠厚，个性倔强，因不甘受农村封建宗族大姓、旺房的欺侮、压迫，经常与乡村中的地主恶霸争斗。1920年间，在几个同族地主、恶霸的欺压下，王钦达曾被迫离乡背井，逃到广东，寻求王姓祖叔帮助。经过内外亲族的斡旋，才得到“和解”。1926年王集成结婚，因修理房间把门安装在走廊上，邻近居住的恶霸叫来几十人把王集成的房间门砸烂，还凶残地用斧头砸破王集成的右脚趾。王集成目睹社会的黑暗，饱尝了地主恶霸的欺压，在心里深深埋下了仇和恨，萌发着反抗压迫、谋求解放的火苗。

（二）

1929年春，红四军首次入闽。才溪乡中共地下党员林俊接到红四军军部的命令，赶到长汀担任长汀赤卫队党代表。“来了红军，来了共产党！”的消息传到才溪，贫苦农民争相转告。王集成受中共地下党员林应山和林俊的指派到汀瑞交界处的古城，以做纸为名探听红军的消息^①。是年7月，才溪人民在红四军策应下，举行武装暴动，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在土地革命中，王集成一家分得土地40多担（折合十亩余），废除了债务，经济上翻了身。王钦达立即吩咐次儿王樟堂专程赶到古城去叫王集成回家乡参加革命斗争。王集成回到家乡立即到乡苏维埃政府要求工作，被分配担任山林调查员。接着，他的四个弟弟在扩大红军运动中，先后参加红军或革命工作。

^① 访问林攀阶谈话记录。

1929年冬，王集成刚满18周岁，报名参加了上杭赤卫军，在第十三大队当运输员，不久改任宣传员，参加了配合红十二军攻打上杭反动民团刘子畴部和武平反动民团钟绍奎部的战斗。1930年2月，上杭赤卫军第十三大队编入闽西工农红军第十二军第二纵队，王集成在二纵队当宣传员。6月间，改任支队宣传员，并在江西兴国县新坡头经邱德荣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王集成升任宣传中队长、党支部书记兼士兵委员会主席。10月，红十二军第三纵队向湖南边境进军，攻打浏阳县文家市。王集成在此次战斗中，积极勇敢救护伤员，受到上级表扬。接着部队打下吉安，队伍扩大，纵队改为师，支队改为团，王集成调任第四连政治委员。

（三）

1930年10月，蒋介石开始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反革命“围剿”。王集成在参加此次反“围剿”战役后调到第一连任政治委员，并参加团党委任组织委员兼肃反委员会主任；1931年1月参加师党委为委员。

5月中旬，第二次反“围剿”中，王集成参加了富田战斗、黄陂与小陂战斗和攻打福建建宁、打垮敌刘和鼎一个师的战斗。同年9月，在第三次反“围剿”的高兴圩战斗中，王集成第一次单独担任军事指挥员，初现了他的军事指挥才能。

9月7日黄昏，王集成奉命率领一连乘夜色直插高兴圩。任务是：如果没有驻敌就占领高兴圩；如果发现驻敌就立即接战，并派员向团部报告。王集成受命后立即率领部队悄悄地摸过山坳，进入村中。正当他指挥部队进入村中街道时，突然射来一道刺眼的手电光，随即传来一声惊呼：“共军进来了！”同时响

起了零乱的枪声。王集成立即指挥部队接火，在街心与敌人展开巷战，并趁敌人仓皇闪开的一瞬间，指挥队伍甩开敌人，躲进敌人厨房里隐蔽起来。街上一片混乱，敌人叫嚷：“搜！挨家搜！”“抓活的，别让‘共军’跑了！”一连已落入敌人的包围之中。危急关头，王集成一面派通讯员潜出村去向团部报告敌情，一面清查队伍的人数，布置好警戒。这时，他又坚定地喊了一声：“共产党员站出来！”听到这一声严肃的命令，十几个共产党员急速地站了起来，靠拢在王集成的周围。王集成简要地讲明眼下连队所处的险境和突围的打算，接着说：“全体共产党员同志们要不怕牺牲，带领好战友，照顾好伤员，把部队带出去。”^①他很快把连队组织好，由几个有战斗经验的共产党员组成尖兵，其他党员分别插配在队伍中间。然后指挥部队悄悄地贴近墙根向村外匍匐前进。快到村口时，被敌人发觉，王集成指挥尖兵向敌人反击，掩护连队撤到村外，安全脱险。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部队进行整编中，红十二师与红十一师合并，改编为红十一师。原红十二师的三十五团改为红十一师三十二团，王集成任该团一连政治委员。11月初，红十一师从兴国折回石城，奉命攻打国民党军反动堡垒。红三十三团担负主攻，三十二团配合。激战中，王集成腿部挂花。1932年1月，部队攻打大庾县新城后，王集成调往福建汀州，进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团政委训练班学习了三个月。他后来回忆说：“这次学习虽然时间短，但对我的影响很大，在政治思想上打下了一个初步基础。”^②同年5月，王集成调红一团任无线

①王集成：《团结自己，消灭敌人》，《星火燎原》选编之三，战士出版社1980年11月版。

②王集成：《自传》（1955年于华东速成中学）。

电队政治委员兼红一军团直属队党总支部书记；9月，又调任红四军十一师政治部党总支部书记。1933年2月，王集成参加了第四次反“围剿”中的大龙坪、蛟湖战斗。这年6月初，红一方面军进行大整编，通称“腾田整编”，原红十一师编为红二师五团。王集成改任五团党总支部书记。8月，红一军团政治部主持召开“八一”运动大会，各师选派一个团作代表队参加，王集成率领红五团参加运动会。经过30几个项目的比赛，红五团获得集体优胜，被誉为中国工农红军模范红五团。原红五团政委刘忠回忆说：“红五团所以成为模范，主要是从党的建设做起，王集成这位党总支部书记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当时红一军团一师、二师各有3个团，共6个团，王集成是6个团党总支部书记中模范总支部书记。他负责部队政治工作做得很好，特别是做战士的思想政治工作很有特色。在那极为艰苦的战争环境下，红五团官兵一致，团结奋斗，步步向前，很少掉队或开小差的。”^①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错误指挥，红军接连失利。9月下旬，王集成奉命率领红五团攻打浒湾和硝石国民党军据点。因敌工事坚固，守备顽强，红五团强攻了一天一夜，毫无进展，反而自身伤亡不小，被迫撤出战斗。后来王集成所在的红五团又受命攻打大雄关。在激烈的战斗中，团长朱水秋负重伤，政治部主任张兴牺牲，战役十分艰苦。王集成和刘忠两人奉命率部撤出大雄关，向南转移，开到广昌以北之甘竹。一次，国民党军集中了11个师的兵力，沿甘竹河分左右两路进攻广昌。红五团担负掩护全军集结，阻滞敌人前进的任务，在甘竹与敌接火。国民党军气势汹汹，步

^①刘忠谈话记录（1987年8月初）。

步推进，红五团节节抵抗，一连阻击了5天，伤亡很大，代理团长陈正湘负重伤，军团委派曾桂继任团长，并调地方部队补充红五团。不到10天，红五团又奉命开到新桥以东地区与国民党军作战，因敌强我弱，曾桂团长壮烈牺牲，政委刘忠腰部挂花。在这危急关头，王集成照顾着坐在担架上的政委刘忠，指挥部队撤出战斗，向福建的建宁地区转移。

1933年10月上旬，蒋介石调集其嫡系两个师配合福建军阀刘和鼎，进攻红军驻地建宁城。王集成和刘忠奉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的命令，率领红五团在猪麻寨周围地区隐蔽集结，构筑工事，坚守防御。19日上午，原国民党军队中俘虏过来的三营二连连长叛变投敌，引敌军从两路夹击猪麻寨。猛烈的炮火轰击，加上四架敌机低飞扫射，红五团陷入敌人包围之中。王集成和刘忠指挥敢死队杀开一条血路，尔后交替掩护突围。突围中，王集成大声疾呼：“同志们！在战斗的关键时刻，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应该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呀！我们是模范的红五团指战员，在战场上牺牲最光荣，逃跑最可耻！勇敢地冲呀！”^①部队终于脱离了敌人的包围圈，转移到了安全地带。8月底，王集成参加了福建连城的温坊战斗，全歼国民党东路军一个旅一个团。

（四）

第五次反“围剿”在“左”倾冒险主义者的错误指挥下失败了。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此时，王集成调任红一军团二师六团政委。在长征途中，

^①刘忠：《从闽西到京西》，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6月版，第50页。

他和团长朱水秋，率领六团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袭击金鸡岭，旗开得胜。11月2日，他们乘胜进军，采用奇袭的战术，占领了城口。

城口是仁化县北部山区一个城镇，位于湘粤两省交界处，是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的一个山隘口，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城口临河，河边有一座木桥，公路从上边通过。国民党军在桥头设有岗哨。要进入城口必须经过木桥。王集成和朱水秋采取迂回包抄的战术，指挥一营主攻，二营迂回。是日夜间，一营趁天黑悄悄地突进到距桥头数百米处，被敌人发觉了。敌哨兵喝令：“停止前进！”一营佯称是“自己人”，飞速上前夺了哨兵的枪；此时二营也迂回到达，两面夹击，歼灭了守敌，生俘敌100多人，一举拿下了城口。

11月22日，王集成和朱水秋率红六团快速进入湖南道县以南的葫芦岩、莲花塘和九井，架造浮桥，掩护中革军委和后续部队渡过了潇水，为进一步渡过湘江造成了有利态势。27日，王集成和朱水秋又率领红六团与红五团一起，由石塘抵达大坪，涉水渡过了湘江。23日，全军团展开阻击敌军的战斗，掩护中革军委和后续部队渡湘江。红四团、红五团担负阻击，王集成和朱水秋率领的红六团作预备队。经过几天几夜的浴血奋战，虽然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一军团减员不少，但终于渡过了湘江，打破了国民党军的第三道封锁线。

突破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后，王集成和朱水秋率领红六团进占贵州黎平。中共中央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渡过了乌江，上级将夺取遵义城的光荣任务交给了红六团。

王集成和朱水秋受命之后，于1935年1月4日凌晨，率领红六团向遵义进军。当日黄昏，红六团到达离遵义城约90里的

团溪镇。部队赶了一天一夜路，非常疲劳，王集成和朱水秋决定停止前进，就地休息，命令一营作前卫营，要他们快找向导。这天后半夜，军委总参谋长兼纵队司令员刘伯承率领干部团到达团溪，亲自部署攻占遵义的战斗。刘伯承问王集成：“你们打遵义有把握吗？”王集成坚定地回答说：“我们已经研究好了，没问题。王家烈的部队我们领教过了，一定能拿下来。”刘伯承又问了部队的情况，叮咛说：“我们的日子是比较艰难的。要求仗要打得好，还要伤亡少，又要节省子弹，这就需要多用点智慧！”^①当刘伯承和王集成谈话的时候，机要员送来一份万万火急的电报。刘伯承看完电报笑着说：“三军团已截断了贵阳到遵义的交通，我们就不必顾虑敌人来援兵了。同时，总司令部命二军团派一个师从正南进攻。这样我们两个师协同作战，可以有把握地攻占遵义。”^②

王集成和朱水秋率领的红六团，在刘伯承指挥下向遵义疾进。

6日午后，侦察员报告：“在距遵义城三十里处，发现了敌人的外围据点，驻有敌一个营的兵力。”刘伯承当即指示朱水秋、王集成说：“要先歼灭这股敌人，而且要保证不准有一个漏网；否则，就会影响打遵义。”^③王集成和朱水秋立即指挥部队分成两路疾进，形成一把铁钳钳住这个庄子。下午3点多钟，天下大雨，敌哨兵没有发现红军的到来。红六团前卫一营以闪电似的动作，展开奇袭。蒙在鼓里的敌人听到枪声仓皇应战，被红军打得昏头转向，成了“瓮中之鳖”，结果，无一漏网，全部就

^{①②}王集成：《智取遵义》，《回顾长征》，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

^③《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243页。

歼。

为了详细了解遵义守敌的情况，王集成从俘虏中找来一个连长、一个排长和十几个出身贫苦的士兵，向他们宣传红军的主张和宗旨，讲明红军的俘虏政策，并告诉他们说：“我们今天就要打遵义，谁了解遵义的情况要详细报告，说得对的事后有赏。”^①那位连长在红军俘虏政策的感召下，详细介绍了遵义的城防工事，守敌的实力和位置，并画了一张草图。别的俘虏也补充了一些具体情况。

遵义城敌情的底细摸着了。王集成和朱水秋决定：把队伍化装成国民党军，利用俘虏诈城，打个便宜仗；并立即把作战方案向刘伯承报告。刘伯承听后非常高兴地说：“很好！这就是智慧。不过化装敌军一定要装得像，千万不能叫遵义城守敌看出馅来”^②。

王集成和朱水秋决定由一营营长曾保堂扮演诈城主角。刘伯承亲自对曾保堂嘱咐说：“赶快集合部队。遵义有一个师的守敌，听说红军过了乌江天险，军心动摇，我们要趁机赶占遵义。”又说：“敌人是惊弓之鸟，一轰就跑。你们一定要有胜利的信心，同时还要动动脑筋，多用点智慧。”^③接着，王集成亲自对集合待命的一营指战员作战斗动员。之后，一营随即向遵义出发。

是夜又是一场大雨，路十分难走。红六团的指战员们9点钟左右从春溪水出发，急行军两个小时，到达遵义城郊。曾保堂营长命令化装成国民党部队的红军战士佯装成在战场上败下来的样子，慌慌张张往城墙根跑去，没费多大劲就诈开了城门，接着，红军大队人马一下子拥进了遵义城。红六团取得了智取

^{①②③}王集成：《智取遵义》，《回顾长征》第129页。

遵义城的胜利，王集成受到中共中央的表扬^①。

1月7日凌晨，红二师进入遵义城。王集成和朱水秋率领的红六团，除了一部分乘胜追击逃窜的敌人外，另一部分留在城里作群众工作，并担任警戒任务。第二天，刘伯承和聂荣臻进城传达军委的命令：要乘胜追击自北门逃窜的黔敌三个团，占领娄山关和桐梓。刘伯承把占领娄山关和桐梓的任务交给红四团。王集成和朱水秋率红六团继续北上，配合红四团拿下了桐梓。

遵义会议后，军委命令各军团“迅速向赤水及其附近地域集中，以便争取渡过赤水的先机，必要时在赤水以东地域，与追击、截击的敌人一路进行决战”^②。遵照军委的命令，全军分三路向赤水进发。红一军团于1月25日首先攻占习水、土城等地，向赤水城推进。27日，在赤水城南与敌激战两日，因战斗不顺利，中革军委决定放弃由赤水北上，从泸州至宜宾间渡过长江的计划，下令迅速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开进。2月7日，军委要求各部“迅速脱离四川追敌，向滇境镇雄集中”^③。土城战斗后，王集成率部在云南边境建武附近掩护军团部首长及直属队时，与敌遭遇。次日奉命抢夺黄泥河掩护师部。第二天，王集成在进军路上左腿被敌炸弹炸伤，随军团野战医院坐担架行军。

同年6月，红一军团翻越夹金山，到达四川西部的懋功地区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7月间，红六团在过草地时遭敌骑兵袭击，伤亡较大，部队情绪受到影响。王集成闻讯后坐着担架回到红六团，仍任政委。他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加强政治工作，深入

①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王集成同志生平简介》（1987年12月），未刊。

②③李聚奎：《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党史资料征集通讯》1986年第10期。

细致地做好思想动员，安定了部队的情绪；另一方面沿途筹粮，搜山打猎，解决部队吃饭问题，使战士们增强了体力，整顿了军容，恢复了士气。

八、九月间，中革军委纵队和红一、三军团改编为陕甘支队（北上抗日先遣队），原来的一军团二师六团与四、五团合并。王集成调回军团政治部任巡视员主任。3个月后，又调到二纵十团任党总支部书记。1936年1月，王集成调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二二三团任政治处主任。2月，中共中央决定将部队改称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王集成调到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二二四团任政治委员，5月间又调任七十五师政治部主任。这期间，他随部队东征、西征，11月又参加了三个方面军联合攻打山城堡的战斗。

山城堡战斗的胜利，稳定了陕北的局势，标志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基本结束。接着西安事变发生，部队奉命南下。12月间经西安到达蓝田县，就地进行整训扩军。

1937年1月，王集成到“抗大”学习，8月毕业。恰在这时，方方到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请求派干部到闽西南，以适应斗争的需要。中共中央派王集成回闽西南担任闽粤赣军区政治部主任。王集成受命后化名王继声从延安出发，经西安到上海，绕道香港、汕头去闽西。

（五）

1937年8月初，王集成和蓝天才乔装成华侨从广东到达永定下洋，由中共地下党员许仁三引导，找到红军游击队驻地金丰的大溪圩，会见了闽西红军部队某支队负责人阮文松和王直。当时，闽西红军正在着手整编为新四军，上级发下新军服，要他们

摘下帽子上的红五角星,换上白十二角星帽。战士们思想情绪波动,支队领导人王直急得团团转。王集成的到来,帮了他们很大的忙。王集成向战士们介绍了长征路上召开遵义会议的情况,讲了智取遵义城等战斗,又把《中国全图》挂在墙上,向战士们宣讲形势。他说:日军已经侵占了我们很多国土,国难当头,民族矛盾上升,说明抗日则生,不抗日则亡,抗日做人,不抗日就要做亡国奴的利害,然后把朱德总司令戴着那缀有“十二角星”军帽的照片摆在大家面前,说明我们不能为一顶“十二角星”的帽子丢掉团结抗日这个关系民族存亡的大局^①。战士们解开了心头的疙瘩,高高兴兴地换上了新军服。王集成还亲自教战士们唱起《义勇军进行曲》,使这支红军游击队立即活跃了起来。王直后来回忆说:“我磨破嘴皮,一个多月也没解决得了的那个‘十二角星’问题,王集成只讲了一席话,就解决了。”^②三天后,王集成赶到龙岩去向中共闽粤赣省委报到,具体协助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把闽西南红军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二支队,王集成出任二支队政治部主任。为了抓好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他召集新从漳州、厦门、梅县、汕头和海外归来参加抗战的华侨青年知识分子开会,成立北上抗日宣传队,并具体布置宣传队在进军途中的任务。这批爱国知识青年组成的宣传队,后来在他的直接领导下,较好地完成了宣传任务。

1938年2月27日下午,全支队(除浙南红军游击队改编的四团三营外)共2400余人,在龙岩白土镇西边广场举行盛大的北上抗日誓师大会。参加大会的除支队和中共闽粤赣省委负责同志外,还邀请了上杭、永定、龙岩、南靖、平和等县的各界代表

^{①②}王直:《弯弓射日》,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16页。

和白土、后田一带群众一共 6000 多人。国民党龙岩师管区的涂思宗、张策安、练惕生和爱国民主人士也应邀参加了大会。王集成是这次大会的主持人。誓师大会上，张鼎丞司令员作了报告，省委代表和各界来宾讲了话。

3 月 1 日，王集成和二支队其他领导同志一起，率领部队从龙岩出发北上，经汀州到达江西瑞金，后经于都、赣州、吉安、上饶和浙江的开化埠、安徽的屯溪、太平等城镇，4 月初进入军部指定地点潜口。在进军途中，王集成领导政治部开展了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他以当时形势和红军的光荣传统为内容，细心、认真、实事求是地对广大指战员进行思想教育。此外，政治部还与当地国民党军政机关联系，宣传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伟大意义；并组织宣传队采取张贴标语、在街头演活报戏、同群众一起联欢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虽然在进行中受到某些国民党地方当局的种种阻挠，但二支队名正言顺，方法灵活，得到了沿途各界群众的拥护与支持。二支队政治部完成了在行军途中每到一地演一出活报戏，开一次各界人士座谈会、一次群众大会的计划，为唤起民众，团结抗日起了很好的作用。同时，王集成在行军途中还帮体弱的同志背背包，帮助炊事班挑炊具，宿营时帮群众挑水、扫地等。每次部队离开宿营地时，他都要检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执行情况，使新四军二支队所到之处秋毫无犯，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军部的好评^①。

1938 年春，二支队进入皖南歙县岩寺地区集中，经国民党

^①李东明：《回忆王集成同志在新四军二支队片断》（1987 年 6 月 29 日）。

当局派人来和叶挺军长点验后，到泾县进行战前的休整。可是，二支队刚刚到达皖南，尚未立定脚跟，蒋介石就三令五申要二支队向敌后进军，既不允许部队进行休整，又在编制、粮饷等方面作出种种极不公平的限制，连必须补充的武器弹药也不供给，企图借日、伪之手消灭这支由红军改编的人民军队。当时新四军二支队武器装备太差，每个班只有几支步枪，大多数战士手里只有大刀、长矛和几颗手榴弹，每个连队只有一挺机枪。许多爱国人士、社会贤达均为新四军二支队的命运担忧。在这严重困难面前，二支队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夺取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的指示，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英雄气概，毅然向敌后进军。粟裕率领的抗日先遣支队在江苏卫岗首战日军告捷，接着二支队乘胜向安徽芜湖以东的宫陡门进军，全歼驻在该地的伪军100多人，又缴获了枪枝弹药和军用物资。7月初，王集成和司令员张鼎丞、参谋长罗忠毅等率二支队由皖南进入横山地区，于京芜铁路以东，京杭国道两侧的江宁、当涂、溧水、高淳地区，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7月1日，新四军二支队司令部、政治部在大官圩召开晚会。王集成首先发言说：“抗日先遣队在粟司令员直接指挥下，取得了镇江卫岗战斗的初战胜利。斩了敌首上井，火烧了日寇的好多汽车、辎重，缴获甚多，所谓‘皇军是不可战胜的’神话，在江南战场上被我们粉碎了，从这一战例完全可以预言，我国人民抗战必胜，日寇必败。”^①他的这番话，博得到会的指战员雷鸣般的掌声。

二支队初到江南时，人民群众对他们缺乏正确的了解，加

^①邹时安：《缅怀王集成同志》（1987年7月28日）。

上国民党顽固派及日军、汉奸的造谣中伤，不少群众把新四军和国民党军队同等看待。为了宣传新四军的政治主张，使人民群众了解新四军的宗旨，王集成在政治工作中十分注意抓好部队的纪律，要求全体指战员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当地人民群众的风俗习惯，搞好军民关系，以实际行动表明新四军是一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抗日救国的新型军队，跟国民党反动军队有严格的、本质的区别。二支队在大官圩的石桥村、杨村、塘南镇、马桥、亭头、黄池、乌溪等地驻扎时，王集成每到一处都带领机关参谋、科长、干事们深入群众之中，作调查研究，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租佃关系、各阶层的思想动态以及风土人情等等，向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新四军的性质、宗旨和抗日救国的方针、政策，还定期召开军民联欢会，组织政治部文工队给群众演唱文艺节目，以丰富多采、通俗易懂、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讲解抗日必胜、日军必败的道理。同时，发动战士们帮助当地群众打扫庭院，挑水，劈柴，照顾小孩，喂养牲口。有人生病，王集成立即派部队的医生送医送药上门。人民群众把这一切视为开天辟地第一回的新鲜事，四乡传颂。大官圩有位老人称赞说：“我从清朝到民国，几十年没见过这样好的军队。”江南的老百姓众口皆碑：“新四军来了，社会秩序好了，夜不闭户，我们也睡得香甜。”大官圩、横山一带群众编起顺口溜：“工农新四军，抗日有威名，爱护老百姓，恩情似海深。”“吃菜要吃芥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①

①张望泉：《新四军二支队在当涂大官圩的光辉历程与大官圩人民革命斗争史绩》（1987年8月），未刊。

二支队在北上途中和到江南后，吸收了一大批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归国华侨。王集成十分重视这批有文化的爱国青年，组织他们学习政治理论。他说：“在我们部队和地方干部中，应该有若干同志在基础理论方面下功夫。理论是行动的指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书籍，应该挤时间攻读，努力提高政治理论水平。”^①他还以工作委员会和民先队的名义，帮助地方建立抗日群众团体，建立地方党组织，动员各界人民参加抗日救国。他和司令员张鼎丞等一起，多次召开当地农民、青年、妇女、学生、教师、商人、开明绅士以及国民党政府官员座谈会，共商抗日救国大计。8月间，他又主持召开了当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到会有5个区的代表，共100多人。王集成和张鼎丞分别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与任务》、《抗日必胜，日寇必败》、《一切爱国力量团结起来，共同抗日》等政治报告。是年秋，王集成帮助大官圩组建了一支100多人的武装力量，后为巩固和发展这支抗日武装，二支队调了两个连的部队合编成大官圩特务大队。

王集成和张鼎丞曾多次与当地国民党县长、区长等进行谈判，一再阐明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抗日救国的严正立场，要求他们密切合作，共同抗日。可是，国民党顽固派口头上说“团结抗日”，背地里却“防共、限共、反共”，极力推行其所谓“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法西斯统治。在新四军二支队占领地区，他们不断派遣特务进行破坏。为了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罪恶行径，二支队政治部在宣城狸头桥召开了数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公布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事实真象，迫使特务分子陶

^①邹时安给作者的信（1987年7月28日）。

庭宁向群众坦白认罪。王集成和张鼎丞在会上严厉谴责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号召人民团结起来与他们作斗争，重申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严正立场，并当场释放了特务分子陶庭宁。二支队这一顾全大局的态度，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拥护。

新四军二支队的绝大多数指战员来自闽西南山区的游击队，不熟悉水网地区的游击战术。为了适应战争环境的变化，王集成和粟裕、罗忠毅等十分重视抓好部队的军事训练，组织部队利用战休时间，进行水上训练，学习游泳，王集成带头学划船。

新四军二支队在当涂县大官圩和横山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王集成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组建抗日武装和建立地方党组织，坚持独立自主，保证了新四军的迅速发展壮大。王集成顾全大局的正确行动，遭到项英的打击、压制，被扣上所谓“人枪马主义”、“闹独立性”、“本位主义”等莫须有的罪名，撤销了他的职务。

1939年2月，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到皖南向新四军军部传达中央确定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以配合中共中央中原局领导的东进部队，开辟整个华中抗日根据地^①。在此期间的“二七”政工会议上，王集成领导的二支队的政治工作得到了上级的好评。9月，调王集成任新四军军部指导员班主任。

1940年1月，为了壮大人民武装力量、筹集军饷以及整顿江北游击队，新四军军部决定成立江北工作委员会，由三支队和一、三团派人参加，王集成担任工委书记。他们过江到达巢（湖）无（为）地区后，在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领导下，协助

^①《中共历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版第138页。

江北游击队争取了巢南大刀会起义，将其整编为巢南自卫总队，后来又整编成巢南独立团。接着，王集成领导的江北工委，完成了扩军三千、筹款十万和整顿游击队的任务。此后，三支队和一、三团奉命返回江南，王集成留在江北担任江北游击纵队政治部主任。

同年4月，国民党军桂顽一七六师的五二七、五二八团及保安八纵队的二团等3个团的兵力，向新四军进攻，在无为县城北的照明山发生激烈的战斗（又称牌楼战斗）。江北游击纵队参谋长桂逢洲英勇牺牲，部队伤亡较大，形势危急。纵队政委黄岩宣布军事上由王集成指挥。经过两天激战，击退了顽军的进攻，使局势转危为安。后来，游击纵队在王集成和黄岩政委率领下，安全转移到含（山）和（县）地区，改编成新四军二师六旅。照明山战斗的胜利，王集成受到上级的表扬，毛泽东发来电报，对王集成表示嘉奖^①。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为独立自主坚持华中敌后抗战，中共中央军委于1月20日发出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以华中总指挥部为基础组成新的军部，王集成等领导的江北游击纵队改编为二师六旅。皖南事变的发生，证明王集成是正确的，中共中央为此给王集成甄别平反，撤销了项英对王集成的错误处分，并发出慰问电，调王集成到新四军二师六旅任政委^②。接着，王集成率部先后参加了路东反“扫荡”和淮西地区反摩擦的战斗、路西反摩擦的大桥战斗，出色地完成了消灭敌人、壮大自己的任务。

^① 邹时安给作者的信（1987年7月28日）。

^② 张望泉：《新四军二支队在当涂大官圩的光辉历程与大官圩人民革命斗争史绩》（1987年8月），未刊。

1942年6月，王集成进华中党校学习。他认真阅读整风文件，特别重视学习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他曾对邹时安等说：“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我们党的建党学说，理论深刻，令人信服。”“我认为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对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丰富与发展。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从中吸取教益，树立共产党员的革命人生观，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坚持党的原则的立场，克服主观主义。”^①王集成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总结实践经验和教训。他和同学王胜、王培臣一起学习讨论，谈到1938年到1941年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抗日的经验教训时说：当时的情况如何呢？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日军只占据大中小城市和交通要道，其他地区为散兵游勇所占据，这时，正是我军深入敌后扩大部队建立根据地的大好时机。当时我们新四军只有1.2万人，要坚持在这一大块地区敌后抗战，这1.2万人全部用来当干部也不够，我们必须在战争中消灭敌人，壮大自己。可是，项英却认为一切要经过统一战线（实则一切经过国民党），依靠国民党当局发钱吃饭，批评人多、枪多、钱多是什么“三多主义”，把新四军解放的地区当涂县大官圩、溧阳县西、江宁县南等地都交给国民党统治，国民党当局立即在这些地方成立县政府，没几天就反共，秘密派人与日伪拉关系，策划与日伪配合攻击新四军。结果，皖南事变发生，新四军受到重大损失^②。他这种善于理论联系实际，总结经验、教训的学习态度，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1943年2月，王集成调任七师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部部

^①邹时安：《缅怀王集成同志》，存中共上杭县委党史研究室。

^②王直、王培臣：《怀念王集成同志》（1984年5月），未刊。

长；10月，兼任沿江支队政委、地委书记；后任七师政治部主任、主任；曾参加周家大山、牌楼等地反“扫荡”、反摩擦等多次战斗。

1944年冬，新四军皖江抗日根据地西边的盛家桥的国民党驻军桂系一个营，突然“启事”要求联共抗日。王集成对该营的“启事”作了充分的估计和准备，并立即向上级报告，经上级批准，该营编入新四军七师独立团，任命该营长担任独立团团团长。王集成同时指出：该营突然“启事”联我抗日，是国民党军内部矛盾冲突和下级军官、广大士兵不满其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暴露；该营的正、副营长也是被部下所迫才有此举，若有适当时机或受到外来压力，则动摇、叛变的可能性很大，要求部队保持高度警惕，防止突然事变的发生^①。果然不出王集成所料。当桂顽近一个团的兵力迫近盛家桥时，该营正、副营长就威胁其部属背叛了新四军，只有一个连长唐松光和一个排长梁森两人带了几个士兵和二挺机枪投靠新四军。由于王集成的正确处置，保证了部队的稳定和政治上军事上的主动权。

（六）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0月，中共中央根据时局的发展，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将各战略区进行了调整，把能够机动的兵力组成旅和纵队，编成野战军。二纵队（包括二师四旅、五旅、七师十九旅）由新四军副军长罗炳辉任司令员兼政委，王集成任政治部主任。接着，二纵队及叶飞率领的

^①王直、王培臣：《怀念王集成同志》（1984年5月），未刊。

一纵队(3个旅)、丁秋生率领的八师(3个团)等部队发起津浦路中段战役,围攻大安、兖州、界河、滕县、沙沟、韩庄等城镇。同年底,王集成调回山东临沂新四军政治部;1946年5月,又调任华中军区新一师副政委。是月,他在给邹时安的信中,谈到做一个好党员应该注意四点:一,在最危险、最困难的时候,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二,在最富裕、最安闲的时候,能不贪污、不腐化,不与社会恶习同流合污;三,在事业成功,职位高,人人敬、个个夸的时候,能不骄傲,不闹独立性,不搞山头主义,本位主义,不要忘记一切胜利都是党的力量,党的功绩,是群众的力量,集体的智慧,个人是微不足道的;四,在事业遇到失败时,不悲观,不气馁,在党内受到委屈时,能忍耐克制,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6月下旬,王集成和副师长陶勇接华中野战军司令部的通知,到海安参加作战会议。会上,粟裕传达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指示,依据全国局势和国民党军的企图,拟定华野在南线迎击敌人的战略计划。会议确定在苏中的泰兴、宣家堡迎击进攻之敌。具体部署要求第一、六师担任歼灭中路敌第十九旅的两个团。粟裕说:“敌人12万人马进攻我们3万多人,是四打一,我们这么一来,还了它个六打一!”^①王集成和陶勇在返回途中商议说,这次战役责任重大,能不能打败敌人?这一仗是初战,初战打得好不好,对于战役、战局,对于回答举国关心的问题,都有很大影响。回到部队后,王集成大力抓好政治工作,把海安会议精神传达贯彻到各团的连队中去,组织部队进行战前训练,发动指战员忆苦思甜,讨论为谁而战?同时引导大家分析敌情,总结抗战经验,要

^①陶勇:《苏中初战》,《苏中七战七捷》,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2、336页。

求大家战略上敢于藐视敌人,并要求各部队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抓好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强战局教育,办好团报、快报,做好战地宣传工作,还要做好瓦解敌军,优待俘虏的工作,对解放战士应“待之以诚,令之以威”。

7月13日,王集成和陶勇率领一师进军宣家堡一带。黄昏,第三旅第三团首先发起攻击。经过一夜激战,歼敌第五十六团及旅属山炮营全部,首战告捷!宣家堡的硝烟还未散尽,王集成在师部又接到华野首长急电,命令一师和六师连续作战,立即转兵日夜兼程,火速东进,歼灭进攻如皋的国民党军整编第四十九师。王集成和陶勇立即率部出发。行军途中,他们把各旅的指挥员找来,在马背上开作战会议,要求每个战士要“不怕艰苦,不怕疲劳,连续作战”,务必打好这一仗^①。18日拂晓,第一师主力5个团赶到白蒲、林梓之间地带,截断敌军退路,将敌整编四十九师师部和二十六旅全部压缩在如皋以南10公里之鬼头街、田肚里地区,展开激战。19日下午,王集成和陶勇指挥部队全线出击,在第七纵队和华中第一军分区特务团配合下,至晚间歼灭敌整编第四十九师师部大部和第二十六旅全部,仅敌师长王铁汉率领百余人逃窜,又获大捷。

此次战斗之后,王集成和陶勇奉命率一师撤至海安东北的三仓河一带休整。他们一面发动指战员总结战斗经验,进行军事训练,熟练地掌握新缴获的美式武器;一面进行政治教育,团结教育解放战士,展开立功运动,使部队兵员增,情绪高,劲头足,

^①陶勇:《苏中初战》,《苏中七战七捷》,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2、336页。

军威大振。

8月9日，华中野战军司令部下达命令：攻歼李堡、角斜及丁家所之敌，尔后相机围攻海安，打击如皋、黄桥、泰州增援之敌，并要求各参战部队于10月23日发起攻击。王集成和陶勇受命后率领一师从三仓河出发，避开大道走小路，一连焠过十几道河沟，急行军20余公里，当晚赶到李堡外围。他们抓住战机，提前于20时指挥部队向李堡驻敌发起攻击，至11日拂晓，第三旅第八团、第九团先后攻入李堡，与敌展开巷战。经一夜白刃肉搏，歼灭敌第十九团大部。次日凌晨，他们又指挥部队集中兵力攻打杨家庄，敌第三、四团孤立无援，大部分缴械投降，企图溃逃的也被消灭在野外。

李堡战斗之后，第一师又奉命攻打丁埝，准备歼灭如皋出援之敌，相机攻占陈草籍。王集成和陶勇命令第三旅以七、八两个团的兵力投入战斗，激战一夜全歼守敌。接着，他们奉命攻击泰州之敌。8月23日晚上，王集成和陶勇指挥一师进军，先头部队穿过如黄公路时，传来“停止前进”的命令。原来野司获得可靠情报：国民党军从黄桥调第九十九旅沿如黄公路北上，企图增强如皋防务，如皋城里派出一个团沿如黄公路南下接应。于是野司当机立断，紧急命令一师：就地停止待机，歼灭这股敌人。王集成和陶勇等研究了上级的命令，觉得野司这一着真高明，“一举而赢得三着！敌变我变，真是灵活机动，大胆的决定。”^①这天午后，一师与敌展开遭遇战。他们命令三旅顶住敌人，激战至黄昏，又接到上级命令要一师第一旅赶到南面分界地区，配合六师围歼敌第九十九旅。这次遭遇战，华野集中优势兵力以九个团攻敌五个

^①陶勇：《苏中初战》，《苏中七战七捷》第342页。

团，获得全胜，歼敌两个半旅，俘敌第九十九旅旅长朱志席、副旅长刘光国和敌第一八七旅旅长梁采林以下官兵共 1.2 万余人，毙伤敌 5000 余人。

在苏中“七战七捷”战役中，王集成和陶勇密切合作，勇敢顽强，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出色地完成了作战任务。第一师也在战斗中成长壮大，由原来 1 万余人、武器陈旧的部队，发展成 1.5 万人的美械化师了。

1947 年 1 月，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统一改编成华东野战军，王集成任第四纵队政委。2 月初，他率部参加了著名的莱芜战役，首创了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一举歼敌 7 个整旅的光辉战绩。5 月上旬，在孟良崮战役中，王集成指挥四纵队配合一、二、三、六、七、八、九、十纵队，以几倍于敌的绝对优势兵力，实施中央突破，割歼敌整编七十四师。16 日，四纵与兄弟部队一起，在猛烈炮火支援下，全歼敌七十四师，击毙其师长张灵甫。在 1948 年 9 月的济南战役中，王集成和陶勇率领的四纵与六纵、七纵、八纵、鲁中南纵队、十一纵、十二纵和中野十一纵，冀鲁豫独立第一、第三旅等部，在兖州、滕县、泗水地区，与运河以西的嘉祥、菏泽地区，组成阻援集团，阻击可能由徐州北援之敌。济南战役历时 8 天，共歼敌 10 万余人，使山东全境基本解放。11 月，王集成参加了淮海战役。1949 年 3 月，他调任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

（七）

新中国成立后，王集成调任华东航空处政委兼党委书记。1950 年 2 月，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对

上海进行空炸。中央军委命令华东航空处和上海防空部队联合组成上海防空军，陈毅任司令员，王集成任政治部主任，蒋天然任参谋长。4月，中央军委命令成立华东空军，王集成任政委兼党委书记，蒋天然任参谋长，工贵德任政治部主任。

上海防空军和华东空军成立后，一面组建空军和防空部队，修建空军基地；一面与美蒋空军作战。在陈毅、粟裕领导下，王集成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在抓好部队政治工作的同时，着重抓空军基地的建设。短短几个月，迅速建成了一支航空部队和防空部队。同时，在一片废墟上修建了青岛、济南、南京、上海、漳州、泉州等十几个空军机场。在上海防空作战中，人民空军首次飞上蓝天，与美蒋飞机作战。这是人民军队第一次进行现代化的主体防御作战。经过三个月零二十天的防空战斗，共击落敌机16架，取得了上海领空的控制权，胜利地完成了上海防空的战斗任务。

在组建华东空军的过程中，王集成坚决贯彻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加强党的领导，为在空军这样的一个新军种中开展政治工作创造了经验。后来，空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涌现的战斗英雄张积慧、王海、赵宝桐、刘玉提、王天宝、赵大海等，都是在华东空军培训成长起来的。

为了加速华东空军基地的建设，节约军费开支，王集成创造性地建立了一个以部队为整体的自负盈亏承包工程的大建公司，大大加快了速度，节约了大量的经费；同时，培养和训练了一支基建、技术力量，保证了机场质量，在防空战斗中起了积极作用。

同年8月1日，华东空军正式成立，聂凤智为司令员，王集成任政委兼党委书记。到1952年初，华东空军已发展到9万

多人，基本上完成了华东空军的组建任务。为此，王集成日夜操劳，呕心沥血，废寝忘食。他曾经说过：“我是工农出身，文化不高，不能够在马列主义理论宝库里有什么发展，但我要在建设社会主义大厦上添砖加瓦。”他经常深入部队、基地，了解情况，与干部、战士促膝谈心，征求他们对工作的意见。”

正当华东空军从无到有，初具规模，各项工作逐步走上轨道的时候，有人利用“三反”运动的机会，诬陷王集成是什么“大老虎”。王集成被迫停职审查，并在“三反”运动后期被处分——留党察看一年。1955年授军衔时，王集成因此只授予少将军衔。王集成本着共产党员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党性原则，坚信党组织总有一天会实事求是地对待他的问题。他一方面服从组织的分配，进华东军区速成中学学习，提高自己的党性修养和文化素质；一方面向党组织申诉，要求澄清事实，给予平反。后又进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学习。1957年1月，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副政委。

王集成在铁道兵工作期间，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上级的指示，注重铁道兵部队自身的建设。他针对铁道兵部队的特点，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为铁道兵的建设 and 铁道兵完成战备、施工任务做出了贡献。

1962年12月12日，周恩来对铁道兵的建设作了重要指示：铁道兵编制应本着官少兵多，提高生产人员的比例的原则；编制干部人数不得超过10%，全年劳动240天，生产人员达80%以上^①。王集成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始终不渝地坚持铁道兵

^①铁道兵善后工作领导小组史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王集成同志在铁道兵工作期间的情况简介》（1987年4月2日），未刊。

是工程部队的思想。他分管干部工作，在部队干部的配备上，按照不超过10%的比例严格把关。在部队的政治教育、军事技术训练等方面，坚决以保持全年劳动240天的基础上进行安排。

王集成注重调查研究。为了开发东北林业资源，加速我国林业建设，适应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从1962年冬开始，铁道兵部队担负了东北森林铁路的修建任务。部队在人迹罕至、气候严寒的恶劣环境下，生产、工作、生活非常艰苦。王集成不畏艰难，深入林区，到施工部队去进行调查研究，多次慰问战士，了解施工生产情况，总结典型经验，指导工作。他以多年政治工作经验，结合新形势下部队工作的特点，在铁道兵部队中提出“以艰苦为荣，劳动为荣，当铁道兵光荣”^①的口号，深入进行思想教育，为部队的思想建设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王集成在工作中忘我的革命精神是令人钦佩的。1964年夏秋间，他身患心脏病、糖尿病。为了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他说服医务人员，登上海拔3000多米的青海高原。在青海湖边和连队战士一起住进帐篷，同吃一锅饭，同点一盏灯。经过数个月的调查研究，写出了调查报告，针对基层干部战士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加强连队党支部建设，培训连队指导员等具体建议，为铁道兵总部所采纳。

十年动乱中，王集成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与迫害，被迫离职回到福建顺昌老家。在艰难困苦中，他坚信党的领导，坚信革命事业必定胜利，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作了坚决的斗争。粉碎“四人帮”以后，王集成重病在身，仍然

^①铁道兵善后工作领导小组史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王集成同志在铁道兵工作期间的情况简介》（1987年4月2日），未刊。

关心国家大事，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对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国家出现的新局面，感到万分喜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军委关于撤销1952年“三反”中对王集成的错误处分，改为行政六级，大军区正职。

1983年5月11日王集成逝世后，中共中央军委和人民解放军三总部为王集成举行追悼会。在悼词中号召大家学习王集成努力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党对人民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革命精神；学习王集成勇敢战斗，不怕牺牲，努力工作，不怕困难，勇挑重担，认真负责，联系群众，深入实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德；学习王集成胸怀坦白，光明磊落，识大体，顾大局，坚持原则，掌握政策，服从组织，遵守纪律，维护团结、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

附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王集成自传》，存中共上杭县委党史研究室。
2. 《聂荣臻回忆录》（上）。
3. 李志民：《抗大抗大越抗越大》，《中共党史资料》（7、8）。
4. 《回顾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会师五十周年》，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
5. 王集成：《智取遵义城》。
6. 王集成：《团结自己，消灭敌人——红军反“围剿”期间政治工作的片断回忆》，《星火燎原》选编之三，战士出版社1980年11月版。
7. 王直：《为革命挑重担——悼念优秀共产党员王集成同志》，未刊，存中共上杭县委党史研究室。
8. 王直、王培臣：《怀念王集成同志》，未刊，存中共上杭县委党史

研究室。

9. 王直：《弯弓射口》，解放军出版社 1985 年版。
10. 陶勇：《苏中初战》，《苏中七战七捷》第 330 页。
11. 《苏中七战七捷》，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12. 李聚奎：《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党史资料征集通讯》1986 年第 10 期。
13. 访问失散老红军刘大文（王太堂）记录。
14. 访问才溪乡老红军林攀阶纪录。
15. 函访刘忠、刘少卿、邱子明回忆材料。
16. 函访朴明、蒋天然回忆材料。
17. 函访李东明（谢影冰）回忆材料。
18. 张望泉：《新四军二支队在当涂大官圩的光辉历程与大官圩人民革命斗争之史绩》。
19. 邹时安：《缅怀王集成同志》。
20. 《中国红军长征记》，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6 月第 1 版。

何 穆

田 蓓

何穆是我国著名的医学科学家。他以高尚的医德、高超的医术长期从事中共党领导的医疗卫生工作，为建设、发展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医疗卫生事业，为开创新中国结核病防治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作风朴实，刻苦耐劳，勤奋治学，克己奉公，是高级知识分子的优秀典范。”^①

（一）

何穆，字公競，1905年4月22日出生在上海市金山县廊下镇郊一个地主家庭。

何穆自幼丧父，在孀居母亲的培养下长大。6岁起在本村一个堂叔家的私塾内附读，11岁入廊下镇景瑞高等小学读书。15岁小学毕业，到上海进了一所工商学校。此时出国留学出现热潮。何穆受此影响，也准备出国，遂于同年9月转入震旦大学附中学习法语，三年毕业，又入该校医预科学习两年。

1926年7月，何穆委托母亲卖掉分家时自己所得的一份田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何穆同志生平》（1990年4月13日）。

产，筹款自费赴法留学。到法国后，先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医学院学习；后因费用不足，于1928年10月转入可由庚子赔款资助食宿和学费的里昂中法大学，就读于医学院。1929年5月，何穆患肺结核，被校方免费送到邻近瑞士的高城疗养。高城法国公立肺结核疗养院院长采用人工气胸术为何穆精心治疗，同时还允许他在该院实习，并成为促成他选择以治疗结核病为专业的导师。1930年10月，何穆遵医嘱到位于法国中央高原的克勒蒙菲朗大学医学院继续学业，所需费用仍由里昂中法大学资助。1934年4月，何穆到图卢兹大学医学院参加毕业考试和通过毕业论文，1935年1月毕业，获博士学位。

何穆在法国学习、生活了8年多时间。在法国他结识了莱葛尔夫妇。莱葛尔在克勒蒙菲朗市一家汽车制造厂做工，他和妻子不仅在生活上关心、照顾何穆，还经常与何穆谈起法国的工人阶级状况和工人运动。莱葛尔订阅一份法国共产党办的《人道报》，何穆每期必读，从中得知不少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情况。

1935年初，何穆从巴黎启程回国，到达上海后，在家乡小住数月，得好友鼎力相助，在无锡开设诊所行医。1936年秋，一位留法时的同学来无锡看望何穆并带来信息：南昌法国天主教会圣类思医院来沪聘请留法内科医生，待遇优厚。何穆决定前去应聘。10月，何穆到达南昌，入圣类思医院工作；同时，每天下午仍在自己开设的诊所行医。

何穆行医，对病人一视同仁，热情诚恳、认真负责。遇有穷人请他治病，经常少收或不收诊费。他的医术也日趋精湛，很快成为治疗肺结核的专家，许多人慕名而来，不少有钱人出高价请他出诊。生活逐渐富裕起来，而何穆的心灵却越来越不得

安宁：国内的肺结核患者为什么这样多？穷人得了病无法休息、无法营养、无钱医治；富人得了病，精神抑郁，照样治不好。医学和社会制度的关系究竟怎样？医生的责任到底是什么？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养成的探索精神，驱使他去寻找答案。

何穆在无锡和南昌期间，正值国内抗日民主运动不断高涨，迫使国民党改变“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国策，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全民族抗日战争开始之时。何穆也和千千万万中国普通民众一样，汇入抗日的洪流之中。从上海抗战前线下来的重伤员陆续到达南昌，何穆在医院中积极参加抢救、治疗。国民党当局号召人民捐献金银，说是用来购买飞机“航空救国”，何穆毫不犹豫地拿出自己的戒指、银元。日本飞机轮番轰炸南昌，无数居民被炸死，房屋被炸塌；日本侵略军在杭州湾登陆，何穆家乡整个村庄的房屋被烧，他二哥何庄晖因迫当挑夫不从而被枪杀。国恨家仇，何穆热血沸腾，急于为抗战效力。

1937年底，何穆随撤退的人流到了重庆。适遇国民党军队一二一后方医院招请医生，并宣传该院专门救治前线下来的受伤抗日将士。何穆前去报名，几天后乘船至距涪陵县城数公里的医院报到，被任命为少校军医。

然而，一二一后方医院院长不仅不通医术、不谙管理，还滥用私人，甚至倒卖药品，牟取暴利；仅有的几个医生、护士，依仗与院长有亲友关系，不干实事，整日闲荡。凡是诊断、换药，都由何穆一个人承担。那里的伤员，是从别的医院转来的，连日本人的影子都没见过，并不是什么抗日将士。何穆大失所望。他迅速抛弃在国民党领导下参加抗战的幻想，1938年6月，借故离开了一二一后方医院，回到重庆，寄住青年会的宿舍，在生活书店重庆分店食堂搭伙。

生活书店是邹韬奋先生创办的进步书店，该店重庆分店的青年经理李济安（李文）是中共地下党员。何穆与李济安谈话投机，一见如故，很快成为挚友。何穆喜欢阅读进步书刊，李济安就把《生活周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送给他看。李济安聘请何穆做生活书店的医学顾问，使他能接触更多的进步青年；还邀请何穆去给新华日报社等中共驻重庆机关的同志看病，增加他对共产党人的感性认识。在李济安的帮助下，何穆决心去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经李济安介绍，何穆来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正式提出去延安的申请。当时是吴玉章主持办事处工作，吴玉章之子与何穆是留法同学，对何穆的为人学识已有了解，见到他后非常高兴，当即写信推荐。何穆带着吴玉章的亲笔信，踏上了去延安的革命征途。

（二）

1938年8月，何穆到达延安，受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兼政委萧劲光、军委总卫生部部长姜齐贤、中央总卫生处处长傅连璋等的亲切接见。他们对何穆自愿来到艰苦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表示热烈欢迎。何穆被安排到军委总卫生部下的边区医院工作。因何穆是治疗肺结核的专家，边区医院特成立肺科，任命何穆为肺科主任。不久，日本帝国主义飞机轰炸延安，边区医院位于宝塔山下，成了被袭击的目标。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副部长李富春为保证何穆的安全，特将他转移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居住，并调他到中央卫生处门诊部任主任。

延安，一方净土，一方圣地。这里有宁静无染的山林和蓬

蓬勃勃的生机，有不屈不挠的抗战意志和自由、平等的民主精神。何穆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振奋。他积极工作，看病不计业务范围、职务高低，出诊不顾山高路远、风雨泥泞，很快博得干部群众的一致好评。中央领导同志也为得到这样一个宝贵的医疗人才而高兴。陈云主动将自己的马送给何穆，为他行医创造更好的条件。领导的信任和关怀，更增加了何穆的革命责任感，提出了许多合理化建议。延安原来每个单位都设几名通讯员，每天分别向各有关单位递送文件，远的甚至来回四五十公里路。何穆建议在组织部设一个信件交换站，每个单位只要一名通讯员，把要送往各有关单位的信件带到交换站，然后再把给本单位的信件带回去。李富春当即采纳何穆这个建议。这种信件交换办法，受到各方面的赞扬。何穆看到军队与地方都有所属医院，唯独中央机关没有直属医院，多次向李富春等领导同志建议：在中央机关创办一个比较完备的、尽可能现代化的直属医院，以解决干部和首长的医疗与保健问题。

1939年7月10日，从重庆回延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周恩来，因坠马右臂受重伤。情况紧急。但中央卫生处既无骨科医生，又无骨科诊断设备，在场的几位中央首长便决定由傅连璋和何穆两个内科医生赶赴现场诊治。傅连璋和何穆尽自己的骨科知识，诊断臂伤为右肘关节脱臼却无法发现肱骨内髁骨折（裂缝），于是，仅为周恩来做了脱臼整复，但未能处理骨折。这件事后来成为何穆的终生遗憾。

7月底，李富春找何穆谈话，告诉他：中央通过了你的建议，委托你筹备一个比较完备的、尽可能现代化的中央直属医院。还说：完成这个任务困难是很多的。助手，只能分配给你一个，他叫陈洛怡，上海人，22岁，当过工人，右腿受伤后截肢2/3；经

费，给你准备了 3000 元；器械，只有到新市场去找；至于选地址算是最容易的，我们替你物色了两位有经验的打窑洞工人，帮你选地址，在中央机关范围内，凡是适于打窑洞的向阳山坡都可以。受命后，何穆第二天便在打窑洞工人的陪同下，翻山越岭选择院址，奔波两天，最后选中了位于中央政治局、陕北公学与中央保育院中间的李家湾村旁边的一个山沟口作为院址，经李富春同意确定下来。这样，中央直属医院就在“一座山、两个人、三千元”的情况下着手创建。

医院医疗上用的设备，需用白铁制作，但当时延安白铁工人很少，技术也差，消毒锅、大小便器和化验室用具的形状及要求，白铁匠见都没见过，更不会做。何穆便亲自动手，帮助他们剪裁铁皮、卷边、焊锡，先制成一两个成品，然后再让他们仿造。

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医院初具规模。共打了 40 多孔窑洞，另建了一些平房，各种设备也基本置办齐全。与此同时，中央组织部陆续调来一批医护人员、后勤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9 月下旬，就在医院开张前夕，何穆因家庭问题要求去重庆。临行前，接受组织上委托：到国统区为新建医院招聘医护人员、采购药品及医疗器械。李富春还让何穆带他的亲笔信给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主任钱之光，要他找机会安排何穆去香港采购医药器材。

何穆到重庆后，以开设诊所行医为掩护，抓紧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但招聘人员的事，遇到不少困难。当时重庆的医护人员，大部分是因不愿当亡国奴从沦陷区来的。他们有一技之长，工作比较稳定，生活比较安逸。其中多数人是想暂时避过灾难，待抗战胜利后回老家去；也有少数人悲观失望。他们

对国民党政治腐败、消极抗日不满，但愿意到延安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工作的人却很少。何穆通过社会关系，联系、接触了一些医务人员，向他们介绍延安的情况：吃小米、穿布衣、住窑洞，生活当然比重庆艰苦，但是那里没有重庆这种沉闷、压抑、令人窒息的政治空气和复杂的人际关系；共产党和边区政府相信和依靠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政治清明，大家为抗战胜利团结奋斗；人与人之间平等互助、开诚布公，生活丰富多采，军民联欢周末舞会、球赛、游泳，健康活泼，别有情趣。经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有些医护人员有正义感的决定随何穆去延安。他们中有医生、助产士、护士、化验员等，这批人到延安后很快成为医院的业务骨干。采购药品和医疗器材的事更为困难。何穆多方奔走，总算买到了显微镜1架，血球计1副，体温表4个，以及少数空针针头和一些注射药品。第一个从法国巴斯德研究院要来卡介苗到中国的王良医生，还送给了何穆三对做实验用的天竺鼠。

何穆在重庆期间，在为完成领导上交的任务而奔忙的同时，还担任了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保健医生。他的工作得到了正在重庆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的周恩来的热心支持和帮助。周恩来曾亲手烹制了家乡菜——红烧狮子头给何穆送去。何穆患肠炎住医院治疗，周恩来让邓颖超带着鲜花前去慰问；何穆将志愿赴延安的医务人员集中到八路军办事处时，周恩来在何穆的陪同下前去看望，并作了亲切谈话。

1940年11月底，何穆领队，一行七人，身着八路军军装、搭乘八路军办事处租用的卡车，以八路军医官及看护赴山西前线经过延安给国民参政员吴玉章看病为由，从重庆出发前往延安。何穆领队，沿途对大家照顾十分周到。12月初，卡车行至

距陕甘宁边区不远的同官（今铜川），被驻扎在那里的国民党武装特务以未接到上级放行命令为借口强行扣留。特务们强迫何穆等住进一个指定的旅馆，检查了他们的行李，采取白天集体训话，夜间个别谈话的办法，对他们进行威吓、哄诱、分化瓦解，千方百计阻挠这批医务人员去延安。

何穆一行被扣留在同官整整 10 天，直到另一辆八路军的卡车途经同官返回延安将他们的情况作了汇报，中共中央才知道消息，立即拍电报给重庆的周恩来，周恩来马上去向蒋介石交涉。蒋介石这时正准备发动皖南事变，不想打草惊蛇，遂命令胡宗南放行。

12 月 11 日，何穆一行到达延安。第二天，陈云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王首道找何穆谈话，向他宣布决定：任命何穆为中央医院院长。何穆上任后，为将医院各项工作纳入正规化轨道竭尽全力。首先，增加人员，健全机构。在何穆要求下，组织部调来了中共总支部书记、院秘书长和总务处长，加强了医院的党政领导；还给医院分配来几名新从国统区来的有经验的医护人员，为医院成立新的科室创造了条件；接着，又从延安几个抗日干部学校中，动员了 40 名具有高中文化水平的青年学员，到医院参加第二期护士训练班，加强了医院的护理力量。其次，增加房舍。在何穆主持下，以原有窑洞为基础进行填平补齐增加新窑洞，依山势逐渐向上，形成九层楼式的窑洞分布，实行一科一层编号管理，还加盖了一些平房做手术室、会议室、俱乐部和工作人员宿舍等。第三，建立健全规章制度。除进一步明确医疗制度、护理制度、病房管理制度、各级各类人员职责范围外，还建立了全院性的业务学习制度和改革了住院制度。这些制度的推行，加强了医院的管理，提高了医院的医疗质量和

工作效率。

在扩建医院过程中，何穆本着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土洋结合的原则，带领全院同志自己动手干。病床是用几根木棍，几块木板制成的；厨房、厕所要防止苍蝇进入，在出入口修上转弯的黑弄；医务人员需讲究个人卫生，就架起一个周围打孔的大木盆，再接上胶皮管挂在钉子上，随时可以淋浴；手术室、产房、婴儿房既要保持一定温度又不能有灰尘，就学习陕北老乡烧土炕的办法，砌成地炉火墙；手表极少，闹钟只有一个，要统一掌握时间，怎么办？先设计制造一个日晷，再找一段铁轨吊起来敲，早5点到晚10点之间每小时报时一次；护士试体温、数脉搏，用玻璃试管制成的“砂漏表”计时；测试肾脏功能，应用尿素定量方法，没有测试设备，就采用测试肾脏排尿功能与肾脏浓缩尿素功能来代替，只需比重计和量杯就解决问题；治疗疟疾没有奎宁，用914注射液0.3克注射，也达到同样效果。

医院经过一年扩建，工作人员增加到350人，设置了内、外、妇、儿和传染等科以及药剂、化验、X线等室，病床达180张，基本满足需要。门诊、治疗、护理工作秩序井然，医护技术接近国内先进水平，一所比较完备的、尽可能现代化的医院终于建成。白天，医院的倒影映在延河水中，雄伟多姿；入夜，一层层窑洞灯火通明，蔚为壮观。一些来延安访问的国际友人和国统区民主人士到此参观，无不感到惊讶和赞叹。

1942年春，原内科主任工作调动，由何穆兼任内科主任。不久，中央又决定中央医院设立肺科，以收容中央卫生处疗养所的危重肺结核病人，也由何穆兼管。自从接管两个科后，何穆的主要精力逐渐转移到病房。年底，得到中央组织部领导同志的同意，何穆辞去院长之职，由傅连暲兼任。

何穆在中央医院担任院长和科主任期间，到中央医院就医的病人有中央机关和军队、地方的首长和干部，也有边区的职工、农民，还有日本工农学校的学生和其他国际友人。对路远病重行动有困难的病人还要出诊治疗。中央医院的医生，还要去中央卫生处门诊部参加门诊，到延安别的医院参加会诊。据统计，从1939年到1945年，中央医院共收治伤病员12677人，为救治干部、群众伤病，保护中央领导同志的健康，做出了很大贡献。此外，中央医院还担负着为中央领导同志做健康检查，以及卫生防疫、培养实习医生、培训前方卫生干部、训练其他医务人员等任务，何穆和他的同事们，都完成得很出色。

何穆医疗作风严谨，对病人尽心尽责。他每天必查病房，仔细检查患者病情，提出治疗措施。遇有危重病人，则一天几次看望，想方设法解除病人痛苦，挽救病人生命。夜间抢救，更是随叫随到，不辞辛苦。为保证病员伙食符合标准，何穆亲自制订食谱，到炊事班给炊事员讲解食品的营养成分及怎样才能不破坏其营养成分，并做烹饪示范。为使病人早日恢复健康，他反复嘱咐护士：这些病人都是为人民立了大功的，你们要细心地护理好他们。他亲自教护士给病人洗脸、洗脚、搓澡、翻身、喂饭、清理大小便、替换床单，有时还抽空坐在病人床前，拉着病人的手，好言安慰，或说些幽默笑话，使病人开心。在何穆的带动下，医护人员与伤病员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形成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的风气，模范医生、模范护士不断涌现，受到中央领导同志和伤病员的一致赞扬。

1941年至1942年，由于延河水系污染，延安伤寒病流行。何穆顾全大局，先是抓紧盖一排平房设立传染科，后来又把内科的大部分病房也改做传染病房，先后收治患者近200人。何

穆带领两科医护人员，克服药品缺乏的困难，提出“三分治疗，七分护理，视病人如亲人”的口号，千方百计为患者医治。在大家的努力下，中央医院伤寒病人的治愈率很高，死亡率低于国统区。同时还向群众大力普及防疫知识，使伤寒病迅速减少。

1943年6月，何穆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肺病病的疗养法》一文，用极其亲切、通俗的语言，详细介绍了有关肺结核病的常识和防治方法，特别提出了疗养的重要性，对当时延安地区的肺结核病防治起了积极作用。

何穆十分重视卫生防疫工作，提出大搞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提倡医务人员走出医院为人民群众防病治病。为了搞清延安地区结核病发病率，何穆亲自操作X线机，先后为几千名干部和群众进行了肺部透视普查，对查出的结核病人及时予以治疗。还组织医务人员对当时延安发病率较高的关节炎、心脏病进行了普查，发现1/3的人心脏有问题，并分析出是窑洞阴湿、光线不足引起，提倡多晒太阳，增加室外活动。何穆还参加医疗队到瓦窑堡地区进行巡回医疗，了解到陕北农村缺医少药、无医无药的情况，经常组织医务人员下乡为老百姓防病治病。

1943年，陕甘宁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中央医院也成立了生产委员会，组织大家在业余时间开荒种地、养猪养羊、纺羊毛、织袜子，劳动所得交公。何穆除带头完成分配给自己的生产任务，还开动脑筋搞技术革新，给纺羊毛用的简易纺车增加了一种装置，提高效率好几倍。周恩来知道后，在一次中直机关大会上提出表扬，称之为“何穆式纺车”，建议推广，中直系统各单位纷纷派人前来学习。

中共领导人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作风，使何穆深受教育。一次，中央医院化验室委托重庆国民党中央医院化验室

的进步人士龚真纯女士，搞到了延安急需的正伤寒和副 A、副 B 伤寒菌种。何穆得悉周恩来正好要从重庆回延安，便写信给八路军办事处，想请周恩来的随员将菌种顺便带回。周恩来得知此事后，冒着传染病的危险，将三管菌种放在自己的中山装口袋里带回延安，交给何穆，使何穆深受感动。

当改革后的何穆主持制定了一个新的住院制度，上报党中央。王明对住院病人须经医生检查批准这一条很不满，曾严厉地批评了何穆，使何穆不知所措。张闻天知道此事后，特邀见何穆，对他说：我们实行集体领导，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意见只代表个人。你们搞的住院制度，过几天我们有会，还要讨论一下。几句话稳定了何穆的情绪。一星期后，新制度果然得到了批准。陈云亲自参加中央医院的党员干部会议，要求全体党员尊重专家，带头实施医院管理新制度，使中央医院早日正规化。

1944 年，何穆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让党进一步考验自己，何穆提出上抗日前线的请求，并且为适应前方需要，潜心向苏联医生阿洛夫学习外科技技术。何穆阅读了所能找到的外科书籍，观摩阿洛夫的每次手术，虚心求教，很快就能充当阿洛夫的助手，并可以在手术中与阿洛夫医生交换位置。

1945 年 8 月 30 日，何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三）

抗日战争胜利后，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请求中央派遣医务人员加强晋冀鲁豫军区的医疗卫生工作。1945 年 9 月初，何穆率中央医院的 5 位医护人员离开延安赴晋冀鲁豫军区。他们用两匹马和一头骡子、一头毛驴驮着简

单的医疗器械和个人行李，在向导的带领下，晓行夜宿，翻山越岭，冲破层层封锁线，经过半个多月的长途跋涉，到达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河北省涉县赤岸村，受到刘伯承、邓小平热情欢迎。何穆被任命为晋冀鲁豫军区卫生部副部长。首长们委托他尽快创建一个较正规的后方医院，一方面接收医治疑难重症伤病员，一方面附设学校培养医疗卫生人才。何穆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何穆率随行人员到山西长治，与原驻那里的八路军野战医院的两个医疗所和野战卫生学校的部分人员合编，于1946年春在一所日伪时期陆军医院的旧址上成立了晋冀鲁豫军区预备医院，开始接收救治伤病员。几个月后，医院奉命迁至河北邢台一所师范学校内，军区卫生部又陆续从各有关单位抽调人员充实医院各部门。同年7月1日，成立了晋冀鲁豫军区白求恩和平医院总院，何穆兼任院长。军区副政委薄一波、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后勤部部长杨立三等，对这所医院的创建、发展极为重视，给予大力支持。在何穆等的努力下，医院很快成为太行、太岳解放区的医疗卫生中心。

1947年夏，刘邓大军南下，医院也曾准备随迁。鉴于太行老区人民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做出重大贡献而目前又缺医少药，薄一波与刘、邓商量，将医院转交地方，更名为晋冀鲁豫边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何穆被任命为晋冀鲁豫边区卫生局局长、太行行署卫生处处长，兼任医院院长。1948年5月，医院迁回长治，安置在日本投降后遗留下的旧兵营中。

太行老区条件十分艰苦，军区首长将有限的经费、缴获的物资，优先拨给医院，何穆深知这些经费、物资来之不易，带领全院同志自力更生，精打细算，勤俭办院。院址破烂不堪，他

指挥修整、改建房屋，从制作门窗、安装玻璃到抹水泥地面，都和大家一起动手；医务人员的工作服、伤病员的床单、被褥，以至病房的窗帘、手术室的消毒巾，全部由他亲自剪裁缝制成样品，再教大家去做；高压消毒锅、蒸馏器等设备也是他组织医院人员自行设计、制造的。换药时用几块敷料，缝合时用几尺线，何穆都从不让超过用量。谁到时间不封火，浪费了几块煤；谁在化验单上乱划，糟蹋了一张纸，都要受到他的批评。为了节省肥皂，他让大家把肥皂挂起来使用，为战争节约每一块铜板。

为保证医疗质量和工作效率，何穆吸取延安中央医院的经验，从建院开始就制订和推行正规医院的医疗规则和管理制度。何穆对医护人员的要求非常严格。他说：伤员们没有死在战场上，绝不能在我们这里出问题。他决定强化无菌操作，除对所有手术器械、敷料等进行严格消毒外，他要求医生在手术前洗手、刷手长达 15 分钟。这些措施使医院的手术化脓率控制在 4‰，这种成绩在当时大城市的大医院中也是罕见的。

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攻解放区，医院不得不转移到山区，辗转于河北邢台县固坊村、沙河县安河村、武安县西井村等地。医院搬迁，困难重重。大量的医疗器械及用品，大批的伤病员，只能用车拉马驮，有的还要医护人员身背肩扛。山路蜿蜒崎岖，队伍浩浩荡荡。每次搬迁，何穆都苦心安排。他对每一件医疗器械、用器都视为珍宝，指挥大家小心捆扎、搬运，不准损坏、丢失，对伤病员更是千方百计周密护理，保护安全。转移途中，暂住山村，伤病员分散在老百姓家中，何穆仍坚持每日查房，跑上跑下，不辞辛苦。

这期间，何穆仍兼任医院的内科、传染科主任，许多外科

手术也由他执刀，经常分管几十个病人，亲自写医嘱，甚至兼顾着手术室和 X 线室。随着战争的发展，医院因奉命抽调到前线的医护人员越来越多，同时到医院里来治疗的危重伤员却与日俱增，何穆更是忙累不堪。1948 年夏，炎热异常，封闭的手术室像个大蒸笼，何穆带着医护人员废寝忘食，昼夜不停地进行手术，抢救伤员，直至他累倒在手术台前。河南焦作地区发生黑热病，疫情严重。何穆率领小分队跋山涉水、日夜兼程赶赴疫区，一面抢救病人，一面组织调查。他挨家挨户查看谁家有蚊子，谁家有狗，动员群众灭蚊打狗，很快控制了疫情。

何穆在晋冀鲁豫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工作期间，能做到知人善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医院的多数医护人员是在革命队伍中成长起来的，觉悟高、干劲大，但文化程度比较低，医疗技术水平比较差。何穆请这些同志负责医院各部门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各方面的组织领导工作，充分放手让他们分管病人，参加手术，单独出诊，使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得到锻炼。他除自己花费大量心血言传身教外，还千方百计为这些同志创造条件参加进修、深造，使他们的文化程度和医疗技术水平迅速提高。有一名延安中央医院的护士，跟随何穆到太行和平医院后很快担任了手术室护士长，后来又成为助产士、妇产科大夫。何穆送一名小八路出身的同志去军区学习 X 线技术，临走之前千叮咛万嘱咐，学习期间还翻山越岭走几十里路前去看望，从指导教师那里了解他的学习成绩，备加鼓励。何穆还积极为这些同志中的已婚夫妇解决两地分居问题，亲自去找有关领导机关，将他们的爱人由四面八方的其它机关、部队调入医院。每当调动被批准，他都要派人牵马去接，还派人用木板为新团聚的夫妇隔出单独的房间。对医院里住单身宿舍的小青年，他更关怀备

至，夜间给他们盖被子，行军时把马车让给小鬼们坐，全院上下，一派团结和谐的革命景象。

建院不久，几位新解放区和国统区的医学专家相继来院工作。他们毕业于国内正规医学院校，有的还曾出国留学，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何穆请他们担任主要科室的主任，充分发挥他们的专业特长，创造条件使他们能顺利开展工作，在生活上也给予特殊照顾；想方设法让他们住单间，吃小灶；家具比较干净齐全，饭菜尽量营养丰富。夏天，用木架子和布给每人做一个简单的躺椅乘凉；冬天，给每人量体做一件皮大衣御寒。医院每次搬家，何穆都要指定专人为专家搬家队队长，负责照顾好专家们一路的吃、住、行和安全。这些专家感到革命队伍的温暖，工作起来都尽心尽力。何穆还安排这些专家住在离自己较近的地方，以便经常同他们接触，与他们谈生活、谈工作、谈形势，了解他们的思想情绪，帮助他们树立起干好革命工作的信心。专家们对何穆心服口服，都把他当做知心朋友。直到全国解放，这些同志没有一位离开解放区，后来都担负了重要的工作。

自1947年底始，世界卫生组织也陆续派医生来院工作，有美籍、加拿大籍的外科、胸外科、骨科专家，有英籍、新西兰籍的护理专家等。何穆要求全院医护人员，要尊重外国专家，虚心向外国专家学习。为方便外国专家的工作，他派人从上海请来翻译，还号召全院人员突击学习英语。短时间内，全院形成学习英语的风气，不少人学会了简单英语会话，有的医生还学会了用英文写病历，给专家工作带来很大方便。何穆请外国专家担任各科室的业务指导，经常征求他们对医院工作的意见。有位专家是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伤外科权威，何穆亲自带

领医护人员配合专家工作，观摩专家手术。为使专家们不感到山乡生活的枯燥，他特意让医院在周末举办游艺晚会和舞会，组织医护人员在节假日陪同外国专家登山野游。外国专家感到心情舒畅。他们不仅帮助医院解决了许多疑难重症的诊断与治疗，还通过讲课、示范，向全院医护人员传授先进的医疗技术。有的专家临回国时，还将自己所带来的图书和医疗器械捐赠给医院。

一次，前方送来两个战场上俘虏的国民党部队的军医，请医院酌情发落。晚上，两个俘虏逃跑了，半路上又被抓了回来。有的同志很气愤，想严肃处理。何穆认为他们逃跑的原因主要是对共产党不了解。于是他找他们谈话，并把俘虏请到自己家里吃饭，边吃边谈，反复交待党的政策，终于使这两个俘虏解除了顾虑，由惊惶不安到愿意留下来工作，表现很好。

在何穆主持下，晋冀鲁豫白求恩和平医院不仅成为太行、太岳地区的医疗卫生中心，而且成为部队和解放区培养医疗卫生人才的基地。建院不久，就接收了冀鲁豫军区三纵队、六纵队、五师及太行、太岳、邯郸地区进修人员 30 多名，3 年共接收进修人员近 500 名；医院还于 1947 年创办了附属护士学校，3 年时间共培养护士 250 多名；于 1948 年创办了和平医专，招收学员 60 多名；此外，医院还接受华北人民政府为太行、太岳、邯郸等地区开办各种医疗专业技术训练班的任务，短期培训了大批的助产士、化验员、防疫人员等，有力地支援了华北地区的人民解放战争。何穆极为重视培养人才。他除承担大量组织工作外，还亲自给各类学员讲课，并且兼任和平医专的校长。在教学中，他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针和少而精的原则，讲课科学性实践性强，深入浅出，简明扼要，突出重点，深受学

生欢迎。他还让各类学员边上课边到病房工作，既掌握了基础理论知识，又在短时间内具备了实际工作能力。随着山西、华北、全国的解放，和平医院培养的医疗卫生人才遍布各地，其中许多人成为地方或部队卫生行政机关和医疗单位的主要领导和业务骨干。

1949年8月，山西全境解放，何穆奉命率领一批老解放区的医务人员赴太原接管山西省卫生行政、医疗机构。

（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何穆担任山西省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省卫生厅厅长，成为山西省人民卫生事业的开创者。

当时的山西，除老解放区外，许多城市、乡村刚刚解放，到处是战争留下的残垣断壁，群众生活困难，疫病丛生。何穆上任伊始，便拟定《山西省卫生建设草案》，并着重抓了四件事：一是建立、完善省、市、专署、县各级卫生行政机构，以加强对全省卫生工作的领导；二是建立各级卫生医疗机构，专署、县设医院，区设诊所，村设卫生助理员，工矿企业设医院或卫生所、室，以解决全省人民防病治病问题；三是改组、整顿原省立、市立医院和医学院校，迅速提高全省医疗卫生水平和培养医疗卫生人才；四是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防疫保健工作，医治战争创伤。

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亟需大批专业人才，而当时山西省的医学教育落后，远远满足不了需要。何穆在改组、整顿山西省立、太原市立几所较大医院的同时，请示上级批准，将长治和平医专、川圣医专、太原高级助产学校、山西大学医学院，合

并为山西医学院，亲自兼任院长。合并后的医学院，教学人员有 28 人，加上附属医院科主任仅有 35 人，很难开展教学工作。为广招人才，建立一支教学队伍，何穆带人到山东、河北、天津、北京等地聘请教师。他还把老解放区来的学生插入高年级各班作为骨干，在学生中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山西医学院的建立，为山西省培养高级医学人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不久，何穆又着手筹建太原和长治两所医学专科学校。这些院校为山西全省培养了大批医学专业人才。

何穆在山西工作时，认真贯彻新中国卫生工作“预防为主”的方针，集中人力物力优先开展防疫工作。在他的主持下，成立了省防疫医疗大队，开办了防疫人员训练班。他曾多次步行到离卫生厅很远的防疫大队和训练班去了解情况、指导工作。为了尽快摸清全省主要地区疫情，何穆为防疫人员调来了专业装备、医药仪器和交通工具，使他们能迅速开赴各地调查疫情，防疫灭疫。当时山西省麻疹、痢疾、回归热、伤寒、结核病等流行，严重危害人民健康。何穆决定在太原市开设有 150 张病床的传染病院，接着又成立了结核病医院，加强对各种传染病的控制和治疗。

何穆在山西省卫生厅任职两年，在艰苦条件下兢兢业业做了大量工作，使山西省医疗卫生面貌得到初步改善。

1951 年 8 月，何穆奉调到北京，担任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

1955 年 5 月，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任命何穆为中央结核病研究所（后更名为北京结核病研究所）所长。从此，何穆便将自己的全部才华和精力，贡献给了新中国的结核病防治事业。

创办一个全国唯一的从事结核病全方位系统研究机构，任

务重大而艰巨。当务之急是网罗人才，培养人才。何穆多方奔走联系，经卫生部从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医学院校、医疗或学术单位抽调了一批专家来所充当学科带头人。这批专家绝大多数曾留学欧美、苏联、日本，有的是国内外知名学者，有的是享有盛誉的名医，有的是初露才华的中青年业务骨干，他们服从党的需要，同时也由于受到何穆的精神感召，放弃了原单位较优裕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来到位于北京远郊、刚刚草创的研究所。这批专家进所后，分别担任了副所长和各研究室主任、副主任，使研究所的业务力量得到全面加强。在何穆的争取下，卫生部又先后给研究所分配来两批医学院毕业生。何穆给这些青年人提出了很高的业务标准和明确的努力方向，让各研究室专家予以悉心指导和严格训练，还送他们到国内著名的医学院校或医院进行专业进修。精心培养和严格要求，使这两批大学毕业生很快成为业务骨干，以后从中产生了研究所第二代以至第三代所领导和学科带头人。

何穆深知要办好研究所必须创造一个使人才能够稳定的环境。他一方面发扬学术民主，鼓励创新，调动全所人员的积极性；一方面尽可能照顾好专家和大学毕业生们的生活细节，关心全体职工的衣食冷暖。何穆保持着战争年代火热的事业心和强烈的责任感，以身作则。他把家和三个孩子交给保姆，自己同担任研究所附属医院副院长的妻子一起住在所里。他黎明即起，到所里各处察看，发现问题及时处理；然后再到办公室、研究室或病房，投入日常工作；晚上，或到图书馆、宿舍督促青年学习，或找专家谈话；从早到晚，处处可见他忙碌的身影。在何穆带动下，研究所形成艰苦创业、团结奋进的风气，生活虽有不便，大家毫无怨言。

何穆为人正直，有原则性，敢于在政治风雨中保护人才。1957年反右斗争中，我国结核病防治事业老前辈、研究所副所长裘祖源教授，因有所谓“反党言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撤销一切行政职务，工资也降了两级。何穆从党校学习回所后得知情况，便安慰老教授说：你的那些“言论”原则上没有什么大错误，类似的话我何穆也说过。相信党总有一天会把你的问题搞清楚。何穆月月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钱来给老教授作为生活补助，还竭力争取使老教授在工作上不受歧视，政治上早日解脱。在何穆的关照下，老教授照旧从事科研工作，出国开会也没受影响，第一批就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何穆这些有胆有识的言行在当时很不合时宜，就在老教授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1959年，他自己却因“右倾”问题受到党内处分，直到1979年才平反改正、恢复名誉。何穆为保护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而引火烧身，使许多人深受感动。裘祖源教授在右派问题彻底更正后，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说：是何穆给了我对党的信念。后来，裘祖源教授耄耋之年仍坚持为结核病防治事业做贡献，实现了他要求入党的愿望，还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何穆非常重视结核病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和防治措施研究，在研究所内设立了流行病学研究室。派出人员对城市、农村、少数民族地区居民及团体单位进行结核病流行病学调查分析研究，并对患者发现、不住院治疗、卡介苗接种及化学预防等防治措施进行研究，以掌握我国结核病流行情况，提出适当可行的防治措施。

何穆强调基础理论研究在结核病防治工作中的重要性，在研究所内兴建了基础研究楼，装备了现代化的实验室，亲自设计动物房，设立了细菌免疫学、生物化学、病理解剖学、病理

生理学等系统的基础理论研究室，从事与结核病防治有关的基础理论研究，为临床和预防服务。

何穆还在研究所设立了内科、胸外科、骨科、小儿科等临床研究室，并附设结核病医院收治疑难重病病人，使结核病临床治疗从单纯内科向综合科室发展，从保守治疗向内外科结合、中西医结合发展。

在附属医院管理中，何穆也有许多创新。他主持制定了 30 多种规章制度，在院内推行收到很好的效果。为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他提倡美化环境、微笑服务、全心全意为病人。为使病人入院期间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以利治疗，他指派专人负责在病房建立病人服务室，组织舞会、音乐欣赏、书法、编织等项文娱活动。根据结核病患者中工农劳动人民占多数，文化水平较低的情况，他还注意对病人进行结核病防治知识和卫生保健常识教育，定期举办讲座，组织医务人员编写通俗易懂的讲义，自己坚持上好第一课。这种种教育形式深受病人欢迎，他们说：在这里住院等于上卫生学校。

在何穆主持下，一个融防治、科研、临床为一体，图书资料丰富、仪器设备齐全的结核病研究基地形成了。1958 年，卫生部调整直属单位，将北京结核病研究所划归北京市，由北京市卫生局领导，但仍承担全国性的专业任务。何穆继续留在该所担任所长。

到“文化大革命”前，结核病研究所建所 10 年，成为结核病专业人才荟萃之地，涌现了许多高水平的科研人员和医务人员，所内有些科室和个人被评为北京市或全国的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1964 年，结核病研究所编著了我国第一部《结核病学》，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何穆作序。1965 年，又编著了

《结核病学进展》一书，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全所科研医务人员在国内外医学杂志上发表了近 200 篇具有较高水平的学术论文。何穆在建所时提出的“出人才，出成果”的办所目标基本实现。80 年代初，卫生部明确该所（又更名为北京结核病肺部肿瘤研究所）为全国结核病防治研究中心，担负指导全国结核病防治工作，协助卫生部制定全国结核病防治、科研规划，为全国培训结核病防治科研骨干等任务。

何穆在担任结核病研究所所长的时候，还兼任多种学术职务：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华医学会结核病科学会主任委员，中华结核病科杂志副总编辑，中国防痨协会秘书长，中国防痨杂志主编等。是我国建国后至“文革”前有关结核病的一系列学术会议的组织者。

五六十年代，何穆曾代表我国医务工作者出访法国，赴苏联考察，到印度、东德等国出席有关结核病防治的国际会议。1964 年，我国举办建国以来第一次大型国际学术会议——北京科学讨论会。何穆代表我国结核病防治工作者与会，作了《我国结核病防治工作的进展》长篇学术报告。在报告中，他对比解放前后我国结核病防治工作情况，热情讴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同时全面、详尽地介绍了新中国结核病防治工作在预防、治疗、科研方面的进展情况与取得的成绩，并且总结了我国结核病防治工作的宝贵经验，受到各国学者高度评价。

为了在我国尽快地控制和消灭结核病，何穆将目光转向广大农村，探索中国农村结核病防治办法。早在 60 年代初，何穆就带领科研医务人员多次深入农村，普查结核病患率，调查农村防治结核病的历史和现状，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据此，他提出将结核病防治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农村。1966 年，他编写

了半农半医训练班参考教材《结核病》，发表在《中国防痨》杂志上，并着手准备培训农村结核病防治人员。可惜何穆的这一思路和计划，被“史无前例”的风暴所中断。

“文化大革命”中，何穆被加以莫须有的罪名受到严重冲击。但他始终相信党，正确对待群众。他对审查他的造反派说：所长可以不当，工资可以不要，党籍一定得给我保留。“靠边站”时，不管是当清洁工、洗衣工，还是图书管理员，他都一如既往，认认真真、尽心尽力地干。打扫厕所，用削铅笔的小刀将便池上的污垢一点一点刮去；在洗衣房，将衣物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在图书馆，将书刊重新分类，搬运上架，方便读者。

十年浩劫结束时，何穆已年逾古稀。但他不顾年迈体衰，又奋力投身于抢救遭到严重破坏、陷于停顿的结核病防治事业中。1978年8月，何穆被任命为卫生部顾问，负责统筹、协调全国结核病防治工作。这一年，何穆参与筹备了卫生部召开的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国结核病防治工作会议，会议提出了1978到1985年的结核病防治规划。就在这次会议上，何穆提出开展一次全国性的结核病流行病学抽样调查的建议，得到与会专家们的赞同，并取得卫生部的批准。会后，在卫生部领导下，成立了结核病流行病学调查领导小组，由何穆担任组长。何穆精神振奋，亲自主持制定调查方案和实施细则，并深入到各地进行现场指导，足迹遍及华中、华南、华北、西南、西北及东北各地区。调查历时两年，组织了近3000名专业人员，在全国880个抽样点约130万人口中进行了抽样调查，统计分析各种与结核病防治有关的数据，影响面之广声势之大都是空前的。因而获得了全国结核病流行情况的宝贵资料，进一步掌握了我国

结核病的流行规律，为制定新的结核病防治规划和措施，提供了可靠的科学依据。

1979年，何穆参与组织全国结核病防治学术会议，并在闭幕会上讲话，提出加速开展我国结核病防治工作的意见。针对一些省、自治区结核病防治机构没有恢复或不健全，何穆特别强调建立健全结核病防治网。会后，他四处奔波，力促这一目标实现。

1982年5月，何穆因年龄和健康状况退居二线后，继续担任卫生部全国结核病防治研究咨询组组长，组织全国著名结核病专家，承担卫生部交办的有关咨询任务。他多次向卫生部提出建议：结核病防治工作首先要面向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农民。在他的推动下，1982年9月召开了全国工矿企业结核病防治工作座谈会。会议由卫生部、化工部、冶金部等8个部联合签发了《关于加强工矿企业结核病防治工作的意见》。何穆还主持了1984年全国农村结核病防治学术会议，正式提出结核病防治工作必须把重点放在农村，把治病和治穷结合起来的要求。从1983年起，何穆接受了当代中国丛书《新中国预防医学的历史经验》一书结核病防治部分编审组的负责工作。他组织召开编审组会议，拟定提纲，确定编写人员，亲自催稿、审稿、改稿，从初稿到定稿，反复5次，终于成书，1988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1985年，年届80高龄的何穆身体更加衰弱，但他对我国结核病防治工作仍时时牵挂，呕心沥血。一次大病初愈，他对一位来访的记者又情深意笃地讲起他的事业，他说：结核病在解放前是患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传染病，占各种死因第一位，严重危害人民生命健康。解放后，结核病防治工作得到党和政府

的重视，成绩显著。患病率下降到解放前的 1/5，死亡率下降到解放前的 1/10，退居各种死因的第 8—10 位之间。但是，由于我国幅员辽阔，情况各异，结核病防治工作发展很不平衡，个别地方发病率有时还在上升。1979 年调查全国结核病人有 700 万，我们的任务还很重啊！何穆让记者借助新闻媒介代他向社会呼吁：搞好公共卫生，加强宣传教育，积极治疗病人，争取早日控制并最终消灭结核病。

这次大病之后，作为医生的何穆，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便提笔写下遗言：恳求卫生部批准当我病到不治之时，不要进行无意义的抢救或延长生命。我死后不举行告别等仪式，遗体不火化，献给北京医科大学，供科研或同学解剖实习之用。

1990 年 4 月 11 日，何穆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他的去世，在卫生系统广大干部和医务人员中引起巨大的悲痛，人们不仅怀念他的光辉业绩，同时也怀念他的优良作风和崇高精神。

进城几十年，何穆从不摆老资格，不搞特殊化，始终以一名普通老百姓自居。无论是在太原担任省卫生厅厅长、医学院院长，还是进北京担任医院院长、研究所所长，何穆一家老小长年累月居住在低矮破旧、阴暗潮湿、无取暖及卫生设备的平房中。担任卫生部顾问后，按规定应享受副部长级待遇，领导给他安排了相应级别的新住宅，但他执意不肯搬去，直到 80 年代初，因老伴双目失明，自己也年老体衰住平房实在有困难，才搬进普通的居民楼房。1956 年评定工资级别，任结核病研究所所长长的何穆主动要求比两个专家副所长定低一级。除工作特别需要，何穆很少用公家汽车，偶尔因急事用车，每次都按章交费。80 高龄到外地主持会议，仍拒绝坐地方领导为他配备的轿车，和其他与会代表一起步行前往会场。因病住院，天气太冷

暖气不足，医院为“高干”、“高知”提供“小电炉”取暖，何穆始终不肯动用。70年代初，电视机还不普及，何穆将自己家仅有的一台电视机，奉献给家属宿舍，让大家共同享用。在居民楼里，他不顾年高体弱，每天打扫公共楼道、擦拭楼梯扶手，甚至亲自动手安装被冰雹打破的玻璃。

何穆一贯艰苦朴素、助人为乐、克己奉公，家中摆设的是50年代的几件旧家具，出国穿的是用旧西装改制的中山装，毛巾破得像鱼网似的仍继续使用。有人收到他寄来的一封信，外面的信封是一个翻过来的旧信封，里面的信纸也是一个拆开来的旧信封。然而，当何穆听说一位司机同志家中有事急需用钱，立即拿出自己的存折交给他说：用多少取多少。一位烈士子弟，母亲有病，孩子又多，生活困难。何穆便经常用自己的工资给他发放“生活补助费”。打扫卫生的老清洁工病了，何穆带上点心、水果前去看望，临走时还放下50元钱。“文革”后期，何把补发给他的数千元工资作为党费交给了党组织，并在以后的几年中，每月交150元党费，直到党组织拒收为止。身为专家又担任多种学术职务，来往信件多是工作事宜，何穆却坚持自己付邮资。最后一次住院，本可平安出院，只因夜间起床去关一只可以不开的电灯而不慎跌倒，造成骨折引起第二次手术而致不治。何穆还将自己积累多年的中外医学书籍，全部赠给北京结核病肺部肿瘤研究所。

1990年4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发出通知，号召全国卫生系统广大共产党员、干部、职工，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向共产主义战士何穆学习。通知说：我们要学习何穆同志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而不谋取私利的革命精神；学习他勤奋工作，拼搏进取，艰苦奋斗的坚强毅力；学

习他襟怀坦白，诚恳待人，诲人不倦的高尚风格；学习他公私分明，廉洁自律，两袖清风的高贵品质^①。

附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何穆：《履历》。
2. 何穆：《参加革命前的经历》。
3. 何穆：《历史照片说明》。
4. 何穆：《为〈陕甘宁边区医家传〉所撰稿件》（1988年12月）。
5. 何穆：《延安中央医院是怎样创办起来的》，《革命史资料》第18期，政协全国委员会编，《陕西卫生志》1989年第3期。
6. 何穆：《肺癆病的疗养法》，1943年6月29日《解放日报》。
7. 何穆：《山西省卫生建设草案》（1949年9月1日）。
8. 何穆：《〈结核病学〉序言》，人民卫生出版社1964年版。
9. 何穆：《我国结核病防治工作的进展》，1961年北京科学讨论会论文集。
10. 何穆：《结核病》（半农半医训练班参考教材），《中国防痨杂志》1966年第7卷第2期。
11. 何穆：《加速开展我国结核病防治工作的道路》，《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1980年第3卷第1期。
12. 何穆：《主要收获》（1984年整党期间）。
13. 何穆：《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1983年7月）。
14. “当代中国丛书”《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年版。
15. 何穆：《进一步发挥各地结核病学会的作用》，1982年在全国结核病防治学术会议上的讲话。

^①《卫生部通知，向共产主义战士何穆学习》，1990年4月18日《健康报》。

16. 何穆：《在全国结核病咨询组全体会议结束时的发言》（1986年5月1日），《中国防痨通讯》1986年第3期。
17. 何穆：《何穆遗言》（1985年12月）。
18. 《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何穆同志生平》（1990年4月13日）。
19. 《无私奉献堪称楷模，我国著名医学家何穆同志逝世》，1990年4月19日《健康报》。
20. 《卫生部发出通知，向共产主义战士何穆学习》，1990年4月18日《健康报》。
21. 《何穆同志逝世》，《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1990年第13卷第4期。
22. 太行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史编辑组：《太行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发展概况》（1990年11月17日）。
23. 太行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斯人虽逝，风范长存——追忆老院长何穆》，1990年6月14日《健康报》。
24. 《山西省卫生厅、山西医学院联合举行学习何穆座谈会》，1990年7月5日《山西医学院学报》。
25. 山西省卫生厅、山西医学院：《崇敬的专家、良师、难忘的领导、益友——追忆我省第一任卫生厅厅长兼山西医学院院长何穆》（1990年6月10日）。
26. 山西医学院院史编辑组：《山西医学院院史》（未刊）。
27. 中共卫生部党组：《关于何穆同志问题平反改正的决定》（1979年11月23日）。
28. 北京市结核病肺部肿瘤研究所编：《建所三十周年专刊》，1985年1月。
29. 全国结核病防治研究中心：《他的精神永存——悼著名医学家何穆同志》，1990年5月8日《健康报》。
30. 《医学家带头移风易俗，何穆遗体献给医学事业》，1990年5月5日《人民日报》。

31. 《学习前辈风范，发扬优良传统——卫生部领导和老干部缅怀何穆同志》，1990年6月7日《健康报》。
32. 1991年1月20日电视剧《何穆》剧本征求意见座谈会发言记录，发言人：李文、林华、李新、徐洲、姚冷子、米堃等。
33. 1990年5月20日，原晋冀鲁豫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几位老同志回忆、学习何穆座谈会发言记录，发言人：常宗礼、曹洪山、王仲兴、余国器、徐彤斐、王绍曾、朱坚、李争灿、赵达德。
34. 1990年6月7日，山西省卫生厅、山西医学院联合举行学习何穆座谈会发言记录，发言人：徐大毅、韩德伍、王仲兴、余国器、宋万揆、刘方程、常宗礼、郭登云、韩忠、吴斌、李福东、徐彤斐、余克明。
35. 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部分同志回忆、学习何穆座谈会纪要，参加人：田庚善、田文彦、李凤鸣、郑立、郭应禄。
36. 1990年7月18日，北京市结核病肺病肿瘤研究所部分同志回忆、学习何穆座谈会发言记录，发言人：姚飞琴、黄汀涛、王忠仁、周玉红、刘绍兰、王炎、阮根立、明安宇、汪惠、杨勇、端木宏谨、李麟书、田武昌、严碧涯。
37. 刘虹：《老专家、老干部、老百姓——追忆我国著名医学家、卫生部原顾问何穆》，1990年4月28日《健康报》。
38. 李文、邹贞坚：《虽九死其犹未悔——沉痛悼念无私奉献的医学专家何穆同志》。
39. 刘文典：《八旬老人抒壮心——访全国政协委员何穆同志》，1985年12月3日《北京晚报》。
40. 陈学昭：《天涯归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41. 沈家凤：《回忆何穆同志》（1990年7月1日）。
42. 何效莲：《有关何穆同志的情况》（1990年5月27日）。
43. 辛智科、李忠全、孙忠年：《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开拓者——陕甘宁边区几位著名医林人物访问侧记》，《陕西卫生志》1990年第1

期。

44. 姜亚洲：《何穆在延安》，1991年1月26日《健康报》。
45. 伍义译：《追忆老师何穆》（1990年7月18日）。
46. 韩明：《回忆何穆、尊敬的何老专家》（1990年5月）。
47. 陈秀章、乔陆、李建平：《关于何穆同志的点滴情况》（1990年6月）。
48. 王仲兴、常宇礼、王绍仪：《关于晋冀鲁豫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情况回顾》，《太行区卫生工作回忆录》（初稿）。
49. 姚冷子：《深切的怀念——忆何穆同志在太行》，1991年4月13日《健康报》。
50. 黄爱辰：《致卫生部领导的信》（1990年4月25日）。
51. 郑洪骏、粟青：《缅怀何穆同志》（1990年6月12日）。
52. 宋万揆：《沉痛悼念老首长与恩师何穆》（1990年6月11日）。
53. 苗沛池：《在何部长领导下几点体会》（1990年6月10日）。
54. 陈任采：《关于何穆事迹给作者的回信》（1990年6月20日）。
55. 李仰岳：《关于何穆事迹给作者的回信》（1990年7月1日）。
56. 吴霁棠：《关于何穆事迹给作者的回信》（1990年6月18日）。
57.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第1辑、第6辑，中国学术出版社1983、1985年版。
58. 《裘祖源教授生平》（1988年11月）。
59. 沈家风、何效莲、左英、王绍曾、宋万揆、陈任采、朱祖焜、吴霁棠、陈锡良、王平飞、田平等为悼念何穆致姚冷子的信。
60. 访问姚冷子、李文、邹贞坚、李新、孙立余、季明、骆行、李冰、侯明、陈鹤祥、黄爱辰、王云山、王宗杰、张敬东谈话记录。

上述参考资料由何穆夫人姚冷子、儿媳顾用希协助搜集整理，在此表示感谢。

屈 武

张守宪 梁星亮

屈武，原名屈儒，字经文；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卓越的领导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国民军第二军胡景翼部参议，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顾问处处长，国民党和谈代表团顾问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兼参事室副主任，对外文委副主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主席、名誉主席、中共党组书记，政协全国委员会第六、第七届副主席等职务。他一生经历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各个不同阶段，经受了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和考验，从一位真诚的爱国主义者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寒门子弟 立志报国

1898年7月16日，屈武生于陕西省渭南縣（今渭南市）下邽镇一个贫民家庭。他的父亲曾在下邽镇开杂货铺，用以维持全家人的生计。屈武五六岁时，父母亲因病相继去世，杂货铺也被卖掉当作父母亲的安葬费。从此，他和祖母、姐姐、妹妹

相依为命，苦度光景。祖母纺线织布，仍维持不了一家四口人的生活。兄妹三人只得以挖野菜、拣破烂，甚至讨饭度日。屈武八九岁时进镇上商店当学徒，平日稍有懈怠，就遭到老板的辱骂和毒打。他心中愤愤不平，常偷偷到镇上的“三贤”^①碑前默默地叩头祷告，立志“长大成人后要出人头地，成为历史名人。”^②这时，他还利用一切机会学习文化。同伴们上私塾，他就站在门外听先生讲课；晚上把同伴的课本借来，自学到深夜。

一位私塾先生看到屈武勤奋好学，天资聪颖，主动抽空教他读“四书”、“五经”，讲白居易、张仁远、寇准苦学成才的故事，以“寒门子弟也能成就事业”的道理来勉励他。

屈武12岁时，祖母去世，全家人生活的重担就落在他的身上。不久，姐姐、妹妹也因生活所迫，先后当了童养媳。1911年的一天下午，屈武因不堪忍受店老板的欺凌，在磨刀准备杀鸡时，把老板砍伤。凶狠的老板夺刀将屈武按倒在地，毒打后又用刀砍伤他的胳膊，顿时鲜血直流，还扬言非把屈武打死不可。邻居们闻讯前来劝解，屈武乘机离开商店，连夜跑到西安，找到了当皮货商的表兄。表兄给他养好伤后，又留他当了学徒。

一次，屈武在皇城（今西安新城）附近看到学生正在开运动会，学生们的精彩比赛，把屈武看得入痴人迷。他触景生情，更加萌发了上学的念头。不久，他告别了表兄，离开西安，回到家乡准备上学。

但是，上学又交不起学费，屈武不得不去求助外祖父。外

①下邳镇有“三贤故里”之称。“三贤”即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大将张仁远和宋朝的宰相寇准。他们都是下邳镇人，镇上立有纪念碑。

②访问屈武记录（1981年7月17日）。

祖父是当地的大地主，视钱如命，不但不肯资助他，反而把他臭骂一顿，还讥讽他说：“撒尿看一下人影，十几岁啦还上什么小学！”“别丢我家的人。”屈武极为气愤，暗暗下定决心，非上学不可。在那位私塾先生和同伴的帮助下，屈武在家边劳动边读书，15岁时进入三贤故里高等小学。由于他勤学苦读，考试成绩常名列前茅，尤以作文、演讲最佳，颇得学校师长的喜爱。

1915年，陕西革命党人、著名教育家郭希仁等在华山玉泉院创办了习文练武的共学园，一时四方有志之士纷至沓来。屈武得知后只身前往华山，向郭希仁诉说了自己的苦难遭遇，渴望学文习武，为革命作一番事业，并当即表示把自己的名字由屈儒改为屈武。慧眼识才的郭希仁看到屈武年纪虽小，志气不凡，决定把他留下来培养，并为他提供学习所需的费用。在这里，屈武与郭希仁、李岐山、孙岳、续西峰、王敬如、刘蔼如、史可轩、董振五、邓宝珊等革命党人和学者名儒朝夕相处，耳濡目染，长进很快。不到两年时间，他不仅古文基础和写作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而且学到了不少军事知识，还练出了健壮的身体，经常独自爬山，华山的五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随着学识的长进和新文化思潮的影响，屈武对孔孟学说渐渐失去兴趣。1917年春，屈武在郭希仁等人的同意和支持下，去西安参加中学考试，最后以总分第二名、国文成绩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成德中学。

成德中学是当时陕西督军陈树藩创办的私立学校。其中有许多革命党人执教，史可轩曾兼任总务主任。屈武在这里得到他们和同乡武之柏（陈树藩的军需官）的帮助，学习和生活的费用都有了保证。他不仅学习成绩优良，还十分爱好足球运动。

他曾对同学说：“我们要练就铁足钢腿，踢翻欧美。”^①在成德中学与省立一中、三中和圣公会等学校的多次足球比赛中，他球技高超精湛，所在球队屡获“足球冠军”，他本人还当选为成德中学足球会会长。通过多次的足球比赛，屈武结识了新的朋友，如邹均、武止戈、董汝诚、方千才、刘道洁、李伍亭等，他们后来都成为陕西革命斗争的骨干，有的还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血 溅 总 统 府

1919年的春天，严重的民族危机笼罩着中国。在这存亡攸关的时候，5月4日，北京的青年学生掀起了震动全国的爱国运动，反帝反封建的烈火在中国大地上熊熊燃烧。5月14日，“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陕西。屈武闻讯后心中十分激动，先在校内广泛宣传北京学生的爱国正义斗争，秘密组织起十人救国团，发动同学们赶制宣传标语和传单，揭露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继而作为成德中学的学生代表，先后去省立一中、三中、圣公会学校、第一师范学校、法政专门学校进行联络，希望采取一致行动，声援北京学生的反帝斗争。在大家的热烈支持下，5月26日，西安各校学生代表联席会议在省立一中召开，会议一致通过了实行全体总罢课；组织讲演团，宣传抵制日货；向省教育厅及督军公署请愿等决议案。5月27日，屈武等10名学生代表前往省教育厅向厅长郭希仁请愿，抗议北洋军阀政府出卖国家主权的罪行；并提出立即致电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拒绝在

^①访问屈武记录（1981年7月17日）。

和约上签字；惩办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抵制日货；组织学生罢课、游行示威等要求。郭希仁以此事关系甚大，拒不表态，并称请示督军陈树藩后再定。屈武等旋即向陈树藩请愿，提出上述要求。陈树藩勃然大怒，拒绝了学生的要求，并“声言如有不遵者，即行枪毙。”^①同时命令电报局不准发学生的电报。屈武等毫不畏惧，在进步校长的帮助下，再次向陈树藩请愿。老奸巨猾的陈树藩迫于省内外的压力，不敢过分干涉学生的要求，勉强允许讲演、发传单，但仍不准游行示威。

学生们的正义斗争，屡遭陕西反动当局的干涉和阻挠，但他们并不屈服。为了进一步坚持和扩大这一斗争，5月下旬，在屈武等人的组织下，成立了西安学生干事会^②，由屈武主持干事会的工作，会址设在成德中学。干事会利用同陈树藩达成的口头协议，组织各校学生开展了各种活动，发表讲演，书写标语，散发传单。5月底，以屈武为首的干事会冲破陈树藩的禁令，组织爱国学生先是在省议会门口，接着又齐集西安文庙门前讲演。同时，进一步发动群众，准备举行全市范围的游行示威。

陈树藩得悉学生准备游行示威的消息，便施展离间之计，挑拨各校学生之间的关系，使这次示威游行实际未能举行。面对这种形势，屈武等研究决定，暂时改变斗争策略，化整为零，组织小规模的说演队、宣传队，分散活动。5月30日，屈武联合西安几所学校的学生会负责人，以“陕西学生通启”的名义，通电全国：“惊悉青岛交涉，忽于节外生枝，噩耗传来，悲愤填膺。呜呼！狡日思逞，岂仅得一青岛而可以厌其欲哉？”“盖以藩篱

^①1919年11月30日北京《晨报》。

^②筱青：《五四前后之陕西学生》，1919年11月30日北京《晨报》。

即毁，门户洞开，山东不可保，黄河流域不可保”，“一旦而为奴隶，国为附庸。言念及兹，五中俱裂！”“国人等侧身学界，分忝国民，敢不联袂奋起，以图其后。宁可蹈海而亡身，誓不愿弃地以资敌。”^①

西安学生的这些活动和通电的发表，标志着陕西学生爱国运动开始走向高涨。6月初，在屈武等人的筹划下，以原西安学生代表联席会议为基础，正式组成了陕西学生联合会，屈武当选为会长^②。下设总务、宣传、编辑三个部，并编辑出版《白话报》，以通俗易懂的文字，及时报道陕西和全国学生运动的发展状况。陕西省学联成立后，立即作出六项决定：一，致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据理力争，收回我国权力。二，致电北京学生联合会，表示陕西学生誓作他们的后盾。三，西安各中等学校学生全体罢课，继续举行示威游行。四，扩大讲演团；呼吁国人以实际行动使用国货，抵制日货。五，出版会刊《白话报》。六，派代表去三原同支持学生爱国运动的靖国军和渭北学联进行联络。在屈武等人的领导下，省学联的各项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十分活跃。在西安的大街小巷到处可以看到流动的宣传队、讲演队和张贴的“头可断，血可流，青岛不可丢”、“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等标语、传单。由各校组织的十人救国团广泛向群众宣传拒绝使用日货，还会同商会协商杜绝日货来源。在广大学生爱国热情的影响下，西安商界一些商人自动销毁部分日货，少数继续贩卖日货的商店，也被成德中学的童子军捣毁。当时，《长安日报》曾报道学生烧毁日货的消息：“一

^①1919年6月7日上海《申报》。

^②屈武：《激流中的浪花》，《中国青年》1959年第10期。

时火光耀目，碎物之声震耳，众生鼓掌之声如雷。”^①

6月中旬，全国学生第一次代表大会计划在上海举行，并成立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要求各省派代表出席。陕西学生联合会推选屈武和省立三中学生李伍亭（耀南）为代表^②，赴沪参加会议。他们为了躲开反动当局的监视，化装离开西安，因去上海的路费不足，不得不假道北京求助。6月26日到达北京，住在陕西会馆。旅京陕籍学生杨明轩、刘天章、李子洲、杨钟健、魏野畴等得知他们来京，立即前往会馆看望。当天下午，陕西旅京大中学校的学生百余人为他们举行了欢迎会，屈武在会上介绍了陕西学生运动的情况。会后，在刘天章、李子洲陪同下，屈武、李伍亭会见了北京大学学生联合会负责人许德珩、段锡明、方豪等人。

6月27日，“五四”运动的浪潮又达到了一个高峰。下午1时左右，屈武、李伍亭代表陕西学生联合会同山东代表请愿团、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代表请愿团、京师总商会代表、留日学生代表、报界代表、基督教代表等500余人，高擎大旗，云集新华门，联合向总统府请愿。请愿团向北洋政府提出三项要求：“（一）不保留山东则和约决不签字；（二）决定废除高徐、济顺两路草案；（三）立即恢复南北和会。”^③请愿团还推举屈武等10人为学生代表，去面见总统徐世昌，被徐世昌所拒绝。徐另派出教育部次长傅岳荃代见学生代表，答复请愿团的要求。傅岳荃冠冕堂皇地应付了一番，学生代表极不满意，一致认为政

①1919年9月16日《长安日报》。

②筱青：《五四前后之陕西学生》，1919年11月30日北京《晨报》。

③1919年6月28日北京《晨报》。

府无言可信，“请立见总统，即发命令正式声明不签字。”^①傅岳荃态度恶劣，告诉代表明晨再来求见。代表不答应。傅又称请国务院总理出面答复学生的要求。代表们决不让步，说非见总统不可。10名代表即在中南海颐年堂坐候。几百名学生在新华门前伫立了一天一夜。

徐世昌深怕事态扩大，局面难以收拾，不得不于6月28日9时左右，在怀仁堂接见了10名学生代表。当时警卫森严，如临大敌。学生代表向徐世昌陈述了三项要求。徐世昌对学生的正义要求避而不谈，采取敷衍的态度，说什么：学生的任务是安心读书，国家大事政府自有权衡，等等。代表们对徐世昌的答复一致不满，相继发言和他辩论。屈武激于爱国的义愤，冲着徐世昌声泪陈词，说，“现在国家都快要亡了，今天丢青岛，明天丢山东，后天就可能丢掉整个华北。如果政府再不想办法，不答应学生的要求，我们只好以死力争！”^②说罢，就以头碰地，血流如注，当即被送往医院治疗^③。但是，徐世昌毫不动心，反而拂袖而退，由国务院代总理龚心湛应付学生。消息传出，一时舆论大哗。北京《公言报》报道称：陕西学生联合会代表屈武突出发言，言较激烈。言毕即长跪痛哭，以首触地有声，左右弁护争挽不起，在地俯伏，首触墙壁”^④，头部受伤，血流满面，传闻全国。史称“血溅总统府”事件。屈武一时亦被誉为“爱国英雄”，名扬海内。他住进医院后，前往探视、慰问者络绎不绝。在全国人民反帝爱国浪潮的冲击下，在请愿代表的坚决斗争下，北洋政府当天晚上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同意学生的

①1919年6月28日北京《晨报》。

②③屈武：《激流中的浪花》，《中国青年》1959年第10期。

④1919年6月29日北京《公言报》。

要求，并打电报给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命其拒绝在和约上签字。6月29日，徐世昌令国务院发布文告，表示学生代表“所陈三事，政府已具决心”，望全国各界“各安本业，勿滋疑虑。”^①“五四”爱国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五四”运动胜利后，屈武和李伍亭在北京暂住数日，旋于7月上旬在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的资助下，前往上海参加全国学生第一次代表大会。当屈武等抵达上海时，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已经成立。尔后，他们与尚未离沪的各地代表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屈武还通过于右任的介绍，到莫利哀路孙中山的寓所晋见孙中山。孙中山同屈武进行了亲切的交谈，鼓励他回陕后，要多在有志青年中宣传三民主义的道理，做救国的事业。还语重心长地说：“中国的希望，就寄托在你们这般青年人的身上。”^②从而更加坚定了屈武投身于民主革命的决心。

威武不屈

8月底，屈武、李伍亭返回西安。当时的陕西，依然处在陈树藩的统治之下。军阀之间整日忙于争权夺利，百姓怨声载道，局势日益恶化。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屈武与各校学生代表酝酿，决定重新组织陕西省学生联合会。9月6日，全陕学生联合会开幕，屈武作了外出活动的报告。他大声疾呼，力图唤起人们改造陕西的热情，说：“武自陕至京，由京至沪以来，掷数月之光阴，查各省联合会之情形，濒海各省，于米粉出口严

^①1919年7月1日《民国日报》。

^②屈武：《激流中的浪花》，《中国青年》1959年第10期。

加防范，而焚毁仇货之举亦皆时有所闻，其激昂之状直足以撼山岳而薄日星，我陕则寂寂寞寞无生色，武实愧焉！”^①9日，屈武被选为陕西学生联合会会长^②，刘道洁当选为副会长；高尚贤、邹遵（均）当选为正副评议长。大会还通过了由屈武主持起草的《全陕学生联合会成立宣言》，内称：“哀莫大于心死，耻莫甚于国亡，苟知国亡可耻，牛马难为，则当起而挽回之、补救之。”^③《民国日报》刊登了上述消息和宣言，多所推崇，指出：全陕学生联合会“发行学生联合会报，且前曾请愿省会，反对陈树藩卖陕之日债，省议会亦因之一致否决陈氏滥借日债案，因此陕民对该会，均表钦仰之意。”^④

暑假后，西安各校教员由于薪金长期拖欠，生活无着，酝酿罢教斗争。10月6日，刚成立不久的省学联决定积极配合教员的索薪斗争。在屈武的组织 and 倡导下，学生列队来到省政府请愿，要求尽快补发教员的薪金，恢复正常教学。省长刘镇华拒不出来接见学生，还命令军警阻拦。学生在义愤之下砸烂了省长衙门大堂的全部桌椅器物。事发后，刘镇华要求陈树藩严惩带头请愿的成德中学学生和省学联负责人屈武。10月8日（这天是中秋节），陈树藩亲自出马，带领马弁百余名先包围了成德中学，并召集全体师生训话，威逼学生承认错误。以屈武为代表的学生运动骨干毫不示弱，据理驳斥。陈树藩气急败坏，大施淫威，下令对带头请愿的20多名学生用军棍毒打，但没有一个人肯承认错误。事后，10月22日《民国日报》以《陕学生驳斥陈树藩——屈武君真威武所不能屈》为题，报道了陈树藩

①②1919年9月11日、13日《长安日报》。

③1919年10月16日上海《申报》。

④1919年10月19日《民国日报》。

与屈武对辩的详细经过：陈树藩责问屈武“此次胡闹，……尔等所以云国亡无日危在旦夕者，不过借口而已。”屈武驳斥道：“武以为国家之亡与不亡，视国人能死力救国与否以为断，中国人民，若能各尽救国之责，不特十年二十年后不止于亡，即千百年后恐亦未必亡也。设中国无学生之救，而听国贼之常自卖国，又恐不待十年二十年后，即为朝鲜之续也，若但以国大人众定国之不亡，试问波兰国非不大也，印度人非不众也，而今安在哉？”陈树藩又以执政者的身分教训屈武，声称：“即国家有何危险，自有执政者为之挽回，试问执政者之学问见识，宁不如尔等未学成之学生耶。且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尔等学生无干预政治之权，又何越俎代庖哉？！”屈武反驳道：“武以为虽执政者学问识见，较诸学生为优，然设谋一己之权利，不顾国家之衰亡，则所谓才大适足济其恶，斯则不特弗能救国家之危险，恐适足促成国家之危险，而学生学问识见虽不如衮衮诸公，然既不攘权，又不渔利，本良心以作事，抱热诚以救国，出一分力，即补国家一分缺，又况学生中非绝无出类拔萃者乎，安见学生之不济于事耶，至学生不当问国事，试问学生亦国家之分子也？按诸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义，学生安能坐视国家覆亡而不一援手乎。且执政者既知国之将亡而不救，普遍人民本不知国家为何物又安望其救，然则学生不奋起力图挽救，又望谁耶。故此次学生救国，份内事耳，焉能谓之代庖？”陈树藩理亏词穷，沉思片刻，又节外生枝说道：“尔等之周报、文章也不见其好，且以一纸空文为爱国，究于国家有何补哉？”屈武义愤地答道：“武以为学生出报之意，绝非以文章夸耀于众也，一纸空文，固不足以救国，然学生痛国家之将亡……，故以热血爱国之忠诚，演为一字一泪一文一哭之文解，唤醒一人，即四万万人中减一

无用之人，而增一有用之人，扩而充之，又安见于国家无所补哉。况学生救国，固不仅发行报纸已也。”陈树藩见屈武义正词严，便声色俱厉地威胁道：“此后尔等若再有越轨行为，我必有严办，前报虚传我枪毙学生一千人，但尔等真不就约束，安知我不实行枪毙。我能振兴教育，我即能摧残教育。”屈武无所畏惧，慷慨答道：“设以奔走为捣乱，以呼号为惑众，以救国为干政，以共同协力为代庖，则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而学生惟有血染弹丸伸颈受刃而已，然为国而亡，复何所憾，前仆后继，决不少却，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夫复何求！”最后，陈树藩见屈武凛然正气，厉声责问道：“屈武，汝若不听命，我绝不容汝，我不信坏学生不就范。五百板子，即可使其变为好学生。”屈武答道：“武生不辰，年未成童而双亲见背，既无叔伯，又无兄弟，只身流转，无家可归，生为国家人，死为国家鬼，知有国家而不知有个人，故此次代表陕西学生东上，已将生死存亡祸福利害置诸度外，鉴东省学生为国亡身，益以自励，今又被选为会长，责任愈重，救国之心愈切。本总会为学不忘救国，救国不弃求学之宗旨，一往直前，毫不返顾，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肝脑涂地所不惜，威不足以慑其志，利不足以诱其心，惟义是视，百折不回，此身可死，此心不可死，三军之帅易掳，匹夫之志难夺，五百板子，何足令武心灰意冷而递变初衷哉？！”①《民国日报》在详细报道上述答辩时，对屈武备加赞扬，称：“屈君即前次以陕学生代表见徐世昌碰头流血者，徐当时仓皇拂袖而退。今又在陈氏淫威之下，竟批陈之逆鳞，而披露其义胆忠肝。屈

①详见1919年10月22日《民国日报》。

武君乎，真威武不能屈者也。”^①

陈树藩毒打屈武等爱国学生的暴行，更加激怒了广大学生。他们纷纷走上街头，奔走呼号，痛斥陈树藩同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一样，都是无耻的卖国贼，强烈要求释放屈武等爱国学生，呼吁省内外学生进行声援。陈树藩和刘镇华得知事态扩大，狼狈为奸，密谋先将屈武等三人秘密关押起来，待机处决。同情爱国学生的陕西省卫生局局长杨叔吉，很快把屈武等人被关押的消息告诉给被陈树藩软禁在医院的陕西靖国军领导人胡景翼，请他设法营救。胡景翼与杨叔吉秘密商定，利用给屈武等人看病的机会，将监狱看守人员用酒灌醉，而后帮屈武逃走。

屈武等三人脱离虎口，连夜从草滩镇渡过渭河，前往三原，受到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的欢迎。不久，胡景翼也脱险回到三原。在这期间，经胡景翼的介绍，屈武同于右任的长女丁秀芝（又名于楞）订婚。1922年4月，屈、于在北京结为伉俪。于右任特意写了一组《助攻诗》，其中第四组是写屈武的，诗曰：

汝婿亦奇士，青年多美誉。
忧同屈正则^②，事类申包胥^③。
至理无贫贱，浮云有卷舒。
进修齐努力，嘉耦复谁知。

诗中把屈武比作我国春秋战国时期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和楚国舍己救人的著名大夫申包胥，表达了于右任对女婿的喜爱

①1919年10月22日《国民日报》。

②屈正则，即屈原。

③申包胥，楚国大夫。

和赞赏之情。

从爱国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

“五四”运动的战斗洗礼，在屈武的人生道路和思想上，是一个新的起点。1920年春，屈武考入天津南开中学高中。这时，京津地区新思潮的宣传活动异常活跃，新的社团纷纷涌现，新的刊物如雨后春笋。屈武在这里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学说，先后阅读了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以及《新青年》、《社会进化史》、《社会问题》等许多书刊，尤其喜欢阅读有关十月革命后苏俄的报道，十分向往列宁缔造的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除此，他还积极参加天津地区的学生运动，关心陕西地区革命局势的发展，发起成立了天津南开学校陕西同乡会。1922年1月，他与邹均、武止戈等以陕西同乡会的名义，在《共进》杂志上发表文章，揭露在反动军阀统治下陕西教育界落后与黑暗的局面，提出改造陕西教育的方针，建议“组织团体和出版物……把各界的黑幕尽量的介绍出来，和《共进》半月刊内外夹攻”；希望全陕青年学生“以自动的精神、互助的精神，同心协力去奋斗、牺牲，废除黑暗的势力，努力向光明的路上去。”^① 1922年春，屈武还在《共进》上发表了《忠告刘镇华》一文，历述刘镇华在陕纵匪抢劫、勒民种植鸦片、增设苛捐杂税、摧残教育、镇压学潮等罪恶行径，称其是“怙恶不赦”的军阀、官僚、政客。他尖锐地指出：“万恶的军阀、资本家、政客通同是我们的仇敌。”^②

①《改造陕西教育的彻底方法》，《共进》第7期。

②《共进》第9期，1922年2月10日出版。

1922年3月,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屈武与同在天津的陕西进步学生武止戈、邹均等创办了《贡献》杂志。它以宣传新文化、新思想,提倡革新教育,改造社会为宗旨,连续刊登了《为什么讲社会主义》的专论,论述社会主义学说的强大生命力及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历史必然性。它还倡导青年学生深入实际,开展社会调查,研究社会主义。《贡献》杂志只出版了4期,但在京津地区和陕西青年学生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人撰文誉它为“宗旨正大,议论卓越”^①。

1922年夏,屈武考入北京大学文科预科。同年秋,经刘天章介绍加入陕西旅京进步学生团体共进社;1924年10月当选为共进社常任主席、政治委员会委员。屈武对共进社进行了整顿,修改了纲领和章程。经过屈武等的共同努力,共进社发展很快,社员遍及京、津、沪、汉、穗和豫、陕、苏等省市以及德国、日本、南洋地区。广大社员特别是京、津和陕西地区的社员,在国民会议运动、“五卅”运动和陕西人民驱逐军阀吴新田、刘镇华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共进社是当时规模较大、存在时间较长的进步社团,是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斗争的得力外围组织之一。屈武不仅是共进社的领导人,也是《共进》杂志的积极撰稿人,先后为《共进》杂志撰写了许多有一定见解的文章。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之后,屈武在1924年7月发表了《国民党与陕西青年》一文,正确评价了改组后的国民党,指出:“国民党有它二十年的光荣历史”;“国民党有它极鲜明而适合于中国现在的政治主张;国民党有它人格伟大不屈不挠的领袖”。“国民党是救国的,不是卖国的”;“国民党的主张是进步的,不是退步的”。他敬告陕西的青

^①《共进》第11期,1922年3月10日出版。

年们“应当毅然决然毫不迟疑地加入国民党,来做轰轰烈烈的革命事业,来推翻这万恶的政府,来实现民治政治,来建设国民政府。”^①这篇文章发表后,在陕西青年学生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屈武在北京大学上学期间,直接受到李大钊的教育和帮助,使他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有了进一步的认识。1923年春,屈武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②,并任北京大学团支部书记、团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委员、团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③。1925年,经王若飞、刘天章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④。在北京团地委工作期间,屈武主要负责学生运动。1924年10月,屈武同刘伯庄、于国桢、王复生、李勃海等一起对北京地区的团组织进行了整顿,对每个团员逐一进行了审查并作出鉴定评语,最后将审查合格的112名团员分编为8个支部。当时团组织对屈武的审查评语是“笃信主义,忠实精干。”^⑤

1924年初,国民党改组后,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不久,北京建立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特别市党部,由李大钊亲自负责,屈武为北京市党部的核心成员之一。同年10月,在国共合作大好形势的影响和鼓舞下,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利用直奉军阀混战之

①《共进》第66期,1924年7月25日出版。

②④《屈武同志生平》,1992年6月27日《团结报》;访问屈武记录(1981年7月17日、1979年6月3日)。

③《屈武同志生平》;《北京团地委关于团员审查结果给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4年10月18日)。

⑤《北京团地委关于团员审查结果给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4年10月18日)。

际，发动北京政变，囚禁了北洋军阀政府总统曹锟，打垮了吴佩孚在北方的反动势力，并成立了中华民国国民军，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分任总副司令兼第一、二、三军军长。屈武直接参与了这一政变^①。由于屈武与胡景翼旧交甚笃，加上他在这次革命行动中表现出的卓越才干，很受胡景翼的器重。11月，屈武陪同胡景翼在苏联大使馆第一次会见了李大钊，解决了胡部请求苏联帮助解决武器等问题。同月，经李大钊同意，屈武又陪同胡景翼率部南下，在攻占郑州后进驻开封。此后，国民军第二军驻扎河南，胡景翼任河南督办，屈武被任命为国民军第二军参议^②，协助胡景翼为稳定河南局势而努力工作。

胡景翼在屈武的帮助下，经过十多天的紧张工作，使河南局势得到基本稳定。但是，胡景翼深感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亟待解决，欲请李大钊亲往河南，面商大计。于是，决定派屈武前往北京向李大钊面达此意。屈武携带胡景翼给李大钊的亲笔信，向李大钊汇报。李大钊认为胡景翼是同盟会会员，信仰三民主义，参加过辛亥革命，又是陕西靖国军的首领人物，思想进步，倾向革命，经过进一步争取，完全可以成为共产党信赖的朋友，也会对中原地区和陕西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起很大的促进作用。经过反复慎重考虑，李大钊决定亲自去河南会见胡景翼。

12月下旬，李大钊冒着严寒，在屈武和刘天章的陪同下，前往河南省会开封。李大钊远道而来，使胡景翼喜出望外，立即为李大钊等接风洗尘，并亲自安排在国民军第二军招待所下榻。李大钊在开封停留了一个多星期，与胡景翼等人进行了多次会

①屈武：《李大钊同志到河南指导党的工作》，《中共河南党史资料》第1辑；访问屈武记录（1979年6月3日）。

②《屈武同志生平》，访问屈武记录（1979年6月3日）。

谈，使胡景翼颇受教益。最后，李大钊答应胡景翼关于从苏联援助的军备物资中多分一部分给国民二军的请求，还应允邀请苏联大使加拉罕来开封和苏联顾问来二军，派遣中共北方区委的党团员和干部到二军和河南督办公署，以加强二军的政治工作。李、胡还商定将屈武和刘天章留在开封，协助胡景翼开展工作。李大钊曾对屈武说：胡景翼“这个人很好，一是有政治远见；二是有股革命事业心。”又说：“他想培养革命军事力量与反革命力量相对抗，这是不简单的。”^①李大钊的开封之行，为国共两党在河南地区的革命合作奠定了基础。

1924年12月，孙中山应冯玉祥的邀请，北上到达天津，因肝病在天津暂时休养，提出约见屈武。屈武闻讯后立即由北京赶往天津，一见面，孙中山十分高兴地回忆起他们在上海相见时的情形，并问起开封和西北地区学生运动的情况。孙中山对屈武说：“现在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长此以往，中国的政治将永远无清明之望，民众将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唯一的办法，是举行有各省代表参加的国民会议，选出代表民意的合法政府，由民众来管理国家大事。”孙中山还委派屈武作为他的私人代表，赴陕西宣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以及召开国民会议、和平解决南北统一问题等政治主张，争取陕西地方实力派的支持。临别时，孙中山还交给屈武一份印好的宣传大纲和其它宣传材料，作为开展工作的依据^②。屈武慨然受命，回到北京，向正在北京迎接孙中山北上的于右任说明了孙中山的

①屈武：《李大钊到河南指导党的工作》，《中共河南党史资料》第1辑。

②屈武会见孙中山有关情形详见《屈武文选》，团结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57页。

意见。于右任考虑到陕西正处在镇嵩军刘镇华的统治之下，地方不靖，深恐屈武遭到不测，劝他过一些时间再去。血气方刚的屈武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毅然留下一张“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纸条，就与同行的董汝诚（中共党员，北京大学学生）启程了^①。

屈武、董汝诚奉孙中山之命回到陕西，四处奔走，不遗余力。2月1日，他们应邀出席陕西省国民会议促成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屈武在大会上发表演说，指出孙中山先生发起的“国民会议责任在解决国是而树立民众自决之基础”，“孙中山主张系由职业团体（商、农、工、教各大学、各政党）派出代表组合而成。”驳斥了“国人能力弱会开不成和国民党操纵”的论调^②。会后，屈武招待各报记者，告以孙中山倡导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是、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真相，请各报“代为鼓吹”^③。他还亲往西北大学，三原、耀县杨虎城部——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部和大荔麻振武部进行宣传。在三原期间，于2月17日联合各人民团体成立了渭北国民会议促成会筹备会，反对段祺瑞召开的善后会议。

屈武等在西安等地活动了两个多月，又回到北京，向孙中山复命。那时孙中山已经病重，卧床不起。屈武同于右任到孙中山行辕去探望。当于右任把屈武介绍给孙中山时，孙中山神智很清楚地对于右任说：“我早认识他了，是我派他到陕西去的。”然后屈武向孙中山作了简略的汇报便匆匆告辞^④。这是屈武第三次会见孙中山。不久，孙中山与世长辞，屈武十分悲痛。

①④《屈武文选》，团结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97、57页。

②③1925年，2月2日、3日。《新秦日报》。

后来，他每每忆及同孙中山的三次会见，总是难以忘怀，无限深情地说孙中山是“我心目中树立的第一块丰碑、第一盏指路明灯。”^①称颂孙中山是一位“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②的革命伟人。

屈武回到北京后，又受李大钊、胡景翼、冯玉祥的指派，与邹均、张允荣先后去库伦等地接运苏联援助国民军的军用物资^③。他们穿越茫茫沙漠，备受艰辛，到达库伦，胜利完成任务后，乘坐苏联飞机返回北京，受到国民军和各界群众的欢迎^④。

同年夏，屈武奉命再次赴开封国民军第二军工作。此时，胡景翼因病逝世，继任的二军军长兼河南督办岳维峻，自以为羽毛丰满，日渐右转，不顾李大钊、王若飞、屈武等共产党人的劝告，在省内压制工农运动和学生运动，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同时，他四面树敌，在各路军阀的联合进攻之下，拥有20万大军的国民军第二军顷刻瓦解，余部退往豫西。屈武于1926年初离开开封回到北京。同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屈武因故未能出席，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留 苏 十 二 年

屈武从河南回到北京后，中共北方区委决定派他和邹均去苏联学习。李大钊在百忙中亲自为他们安排去苏联乘坐的轮船，临行前又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你们到了苏联要好好学习，争

①②《屈武文选》，团结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253、58页。

③④访问屈武记录（1979年6月3日）。

取早日回国，多为革命出力。”^① 经过长途跋涉，屈武一行抵达莫斯科，见到在中山大学学习的夫人于秀芝和蒋经国、冯洪国（冯玉祥之子）等人。不久，屈武即与邓希贤（邓小平）、左权、俞秀松、朱瑞、李卓然等一起插班进入当时中山大学的“理论班”学习，与其夫人和蒋、冯属同一年级^②。屈武来到异国，首先遇到的困难是语言不通。为了攻克俄文关，他自备了单词小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进行默记和背诵，连吃饭、走路、甚至上厕所的机会都不放过。冬日清晨的操场上，夜晚走廊的灯光下，都常常留有他顽强学习的身影。就这样，他的俄语水平提高很快，是同龄人中较早能直接用俄语听课的一个。中山大学“理论班”开设的必修课很多，有《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列宁主义基础》、《俄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中国革命运动史》、《东方革命运动史》、《经济地理》、《军事学》等十多门。对每一门课程，屈武都悉心钻研；对于学习中的疑难问题，都虚心请教老师，并和同学们展开讨论，直至弄懂为止，因而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当时，中山大学师生中有共产党和共青团的组织，也有国民党的组织。在屈武所在的第七班中就有国民党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成员，邓文仪、谷正纲、谷正鼎等是其中的骨干分子。因而中大学生中的政治斗争十分激烈。屈武与他们虽系同窗，但在政见上的差异很大，多次和他们展开辩论。一次，屈武在班上的辩论时作了专题发言。他尖锐地指出：所谓孙文主义学会不过是一部分人为了捞取政治资本，打着孙中山的招牌，挂羊头卖狗肉而已。他还参与学校创办的《红墙》墙报的编辑

^{①②}访问屈武记录（1979年11月11日）。

工作，宣传共产党人的主张。1927年3月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山大学后，屈武激动不已，热泪盈眶，撰写文章，并和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欢庆这一伟大的胜利。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这种剧变的政治形势，引起中山大学学生普遍关注。在中大的集会上，屈武与进步师生齐声申诉，要求惩办“革命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蒋介石。7月15日，汪精卫又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形成了反动的宁汉合流，国共合作的政治局势彻底破裂了。就在这一黑云压城的时刻，由国民党左派宋庆龄联合部分国民党中央委员（其中包括一些共产党员），发表了著名的《中央委员宣言》，痛斥蒋介石、汪精卫等“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① 屈武虽远在苏联，也列名其中。

1929年夏，屈武从中山大学毕业，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又调他到伏龙芝军事学院（又称陆军大学）学习军事。这在当时苏联最高军事学府，师资力量和教学设备均是一流水平。和屈武一起学习的还有刘伯承、左权等。他们朝夕相处，情同手足。屈武对学院开设的战略学、战役学、军事地理学等课程都有浓厚的兴趣。教学中指定的参考书籍，他每书必读，仔细钻研，用红色铅笔标出要点。为了配合战略学的学习，他利用课余时间阅读了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三卷本《战争论》。屈武在军事、政治课程的考试中富有自己的创见，他旁征博引，阐其要义，成绩斐然。每一次战术作业都一丝不苟，自觉地培养军人应有的严谨作风，受到师生们的好评。

^①1927年8月1日南昌《民国日报》。

1930年4月，屈武即将毕业时，苏联共产党内开始全面“清党”，后来又开展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使许多老布尔什维克遭到残酷迫害，蒙受了不白之冤。对此，既是中共党员又是联共（布）党员的屈武深感不安。正当他百思不解的时候，联共（布）组织以“违犯军纪”等“莫须有”的罪名，割断了他与党组织的联系，并发配到北冰洋岸边的一座小城摩尔曼斯克去服苦役。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屈武内心十分痛苦。但他忍辱负重，委屈求全，白天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晚上仍坚持学习，始终保持着一一种旺盛的革命意志。后来，屈武每每回忆到这一段不平常的经历，说：“我虽受到错误的处理，从事很重的体力劳动，但它对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既锻炼了体魄，又磨砺了意志。”^①

在苏联期间，屈武与蒋经国同窗共读，有着深厚的交谊。他们两人是1924年初在北京通过于右任的关系相识的。这时屈武26岁，蒋经国14岁，两人的生肖一样，都属狗；两人的名字中都有一个“经”字（屈武字经文），所以于右任让他们结拜为兄弟。蒋经国称屈武“经文老兄”；屈武也十分喜欢蒋经国，经常在一起学习，游故宫、天坛、十三陵。彼此往来频繁，关系日密。于右任还调侃地叮嘱他们：“你们要好好相处，切不可‘狗咬狗，两嘴毛’呀！”屈武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后，又与蒋经国同班。两人异国相逢，相知更深了一层，情同手足，知无不言，有时促膝交谈，直至深夜。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蒋经国曾撰文表示异常气愤，屈武也深表痛心。1927年，屈武与蒋经国在中山大学毕业，屈武进入苏联陆军大学学习，蒋经国进入列宁格勒政治军事大学学习。后来，蒋经国提前毕业，被

^①访问屈武记录（1979年11月11日）。

分配到西伯利亚的一家工厂做工。出发前，蒋经国从列宁格勒来到莫斯科，在屈武那里住了一个月。每当夜晚，两人遥望祖国，思念亲人，不禁潸然泪下。言及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两人都有切齿之恨。屈武虑及西伯利亚严寒难耐，将他从国内带去的一条毛毡赠给蒋经国。这条毛毡帮助蒋经国度过了西伯利亚寒冷的漫漫长夜。后来两人见面时，蒋经国回忆这件事，激动地对屈武说：“你在苏联救了我一条命！”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屈武与蒋经国相继回到国内，两人虽然在政见上逐渐产生了分歧，但仍然保持着昔日的友谊。1949年初，屈武随国民党和谈代表张治中去奉化溪口，最后一次见到蒋经国。此时两人政见已同水火，但却仍是友情如故。分别时两人互道珍重，蒋经国连连说道：“后会有期。”

1937年冬，抗日战争爆发后，中苏关系得到进一步改善，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通过中国驻苏大使馆向苏方提出交涉，查询11年前去苏联中山大学学习的屈武的下落^①。不久，苏联将屈武从流放地送回莫斯科，并通知屈武：你可以回国参加抗日战争了，用你学到的军事知识为国家服务^②。此时，屈武得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已经建立，思乡之心，骨肉之情，更使他激情难抑。很快，他就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安排下，办好了回国的手续。

在抗战的大后方

1938年春末，屈武踏上了归途。他绕道西欧，途经英、法

^{①②}访问屈武记录（1979年11月11日）。

等国，时走时停，到达香港时已是盛夏时节。孰料，由于抗日战事激烈，香港至重庆的航线中断，屈武只好在香港候留。他找到了中共派驻香港的代表廖承志，作了长时间的谈话。屈武通过廖承志了解到国内各方面的情况，心情虽然有些沉重，但在当时国共合作的情况下，对祖国抗战前途，还是颇具信心的。末了，屈武请求中共组织审查自己的历史，希望尽快恢复自己的党组织关系。廖承志答复说：欢迎您回国参加抗战。关于恢复党组织关系，待您回重庆后再研究，另作答复^①。屈武归心似箭，在香港稍事休息后，取道贵阳，搭乘长途汽车到达重庆时，恰逢中秋佳节。于右任闻讯亲自过江迎接屈武，安排他暂住在陕西同乡、好友康心如的公馆里。屈武见到了阔别12年之久的亲人，格外高兴。

这时，“保卫大武汉”的战事正酣，抗日前线急需军事人才。屈武回到祖国，欲以自己在苏联学习的军事知识和技术奔赴抗日疆场，为国效命，曾多次向有关方面提出自己的请求。按说，像屈武这样的在苏联学习军事的优秀人才，又是于右任的女婿，是不难实现自己的愿望的。但是，蒋介石因屈武不是黄埔军校嫡系，而是所谓的“赤化”分子，根本不放心让他带兵抗日。屈武报国无门，心中愤懑不已，在家闲居多时。后经贺耀组介绍，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顾问事务处供职，先后任副处长、处长、少将参议等职^②。不久，又经冯玉祥和孙科等人的举荐，兼任立法院立法委员、中苏文化协会秘书长。”^③

在重庆，屈武通过职务上的便利，结识了许多新朋友和各

①访问屈武记录（1979年11月11日）。

②③《屈武同志生平》。

界人士，如孙科、冯玉祥、王昆仑、王炳南、朱蕴山、许宝驹、张西曼、张治中、朱学范、钱昌照、谭平山、陈劭先、金仲华、陈其瑗，等等。他们与屈武过从甚密，常常议论时局的发展和抗战大计。尤其是1939年初，经王炳南介绍，结识了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通过直接和间接的关系，受到了许多教益，得到了许多锻炼的机会。当时，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的内外政策都发生变化，国内时局出现逆转的趋向。对此，周恩来经常与屈武探讨时局问题。屈武也经常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或是请教问题，或是反映情况，或是接受任务。在周恩来的教诲下，屈武缜密仔细地体察时局的变化，使他看清了政治上是非的分野，认识到抗战的胜败，关键在于能不能坚持到底；而能不能坚持到底，就在于国共两党能不能保持团结合作。这一认识，成为指导屈武当时和以后政治倾向和行动的定向器^①。

周恩来还通过屈武努力做好于右任的工作。一次，周恩来特邀屈武谈话，说道：“于右任先生是位公正的人，有民族气节。你应该爱护他，首先在政治方面爱护他。要帮助他对国共两党团结抗战问题，立场要坚定；在这方面发生的重大问题，要有正确的理解和积极的态度。”^②屈武体念周恩来珍视国共合作的苦心，从此以后，在于右任身边生活了6年多时间，帮助于右任做他所应该做的工作。1939年，国共摩擦事件迭起，于右任由于不了解情况和受了反动宣传的蒙骗，问屈武说：“八路军挖国军的墙脚，收缴国军的枪枝，一味扩充自己的实力，究竟是为了什么？他们企图是什么？”^③屈武回答说：“这显然是编造的谎言。”他列举了各

^{①②③}《屈武文选》第225、226、227页。

战区大量的材料，证明是国民党军队奉上级命令，在前方和后方“围剿”八路军，而八路军的反击反共摩擦只是不得已而为之。一席话说得于右任只是点头。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屈武把这一消息告诉于右任，于右任听了非常气愤，拍着桌子大声说道：“这样破坏两党的合作，简直是破坏抗战，我一定要讲话！”^①以后于右任听到周恩来亲自在重庆街头卖《新华日报》的消息，以赞叹的口气对屈武说：“恩来先生的人格真伟大！”^②

屈武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为维护国共合作，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一次屈武向周恩来提出请求恢复中共组织关系的问题。周恩来沉思之后对屈武说：“关于您的请求，廖承志同志已经告诉过我。经过研究，为了便于在国民党上层开展工作，暂时不恢复您的党组织关系为好。”^③屈武十分理解并坚决服从党组织的决定。皖南事变后，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屈武和王昆仑、王炳南、许宝驹等在重庆成立了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又称“小民革”），屈武当选为中央委员^④。他说：“国民党左派要团结国民党内的爱国民主力量，成立组织，才能更有力量。”^⑤他们团结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维护国共合作，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45年秋，毛泽东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期间，亲自接见了屈武、王昆仑等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负责人，对他们的工作给予高度的评价，称赞他们是“抗战功臣，无名英

①②《屈武文选》第226、227页。

③④访问屈武记录（1979年11月11日；1983年5月16日）。

⑤朱学范：《沉痛悼念屈武同志》，1992年7月5日《人民日报》。

雄”^①。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背信弃义，向苏联发动了疯狂的进攻。战争之初，苏联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暂时放弃大片土地，以保存实力。于是，重庆的许多军事家、战略家和政治家看到德军“闪电战”连连得手，预言苏联不久就要失败，德国会胜利。一向十分关心苏联战局的屈武多方面综合分析了苏德双方的情况，作出了正确的判断。1941年9月28日，在中苏文化协会组织的形势讲演会上，屈武作了《苏德战争的爆发》的报告，系统阐述了他的看法，认为：“对于战争的观察，要看全盘，不能囿于一时之胜败与一城一地之得失，更不能因一时一地之胜败而推翻基本的结论。因此，在战争起初时，个人就预测苏必胜德必败。虽然苏联一时丧失局部领土甚至几个据点，但最后胜利具有充分保障，毫不含糊。”^②他还从气候、补给、汽油、交通线、人员补充、食粮、占领国家及后方不稳定、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等8个方面分析最后胜利必然是苏联的，希特勒的失败必不可免，但时间的迟早则不能断定。屈武的报告，使听众精神为之振奋。

以后，苏德战争中每一次重大战役，屈武都应邀为有关学校和团体做报告，或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他于1942年2月2日和1943年2月5日，在陆军大学作了《德军闪击战失败之原因》、《苏军冬季攻势》的报告；1943年9月7日，为《中苏文化》杂志撰写了《苏军夏季攻势》的文章；1943年11月11日，

^①《屈武同志生平》，《屈武——从爱国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第86页。

^②屈武：《论苏德战争》，中苏文化协分编译委员会1944年2月版第8、9页。

在中苏文化协会作了《德军从苏联战场上节节溃退》的报告；1944年2月1日写了《胜负已决之苏德战局》等文章。这些文章和报告的主要观点是：第一，纳粹德国失败和苏联的胜利是必然的。屈武认为：“苏联在这次战争中取得胜利，决不是侥幸的。苏联自革命成功以后二十余年时间……在列宁和斯大林先后领导下，举国上下，栉风沐雨，埋头苦干，从事各种建设，结果造成功一个极新的社会，把一个落后的，工业不发达的，政治腐化的，无国防工业的国家，变成了一个进步的，工业化的，政治清明的一个强国。”^①第二，这次苏德战争是对苏联的新制度、新政策的一个总的考验。“这次战争证明了苏联新制度的国家不特在清平时代能以站立得定，而且还可以经得起翻天覆地的暴风雨。”^②第三，这次战争证明苏联红军是世界上最强的军队。屈武指出：苏联红军的技术、高度训练、严明纪律，官兵和蔼以及它的英雄气概、爱国的热情，都证明它是无敌于天下的，“这是法西斯军队先天上不可能具备的特质。希特勒的军队号称世界无敌的军队，这次却碰到较它更高强的对手，也被苏联红军打败了。”^③第四，苏联红军的胜利及其作战经验，是值得研究的。屈武指出：“日本军阀尚控制着我们，蹂躏着我们半壁河山，我们应当研究苏联作战的经验，以便加速反攻，消灭我们的敌人，完成抗战的任务；我们更应当研究苏联建设的经验，以便战后从事改革，完成建国大业，使吾国名副其实的跻于世界四强之一的地位。”^④

后来苏德战争的发展证明，屈武的这些精辟独到的论断都是正确的。一直同屈武在苏德战争胜败问题上持不同看法的国

^{①②③④}屈武：《论苏德战争》第34、47、52、57页。

民党军事理论家、陆军大学教育长徐培根，最后也为屈武的军事眼光所折服，不仅在报纸上公开承认自己的战略思想是落后的，而且请屈武到陆军大学当教官，主讲《苏联红军战略思想》、《苏德战争战例分析》两门课程。屈武讲课“内容丰富，分析透辟，声音宏亮，如雷贯耳”^①，受到学生的欢迎和好评。1944年2月，屈武把多年来所作报告、讲演结集成册，编成《论苏德战争》一书，由中苏文化协会编译委员会出版发行。徐培根亲笔为之作序，序文称：“屈武先生，为我陆大讲授苏德战争经过，并作有系统之叙述及分析，余受而读之，其印证于脑际者益为深切。”^②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中苏文化协会会长孙科也为此书作序，称赞“屈武同志是国内研究苏联军事的专家，近二年半来对于苏德战争的演变，做过有系统的研究。”^③时人对于屈武的军事才能都刮目相看，有“论断苏德战争之权威”的美称^④。

屈武在重庆的言论和行动，引起了蒋介石的猜忌和不满。1944年春的一天，屈武忽然接到蒋介石召见的通知。见面后，蒋介石说：“关于你工作的调动问题，我已决定派你去陕西担任建设厅厅长。”屈武说：“我在重庆的工作很多，怎么能丢得下。况且在抗战期间，哪里有钱搞建设？为什么派我去做这项有名无实的事情！”蒋介石回答说：“这是祝绍周主席要你去的。你是陕西人，回去建设自己的家乡不好吗？”屈武不肯受命，请蒋介石再考虑一下，蒋介石大发脾气，用手拍着桌子声色俱厉地说：

①贾亦斌：《回忆屈老》，1992年7月4日《团结报》。

②③屈武《论苏德战争》第6、3页。

④《中国当代名人传》，世界文化服务社1948年6月出版。

“这是命令！”^① 说完就转身而去。

屈武回到家中，将蒋介石召见的经过告诉了于右任，于右任听了沉思默想，也无能为力。屈武又通过蒋经国，希望从中得到转圜的余地。蒋经国早已知道此事的来龙去脉，对屈武说：“老兄，不行啊！有人在委座面前告发了你，说你同共产党暗中勾结，并与苏联武官处进行非法联系。还说你参加了什么秘密组织（即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委座非常生气，他对我说如果不是看在于院长的面上……他下面要讲什么，你自己会明白的。看来要你到陕西当建设厅长，已经是很宽大了。你想留在重庆不去西安是不行的。我看你还是暂时到西安去^②。屈武带着失望的心情回到家中。后来他又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认真考虑之后说：“那只好去吧，违抗是无益的。你到西安以后要经常和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处长周子健同志联系。”^③1944年春，屈武不得不离开重庆。

屈武在陕西任建设厅长为时一年有余。其间，他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十分险恶的环境里，与周子健等同志进行必要的秘密接触，反映了一些有关胡宗南、祝绍周反共阴谋活动的情报。此外，还和杜斌丞、杨明轩（中共党员）组成三人小组，指导陕西地区的民主人士的抗日和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的活动。1944年10月，屈武协助杜斌丞、杨明轩、王菊人、郭则沉等发起组织中国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委员会，提出“亲苏、友共、努力实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并促成《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成为西北民盟支部的机关报。1945年9月初旬，屈武以到中央述职和请求拨款为由，回到重庆。但为时不久，即

^{①②③} 《屈武文选》，团结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229、230页。

受张治中先生延揽转道新疆任职。

在新疆不平凡的日日夜夜

从1945年11月到1950年初，屈武在新疆生活、工作了5个春秋。此间正值新疆发生重大的历史转折，屈武无畏无惧，受周恩来的重托，为释放关押在新疆的共产党人及其家属尽心竭力；并协助张治中通过和平谈判，与三区革命力量达成协议，维护了民族团结，为后来和平解放新疆创造了有利条件；其后又为实现新疆的和平解放披肝沥胆，奔波不息，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4年秋，新疆伊犁、塔城、阿尔泰山三个地区（简称“三区”）的广大农牧民不堪忍受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在阿合买提江等人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经过一年的斗争，1945年秋，在这里的国民党军队抵挡不住三区革命民族军的反抗，大部被歼灭，余部撤至玛纳斯河东岸，双方形成对峙局面。此时，抗战刚胜利，国共两党正在重庆举行谈判，国民党蒋介石为了安定大后方，稳定人心，即组成以张治中为首的中央和平代表团，赴迪化（今乌鲁木齐市）解决新疆问题，经过反复遴选，张治中将屈武列为代表团成员之一。最初，张治中征询于右任和屈武的意见，于、屈担心蒋介石不会同意屈武离开陕西到新疆去。张治中说：“只要屈武同意去，委员长那里的问题，我有办法。”并说：“因为三区问题与苏联有关，屈武参加代表团，有利于和平解决三区问题”，说服了于右任和屈武^①。

^①《屈武文选》第231页；访问屈武记录（1979年11月11日）。

张治中走后，屈武立即去见周恩来，汇报了张治中要他到新疆去的问题。周恩来说：“如果老蒋同意你到新疆去，那是一件好事：第一，可以摆脱胡宗南和祝绍周的魔掌；第二，张文白在国民党内不是顽固派，在政治上是向前看的。同他一道工作，可以不断地帮助他进步，对将来处理国共之间的问题，是会起好作用的。”周恩来的这一分析，使屈武心中豁然开朗，去从之间，便有所遵循了。

不久，张治中电话告诉屈武：委员长已经同意你到新疆去，最近就要出发了。屈武十分高兴。离开重庆前，屈武又去见周恩来，向他告别，并谈了赴新疆的打算。周恩来明确交代：“你到新疆去有一件重大的事情要办。盛世才统治新疆时期，关押了一百多名共产党员，到现在还没有释放出来。我已经向文白先生提出，他到新疆后，请他贯彻《双十协定》中释放政治犯的条款，把这些中共党员释放出来送回延安，张文白已经表示同意。不过他到新疆是从事和平谈判解决三区问题的，他一定很忙，很容易把这件事置之脑后淡忘下来，你必须随时提醒他，并帮助处理这一重大问题。”^①

1945年11月下旬，国民党赴新疆中央和平代表团一行十人飞抵迪化市。屈武到新疆后，尽管工作繁忙，但对周恩来交办的大事一直萦绕在心头。这时，张治中以全部精力贯注在三区和谈问题上，无暇过问释放共产党人的事。屈武心急如焚，经他再三提醒和催促，张治中终于决定要屈武一面参加和谈，并随时同苏联驻新疆总领事取得联系；一面帮助他处理释放这批中共党员工作。张治中明确对屈武说：“你先抽时间去第四监狱，

^①《屈武文选》第231页；访问屈武记录（1983年6月13日）。

代表我探望杨之华女士，她是瞿秋白先生的夫人，现在名为朴宇。她是我在上海大学的同学。”^①屈武立即前往新疆第四监狱，探望了杨之华和她的女儿杜伊，分别作了两次谈话，并告诉她们周恩来对她们的关怀和周恩来与张治中商定释放在新疆关押的全部共产党人的情况，还告诉她受张治中委托探望老同学的经过。屈武从杨之华那里了解到马明方、方志纯、张子意、张文秋、高登榜、王韵雪（陈潭秋夫人）、陈茵素（林基路夫人）、朱旦华（毛泽民夫人）等 131 名共产党员的下落，即向张治中作了汇报^②。张治中下令改善监狱的生活待遇，提高在狱中共人员的伙食标准。在屈武的安排和参加下，张治中又与被押共产党员的代表举行了会谈^③。

经过张治中和屈武的努力及国内外舆论的压力，1946 年初，国民党蒋介石终于同意释放关押 4 年之久的中共党员。这一年的 6 月 10 日，屈武和改任国民党西北行辕主任兼新疆省主席的张治中，专门为中共人员举行欢送宴会，中共人员登途之日，屈武又代表张治中为他们送行。为了使这批共产党员安全返回陕北，屈武和张治中还特意通过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选派得力人员随行护送，并致电周恩来知晓。1949 年 4 月，当屈武飞抵北平以国民党和谈代表顾问身分见到周恩来时，周恩来紧紧地握着屈武的手说：“谢谢你协助张文白先生完成这件最重要的任务。”^④

1946 年夏，屈武协助张治中通过和平谈判，同三区革命力量达成了协议，坚持民族团结，缓和了盛世才反动统治所造成

①④朱国琳：《屈武同志在新疆》，1992 年 8 月 5 日《团结报》。

②《屈武同志生平》；访问屈武记录（1979 年 11 月 11 日）。

③《屈武文选》第 233 页。

的紧张局面，成立了以张治中为主席，阿尔买提江为副主席的新疆民族联合政府，屈武任委员并兼任迪化市市长。

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岌岌可危。1月21日，蒋介石被迫宣告下野，避居家乡奉化溪口，但仍以下野之身，暗中操纵着国民党的实权。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实现和平统一的声浪中，新任代总统李宗仁于1月22日表示愿意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经过反复酝酿，终于在3月24日组成了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国民党和谈代表团。张治中推荐屈武为代表团的顾问^①。

代表团赴北平前，张治中与屈武两次去奉化溪口，分别会晤蒋介石和蒋经国。第一次是3月3日，屈武同蒋经国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谈，但两人的意见已经距离很大了，蒋经国也对国共和谈信心不足。但是，两人的关系仍旧很好。第二次是3月29日，只住了一天，屈武便返回南京，蒋经国一直送到机场。临别时，蒋经国深情地对屈武说：“我们会很快相见。祝你成功。”^②屈武两次去溪口，基本摸清了蒋氏父子对和谈的态度：他们把和谈作为缓兵之计，待机反攻，反攻如不可能就搞划江而治，决不接受惩办战犯、改编军队等条件。屈武回到南京后，通过中共地下党员吴克坚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③。

4月1日，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抵达北平。国共双方代表团经过半个多月的磋商，于4月15日对草拟的八条二十四款《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达成了协议。即日晩，张治中决定

①《屈武文选》第233页；《屈武同志生平》。

②《屈武文选》第260页。

③访问屈武记录（1979年11月11日）。

派黄绍竑、屈武带着《协定》回南京。对于这个《协定》，屈武和张治中心里都很明白：南京政府决不会批准。张治中对屈武说：这个协定，估计南京政府不会批准。到那时，你要想尽一切办法回新疆去，转告陶峙岳将军，新疆要和平，要学傅作义先生，走和平的道路。第二天早晨4点钟，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又亲临屈武的住所，对屈武说：“南京政府批准这个协定的可能性很小”，“国内实现和平的希望很小，如果决裂了，你要赶紧回到新疆去，策动那方面的部队起义。尽量使人民不受或少受损失。”^①屈武也向周恩来汇报了新疆国民党部队的情况，特别是陶峙岳将军的政治态度。屈武深知这次策动新疆和平起义不仅关系解放战争的进程，而且关系到祖国边疆的安危，事关重大，非同寻常。

4月16日，屈武、黄绍竑回到南京向李宗仁复命。南京政府军政要员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最后于4月20日决定拒绝签字。这时，南京方面有人要屈武同他们一起去广州。屈武借口新疆方面有急事需要处理，便搭乘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郭寄嶠回兰州布防的飞机到了兰州，5月初回到迪化。

当时，新疆形势十分复杂，主和派和主战派斗争激烈。为了掌握时机，屈武一到迪化，就和西北军政长官公署迪化办公厅秘书长兼新疆省政府秘书长刘孟纯商议策动和平起义之事。此前，张治中在从南京即将赴北平和谈的前一天，曾将刘孟纯召到南京交待了新疆起义的意见。现在，屈武又向刘孟纯详细介绍了北平和谈的经过以及周恩来、张治中对新疆和平起义的

^①屈武：《记周总理对于右任先生的关怀和对我的教育》，《人物》1981年第4期；访问屈武记录（1979年11月11日）。

意见与希望。刘孟纯的看法与屈武完全一致，并决定一同去找陶峙岳将军商谈。陶峙岳虽然是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新疆警备司令，名义上是新疆军界的头号人物，统帅 10 万大军，但实际掌握的兵力却很有限，仅有整编第四十二师（师长赵锡光），而且驻守南疆；另外两个师的师长叶成、马呈祥都是听命于胡宗南和马步芳的。当屈武、刘孟纯向陶峙岳汇报北平和谈经过和传达张治中的意见后，陶并没有急于表态，只是说：等等再看。

面对这种情况，屈武和刘孟纯商定，首先大造和平舆论，由屈武将在北平、南京、溪口的所见所闻告之于社会。屈武首先选择了青年知识分子集中的新疆学院，热情洋溢地宣传了人民解放军在三大战役中所取得的辉煌战绩，以及傅作义将军率部在北平起义的重大意义。最后提出“新疆怎么办！也只有一条路，那就是采取和平解决。”他号召学生们要紧跟上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为新疆的和平解放奔走呼号^①。屈武和刘孟纯还一起深入到民众和军队中做工作，一起召开军政人员座谈会，宣传和谈。屈武的讲演不胫而走，引起社会各界强烈的反响，一时把迪化搞得沸沸扬扬。

这一切，使手握军权的叶成、马呈祥、罗恕人、刘汉东等人也坐不住了。他们找到陶峙岳大叫大嚷，说：如果屈武这些文人墨客再不停止赤化宣传与和谈宣传，我们将付诸武力。陶峙岳却不紧不慢地笑着说：“你们依仗枪杆子逞凶去对付他们，不显得过分吗？不是很虚弱吗？你们也知道经文（屈武字）先生是于右任院长的女婿，而于院长在蒋介石面前可是什么话都

^①朱国琳：《屈武同志在新疆》，1992年8月5日《团结报》。

可以说的呀！”^①叶、马、罗三人不禁为之咋舌，悻悻而去。

与此同时，屈武同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陶峙岳司令、刘孟纯秘书长以及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叶浦赛也夫等人已多次在南山、天池和南台子秘密会见，就新疆的局势交换意见，并拟定了和平起义的方针。

1949年8月下旬至9月初，由彭德怀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相继攻克兰州和西宁等城市。王震率领一野第一兵团挥师西进，新疆解放指日可待。9月15日，屈武和刘孟纯等人受包尔汉的委托，到机场迎接中共中央联络员邓力群。当晚，在包尔汉家里，邓力群将毛泽东致陶峙岳、包尔汉的电报转送给陶将军，并传达了中共中央和平解放新疆的主张和政策，希望陶峙岳将军、包尔汉主席尽快组织起义。陶、包都表示了和平起义的心愿，介绍了起义的准备情况。

9月19日，屈武等得悉叶成、马呈祥、罗恕人已在调集部队，准备在20日晚发动暴乱，劫持陶峙岳，杀掉屈武、刘孟纯等人的阴谋。形势极为危急。屈武等人商议对策，一致认为应以大局为重，以和为贵，为顺利举行起义扫平道路。于是决定以陶峙岳将军名义在20日下午请叶、马、罗等人吃饭，彻夜游宴，将他们紧紧拖住。20日午夜时分，叶、马、罗到了马呈祥住所，想继续行事。恰在此时，陶峙岳不畏个人生命危险，只身闯入马呈祥司令部，晓以大义，义正辞严地说：“你们如果将屈武等人抓起来，一定会引起一场战争，几面受敌，自取灭亡。”^②在陶峙岳的说服下，叶、马、罗不得不交出兵权，出国谋生。

^{①②}朱国琳：《屈武同志在新疆》，1992年8月5日《团结报》。

9月25日，陶峙岳将军率部通电起义。次日，包尔汉、屈武、刘孟纯等省政府委员发表通电，将旧政权改组为新疆临时人民政府，听候中央人民政府的命令。28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复电陶峙岳、包尔汉等：表示“极为欣慰”地欢迎你们“归向人民”。

为了使彭德怀、王震率领的第一野战军顺利进军新疆，屈武受陶峙岳将军的指派，任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入新疆代表团团长，前往甘肃酒泉，代表新疆起义部队、新疆临时人民政府和各族人民迎接解放军进疆。在酒泉“一野”司令部里，屈武一行受到彭德怀司令员的热情接待。10月20日，在屈武的陪同下，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批进疆部队抵达迪化，全城欢腾，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的到来。至此，新疆和平解放顺利完成。屈武历经艰辛，终于胜利完成了党交给他的又一项光荣使命。

新疆解放后，屈武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迪化市市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屈武为稳定新疆的社会秩序，进行民主改革，恢复和发展经济、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艰苦不懈的努力。1950年初，屈武调往北京工作。3月，周恩来偕屈武到中南海，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握着屈武的手说：“新疆起义的意义很大，我们知道你在其中起了很好的作用，为人民做了一件好事。”^①此后，毛泽东每次见到屈武，都要提及新疆起义的事。而屈武总是谦逊地说：在新疆起义中，我只不过做了我应该做的事^②。

^{①②} 颂进：《访问政协常务委员屈武》，《中国新闻》第8785期第9页。

统一战线工作的典范

1950年初，屈武调北京工作，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兼参事室副主任，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周恩来见到屈武后说：“屈武同志，现在可以恢复你的党组织生活了。”^①经李克农、徐冰介绍，屈武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②。从此时到“文化大革命”前，屈武还先后担任了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第一、二、五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第三、四、五届委员会常委等职务，积极协助周恩来、李维汉、彭真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并先后率领友好、文化、艺术代表团，出访1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促进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和科学教育文化的交流付出了大量心血。

“文化大革命”期间，屈武惨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其中“罪名”之一是：与张治中勾结在一起，秘密执行蒋介石的阴谋诡计，把在新疆关押的100多名中共党员诱降叛变，钻入中共心脏，为国民党效忠服务^③，被打成“叛徒”、“特务”。他们对屈武进行各种形式的揪斗、辱骂、毒打、威逼、利诱等逼供手段。屈武虽身处逆境，但对中国共产党、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丝毫没有动摇，丝毫没有在破坏真理正义的邪恶势力面前低头，丧失立场。当造反派强迫屈武承认六次出国有“里通外国”的罪行时，他坚决抵抗，誓不屈服。最后以“反革命”罪将他逮捕，关入北京秦城监狱达8年之久，受尽非人的折磨。

^{①②}访问屈武记录（1979年11月11日），《屈武同志生平》。

^③《屈武文选》第245页。

1972年，周恩来看到屈武从监狱中转来的一封信，立即召集专案组负责人查问，并指示立即释放。江青知道此事后竟擅自下令“继续关押”。屈武又多坐了2年牢。1974年9月，周恩来在审批参加建国25周年国宴的名单时，补充了屈武的名单，并经毛泽东批准同意，屈武才得以从牢狱直赴国宴。次日又得以与离别8年的家人团聚。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屈武拥护中国共产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辞年迈，尽心竭力，把自己的晚年毫无保留地奉献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在他担任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期间，为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发挥了积极作用。他多次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民主协商会、座谈会，同中共中央领导人和民主党派负责人共商国是，为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争取祖国早日统一献计献策。

屈武自参加民革中央工作以来，一直担任重要职务，为民革组织的巩固和发展，为中共与民革的团结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1979年民革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他先后担任民革中央副主席、代主席、主席兼中共党组书记以来，为平反冤假错案，落实统战政策，开拓新时期民革工作，付出了大量心血。1987年12月，屈武因年迈体衰，主动辞去民革中央主席职务，被推举为名誉主席。他全力支持朱学范领导民革工作，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曾两度访问江南，视察和指导民革地方组织的工作，关心民革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不愧为民革卓越的领导人。

1979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后，特别是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后，屈武表示衷心

拥护，认为这是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唯一正确途径，希望台湾国民党当局顺应历史潮流和人民意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举行两党对等商讨，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最终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直到1992年春他病重期间，还对前来看望他的民革中央副主席贾亦斌说：“下次国共再进行和谈时，我要争取做共产党的顾问”^①。

屈武一直关心、怀念在台湾的亲朋故旧，长期致力于促进祖国统一的事业。早在50年代，他在北京接待过台湾国民党当局派的代表，并向周恩来总理和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周恩来、毛泽东在屈武的引荐下，接见了这位代表^②。后由种种原因，国共双方的接触中断了。1961年4月，周恩来得知于右任在台湾，尚为在西安的夫人高仲林八十寿辰的事焦虑伤心，即派屈武专程由北京赴西安，以女婿的名义为于夫人祝寿。屈武携儿子北大、儿媳梅君和于右任的外甥周伯敏同赴西安。并在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的安排下，邀请了于右任当年的老朋友孙蔚如、韩望尘、茹欲立、杨子廉等20余人参加寿宴。于夫人兴高采烈，激动不已。寿宴后全体合照一张照片，留作纪念。事后，屈武写信并附合影照片，通过香港友人将西安祝寿的盛况告诉于右任，于右任看后喜出望外，彻夜未眠。1981年10月14日，屈武在《长江日报》发表了《我和蒋经国先生的交谊》的答记者问，后又多次致函蒋经国先生，回顾昔日苏联同窗、赣南闲游、溪口话别、患难与共的情景。希望他以民族大义为重，“顺应历史潮流，体察民意，明照机先，果断抉择”，“造福斯民，流芳百世。”^③1987年6月，

①贾亦斌：《悼屈武》，1992年7月4日《团结报》。

②访问屈武记录（1983年5月16日）。

③《屈武文选》第36页。

屈武又以 88 岁高龄之身，重游奉化溪口，在蒋经国祖母王采玉和母亲毛福梅墓前献了花篮，参观了丰镐房、小洋房和妙高台。所见所闻，使他感触良多。1988 年 1 月，蒋经国先生在台北逝世后，屈武悲痛无已，竟夜难眠，向蒋夫人蒋方良女士发出一封情真意挚、感人肺腑的唁电以示哀悼。一时海内外报刊纷纷转载。后来，他曾多次表示：只要是为了祖国统一大业的需要，我很乐意于飞越海峡，与台湾当局握手言欢，畅谈往事，共商国家大计，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而且永远合作下去。

几十年来，屈武就祖国统一问题发表了许多谈话、讲话和文章，并通过在台湾和海外的广泛社会关系，积极开展促进祖国统一的工作。1991 年 10 月，首都各界隆重集会，纪念辛亥革命 80 周年，屈武不顾家人和医生的劝阻，抱病亲临大会发表讲话，再次希望台湾当局能够重温孙中山先生的遗教，以中华民族的利益为重，捐弃前嫌，开诚相见，采取切实的措施，为祖国统一大业作出贡献。甚至在他病重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祖国统一。他在遗嘱中写道：我只有一个愿望，待到海峡两岸人民团圆那天，你们为我斟上一杯茅台酒，让我在九泉之下分享祖国统一的欢乐^①。1992 年 6 月 13 日，屈武在北京逝世，终年 94 岁。

附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1. 《屈武文选》，团结出版社 1988 年 1 月出版。
2. 《屈武同志生平》，1992 年 6 月 27 日《团结报》。
3. 屈武：《论苏德战争》，中苏文化协会编译委员会 1944 年 2 月出版。

^①《屈武同志生平》。

4. 屈武：《记周总理对于右任先生的关怀及对我的教育》，《人物》1981年第4期。
5. 《屈武》，载《中国当代名人传》，世界文化服务社1948年6月出版。
6. 访问屈武记录（1979—1983年），笔者存。
7. 颌进：《访问政协常务委员屈武》，（1979年9月25日），载《中国新闻》第8785期。
8. 朱学范：《沉痛悼念屈武同志》，1992年7月1日《团结报》、1992年7月5日《人民日报》。
9. 贾亦斌：《悼屈老》，1992年7月4日《团结报》。
10. 侯镜如：《安息吧，屈武同志》，1992年7月1日《团结报》。
11. 彭清源：《屈老是我们的光辉榜样》，1992年7月4日《团结报》。
12. 朱国琳：《屈老同志在新疆》，1992年8月5日《团结报》。
13. 王奇：《经文伟武——男儿——记屈武从投笔从戎到弃武从政》，1992年8月8日《团结报》。
14. 《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在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8月出版。
15. 1919年6月、11月北京《晨报》。
16. 1919年6月、9月《长安日报》。
17. 1919年6月、10月上海《申报》。
18. 《共进》（1921—1925年）。
19. 《贡献》（1922年）。
20. 1925年1月、2月《新秦日报》。
21. 《北京团地委关于团员审查结果给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1924年10月）。
22. 访问许德珩、楚图南、罗章龙、刘仁静、孔祥祯、方仲如、张仲实、师哲、高克林、王炳南、赵守一、郑超麟、严信民、侯镜如、毛齐华、赵伯平、孔从洲、刘威诚、韩志颖、马文彦、刘尚

达、张耀斗、郑自毅、张秀逸、顾红梅、王德崇、罗乐水、米暂沉、曹志麟、武少祖、王超北、彭建华、关中哲、王鸿俊、张崇文、张乃华、谈维熙、杜松寿、杨厚庵、王友直、高幼湘等人的谈话记录，均存笔者处。

关于《中共党史人物传》的研究、 编写和审改工作的几点意见

——1991年9月24日在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
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陈 志 凌

这次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在古城西安召开的讨论会，是一次承前启后的盛会。刘澜涛、邓力群同志在开幕式上作了重要讲话，同志们受到很大鼓舞。我就《中共党史人物传》的研究、编写方面的工作讲点意见。不妥之处，恳请到会同志批评指正。

一、《中共党史人物传》研究、编写任务 的提出和第一期计划的完成

林彪、“四人帮”被粉碎后，全国高等学校陆续招生，四门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共党史）复课。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一伙利用他们占据的权力，把党内、军内、中央和地方大批杰出的领袖人物，诬陷为叛徒、特务，使得党史教育难以进行，党史教材无法编写。从研究党史人物开始，正本清源，恢复历史本来面貌，成为当时全国党史教学人员、研究人员的共

同愿望。

万事开头难。为党史人物立传，最初也是存在许多困难的，例如，恢复重要党史人物的本来面貌问题，查阅档案资料问题，所需经费问题以及出版问题等等。

随着中共党史人物研究活动的开展出现了很多有利条件。概括起来主要有：1. 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支持和指导。本研究会成立之初，中宣部办公厅两次复信，赞成成立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同意编辑出版《中共党史人物传》，并要求扎扎实实做好编辑工作。有了他们的支持，革命老人才愿意参与我们的活动，党史工作者才敢于参加我们召开的会议，接受研究编写党史人物传任务，出版部门才能同意承担《中共党史人物传》的出版。2. 革命老前辈的关心和支持。何长工老人担任本会会长时，已是81岁高龄了。他豪情满怀，先后三次参加本会召开的大会，发表热情演讲。王首道老人多次参加大会，对党史人物研究工作，作了重要指示。陈云同志为本书题写书名。李先念、聂荣臻、刘澜涛、马文瑞等先后为本书题词。这些革命前辈的关心和支持，对开展党史人物研究活动起了重要的动员和号召作用。3. 形成了一支热心从事党史人物研究的骨干队伍。他们熟悉党史、军史，有较高的编审能力。胡华教授是这支队伍的领导者。他以丰富的党史知识，锲而不舍的忘我工作精神，树立了榜样，赢得了大家的尊敬。胡华去世后，这个队伍团结一致，同心同德，按照已商定的出版计划，继续开展党史人物的研究活动和审稿工作，圆满地完成了计划内的审稿任务。4. 坚持正确出版方向的出版社的支持。陕西人民出版社以他们最好的印刷能力和纸张，派出优秀的编辑力量，承担《中共党史人物传》的出版。在《中共党史人物传》印数锐减，亏损高达几

十万元的情况下，他们设法从别的方面填补《中共党史人物传》的亏损，坚持按计划高质量出书。

经过12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在1991年6月完成了已故会长何长工在重庆召开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二次学术讨论会上提出的编辑出版50卷《中共党史人物传》的光荣任务。

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七十周年的时候，《人民日报》发表了《坚定地走自己的路》的社论，指出：“在这个喜庆的时刻，抚今追昔，我们深深怀念为党创立、建设和发展立下了丰功伟绩以毛泽东为代表已故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深深怀念在革命战争年代为民族独立解放抛头颅洒热血的千千万万先烈，深深怀念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祖国繁荣富强奉献了自己生命的党的优秀儿女。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和陕西人民出版社赶在建党70周年纪念前夕，出齐50卷《中共党史人物传》这套大型丛书，使得老一辈革命家的业绩彪炳史册，光照千秋。这是我们向党的生日献出的一份珍贵的礼物。

二、《中共党史人物传》研究、编写 和审改工作的主要经验

1. **发动群众写传。**为中国杰出领导人立传，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单位所能承担的，必须组织广大党史工作者和关心党史人物研究的人们参加研究活动，打破党史人物研究的神秘感，使它从狭小的研究机构的圈子里跳出来，变成全国性活动。我们的基本做法是：调动四个积极性，做到三个结合。四个积极性即传主出生地党史机关的积极性，传主战友和工作机关领导的

积极性，党史研究部门和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研究人员的积极性，传主亲属的积极性。这四个方面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各有关部门主动承担写作任务，所必需的人力、物力、财力也相应地得到了解决。他们利用不同渠道，打通了各档案馆、传主战友的关系，一时间，访问老人，查询历史档案材料出现热潮。三个结合即作者和传主亲友相结合，党史教师和党史资料部门相结合，不同地区研究同一人物的作者相结合，实现三结合，就能在党史人物研究上做到密切合作，取长补短，早出成果。

2. 充分占有资料。资料是传记写作的基础。一篇好的传记总是在充分占有资料后写成的，犹如一件好的工艺品，是由工艺师在掌握大量原材料基础上，经过选材配料精制出来的。一样。搜集整理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资料是十分艰难的。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处在隐蔽的不合法的环境下进行斗争，没有条件建立人事档案。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是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形势下，长期处在打破反革命“围剿”的紧张战斗的严峻环境，文书档案难以保存。因之，我党早年参加革命牺牲的军政领导人不但生年、籍贯无从稽考，事迹记载亦多语焉不详。1928年陕西渭华起义主要领导人唐澍的生年、出生地、家世和早期革命活动都不清楚，唐澍传作者董建中、张守宪到唐澍原籍河北易县寻找唐澍出生地南贾庄，找不到。几经周折，才询问出该村早已划归徐水县管辖。从易县到徐水不通公共汽车，他们骑了一辆自行车前往，中途遇雨，道路泥泞难行，扛着自行车步行几十里，找到了唐澍亲弟弟，才搞清了唐澍家世和他早期的活动，完成了唐澍传稿。

搜集资料工作，主要要求做到六个字：系统、全面、完整。系统性是从纵向讲的，指从传主家庭身世、出生年月、早期活

动，直至去世前全过程的材料。全面性是从横向讲的，指与传主有关各方面的材料，包括有关的历史档案，会议记录，文献资料，传主工作报告、讲话、著作、诗文、书信、题词、报刊资料、回忆文章、访问记录、以及有关照片、遗物、遗墨等。完整性是指传主主持或参与领导的重要会议、战争、事件等重大问题上的材料，要求完整具体，以便客观分析传主的历史作用和功绩，不能只掌握片断的零碎的材料。这六个字反映了资料工作要求的广度和深度，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才能达到。资料工作要做到边搜集边研究，去粗取精，由此及彼，鉴定资料的真伪。重大问题还要反复研究，往返调查订正。

3. 据事“实录”和艺术创造。这是历史人物传记的特点，也是写作历史人物传记的基本要求。《中共党史人物传》作者的做法是，在熟悉掌握人物全面材料的基础上，首先从总体上对所写人物进行判断，明确人物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这位人物区别于他人的明显特征；然后按照人物历史活动发展的顺序，传稿各部分的不同要求，选用典型材料，不谀过、不溢美，如实地叙述人物的功过是非。

《中共党史人物传》虽不是文学著作，但也很重视文采，增强可读性。宋代大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提出写作要注重“事信言文”。就是说，你写出的东西，事情是真实可信的，语言表达又有文采。这是对一般写作提出的要求；也完全适合历史人物传记的写作。一个历史人物一生的主要活动和功过，不能虚构，必须按照历史事实去写。但在这个人物经历的事件中，如何刻画他的内心活动，表现他的个性特点，突出他的思想主流，那是作者驰骋的天地。《中共党史人物传》的许多作者，紧紧抓住这几条，在忠于事实的基础上，精心地进行了艺术创造，他

们笔下的党史人物形态逼真，生动感人，受到了许多读者的肯定和赞扬。

4. 认真审改。审改工作是中共党史人物传完成写作过程的最后阶段，要求把好五关。即政治关：传稿中不能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内容质量关：传稿内容丰富，重点突出，真实地反映了人物一生的本质特点；体例关：传稿写作方法符合历史人物纪传体例要求；材料关：做到立论有本有据，事实可信；文字关：语言朴实、通顺、感人。审稿进程分三阶段：初审、复审、终审，实行层层把关。初、复审认为传稿基本符合要求的，对其不足部分进行细致的修改、调整 and 补充；基本不符合要求的，随即提出具体修改意见退给作者；初、复审未发现的问题以及发现了不能解决的党史上疑难问题，由终审处理。一般传稿需经作者二、三次修改、充实，也有四、五次修改还达不到要求的，就退稿不用。由于作者水平不齐，传稿基础差距大，只有加强审改工作，才能使传稿内容充实，规格体例统一。这是保证《中共党史人物传》质量得到不断提高的有力措施。

三、改进《中共党史人物传》研究、 编写工作的建议

1. 《中共党史人物传》的人传范围。在《中共党史人物传》出版发行过程中，社会上有人提出《中共党史人物传》上为什么刊登非党人士传记？《中共党史人物传》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完成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纪传史。入传的除著名中共党员外，还包括在中国共党政

治路线影响下，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建立丰功伟绩的中国各民主党派领袖人物、海外侨胞、爱国人士、国际友人。他们的传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伟大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全貌，是中共党史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中共党史人物传》不只是中共党员传。这个问题，1979年3月在郑州召开的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筹备会上和1979年12月在广州会议通过的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章程上基本讲清楚了。今天，在中共党史人物研究活动继续发展的的大好形势下，对这个问题作些补充说明，主要的是为了在更大范围内，组织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贡献的党外人士传记入《中共党史人物传》。

2. **《中共党史人物传》的人传标准。**《中共党史人物传》人传的标准，不应只是人物的职位，主要的应看他们的历史功绩，社会影响。如果人物的职位高，但功绩不突出，不应入传；相反，职位虽不高，但在某一方面贡献突出，确有代表性的，特别是在科技、文化、艺术方面的杰出人物也可入传。各单位计划入传的人物，应从实际出发，强调其代表性、典型性，不要降低入传的标准。

3. **《中共党史人物传》中的评论。**按照中国传统的纪传史学体例要求，传记本文与评论应严格区分开。本文只能客观的叙述传主的历史功绩与过失，评论则是作者对传主的看法。例如司马迁《史记》中的“本纪”、“世家”、“列传”，前边是正文，“太史公曰”则是司马迁的评论。《汉书》中各传，前边是正文，“赞曰”后则是班固的评论。《三国志》中各传，前边是正文，“评曰”后则是陈寿的评论，等等。《中共党史人物传》前50卷中各传，基本上是客观地叙述人物的历史，但有的传记个别地方，加进了些作者的评论。从51卷起，凡属作者、编者对传主

的介绍、事迹补充和评论一律放在篇首，在正文中不再夹杂评论。

4. 《中共党史人物传》的立传形式。《中共党史人物传》前50卷立传形式，基本上是单人传，极少数合传。后50卷可以分别采用单人传、合传、集体传三种形式。合传、集体传能省掉一些重复的内容，使人物形象更集中、突出。合传、集体传可以是同一领域里关系密切的人物传，在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主要人物传，还可以在重要历史人物传后附上与这位人物一生成长、发展起过重大作用的人物传。

5. 为在中共党史上有过严重过失，甚至叛变革命的人物立传。人类社会历史总是曲折前进的，这是客观规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不例外。党成立70年来，绝大部分领导人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对中国革命进程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也有人早年信仰马克思主义，后来完全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有人在他一生中对中国革命建立过功勋，晚年却陷入反革命泥坑，等等。没有错误，也就没有正确，没有黑暗，也就没有光明。这部分人的历史，反映中国共产党从自身肌体中吐故纳新的发展过程。当然，它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部分。过去，《中共党史人物传》编委会也多次研究为这部分人立传问题，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暂时放放，时间稍晚一点。现在社会各界提出了对这部分人立传的要求，可以组织对这部分人历史有研究的专家着手为他们写传，将他们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实事求是地叙述他们的功过是非。

6. 为健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二代杰出的领导人搜集资料，准备立传。他们都是75岁以上的老人，大部分退居第二线，少数人担任现职。为当代人立传，这在史学界是有争议的。有的

人认为当代人不敢直书当代史实，原因是会引起当权者的干涉，纵有人书写当代史，亦多是隐恶扬善，阿谀奉承，歌功奉德，胡编乱造，歪曲事实。这就不是信史。后朝写前朝史，后人写前人史，这在封建社会已形成一种传统。但在今天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是为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奋斗终生。在他们一生中功绩是主要的。当然他们也不是超人，可能有这样那样的过失或错误，但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蚀，真正的共产党人是光明磊落的。他们能正确对待错误。如实反映他们的功过是非，正是他们的愿望。了解今天事变和当代人物的，莫过于他们。抢救他们头脑中的活资料，可以考证当代史上一些疑点，弥补文献史料的不足之处。不抓住这个机会，当事人相继去世，许多原始资料不能存留。这种损失是无可弥补的。

12年前，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迎来了党史人物研究上的第一个春天，经过艰苦努力，获得了党史人物研究的丰硕之果。今天，我们在西安召开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改进领导机构，动员广大党史学者投入党史人物研究活动，必将出现党史人物研究上的第二个春天。在本研究会编制的第二期党史人物传记编纂规划里，提出为健在的我党第一、二代著名的革命家立传搜集资料，为党史上有过重大过失，甚至叛变革命的人物立传，这是新问题，也是困难的问题。只要我们紧紧依靠党的领导，依靠党史人物研究学者严肃认真的工作，定能战胜困难，开创新局面，在第二个党史人物研究的春天里呈现出万紫千红，光辉灿烂的前景！

总结过去 继往开来

(1991年9月25日在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
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贾象实

从1979年春我们陕西出版单位接受《中共党史人物传》的出版任务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整整12个年头。这12年来，在中共陕西省委和陕西省人民政府的重视、领导下，我们同全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紧密配合，先后审定了620余篇、1270万字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稿，于今年6月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前夕，出齐了《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50卷，受到中央领导同志、老一辈革命家和海内外广大读者的热情鼓励。6月28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党史人物传》1—50卷出版座谈会上，萧克、陈丕显、耿飚、叶飞、马文瑞、邓力群和许多老同志热烈发言，聂荣臻、宋平、王震、薄一波、刘澜涛同志也写信、题词，充分肯定编辑、出版这套大型丛书的政治意义，赞扬这是一项“功德无量”、“惠及后世”的重大工程。党和国家领导人、老一辈革命家的讲话、来信和题词，使我们出版战线的广大职工受到巨大的鞭策和鼓舞。

回顾过去的工作，这套洋洋50卷的大型丛书所以能够编辑、出版并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主要原因有四条。

第一，中央领导同志和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关怀和鼓励

《中共党史人物传》自1980年第一卷出版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老一辈革命家一直给予了极大的关怀。

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在日理万机之中，为陕西中共组织创建人之一的李子洲的传记和西北红军创建人之一的阎红彦的传记题写了篇名。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陈云，为这套大型丛书题签，还为中共党员、台湾共产党的创建人翁泽生的传记和人民军队最早的“红色医生”傅连璋的传记题写了篇名；为同他“30年代初在上海、40年代初在延安”“共事过一个短时间”的“我党建党初期的老党员任作民”的传记题词，并且同意将他在建国前夕写的记述无锡农民领袖、浙南军委书记兼红十五军政治委员严朴生平事迹的旧作《严朴同志传略》，收入《中共党史人物传》。李先念在国家主席、全国政协主席任上，曾为杨尚奎的传记题篇名；还为皮定均、朱理治的传记分别题词。彭真在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期间及其以后，为《阎红彦》、《林枫》传题词。徐向前元帅亦曾为《皮定均》和《赖际发》传题词。

这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题签、题词、题诗，表达了他们对已故战友的缅怀与追念，也表达了他们对《中共党史人物传》的关怀。大量的题词、题诗准确地概括了共产党人永垂千秋的革命精神、品德和风范，为传记作者、丛书编委会和出版社编辑部准确评价这些历史人物提供了重要依据。

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还直接参与和指导了中共党史人物研究和传记编写、审稿活动。《中共党史人物传》上发表的绝大多数传稿，都包含着他们的辛劳，渗透着他们的心血。杨尚昆十分关心四川中共组织的创建人之一杨闇公的传记的写作，不仅帮助作者搜集到了四川早期珍贵的革命史料，还向作者介绍了杨闇公的革命经历。为陈昌、张赤男、王佐、袁文才等人立传，分别是李维汉、何长工交代的任务，传稿写出后，他们又认真作了修改。姚依林先后对“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领袖黄敬、董毓华两篇传稿作了认真审读，还指示一机部领导同志召开《黄敬》传稿讨论会。仅为这篇传记的第一、二稿提供资料和提出修改意见的，就有姚依林、吕正操、程子华、黄火青、赵健民、段君毅、李葆华、刘导生、李昌、郭明秋、周建南、周叔弢、李霁野、陈翰伯等100余人。至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提供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董必武》传和中央军委各老帅传记组提供的《彭德怀》、《叶剑英》、《刘伯承》传，则得到几乎所有健在的革命老同志的关心和帮助。为《彭德怀》传记提供资料的老同志多达三四百人。这对于保证《中共党史人物传》的政治质量和学术质量，起了重要作用。

中央领导同志和老一辈革命家的关怀，还体现在对编好《中共党史人物传》在政治方向上的指导。一直主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的胡乔木曾题词要求：“为中共党史人物立传，务求资料翔实，态度客观，体例严谨。”研究会理事会、丛书编委会和出版社编辑部十分重视乔木同志的指示，在理事会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上和编委会召开的审稿会上，反复强调传稿要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认真考证、去伪存真的基础

上编写，力求做到有本有据；评价人物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虚美、不隐恶，实事求是；并作出了统一丛书体例的若干规定。由于作者、编委和出版社编辑部共同努力贯彻这些要求，特别是把“资料翔实”与“态度客观”作为写好、编好党史人物传记的生命来对待，使这部收录了600多位著名党史人物传记的大型丛书，没有出现大的差错。

“中共党史人物传”不同于“中共人物传”或“中共名人传”，应当收录那些在历史上一贯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并肩战斗的党外战友和“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参加中国革命并为中国革命献出宝贵生命的外国朋友中的代表人物的传记。因此，在研究会的“章程”里，把他们列入了“研究范围”。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澜涛赞赏这种做法，并致函陕西人民出版社党史党建编辑室，深刻阐述了这样做的意义。他说：“我觉得统一战线在革命和建设时期都是我们党的法宝之一，希望这套丛书能像《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章程》中提到的那样，适当反映一些党外有影响的爱国、民主人士的光辉业绩。这是党外人士的成就，也是党的政策的成功。”

1986年4月，《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6卷出版，原定50卷的编辑出版任务已经完成过半。为了使关心这项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了解情况，研究会和出版社联名写了《编辑、出版〈中共党史人物传〉的汇报》。

“汇报”上呈的当月，李鹏总理来信，对这项工程给予很高评价，提出了殷切的希望。他指出：“《中共党史人物传》的审定、编辑和出版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它对研究中国革命史、党史、军史，教育后代继承和发扬光荣革命传统起着重要作用。”“希望你们再接再厉，完成《中共党史人物传》的编辑出版工作，

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同年5月18日，中央军委办公厅转来聂荣臻元帅的题词：“《中共党史人物传》介绍了几百位著名的革命先烈。他们的英雄业绩永远值得后人纪念和学习！《中共党史人物传》充实和补充了党史军史，成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教育的生动教材。做好这件工作，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

乔石曾几次嘱咐秘书为他购齐《中共党史人物传》。秘书跑了北京的许多书店都无法配齐，打电话请我们出版社帮助解决。也就在这一年的8月，出版社为乔石同志配齐了书，连同《编辑、出版〈中共党史人物传〉的汇报》一并送呈。9月12日，乔石在“汇报”上作了如下的批示：“编辑、出版《中共党史人物传》有很重要的意义，希望继续努力，圆满做好这项工作。”

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自己的工作受到党的肯定、赞誉、鼓励而更令人振奋和自豪的呢？正是由于党的领导、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老一辈革命家如此关怀、支持与鼓励，才使《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50卷的编辑出版任务胜利完成。

第二，有一支治学严谨的作者队伍

《中共党史人物传》的作者近千人，遍布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有党史、军史、现代史和党的文献研究、教学工作者，也有作家、记者、文化工作者和传主的战友、秘书与部下；有中共中央各主要领导人和中央军委各将帅传记组的成员，也有传主家乡地、县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有须发皆白的老同志，也有意气风发的年轻人。

相当一部分著名人物，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留下可

供立传的基本材料。许多作者为了从浩瀚的旧报刊文档和健在的知情老人那里，搜集、挖掘传主生平的有关材料，在各级党组织的支持下，不避寒暑，跋山涉水，可以说下了大海捞针般的功夫。《杨明斋》传成稿前的调查，就是一例。

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作出重要贡献的杨明斋，过去只知道他是山东人，1920年作为共产国际工作组成员，与维经斯基一道由苏俄来华帮助建党建团。他的籍贯究竟在山东的哪个县、哪个村？什么时候、什么原因去的俄国？在俄国和回中国后的经历，以及最后去向和生卒时间，全是空白。为了写好杨明斋传，作者开始了艰苦的调查。在从北京的一位山东籍老同志那里得知传主的籍贯是平度县后，作者接连三次赴平度，在杨姓集中的村庄逐一开会座谈，中共平度县委还利用有线广播和在《平度大众》报上刊登启事以及在县三级干部会上宣讲等多种形式，发动全县人民协助查访，前后历时三年，终于搞清了传主的出生年份、村庄，“闯俄罗斯”的时间和在俄国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参加十月革命等情况。在已有成果的鼓舞下，作者又跑了十几个省、市和地区，访问了20余位健在的知情老人，发出了200余封调查信函，不但找到了传主在国内的活动材料和著作，而且得到了传主“30年代死于苏联”的信息。作者再接再厉，先后向苏联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伊尔库次克省、市党政领导机关、苏联科学院新西伯利亚分院，直至苏共中央写了许多信，在苏联同志的帮助下，最后才搞清了这位被周恩来誉为“忠厚长者”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坎坷一生的全部历史。

即使是为那些已有传记、年谱或回忆录问世的人物立传，《中共党史人物传》的作者也没有用现成的材料去东拼西凑，非

经用亲自调查得来的第一手材料重新核实，一般都不作撰稿的依据。《邓初民》传的作者，是一位在传主身边工作数十年的老同志。1979年，他曾根据传主口述，整理了《沧桑九十年》一文在《战地》发表；1981年底，又参考传主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写的自传，将《沧桑九十年》改写成《邓初民传略》，先刊之于《晋阳学刊》，后又被辑入《中国社会科学家》一书出版；还为《辞海》写了“邓初民”条目的释文。这样一位按理说已经掌握邓初民大量史料的作者，在应邀为《中共党史人物传》撰写《邓初民》传时，也没有在原稿的基础上修修补补，而是按照丛书编委会和出版社的要求，重拟提纲，重作调查，先后访问了40多个单位和个人，阅读了传主的《政治科学大纲》等8部专著，查阅了传主主编的《唯民周刊》、《民主星期刊》，特别是两刊上登载的传主执笔撰写的150多篇文章，以及传主逝世后全国各报刊发表的有关回忆文章等。有段时间，作者天天跑北京图书馆报库、期刊库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后来索性离休，专门为写好邓初民传查找资料。经过这样一番认真的“重新调查”写出的《邓初民》传，不但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而且纠正了作者自己过去写的传略、释文中的四处重要史实错误。

个人署名的作者尚且如此重视立传材料的征集与考证，集体作者，特别是各中央领导人与中央军委领导人传记组，在这方面下的功夫更深。以中央军委彭德怀传记组为例，他们在动笔写传前，查阅了传主本人的历史档案和传主起草的大量文件、电报、信函、报告、讲话稿；查阅了与传主有关的重要会议记录。查阅“文革”期间“彭德怀专案组”的审讯记录和监护人员的日记；还在浦安修等带领下，从湖南湘潭传主的诞生地起，沿着传主一生的战斗足迹，跑遍大半个中国，访问了数百位健

在的老同志，甚至包括传主逝世前所住医院的医生、护士，历时5年之久。

作为信史，除要求材料准确外，还要评价公正，不虚美、不隐恶。《中共党史人物传》的作者，坚持了这种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如《李立三》传，作者在传稿中既写他四个月“立三路线”错误的形成、发展及其给党造成的危害，又以确凿的史料，记述他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为中国革命作出的重大贡献。功是功，过是过，是非分明，客观地反映了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

正是近千名作者这种求真、求实的科学态度，为这套大型丛书赢得“信得过”声誉打下了基础。没有他们在各级党组织的支持下，提供经过艰苦深入调查研究、反反复复修改的传稿，就不会有50卷《中共党史人物传》的编写与出版。

第三，有一个干实事的审稿班子

《中共党史人物传》的编委会和参与审稿的成员，大都是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出版社、杂志社对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现代史有较深研究的教授、研究员、编审或副教授、副研究员、副编审。然而，《中共党史人物传》编委会的特点，不仅仅在于它的实力雄厚，更在于它是一个干实事的审稿班子。作者送来的每一篇传稿，除传主规格太低，不符合《中共党史人物传》的收录条件外，都经过这个审稿班子的认真审改，50卷书上刊出的628篇传稿，就是在这个审稿班子历时10年，先后召开的22次审稿会议上审定下来的。

编委会的审稿会实行“三审制”，重点是把好政治关和史实

关，目的还是为了求真、求实。担任初审的审稿成员，在通读全稿后首先衡量传主够不够入传条件；对传主符合入传条件的稿件，再细审材料是否完整、准确，评价是否客观、公正；然后对基本反映了传主历史面貌的稿件进行材料核对、文字加工，写出修改加工情况和建议采用理由的书面意见，送副主编复审。副主编认真审读初审人修改加工过的稿件，如同意初审人建议采用的意见，对稿件再作查核、加工，写出复审意见送交主编终审。主编每稿必审必改，审改后不仅写出是否采用的意见，而且写出对传主在党史上地位、作用的评价和稿件质量的评语。对于那些或因材料不全、或因史实不确、或因文字过粗的稿件，初审、复审的同志均写出中肯具体的意见，退作者再作查核、补充或修改。不少稿件退修了两三次，有的还退修四五次。多次退修的稿件，在史料基本补齐、核准以后，确因作者文字功底较差，再退修也难以达到出版水平的，主编则指定审稿成员帮助作者重新整理或改写。这样一来，一篇传稿常常要经过好几次审稿会才能审定，附在传稿上的审稿意见也就往往不是一份，而是两份、三份，甚至四份、五份。保存在出版社编辑部的那一摞足足有二尺厚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编委会审稿签》和与作者的来往信函，是主编、副主编和所有审稿成员干实事、严把关、辛勤劳动的见证。

编委会成员来自各个方面，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出于对中共党史的热爱，对中华民族一代英豪的崇敬，对编好这套丛书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深刻理解，他们尽量抽出时间参加审稿活动。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这个审稿班子所有同志那种为严格把关的忘我工作精神。每次审稿会，大致要审阅200余万字、编定50余万字的稿子，每个审稿成员平均要审改10余万字，短

短10天时间，任务相当艰巨，每天工作都在10个小时以上。编委廖鑫初，是中南财经大学一位很有才华的中年教师，1982年在长春审稿，由于旅途颠簸和连续紧张的工作，竟于8月2日不幸猝死，年仅45岁。胡华教授带领审稿成员向遗体告别时说：鑫初同志是累死的！我们要永远记住他为中共党史人物立传所作的贡献，同时也请诸位爱护自己的身体。然而，胡华——这位在在党史学界享有盛名的教授、专家，却首先没有去爱护他自己的身体！经过复审的所有传稿，都由他一人逐一终审，审稿会上他每天都工作到深夜12点以后，审不完的稿子会后带回工作单位利用节假日、星期天审。他也累病了，1987年7月第16次审稿会后不得不住进医院。但是，住在医院里他仍背着护士终审了30余万字的传稿，直到12月8日临终前6天，还再三叮嘱即将启程参加第17次审稿会的编委和出版社同志：一定要把审稿会开好，一定要善始善终地把50卷书稿审完。

到1990年夏，50卷《中共党史人物传》书稿终于审完了。人们在评论这项工程质量的时候，忘不了10年来为这项工程付出巨大心血甚至献出宝贵生命的丛书编委会的专家、学者们。

第四，省新闻出版局和我们出版社一直将《中共党史人物传》的出版列为重点工程

1979年，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还在筹备阶段，陈志凌同志到陕西联系《中共党史人物传》的出版工作。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闭幕，各条战线，特别是理论、宣传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刚刚开始，党史人物的研究和党史人物传记的出版，仍然被许多人视为禁区，在这种情况下，答应接受《中共党史人

物传》的出版，是要有很大勇气的。出版局、社的领导同志认真学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认为为中共党史人物立传，恢复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是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需要，是出版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光荣任务。于是，我们冒着风险，接受了《中共党史人物传》的出版任务，并将其列为局、社的重点工程。此后，出版局、出版社、五二三厂和省新华书店的领导班子几经更迭，但是，《中共党史人物传》作为出版、印刷、发行重点工程这一点，始终没有动摇。近几年来，随着图书市场的萎缩，《中共党史人物传》的发行量大幅度下滑，由第1卷的11万册，跌到1500册，每出一卷书，亏损近2万元。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局领导、社领导的决心也始终没有动摇，我们曾多次向研究会表示，亏损再大，我们也坚持把50卷出完，因为这确实是一项教育子孙后代永远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工程。

为了保证把这套书编好、出好，我们在接受出版任务后，即调整编辑力量，并成立了党史党建编辑室。出版局、社领导同志还多次去五二三厂、新华书店座谈，共同研究解决《中共党史人物传》的印刷、发行工作中的问题，保证了这套书的成书质量。

尽管我们作了努力，但在这套书的出版问题上，还有不如人意的地方，如个别传记的个别史实仍不够准确，书中还有错别字，对这套书的宣传推广和评论工作做得还不够，还没有充分发挥出它应有的效益。所有这些，还希望大家批评、指正。我们将认真研究，努力改进。

去年3月，研究会提出了《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二期编纂规划，即再用10年时间，再编50卷书，使我党第一、二代著

名领导人的传记都能收入这套丛书。这一计划已经得到中央许多领导同志和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宋平同志6月26日在给研究会和我们出版社的信中指出：“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完成百卷的编纂任务，为党史研究做出新的贡献”。邓力群同志在6月28日的座谈会和这次大会的讲话中，更对今后的出版工作作了具体、重要的指示。我们认为，在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国际资本主义势力加紧实施和平演变策略的情况下，继续编辑出版《中共党史人物传》，完成研究会提出的第二期规划，宣传共产党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伟大目标英勇奋斗，艰苦创业的丰功伟绩，更具有重要的、直接的现实意义。

中国目前的国际地位，是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不能比拟的。我们要珍惜国内政治、经济的安定局面，全党全国人民才能集中全力搞好经济建设。经济搞上去了，基础稳固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所以，用中国共产党人为国家民族英勇奋斗的光辉历史和中共杰出人物的光辉形象教育人民，继承和发扬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把全国人民都紧紧地团结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团结在党的周围，努力实现党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任务，是我们出版战线广大职工的任务，也是我们党史教学和研究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希望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能尽快制定第二期人物研究的实施规划。关于出版工作，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牟玲生同志已经表示欢迎这套丛书继续在陕西出版，我们已将这一规划上报并被列入国家“八五”重点图书选题规划。我们真诚地愿意以更积极、主动、认真的态度，继续与研究会紧密配合，为完成《中共党史人物传》第51—100卷的编辑、出版、发行任务而奋斗。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章程

(1991年9月27日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通过)

第一条 会名：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

英文译名 Society on the Research of the Figur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第二条 性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共党史、军史、革命史工作者自愿结合的群众性学术团体。

第三条 宗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通过研究中共党史人物、编辑出版中共党史人物传记，宣传中国共产党人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光辉业绩，总结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发扬革命传统，繁荣党史科学，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的发展。

第四条 任务：

1. 研究五四运动以来各个历史时期中共著名领导人、著名革命先烈和部分一贯支持中共、与中共亲密合作的爱国民主人士，以及部分参加中国革命并为中国革命作出突出贡献的外国朋友的思想发展、生平事迹，宣传他们对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的丰功伟绩。

2. 编写、审定党史人物的传记，主持编辑《中共党史人物

传》丛书。

3. 组织交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成果和中共党史人物传记编写经验。

第五条 会员：

本会会员分团体会员与个人会员。

凡承认本会章程，有志于从事中共党史人物的研究和宣传、进行中共党史人物传记的编写和评论的国内社会团体和个人，可以申请加入本会。

省、市、自治区的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组）申请加入本会，经常务理事会讨论通过，为本会团体会员。未建立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组）的省、市、自治区，个人志愿从事中共党史人物研究和传记写作并向本会提出入会申请者，经常务理事会讨论批准，为本会个人会员。

会员享有下列权利：

1. 参加本会召开的有关会议和本会举办的学术交流活动。
2. 研究成果（传稿），优先在本会编辑的《中共党史人物传》丛书上发表。
3. 在本会学术讨论会和本会办的刊物上，参加关于人物研究和传记写作问题的讨论。
4. 对本会的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

会员必须履行下列义务：

1.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守党的宣传纪律，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2. 承担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传记编写和本会委托的有关任务。
3. 反映各地开展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传记编写的信息。

4. 宣传并协助发行本会编辑、正式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和其他书刊。

第六条 组织：

本会的权力机关是会员代表大会，执行机关是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理事会。理事会向会员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会员代表大会每四年举行一次，由理事会召集。会员代表由各团体会员选举或协商产生，名额由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决定。理事会理事为当然代表。常务理事会可以邀请若干名特邀代表；特邀代表没有选举权。

会员代表大会的职权是：

1. 听取和审议理事会的工作报告、会务报告、经费收支报告；
2. 讨论和通过中共党史人物研究和传记编写规划；
3. 讨论和决定中共党史人物研究和传记编写、出版等重大问题；
4. 表彰奖励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优秀成果和优秀组织、编辑工作者；
5. 修改本会章程；
6. 选举理事会。

理事会每届任期四年。会员代表大会如提前或延期，其任期则相应改变。理事会全体会议由常务理事会召集。

常务理事会和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由理事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中共党史人物传》编委会主编、副主编、编委由理事会全体会议决定；本会顾问由理事会全体会议通过聘请。常务理事会在理事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理事会的职权，组织实施研究和编写规划，决定部分副秘书长、常务理

事、编委会成员的增补与调整，领导编委会的工作，接受新会员。

会长负责召集常务理事会，并主持理事会、常务理事会的
工作。副会长协助会长工作。

秘书长在常务理事会和会长领导下，主管本会办事机构，处理日常工作，掌管经费收支。副秘书长协助秘书长工作。

《中共党史人物传》丛书编委会是本会的下属机构，在理事会、常务理事会领导下，由主编主持，负责传稿的审定和丛书的编辑工作。常务理事会成员为编委会当然编委。

第七条 经费来源及财务管理：

本会经费来源是：

1. 会员会费；
2. 国内外捐赠；
3. 政府部门资助；
4. 与本会业务有关的有偿服务；
5. 其他合法收入。

本会办公室设专人管理财务，经费支出由秘书长审批，接受挂靠单位财务监督。

第八条 终止程序：常务理事会认为有必要终止本会活动，经会员代表大会或理事会全体会议讨论同意，由法定代表人按《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办理本会注销登记手续。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聘请顾问名单

(1991年9月27日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通过)

杨尚昆 习仲勋 王首道 刘澜涛 陆定一
陈丕显 萧 克 马文瑞 乔明甫 莫文骅
李 新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 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 关于聘请名誉会长的决定

(1991年9月27日通过)

出席全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暨第五次学术讨论会的全体代表，一致同意聘请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邓力群同志，担任全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名誉会长。

1991年9月27日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 第二届理事会理事名单

(1991年9月27日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洪武	王 淇	尹俊忠	巨彩丽	吕芳文
朱佳木	李力安	李仲凡	李宏塔	李肇年
杨 力	吴忠才	宋 春	陈文秀	陈志凌
罗正楷	罗占元	罗宗荣	赵俊清	胡提春
哈经雄	姚鸿瑞	钟修文	贾象实	郭洛夫
黄景山	阎景堂	康裕震	蒋伯英	熊美杰
翟作君	樊宪良			

江西省、公安部政治部、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中心各出一名理事，暂缺。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 第二届常务理事会成员名单

(1991年9月27日第二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

名誉会长 邓力群

会 长 李力安

副 会 长 王 淇 陈志凌

秘 书 长 陈志凌 (兼)

副秘书长 郭洛夫

常务理事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洪武 王 淇 朱佳木 李力安

陈志凌 贾象实 郭洛夫 阎景堂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 《中共党史人物传》编委会组成人员名单

(1991 年 9 月 27 日二届一次理事会通过)

主 编： 王 淇 陈志凌

副 主 编： 郭洛夫 军队一名（暂缺）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洪武	王 淇	王 敏	王德宝
方大铭	卢 权	刘勉玉	吕芳文
朱佳木	汪 新	宋 霖	张广立
张守宪	李良明	陈志凌	陈瑞云
吴殿尧	郑洪泉	郑建英	孟晓敏
姜廷玉	郭洛夫	唐曼珍	黄 瑶
阎景堂	蒋伯英	翟作君	魏克忠